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十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 桦 主编

第十卷

民国篇目录(上)

第一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
一、假共和与同盟会的改组	(1)
二、二次革命	(6)
江西作战	(8)
徐州地区作战	(9)
南京保卫战	(10)
上海及其他省市的作战	(11)
三、白朗起义	(13)
四、中华革命党	(14)
五、袁世凯复辟帝制	(16)
六、护国战争	(22)
四川之役	(23)
湘西之战	(25)
滇桂边境作战	(26)
第二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28)
一、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28)

二、西原借款	(36)
三、护法战争	(38)
第一次湘战	(39)
四川靖国之役	(40)
闽、粤地区作战	(41)
第二次湘战	(43)
四、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疆的分裂活动	(45)
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动	(45)
西北边疆的分裂危机	(50)
西姆拉会议及麦克马洪线	(52)
第三节 新时期的曙光	(54)
一、农村经济的变化	(54)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	(61)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67)
四、新文化运动	(70)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75)
六、“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生	(77)
实用主义	(78)
基尔特社会主义	(79)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80)
无政府主义	(81)

第二章 北洋军阀的覆灭

第一节 皖系军阀的统治	(83)
-------------------	------

一、皖系军阀的对内政策	(83)
二、皖系军阀的对外政策	(84)
三、五四爱国运动	(85)
第二节 直系军阀的统治	(92)
一、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	(92)
直皖战争	(92)
第一次直奉战争	(92)
“法统重光”与“曹锟贿选”	(93)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94)
华盛顿会议	(9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96)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96)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99)
三、中共二大的召开	(100)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	(102)
香港海员大罢工	(102)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惨案”	(103)
早期的农民运动	(105)
第四节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106)
一、改组革命党	(106)
二、第二次护法战争	(107)
三、孙中山的伟大转变与改组国民党	(109)
四、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	(112)
西湖特别会议	(112)
中共三大	(113)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1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5)
黄埔军校	(117)
工农运动的复苏	(118)
第五节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119)
一、江浙战争	(119)
二、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124)
三、临时执政府的统治	(130)
临时执政府	(130)
善后会议	(132)
金佛郎案与关税特别会议	(133)
奉浙战争	(134)
郭松龄反奉之战	(139)
三·一八惨案和执政府的垮台	(145)
四、西南军阀的演变	(147)
第六节 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	(149)
一、中苏协定	(149)
二、孙中山北上	(150)
三、孙中山逝世	(152)
四、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	(152)
中共四大	(154)
五卅运动	(154)
省港大罢工	(157)
第七节 国民革命的高涨	(159)
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	(159)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59)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62)
二、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165)
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165)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170)
三、北伐战争前的军阀混战	(171)
刘、杨联合驱袁之战	(171)
国奉直南口之战	(175)
四、北伐战争	(179)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181)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184)
五、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188)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18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0)
第八节 国民革命的转折	(192)
一、国民革命局部受挫	(192)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92)
迁都之争与恢复党权运动	(193)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6)
二、国共合作的破裂	(198)
马日事变	(198)
七·一五政变	(199)
三、地方政权的更迭	(201)
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	(201)
龙云与胡若愚云南之战	(204)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208)
四、宁汉纷争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12)
“三足鼎立”的中国政局	(212)
龙潭之战	(213)
宁汉纷争	(218)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19)
五、第二次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220)

第三章 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

第一节 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	(226)
一、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226)
二、国民党的初期的内政和外交	(228)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训政”	(228)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	(229)
三、新军阀混战	(233)
四川同盟军反对刘湘之战	(233)
蒋桂战争	(235)
蒋冯战争	(239)
唐、石联合反蒋之战	(244)
桂粤联军反蒋之战	(251)
蒋、冯、阎中原大战	(257)
张、蒋讨石之战	(267)
宁粤战争	(271)
第二节 中间派别的产生	(275)

一、第三党	(275)
二、改组派	(277)
三、人权派	(279)
四、乡村建设派	(282)

第四章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285)
一、革命低潮中的崛起	(285)
南昌起义	(285)
八七会议	(295)
秋收起义	(298)
黄麻起义	(304)
广州起义	(309)
湘南暴动	(322)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330)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展湘鄂边游击战争	(337)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343)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	(354)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反“围剿”斗争	
.....	(356)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围剿”	(356)
红四军第二次反“围剿”	(357)
红四军第三次反“围剿”	(359)
红四军第四次反“围剿”	(360)

四、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	(362)
中共六大	(362)
古田会议	(364)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366)
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起伏	(369)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369)
“九·一八”事变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369)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371)
“一·二八”淞沪抗战	(374)
伪满洲国的建立	(376)
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加强	(377)
“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提出	(377)
法西斯统治网络的形成	(379)
党化教育与新生活运动	(381)
三、局部抗战的再度夭折	(383)
长城抗战	(383)
福建事变	(385)
四、国民党新军阀的再次混战	(386)
王家烈与毛光翔贵州之战	(386)
韩复榘与刘珍年山东之战	(391)
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	(393)
刘文辉与邓锡侯 毘河之战	(400)
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新疆之战	(404)
孙殿英与马鸿逵宁夏之战	(410)
五、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经济状态	(414)

民族工商业的衰退和农村经济的凋敝	(414)
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	(416)
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	(417)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419)
第三节 工农武装革命的	
深入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421)
一、中华苏维埃民主政权的成立和巩固	(421)
“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421)
红三军团打长沙	(423)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	(426)
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南征	(428)
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433)
其他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437)
双桥镇战斗	(437)
黄安战役	(441)
宁都起义	(446)
陈家河、龙王集战斗	(452)
赣州战役	(454)
文家墩战役	(458)
苏家埠战役	(459)
漳州战役	(464)
新沟嘴战斗	(468)
南雄、水口战役	(471)
乐安、宜黄战役	(47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479)

苏区各项建设的展开	(481)
川陕和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	(482)
川陕根据地红军反“三路围攻”	(482)
宣达战役	(490)
郭家河战斗	(495)
潘家河战斗	(497)
二、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499)
王明路线及红军长征	(499)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	(504)
湘西攻势	(509)
龙家寨战斗	(512)
浯溪河战斗	(514)
红军长征的胜利	(517)
湘江战役	(517)
遵义会议及四渡赤水	(522)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535)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540)
红军长征的胜利	(543)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545)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545)
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秋冬反“讨伐”作战	(546)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53)
一、华北危机	(553)
二、“一二·九”运动	(557)
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559)

《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559)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与西征	(562)
红一方面军东征	(562)
红一方面军西征	(569)
四、南京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初步调整	(578)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578)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579)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580)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	(582)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85)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585)
西安事变和及其和平解决	(587)

民国篇

上

第一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一节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一、假共和与同盟会的改组

在辛亥革命失败和袁世凯假共和手法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政府力量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和改组，许多人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了“政党时代”，今后主要应该从事议会政治中的政党活动。民国元年春天，各种政党和团体不过 20 个，后来增加到 300 多个，为了争夺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

在同盟会内部，自孙中山辞职以后，妥协的势头更加占据上风，领导者之间意见分歧，各行其是。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章炳麟，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不久，即与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组成统一党。

湖北一部分拥护黎元洪的同盟会员组成了民社。

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他们拥护袁世凯,想以此分享政权。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和内阁的限制,这就妨碍了袁世凯独裁野心的实现。于是,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打着民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种措施,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首先向责任内阁制开刀。

南北妥协后产生第一任责任内阁,总理是同盟会员唐绍仪,由于同盟会员在内阁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内阁中军事、内政、财政、外交等大权,完全被袁世凯集团所控制。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袁世凯感到不能如意指挥、独断专行,在6月间,利用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未经内阁副署,而发布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被迫辞职,同盟会4个阁员也相继退出内阁。这是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的开端。

唐绍仪内阁辞职后,袁世凯就任命“驯顺如羊”的外交家陆征为所谓无党色彩的“超然内阁”。因参议院反对,“超然内阁”流产。于是,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亲信内阁长赵秉钧代理,从此,内阁便成了袁世凯直接掌握的政权机构。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革命政党加强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但同盟会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指出了“元凶尚存,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又有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分会部分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再次发表宣言,指出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议论歧为万途”,警告“当临时政府之,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但不仅无法阻止涣散情况,反而更加严重。

1912年2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决定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制定了同盟会的新总章。新纲领同过去比较起来,政治上显然有所倒退。特别是以“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代替“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抽掉了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对广大群众失去了号召力。在民族问题上,它提出“种族同化”的错误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起了恶劣的影响。在组织上,根据宋教仁扩大吸纳会员的建议,把黎元洪这样的人也拉入了同盟会会员蜕化变质和立宪派、旧官僚打得火热,为猎取个人权位而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孙中山等坚持革命主张的革命党人被攻击为“理想家”,在同盟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自称都督,李燮和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担任浙江都督府总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允许在自己管区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暗杀了陶成章。这一举动不仅使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不可收

拾,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心中投下阴影。

辛亥革命以后,章炳麟是同盟会中明显右转的代表性人物。章原是同盟会中较有影响的宣传家,但是在参加革命之初就背着沉重的封建思想文化包袱。武昌起义后,黄兴就“扩大同盟会”这一重大事宜询问其意见,他认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认为不能“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的这个主张,影响极坏,后来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时指出:“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从此,章炳麟越走越远,直接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一党专制”。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张謇为“特务干事”。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词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攻人非无秕政。”并在该报上公然宣布不改用阳历,以此和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对立。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

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军事领袖。在临时政府期间,他忠于革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支持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力主对袁妥协。

除了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分歧外,相当多的同盟会员由于民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错误地以建成民主政体为满足。这样

共和万能论使许多人成为目光短浅的庸人,许多人沉溺于“革命成功”的幻觉之中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热衷于争权夺利。

综上所述,担任领导革命大业的政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一个政党当然不可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到了南北“统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权力斗争,致力于“社会革命”,振兴实业,以发展社会经济来巩固“中华民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和孙中山的政见不同,坚持树立多数政党,实行责任内阁制,进行议会斗争。

宋教仁是一位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革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几乎都进入他的视野,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经过长时间探索,他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的胜利,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已经瓦解,需要建立一个大的政党来占据国会中的多数。他的目的是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应该说宋教仁等人积极进行同盟会的改组活动是为了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他们四出胥走游说,并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改变了同盟会的领导体制,由总理制改为理事会议制。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将“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竭力避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所触及,甚至连“男女平权”一条也被剔除了。虽然选举孙中山为

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王芝祥为理事。但实际上宋教仁取得仅次于孙、黄的票数,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政党。

二、二次革命

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破坏民主共和,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筹划消灭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为复辟帝制排除障碍。1913年春孙中山去日本访问,国民党推选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宋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企图以责任内阁制度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当时,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宋立即在南方各省奔走呼号,抨击时政,踌躇满志地启程去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授意内阁总理赵秉钧派遣特务武士英,于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宋教仁。4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盐税和海关税收做抵押,悍然向美、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以扩充军备。5月1日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取代赵秉钧任代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袖。6日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总方针,决定以赣、苏为用兵重点,控制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两干线;以湖北为攻赣通道;派北洋军主力部队进攻江西、江苏;以广西陆荣廷、龙济光及滇、黔军队从侧背牵制南方革命军队;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此时,袁军第6师已部署在湖北兴国(今阳新)、蕲春、田家镇一

带,前锋抵达武穴,与赣军隔江对峙。6月,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将通电反对大借款的国民党人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都督下令免职。7月初,袁军第6师师长李纯率部由鄂入赣,占据九江外围诸要点,对九江城形成包围态势,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晚召开党内领导人会议,讨论解决宋案问题。孙中山主张以武力解决,立即兴师讨袁,黄兴等对武力讨袁缺少信心,主张以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在重大策略问题上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迟疑不决。4至6月,孙中山又曾三次召集军事会议,继续研究讨袁事宜,并敦促南方各省独立,但均无结果。直到7月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危及革命党人生存之际,李烈钧接受孙中山指令,12日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告江西独立,组成讨袁军。15日黄兴入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16日通电独立,兴师讨袁。接着,皖、粤、闽、湘、川等省及上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

袁军以第1军军长段芝贵指挥第6师全部、第2师一个混成旅共约1.5万人,进攻江西;第2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一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第4、第5、第20师各一部及武卫军(张勋部)共2.5万人,沿津浦铁路南下,进逼苏、皖,攻取南京;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应瑞”、“肇和”等舰并载运陆军两个团到沪,控制上海和苏南地区;海军次长汤芎铭率“飞鹰”等军舰4艘沿长江赴江西策应第1军进攻九江。江西讨袁总司令李烈钧以赣军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1、第2、第5团从德安方向进攻九江;以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9团及独立营从姑塘进攻九江;以水巡总

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第10团守备湖口。企图扼守湖口,夺取九江,伺机跨江北征。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以第3师扼守徐州,并派第8师混成旅由南京开赴徐州加强防务,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冯国璋部南下;以第1、第2师布防于淮阴、扬州一带,阻止张勋部进攻。

江西作战

7月11日袁军第6师第23团越过沙河一线,不断向赣军开炮挑衅。次日拂晓,讨袁军林虎左翼军由德安向九江沙河镇反击,首战告捷,毙伤袁军第23团300余人,占领沙河镇、铜鼓岭、骆驼山等地,迫敌退守瓜子岭。袁军第6师师长李纯惊慌失措,急电袁世凯迅速派兵增援,以救危局。当时,林虎左翼军未乘胜追击,又因方声涛右翼军行动迟缓,当林部与袁军苦战时,方部尚未进入攻击阵地;驻九江城内的讨袁军亦按兵不动,丧失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袁军第6师的良好机会。13日两军又激战竟日,不分胜负。14日拂晓,李纯集中3个团向沙河镇——苗家湾一线发起进攻,林虎部顽强抵抗,战到下午不支,向蓝桥方向撤退。15日,黎元洪令袁军第2师迅速由鄂开赴九江,攻击湖口,配合第6师进攻德安。16日,讨袁军右翼军向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在八里坡一线激战,袁军竭力抵抗,势几不支。李纯急调两个营抄袭方部左侧,战至傍晚,方部失利,被迫退却。方部退却途中,第9团团长的被叛徒枪杀,第1、第3营及炮队、机关枪队投敌。右翼军遭此挫折,丧失了进攻能力。李烈钧见左、右两翼军失利,遂将司令部由湖口移往吴城,部署节节抵抗,以待湘、粤援军。由于湘、粤援军迟迟不

发,江西战场力量对比发生逆转。17日,袁军第2师开赴九江。23日袁军分三路向湖口一线展开攻击,海军次长汤芑铭率“飞鹰”等舰支援。25日袁军攻陷湖口,次日占领姑塘。此时讨袁军左翼仍扼守瑞昌、蓝桥一线,右翼军退守南康(今星子)、吴城。7月30日,袁军分三路从九江、湖口、姑塘向瑞昌、南康、德安攻击讨袁军,8月1日占瑞昌、南康。李纯率部正面攻击讨袁军左翼军,林虎率部边战边撤,在黄老门作战中,利用有利地形,予袁军以重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放弃黄老门经德安、建昌(今永修)、奉新向赣湘边境转移。袁军8月8日陷吴城,10日占建昌。李烈钧率方声涛余部弃吴城后退往南昌,将所剩两个营及南昌城守军两个营布置在城北乐化、樵舍,组织防御。16日李纯令第11旅及第22团分两路向南昌进攻,讨袁军已无力反击,遂撤离南昌城,18日南昌陷落。李烈钧、林虎率余部退往湖南,方声涛率余部退往上饶。江西讨袁作战宣告失败。

徐州地区作战

7月15日,江苏讨袁军第3师占领利国驿。16日向韩庄袁军第5师方玉普旅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韩庄。方部坚守待援。次日,讨袁军继续猛攻,亦未得手。张勋派武卫前军统领张文生率部驰援,向第3师猛烈反击,讨袁军不支,撤至柳泉。黄兴急令第8师混成旅等部增援,会合第3师反攻制胜,19日又将袁军击退至韩庄一线。后因混成旅回守六合,前线力量削弱,加上第3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率部投袁,并向撤退途中的讨袁军攻击。第3师腹背受敌,无力抵抗,遂放弃徐州,

向蚌埠退却。24日袁军未遇抵抗,占领徐州,至月底占领淮阴、扬州,直逼镇江。黄兴获悉徐州失守,湖口兵败,28日夜乘日轮离宁赴沪,因无法上岸,遂前往日本。程德全立即宣布江苏取消独立。黄兴出走后,讨袁军主要将领亦相继离去,南京陷入“三军无主”的局面。8月初冯国璋部攻占蚌埠、临淮关、滁县等地。

南京保卫战

8月8日,国民党人何海鸣潜入南京,宣布江苏第二次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推第8师师长陈之骥为江苏都督。当晚陈拘何于第8师司令部,再次取消独立。后何被第1师官兵解救出,第三次宣布江苏独立。何组织第1、第8师等余部分守富贵山、雨花台高地及狮子山、天堡城诸炮台和城门,决心固守南京。14日,张勋部与徐宝珍师突袭紫金山,守军叛变,袁军不战而克。讨袁军第8师等部发起反击,夺回天堡城,轰击紫金山。16日后,两军反复争夺天堡城,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天堡城五易其手,至21日终被袁军占领,南京失去屏障。27日,张勋、冯国璋部向太平门、朝阳门(今中山门)、神策门、雨花台进攻,刘冠雄以舰炮配合冯部进攻狮子山。讨袁军固守阵地,大量杀伤袁军,袁军进攻受阻。29日,袁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全面包围。31日发起总攻。9月1日,张勋部用地雷轰开太平门、朝阳门之间的城垣,蜂拥而入,相继攻占神策门、通济门。讨袁军被迫撤出城外。下关、狮子山炮台亦相继失守。南京守军与袁军在众寡悬殊、孤立无援的条件下,进行了20多天的顽强奋战,最后终于失陷。南京保卫战是整

个讨袁战争中最为悲壮的一幕，守城官兵英勇无畏，誓死抗敌的战斗精神，为讨袁战争谱写了最光荣的一页。袁军入城后大掠3日，肆意抢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冯国璋部纵火焚烧了下关，烈火数日不熄。南京人民遭到惨重蹂躏。

上海及其他省市的作战

7月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任讨袁军总司令。23日指挥第61、第37团及松军等部向上海军事重地——江南制造局进攻。袁军在海军巨炮支援下，击退讨袁军。当晚，讨袁军再攻，仍未奏效。以后数日连攻不克，伤亡惨重。30日，讨袁军一部退往闸北被租界英军缴械；一部退往吴淞、宝山一带。8月2日，孙中山见宁、沪战事失利离沪赴粤，后在福州改道台湾，流亡日本。8月13日袁海军占吴淞，讨袁军退往嘉定，随即解体。陈其美逃往日本。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讨袁军总司令，第1师师长胡万泰代理都督。8月初袁军倪嗣冲部攻占凤台、寿州、正阳等地。8月7日，胡万泰倒戈，宣布取消独立，率部攻打都督府，继攻芜湖，柏文蔚率部坚持战斗数日，后出走南京。安徽讨袁作战遂告失败。广东方面。7月18日，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通电讨袁，陈任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22日，袁世凯密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巡防营统领龙济光入粤讨陈。龙部即由梧川东下，直趋广州。8月4日，广东讨袁军炮兵团、辎重营等部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逃往香港。第1、第2师师长及第5旅旅长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广东讨袁也遭失败。

7月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在湖南革命派反袁情绪高涨的形势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后见赣、皖、苏三省讨袁接连失利,遂于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

7月19日,第14师师长许崇智迫使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独立,孙仍任都督,许任讨袁军总司令。许曾准备派兵援赣,但军队不愿出省作战,难以调动,加之赣、沪等地讨袁军屡遭挫败,许崇智离省逃往香港。8月13日孙道仁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

8月4日,第5师师长熊克武宣布重庆独立。同日,革命党人张百群在川西组织讨袁军。川督胡景翼派川东宣抚使王陵基率部向讨袁军进攻,并派四个师围攻重庆。袁世凯令拿办熊克武,并令鄂、陕、滇、黔四都督派军队会合兜剿。熊部奋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各路战事均告失败。9月8日,王陵基部向重庆北面门户合川发动进攻,熊率数千人与之大战,结果败北,11日熊克武出走,后流亡日本。其它各省也有些小规模起义,如湖北沙洋驻军第32团团长刘铁,广西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浙江宁波顾乃斌等,一度宣布独立,都旋起旋灭,没有发展成一支较大的势力。

不到2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之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

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三、白朗起义

白朗(1873——1914年),河南宝丰县人。辛亥革命时期,他在宝丰一带率众进行反清斗争。袁世凯篡夺政权后,“民生凋敝,日益加甚”,河南人民“十(之)八不能自活”。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1913年夏,白朗接连攻陷唐县(今唐河)、禹县等城,并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名义发布告示,声震豫西。袁世凯严令河南都督张镇芳限期肃清,同时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3万人。白朗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由豫西东进,1914年1月入安徽,攻克六安,2月又攻克霍山。白朗的进军,引起袁世凯的震惊,下令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段祺瑞驰赴信阳“督剿”,指挥北洋主力,企图聚歼白朗军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白朗军避敌主力,突围入鄂。3月,一举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并打劫当地豪富和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等,使中外反动派惊慌失措。各国驻华公使接连集会,并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袁世凯在致段祺瑞电中谓:“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

攻克老河口后，白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大计。这时部队已近万人，加以整编，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决定进军西北。白朗军攻克荆紫关及进入陕西后，都曾张贴安民布告，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用是纠合豪杰，为民请命”；肯定辛亥革命的功绩，“君权推倒，民权伸张。”显然，白朗斗争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先后到白朗军中工作，并为之而牺牲。

白朗起义军没有进攻西安，而是用兵渭南一带，随后破凤翔、固关，进入甘肃境内。1914年5月，先后攻陷伏羌（今甘谷）、秦州（今天水）、岷县、洮州等城。攻取洮州后，敌军云集包围，且长期苦战，不得休息，白朗遂决定突围回河南。6月，白朗军回到河南鲁山、宝丰一带。白朗军沿途屡经激烈战斗，又时遭截击，损失惨重，虽仍有数千人，但战斗力大大削弱，无力与敌军对抗，只得分为几股活动。8月，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一带与敌军激战，负伤牺牲。其他各股也先后失败。

白朗起义历时2年多，纵横5省，攻破县城40余座，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低潮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鼓励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的斗争信心。

四、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他鉴于以前失败的

教训,认为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是立党,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吸收了第一批党员。在孙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后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至1914年4月间已达四五百人。是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总理。《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其后发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确指出,“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严密组织,并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凯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是积极的。但是,它存在的弱点和错误也是明显的。首先,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没有提出反帝纲领。其次,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对纯洁党的组织,改变组织涣散,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并按指印,这种做法则是落后的,以致不少老同盟会员不愿参加。总章中还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等,所享权利不同,人为地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从而加深了党内的隔膜,脱离了群众。再次,中华革命党坚持斗争是正确的,但却过分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

黄兴等一批同盟会、国民党中骨干力量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一方面不同意服从个人和入党办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和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黄兴周围的一些原同盟会、国

民党成员,拟拥黄兴为领袖,另行组党,同孙中山派分裂。黄兴没有接受,“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国游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以讨论欧事为名,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100多名,主要是追随黄兴的国民党军事骨干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的政治主张,但在斗争策略上反对孙中山派的“急进”方针,主张“缓进”方针,存在着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揭露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罪行;还在上海和海外办些报刊,派人到会党和一部分军队中策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它存在着上述的弱点和错误,影响远不如同盟会。

五、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在南方用武力镇压“三次革命”,但在北方却暂时保留国民党员占多数的国会,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于1913年7月任命该党的熊希龄组阁,阁员除袁世凯亲信外,还包括梁启超、张謇等社会名流,号“第一流人才内阁”。

希龄组阁后,袁世凯加紧策划选举总统的丑剧。按《临时约法》规定,先制定宪法,然后宪法选举总统。袁世凯急于实现“统一最高政府之集权”,在他授意和大肆活动下,1913年8月全国19个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

宪，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会员们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0月4日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又投标选举。这天，袁世凯派出了军警几千人，又收买流氓、兵痞，所谓“公民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国会两院议员，只许进，不许出。还扬言：“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来，不许选举人出议会一步”。议员们挨饿终日，从早上8点至晚间10点连续14小时，战战兢兢投了三次标，才将袁世凯选为大总统，这时会场外的“公民”们才在“袁大总统万岁”的狂呼中散去。次日，国会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以后，认为国会存在，“政府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和李烈钧有过联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包括跨党和脱党者）438人的议员证书、徽章，使得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另外运用的“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和解散各省议会。熊希龄内阁虽对袁世凯唯命是从，但国会一被解散，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的作用即已消失，2月，被袁世凯下令解散。

1914年5月，“政治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以“约法会议”的名义炮制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一国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襄助人”。正式取消了责任内阁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专制皇帝一样大，撤消了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以国务卿为政事堂首及，下设左右两丞，另设参政院，行立法机关的权力，参政由总统任命。

5月，参政院开会，70多名参政大多数是袁的亲信官僚、

政客或前清遗老,进步党梁启超等人也被搜罗在列。参政院立即修改了《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1、总统任期10年,连任无限制;2、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3、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预书于嘉禾金简,藏之于金匱石室。这样,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不仅可以终身不易,而且还能使总统职位由袁氏世袭。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袁世凯在取得“终身”总统之后,并不满足,他还要正式称帝。

为了做皇帝,袁世凯积极寻求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1914年他恢复了封建时代的官吏考试制度,陛见制度和各种封建官职的名称,并任命前清遗老徐世昌为国务卿,还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县。他还到孔庙和天坛去祀孔、祭天,北领文武官员,身穿古式服装,行跪拜大礼,重演封建时代的“君权神授”。教育部则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

为了早日登基,袁世凯以放手卖国来换取帝国主义的赞助。先后同俄、美、日、英等列强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拍卖了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主权,以便获得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日本洞悉其称帝需要寻求外交支持的迫切愿望,公开提出需以相当的报酬作交换条件。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便乘虚而入,借口向德、奥宣战,但不派兵到欧洲战场,却在中国山东沿海登陆,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本侵略。紧接着

1915年1月2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

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使用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给其他国家。

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民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有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后来他又对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说:“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这就明白表示: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作为换取日本支持其复辟帝制的条件。日本政府要求袁世凯保守秘密并迅速接受,还要求指定陆宗輿(驻日公使)、曹汝霖为中国全权代表,不准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又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称帝心切,竟于5月9回复: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

袁世凯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迅速展开。留日学生于2月11日召开千人大会，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武力抵抗。国内各地人民奔走呼号，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愤怒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上海工人首先罢工，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工人纷纷罢工，沈阳人民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海外华侨也发动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捐款、抵制日货。由于全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使“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

其他帝国主义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为了掠夺更大的侵略权益，也纷纷对袁世凯称帝企图表示支持。英国为了维护其既得权利，一直采取“排革命党人而密助袁氏”的方针，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施复辟。德国虽忙于大战，仍也谋求拉拢北洋政府，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答应在财政枪械方面给以大力援助；美国不仅安插了古德诺在袁世凯身边，最早敲响了洪宪帝制的开台锣鼓，而且自始至终支持袁世凯称帝。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袁世凯认为在政治、思想、外交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于1915年夏秋之间，开始了复辟活动。

首先是公开制造复辟的舆论，1915年8月，按袁世凯的意思，由美国顾问古德诺出面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诬蔑中国人民智商低下，缺乏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胡说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对望有良好之结果。”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在袁世凯指使下,由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在北京筹办了“筹安会”,宣称“以筹一国之治安”。筹安会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为袁世凯大造复辟舆论。杨度及刘师培又先拍抛出《君主救国论》、《民约平议》、《国情论》、《君政复古论》等文章,与古德诺相唱和。大肆鼓吹中国必须“去共和”、“求君主”,袁世凯是解救中国的“救星”,宣扬如果坚持共和制,必“归于亡国而已矣。”

筹安会还对复辟帝制进行了策划。它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商会、教育会、尊孔团体等立即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3天之后却向全国宣布“讨论”结果,声称“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在筹安会的鼓动下,各地袁记死党、爪牙及投机分子纷纷函电响应,并派代表进京请愿,筹安会则代草请愿书,于参议院开会前纷纷呈递。

1915年9月1日参议院开会,装模作样地“审查”这些请愿书。袁世凯急于称帝,但又要盗用民意。于是派代表到参议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袁的部下心领神会,闻风而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作为复辟帝制的“民间机构”,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请愿团”都冒了出来,代表民意,要求袁世凯称皇帝。10月2日,参议院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并让各地加紧派出“代表”,就地进行国体投标。12月11日,参议院汇集了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投票的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附有同样文字的“推戴书”,一致委托参议院“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议院立即于当天上书“劝进”,袁世凯又装模

作样地推让,将推戴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下午,参议院再度“劝进”,袁世凯在以“民意为准”的幌子下,于12日高唱“民之所欲,予必从之”,正式接受帝位。13日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加封赏,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又宣布,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成立大典筹备处,准备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爬上皇帝宝座。

六、护国战争

在袁世凯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等组织,曾分别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在反袁各派的策动下,云南部分高、中级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并着手组织武装讨袁。在袁世凯称帝的前几天,即派出步兵第1、第7团,以剿匪为名,向滇川边境开进,企图配合后续部队夺取四川。12月25日,前云南都督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并在原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基础上,迅速扩编成36个团共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每个军下辖梯团不等。每个梯团下辖2个支队。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出桂,东征粤、浙,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贵州独立。

云南独立后,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征滇,企图一举歼灭云南护国军。

计划由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从湘西经贵川由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后,从北面进攻云南;第3路由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新任云南查办使龙觐光率部出粤经桂入滇,攻击护国军后方。

四川之役

四川是护国军与袁军交战的主要战场,亦为双方必争之地。1915年2月,袁世凯就派其亲信、陆军参谋次长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并调中央直属第4、第13、第16混成旅随陈入川,加强四川防务,连同川军和各地警备部队,共约4万人。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的新场(盐津县南)一带。17日,向防守川南的第4混成旅旅长、新任川南镇守使伍祥桢部发动进攻,一举攻占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地。19日,刘云峰以第1支队在正面实施佯攻,第2支队利用黑夜迂回至安边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安边守军不支,向叙州(今宜宾)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伍祥桢见安边已失,率部弃城逃走。21日护国军不战而下叙州。袁世凯对叙州失守。大为震怒,下令褫夺伍祥桢川南镇守使职,并令陈宦调整部署,组织4路部队向叙州反攻。护国军依托有利地形,实行积极防御,灵活运用截击、阻击和适时出击等手段,战至2月7日,击败袁军的反攻,赢得叙州保卫战的胜利。后因部分兵力往援纳溪,刘率余部退守横江。

1月24日,戴戡率一部滇军抵达贵阳。27日,贵州护军使

刘显世宣布独立,旋即将黔军第5、第6团与戴所部滇军,合编为护国军右翼军,归蔡锷节制,以戴任总司令,向川东进攻;以黔军第1~第3团编为右翼军东路军,王文化任司令,率部进击湘西。2月13日,戴部抵达川黔边境松坎(属桐梓)一带,次日分三路向綦江以南的九盘子、青羊寺和东溪发起攻击,与防守綦江地区的川军第1师激战1昼夜,15日连克上述要地,俘袁军128人,毙伤一部,后继续向北推进,前锋已抵距綦城仅10余公里,袁军为改变不利态势,陆续调集第3、第8师等部各一部兵力往援綦江,并多次发动反攻,戴部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3月中旬退守松坎一带,夺取綦江进而占领重庆的计划未能实现。

1月26日,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第3支队支队长董鸿勋,率部抵达毕节后,奉蔡之命昼夜兼程,赶赴永宁联络川军第2师刘存厚部起义。2月5日,董鸿勋部与起义川军联合向泸州发起攻击。次日占领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与泸州隔江对峙。9日,因防守月亮岩部队疏于戒备,又被袁军夺回。后虽进行多次反击,均未奏效,刘、董两部分别退守江安、纳溪。14日,袁军2万余人,从纳溪两翼向护国军反攻。蔡锷率主力驰抵纳溪后,组织几次较大规模的反击,给袁军以重大杀伤,而护国军亦因弹药不济,人员疲惫,于3月6日,分路撤出纳溪至叙蓬溪(今护国镇)一带有利地形休整。15日,蔡锷乘广西独立,云南解除后顾之忧,以及袁军官兵厌战,物资补给极其困难之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分三路反攻泸(州)纳(溪)。17日,担任主攻的右翼赵又新梯团从纳溪以东之白节滩发起攻击;中路顾品珍梯团在正面牵制敌军;左翼刘存厚部攻占江

安,保障主力侧翼安全。19日,护国军全线突破袁军前沿阵地,歼其一部。22日,袁世凯迫于内外交困,宣布取消帝制,仍居大总统位。蔡锷坚持迫袁下台,继续指挥所部顽强作战。至3月底,连克江安、南溪等地,重新夺回纳溪。袁军伤亡甚大,无力继续作战。陈宦派人向护国军要求停战议和。双方议定从31日到4月6日停战一周,后又派代表商谈,继续休战,反攻泸州计划未能实现。

湘西之战

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三个团,于1月下旬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袁军发动进攻。2月2日晚,第1团趁晃州(今老晃,属新晃)城袁军欢度旧年除夕,疏于防备之机,借夜幕掩护,以迅猛动作冲入城内,正在饮酒作乐的袁军顿时慌乱一团,稍作抵抗,便向晃州以东的蜈蚣关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次日拂晓,袁军第5混成旅和镇远道守备部队各一部在蜈蚣关据险顽抗,护国军奋力猛攻,下午攻克该地,毙敌80余名,首战告捷。第3团亦于2月3日向黔阳袁军发起攻击,当日占领部分据点,5日克黔阳,6日占领洪江,共俘敌250余名,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期间,向麻阳进攻的第2团,因城内防守严密,且地势险要,周围多悬崖绝壁,多次攻城不果。加之袁军第3、第6师各以一部兵力,分别从辰溪、沅州(今芷江)增援麻阳,使第3团处于被围歼的险恶态势。王文华冷静地分析敌我态势,决心乘辰、沅袁军往援麻阳之机,令第2团改攻为守,就地牵制袁军,令第1、第3团于13日联合向沅州发起攻击,袁军弃城逃走,14日护国军占领沅州。

护国军夺取沅州后,王文华急令第1团以一部兵力迂回至麻阳侧后,协同第2团再攻麻阳。15日晚,民军敢死队攀云梯爬入城内,与护国军内外夹攻,袁军相互失去联络,纷纷向辰溪方向溃逃。16日,护国军占领麻阳。至2月下旬,护国军在当地人民支援下,连克靖县、通道、绥宁等地,击溃袁军约3个混成团兵力。3月中旬,袁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全面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袁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战至4月6日,王奉蔡锷之命停战,与袁军形成对峙。

滇桂边境作战

1月中旬,龙觐光率所部约4000人由粤出发,下旬抵达滇桂边境后,以李文富为第1路司令,率部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黄恩锡为二路司令率部经西林(今定安)绕攻广南;朱朝瑛、张跃山等各率一部兵力,分别在百色和西隆(今隆林)等地,阻击由黔入桂的护国军和第1路龙军的进攻。另由龙体乾潜回云南,在滇南一带组织土匪武装,发动暴乱。从而达成了对即将入桂的护国第2军的包围态势。

李烈钧率护国第2军约2000人,于2月20日由昆明出发,向广西开进。途中得知龙军进抵滇桂边境并占领部分据点的情报,一面令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迅速在富州(今富宁)、广南地区组织防御,阻击来犯之敌;一面根据湘西战事进展比较顺利,报经唐继尧同意,将企图援湘并已进至贵州境内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和黄毓成挺进军调入广西,从外线达成对龙军的反包围态势。

3月初,护国第2军与袁军在广南、富宁地区展开激战。

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一带击退龙军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局面。方声涛梯团与黄恩锡部在广南以北龙潭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并歼其一部,亦呈胶着状态。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护国军士气大振。16日,方声涛指挥所部向黄恩锡部发起反攻,已进抵西隆的赵钟奇梯团,此时亦由北向南压迫黄部。黄军腹背受击,被歼一部后,仓皇逃窜。与此同时,经潞城向百色机动的黄毓成挺进军,途中击溃朱朝瑛部后,直趋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迫使龙军缴械投降。在皈朝的李文富见大势已去,亦被迫向张开儒投降。护国军先后共俘龙军2000余人。窜到蒙自、临安(今建水)一带的龙体乾土匪武装,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痛击后,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

袁世凯三路征滇计划虽告破产,护国军却未放松警惕,坚持迫袁下台。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护国战争结束。

护国运动中,各派反袁势力,包括取得主要领导权的进步党人在内,不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都不能不以维护民国、恢复共和制相号召。护国战争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又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第二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一、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互相火并的局面。这种军阀割据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而产生的。“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北洋军阀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存在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权,控制皖、鲁、浙、闽、陕等省广大地盘,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由他来宰制天下。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苏、赣、鄂等省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他就任了副总统,但不肯离开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原来盘踞奉天一带。护国战争期间,张作霖乘机在东三省扩张势力。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奉系成为皖、直两系以外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阎锡山占据山西;张勋以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名

义,率“定武军”屯兵徐州,积极联络各地军阀,成为阴谋拥溥仪复辟的中主人物。在南方,各省军阀自行其是,并不听命于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是唐继尧的滇系,一个是陆荣廷的桂系。滇系占有云贵两省,在护国战争中向四川扩张,与四川军阀进行争夺。桂系在护国战争时,把广东军阀龙济光赶到海南岛,占据两广,势力增大。

南北军阀在袁世凯死后,首先争执的是所谓新旧《约法》。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生前炮制的所谓新《约法》,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一个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段祺瑞的恶劣行径,遭到了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唐继尧等南方军阀把持的军务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原国民党人,以及北洋军阀内部如冯国璋等,都主张应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由于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暂时让步。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宣布定于8月1日召开国会。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而结束。7月,军务院撤消。在南方的进步党和原国民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会复会会议,南北暂时合作。

各种政治势力、军阀派系的矛盾和斗争,继而反映在重新召开的国会中。当时在国会中争夺权力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三派:原国民党议员人数最多,基本上是反对段祺瑞的。他们相继组织起三个政团,即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9月,在孙洪伊的倡议下,三派议员300余人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

“宪法商榷会”，“商榷会”内部各派系，后来又发生分化组合，原“客庐系”分为“政学系”和“益友社”，而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则合组为“民友社”。进步党议员人数也不少，他们高唱“不党主义”，取消了党的名义，分裂为“宪法案研究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两个组织。他们攻击原国民党，支持段祺瑞。原国民党各派合组“商榷会”后，“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案研究会”无条件合并为“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以便在国会中与“商榷会”斗争。还有“中和俱乐部”，是段祺瑞指使其爪牙拏凑一些小政团成立起来的御用党。

在国会中，研究系与商榷系的斗争，首先在宪法问题上反映出来。商榷系主张地方制度纳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北洋军阀集权，代表不当权的资产阶级和与段祺瑞有矛盾的某些地方军阀的利益。研究系激烈反对商榷系的意见，他们主张中央集权，省长由中央任命。这实质上反映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态度。双方争执不下，1916年12月8日，宪法审议会进行第四次投票表决，斗争更加激烈，以致引起叫骂厮打。

上述的矛盾斗争，突出地反映在所谓“府院之争”上。“府”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为代表的军阀政治集团。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国民党人和南方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系和亲段的北洋督军。因此，这场斗争不仅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系与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等。

“府院之争”到1917年提出“参战问题”时，更加表面化

了。这年2月,德国宣布将以潜艇无限制封锁海域。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要求中国与它采取一致行动,并提议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日本获悉后,惟恐落在美国后面,也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抗衡,随即改变态度,反对中国参战。美、日在中国对德外交问题上的冲突明显地表现出来。黎元洪本来担心段祺瑞在参战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因而支持和响应美国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继之以宣战。段祺瑞借参战为名以扩充武力的企图,也遭到一些地方军阀的反对。在国会中,研究系的议员完全追随段祺瑞,主张对德参战;而国民党议员,则多数持反对的态度。3月,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是,参战问题成为府院斗争的焦点,也是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10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督军会议”,决定赞成参战,并胁迫黎元洪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包围,要求当日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的这一行径遭到了议员们的抵制,当日并无结果。19日,国会复议对德宣战案时,决议暂缓讨论。段祺瑞竭力争取的参战案,被搁置起来。

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情况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赴天津,指使皖、奉、

豫、浙、鲁、陕、黑和直隶八省军阀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要以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向黎提出愿进京调停，黎邀张进京。段祺瑞也想借张勋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国会，因而也同意由张勋出面调停。张勋乘机拥溥仪复辟。

清室复辟活动由来已久。张勋在辛亥革命时曾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当政时封他为“上将军”。他以徐州、兖州为老巢，全力扩充其“辫子军”，为复辟清室做准备。袁世凯死后，张勋于1916年6月9日邀请北方各省代表集会徐州。9月21日，九省（后增至13省）代表再次集会徐州，成立所谓“省区联合会”，推“张上将军为领袖”。张勋借此作为复辟活动的基础。

曾任陕甘总督的升允，辛亥革命时期在陕甘武装反抗失败后，逃窜哈尔滨，勾结俄国和日本，组织“勤王军”、“满蒙举事团”，成为仅次于张勋的武装复辟势力。

康有为、劳乃宣、胡思敬等大小清廷遗老，怀着“亡国之恨”，反对民主共和，为清室复辟大造舆论，多方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沙皇俄国是复辟派的一个重要靠山。清恭亲王溥伟在升允逃到东北和库伦（蒙古乌兰巴托）后，两人就密商用出卖民族利益去换取沙俄对他们的支持。在沙俄的参与下，升允在1913年曾制定武装叛乱的计划，由“俄蒙之兵”和“宗社党”、“勤王军”分路入北京，“仍奉宣统皇上复辟”。

辛亥革命后，日本“黑龙会”的川岛浪速等就勾结避居大连的肃亲王善耆、避居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组织“宗社党”，搞

复辟活动。他们拼凑了一支 1500 人的“勤王军”，进行武装叛乱。1916 年，日本政府向黑龙会分子佃信夫表示“同意”支持清帝复辟，佃信夫就往徐州告诉张勋。随后张勋派升允往日本，日本首相寺内正毅鼓励升允等“尽可按计划行事”。

德国是支持复辟派的另一重要力量。1912 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乞求德皇“相助”恢复清王朝，德皇表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是要以支持复辟来阻止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对德参战。以后，德国不断向张勋提供枪炮，壮大这支复辟武装。

在俄、德、日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溥伟、张勋、升允等一些封建复辟势力，策划了多次武装复辟阴谋，但因袁世凯正谋帝制自为，不容他们拥清倒清，因而严加防范，使“清室复辟”的计划一再流产。到 1917 年，张勋一伙终于利用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公开上演了“丁巳复辟”的丑剧。

张勋觉得既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又有各省军阀的赞成，于是有恃无恐，率领 4000 余辫子兵，于 6 月 7 日由徐州登车北上。8 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北京，张本人则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与张“合作”。张勋通知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以武力对付。黎元洪一直以遵守《临时约法》自我标榜，且以根据《约法》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申斥过督军团。此时，迫于张勋的威胁，再也顾不得什么“约法”了，终于在 6 月 13 日下令解散国会。14 日，张勋进入北京。28 日，康有为等抵达北京。当晚，张勋、康有为一伙在张宅举行会议，决定了复辟计划。7 月 1 日凌晨，他们把 12 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张勋任所谓首席内阁议政

大臣,大权独揽。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徐世昌),亲自修改宣布复辟的“上谕”。“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一时,北京街头又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真假发辮的遗老遗少,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7月2日,黎元洪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随后,他逃离总统府,躲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北京人民在张勋的白色恐怖下,奋起抵制,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其他出版者,亦“无恭维复辟之辞”;“至血性健儿,多有不避鼎镬,执笔痛叱者”。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拒挂龙旗”。上海、天津、武汉等处的报纸,也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叛国”。在上海,除由张勋出资、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外,各报纷纷刊登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国是报》遭到印刷工人的坚决抵制,“誓不再为排印”,虽出高价,“均被拒绝”,只好停刊。伪学部尚书沈曾植在上海的住所被“义愤之士”抛掷炸弹。上海“商界亦反对张勋复辟之举,一体悬挂国旗三日,以表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

张勋以及参与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木式、刘廷琛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民众感到这是给江西人带来耻辱,所以更为愤怒,“报馆张目大骂”,谴责张勋、万绳木式为复辟之“祸胎”。万的家属见众怒难犯,吓得从南昌逃走。刘廷琛家在九江,当地人“无不唾骂其甘心从逆”,刘父“以不堪众矢之集,举家避去”。

在广东,人心“异常愤激”,“上自官长,下至舆夫,无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对”。民间自动发起“国民哭灵大会”,抗议张勋解散国会,破坏共和的滔天罪行;随后又改称为“国民护国厉援会”,继续声援反复辟的正义斗争。

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孙中山继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进行反帝制、反北洋军阀的斗争。当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非常愤慨,发表了《讨逆宣言》,表示坚决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军伐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段祺瑞看到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阴谋已经得逞,即通电全国宣布讨伐张勋。冯国璋也通电反对复辟。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山东等 10 省的督军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7 月 3 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梁启超为聘任参赞,成为段的首席幕僚。4 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随之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甚至出兵“讨逆”。张勋进京时只带 4000 余辫子兵,留在徐州的辫子兵因山东军阀隔断交通而无法北上。7 月 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兵被缴械,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后又化装逃出北京;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次复辟丑剧,仅 12 天就迅速破产了。

张勋复辟在全国人民反对下,顷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却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继续垄断北京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动的军阀专制卖国的黑暗统治。

二、西原借款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上台当权的还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大权。

对德参战，因已无国会，无须取得它的通过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发布》，正式宣布对德宣战。美国这时已参加大战，愿意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务相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蓝辛石井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给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有利条件。段祺瑞政府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进行反动的“武力统一”政策。

日本大隈内阁执行的露骨的侵华政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加深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为日本元老派所不满，以对华外交办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任总理大臣。他鉴于前内阁的失败，根据其重要谋士西原龟三等人的建议，挂出“日华亲善”的招牌，改变了对华方针：表面上“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实际上，第一，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日本给予贷款和军火援助；第二，除与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区有关问题外，尽可能和各国保持协调，同时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日本在华的优越地位；第三，在南满东蒙扩大日本

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确保日本的特殊关系,山东问题设法享有德国战前的一切权利。寺内内阁任内二年间,日本对华各项借款总额达 3.86 亿日元。其中,1917 年 1 月至 1918 年 9 月,西原以“私人身份”六次来华,经手八笔借款,合计 1.45 亿日元。这些借款,通常被称为“西原借款”。

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把中国的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例如,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等名目,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都抵押给日本;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电话借款”等名目,把我国电讯事业交给日本控制。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日本为段祺瑞训练和装备了三个师、四个旅的“参战军”,让日本掌握对参战军的指挥权。“军械借款”还规定,将中国“军队所使用的枪炮的口径,必要的机要部分及子弹的规格”,均按照日本“实行统一”。段祺瑞答应“将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归日本控制和垄断,作为借款的抵押。日本还以“顾问”、“教官”等名义,给段祺瑞政府派来大批间谍、特务、军国主义分子,以加强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1918 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使日本后来据为口实,不肯把山东交还中国。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势力瓦解,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极力谋求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在日本的频繁活动下,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1918 年 5 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定了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中日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付诸实施,日军七八万人开进东北,把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东三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东三省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罪行,使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为殖民地的严重危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18年5月,留日中国学生召开大会,抗议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定军事协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为救亡图存竭尽全力。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回国进行活动。在国内,全国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等学生2000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相继奋起要求废约。

三、护法战争

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重掌北洋政府大权后,通电各省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并派北洋军第8、第20师随皖系前陆军部次长、新任湖南督军傅良佐入湘,镇压南方革命。17日,孙中山等抵达广州后,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并致电和派人联络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共图推翻以段为首的北洋政府。桂、滇军阀亦企图借护法旗帜,猎取湖南、四川等地盘,以便对抗段的武力统一政策。8、9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建立

中华民国政府,兴师讨伐段祺瑞。计划以滇、黔、桂、粤等省陆军和海军一部,共约 15 万人,分从湘、川和闽浙三路会攻北京。中路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率部出湘入鄂;左路由云南督军唐继尧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攻川,得手后与中路会攻武汉;右路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等指挥粤军和驻粤滇、桂军及海军,先取闽浙,再图沪、宁,后由海路北上,与中路、左路并进。段祺瑞调集北洋军和湘、粤、闽等省军队近 20 万人,企图以主要兵力入湘,制服两广,以一部兵力夺取四川,制服滇、黔,进而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

第一次湘战

9 月 18 日,被傅良佐免职的革命党人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 1 师第 2 旅旅长林修梅,联衔宣布湘南自主,参加护法。接着,湖南第 1、第 2 区守备司令吴剑学、周伟等相继宣布独立。傅良佐奉段之命,令湘军第 1 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第 1 旅开赴衡山,镇压刘、林护法军。下旬,该旅第 1 团在衡山七里滩等地与林部交战,第 3 营官兵反对“以湘治湘”,宣布起义,加入护法军。该团和第 2 团大部官兵随即响应护法,李逃回长沙。傅急令第 8 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指挥第 8 师王汝勤旅、第 20 师张纪旅进攻衡山;湘军第 2 师朱泽黄旅往永丰(今双峰)策应王部作战。10 月 6 日,王汝勤不待张纪旅到达,针对护法军防守正面较宽,兵力分散等弱点,采用多路小群牵制,集中兵力逐点攻击等手段,向衡山以北地区发起攻击,一举占领白石铺、护湘关等要点,续向衡山外围进攻。11

日护法军不支,退守衡山与衡阳间的贺家山一带。14日,由湘潭经株州沿湘江东岸进攻衡山的张纪旅进抵衡山。15日,王、张两部联合向贺家山发起进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等人,汲取衡山防御战中兵力过散的教训,指挥护法部队集中火力封锁山下的开阔地带,北军死伤甚众,多次攻击受挫,便改攻为守,与护法军形成对峙。

为打破南北两军在贺家山地区的僵持局面,加之两广护国军陆续入湘,10月21日,程潜与桂军陆裕光等将领商定,以一部兵力就地牵制北军,主力向西转移,进行宝(庆)永(丰)作战。到11月11日,护法联军攻克宝庆、永丰等地。14日,直系王汝贤等不愿继续为皖系作战,发出南北议和通电,旋即率部北撤。护法联军乘胜追击,20日占领长沙,北军向岳阳逃窜。28日,谭浩明在陆荣廷授意下,擅自发出与北军议和的通电,顿兵不前,与程潜等人发生矛盾,因此迟至1918年1月23日,才开始进攻岳阳,27日占领该地,俘敌千余人。

四川靖国之役

早在1917年4月,川军第2师师长刘存厚,因对滇军将领、四川督军罗佩金裁编川军不满,联络其他川军发动“刘罗之战”。后经调停,滇军由成都撤至川南。7月1日,张勋复辟,溥仪委任刘存厚为四川巡抚。中旬,唐继尧即以护法讨逆名义,将滇军改称靖国军,编成第1~第6军,(后又增编第7、第8军)自任总司令,通电讨伐刘存厚,发动靖国之役,旋令罗佩金指挥驻川滇军向成都进攻。滇军在青(神)眉(山)一带同川军激战数日,伤亡甚众,退回川南。8月初,北洋政府派长江上

游总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2个旅入川支援刘存厚，不久又令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1个混成旅往援川军，企图将滇黔军逐出四川。11月上旬，依附北洋集团的川军第2师和第1、第31师各一部，向川南靖国滇军发动全面反攻，下旬占领泸州、叙州(今宜宾)等要地，滇军节节向南败退，情况十分危急。

唐继尧为扭转败局，决心以大部兵力坚守川南，牵制川军主力向川东移动，以第4军李友勋旅、第1军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秘密进入江津，协同在綦江地区的黔军和四川靖国军，向防守比较薄弱的重庆方向进攻，切断北洋军援川的重要通道，孤立川南川军，得手后，再由东向西，与川南靖国军夹击川军主力，进而夺取成都。11月12日，黔川靖国军由綦江分两路向重庆方向发起攻击，一度受挫，后在滇军协同下，夺取重庆外围部分据点。30日，黔、川军由重庆东南，滇军从西南夹击重庆。战到12月3日，又攻克铜罐驿、白市驿等要点，进迫浮图关。吴光新等见大势已去，弃城逃走。4日，滇黔川靖国联军进占重庆。嗣后，联军分三路向成都方向开进，协同川南滇军主力进击成都和反攻泸(州)纳(溪)地区。战至1918年1月底，联军收复纳溪、泸州、永川、荣昌、遂宁等地后，川军主力被压缩在嘉定(今乐山)、简阳、成都之间的狭小地带。川军大部倒戈。刘存厚率残部退往川北。2月20日，联军进占成都。靖国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闽、粤地区作战

1917年9月，北洋政府在派兵入湘的同时，就指使福建

督军李厚基和龙济光等人,率部对广东发动进攻,策应湘省作战,不久,又策动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脱离广东省政府,并派兵攻打惠州。10月23日,莫擎宇宣告独立,反对护法。军政府潮梅军和平潮军旋即进剿莫擎宇部。至12月中旬,攻克汕头、五华等地,莫率残部退往闽境。李厚基派汀漳镇守使臧致平率部支援莫擎宇。军政府令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20营粤军入闽作战。1918年1月下旬,陈率部由广州启程,2月中旬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扩充势力,并不热心攻闽。经孙中山几次催促,5月上旬才指挥所部向闽军进攻。战至8月底,连克武平、上杭、漳州等地,李部战败,李逃回福州。

在护国战争中,被护国军战败的前广东将军龙济光逃往琼州(今海南省)后,大肆扩充军队,图卷土重来。护法战争爆发后,北洋政府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并令其出兵攻粤。1917年11月龙率2万余人由琼出动,12月在阳江等地登陆后,即向广州方向推进,并连占数县。广东督军莫荣新即令钦廉镇守使沈鸿英、高雷镇守使林虎,分任讨龙军第1、第2军司令,各率所部在化州、恩平等地阻击龙军。嗣后又编组第3、第4军和讨龙靖国军,加上原有2个军,共约2万余人对龙军作战。双方在阳江及其西南地区激战两月,形成拉锯战。1918年3月7日,护法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出任讨龙军总指挥后,决心改变分兵防守的不利态势,集中主力于开平至阳春之线,围歼龙军李嘉品部主力,收复阳江,再进击廉江、化州之敌。16日,在恩平附近待机的第3军,首先向龙军发起反击,一举收复恩平。李烈钧即令第3军从正面牵制敌人,以讨龙靖国军李根源部为主攻,在海军舰艇支援下,插入阳江北部,从侧翼攻击龙

军。第2、第4军亦迅速向阳江推进,协同李部围歼阳江地区之敌。李嘉品见已被数面包围,25日放弃阳江,退守电白。讨龙军乘胜追击,4月12日占领电白。李烈钧即以一部兵力协同第1军向廉江、化州发起攻击,另以一部兵力南渡琼州海峡,袭击在琼的龙军。龙部军心动摇,加之粮弹不济,节节败退。讨龙军战至28日,收复化州、廉江、遂溪。龙济光弃军逃走,所部大部缴械投降。

第二次湘战

湘粤桂护法联军攻占岳阳后,按照孙中山计划,应在湖北靖国军石星川、黎天才等部协同下,加上滇黔川靖国军以一部兵力配合,乘胜攻取武汉,继续向北推进。但由于滇、桂军阀各怀私利,尤其是桂系军阀满足于占领湖南,拥兵不前,与北洋集团媾和,还对军政府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严重削弱了护法部队战斗力,给北洋政府继续调兵遣将,发动第二次攻湘之战以可乘之机。1918年1月上旬,北洋政府为解决再次攻湘的后顾之忧,令第3师代师长吴佩孚、第11师师长李奎元等部,向荆(州)襄(阳)地区的石星川、黎天才部发动进攻。湖北靖国军孤立无援,相继战败。月底,代总统、直系首领冯国璋在段祺瑞等皖系势力威逼下,令援湘军第1、第2路司令曹锟和张怀芝,各率所部再度攻湘。2月28日,第1路吴佩孚部向岳阳发起反攻。吴亲率一部兵力向护法军防守比较薄弱的新店、滩头等要点进行突击。防守该要点的湘军第1师一部,在吴军猛烈火力攻击下,被迫后撤,吴军乘胜跟进,3月2日攻占万峰山,突破联军第1道防线。接着,吴指挥所部继续向南推进,至3

月15日突破联军第2、第3道防线。17日,吴部会攻岳阳,当晚守城部队退守新墙。18日,吴部进占岳阳城,联军向长沙方向撤退。吴部继续追击。25日,联军总司令谭浩明见岳阳已失,恐惧已极,率桂军撤离长沙。湘军亦退守衡山地区。26日,吴部进占长沙。北军第1路张敬尧部亦于3月11日向平江护法军进攻。防守该地区的湘军刘建藩等部,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北军的进攻。双方战至22日,护法军不敌,北军占领平江。

4月初,北洋政府令第1路吴佩孚部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方向进攻;张敬尧部经湘乡、永丰攻宝庆。第2路军施从滨师和两个混成旅及安武军等部,经醴陵攻取攸县、茶陵。计划旬日内占领全湘,后趋广东。

护法联军弃守长沙后,桂军退至祁阳一带,仅有在衡山的湘军和在安仁的粤军,共约2万人。面对三路南犯的北军,程潜等决定依靠湘军自身力量,联合粤军,以一部兵力率制湘南地区之敌,集中主力和粤军,歼灭企图进攻攸县的施从滨师。4月21日,赵恒惕等率部对施从滨师进行包围攻击,施部损失过半,余部逃向茶陵。护法军乘胜向北推进,又战败北军张宗昌旅及安武军,27日夺回醴陵等地。30日前锋逼近长沙。张怀芝逃回汉口。吴佩孚、张敬尧闻讯,各调一部兵力驰援第2路军,至5月初,连陷安仁、攸县等地。护法联军分向湘桂边境溃退。

5月初,国会非常会议在西南军阀操纵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战争结束。

护法运动对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孙中山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当时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孙中山所指望的力量,还只是和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南方军阀,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也没有可靠的革命武装,护法运动不能不归于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绝境,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帝国主义 在我国边疆的分裂活动

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俄、英帝国主义乘机加紧分裂中国的活动,策动中国边疆地区的武装叛乱,以至公然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1911年7月,杭达多尔济亲王纠集四盟王公,在库伦密议外蒙“独立”。“会议的召开和通过的决议,都由会议的首创者通知了沙皇俄国的外交代表”。会后,他们派“代表团”赴俄,以“承认俄国保护”,并给俄国以种种特权为条件,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的“独立”。沙俄派

兵千余人进入外蒙,要挟清政府在外蒙停办新政。10月,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清政府予以严正拒绝。

武昌起义爆发,沙俄认为是它“吞并中国领土而能达到其宿愿的大好时机”。它借口保护领事馆,增派俄军侵驻库伦,并拨给外蒙杭达多尔济集团大批军械弹药。在沙俄的导演下,他们于10月18日宣布“独立”,与俄军一同进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驱逐办事大臣三多。12月1日,他们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沙俄立即从军事、财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傀儡政权。同时,科布多的封建领主和乌里雅苏台扎萨克图汗也在沙俄策划下,占领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俄军驱逐了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

1912年6月,沙俄再次提出:如果中国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设治、驻军和移民,它愿进行“友谊调停”。中国政府拒绝了沙俄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我国内蒙分为东西两部分,俄国“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的“特权利益”,日本支持沙俄对西部内蒙和外蒙古达成的“谅解”。中国政府于8月13日对英、俄、日三国发表了关于《满蒙藏之主权五事》的声明,指出满蒙各地皆为中国领土,凡有关满蒙各地之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承认,不得私订;满蒙各地之矿产,无论何人不得私自抵押;中国政府在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各国不得以护侨为名向中国增派军队;现蒙藏地方少数王公贵族反对中国政府的行动是

非法的,外人不得主使挑拨。

沙俄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于11月3日与外蒙当局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为其整编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中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以后,又签订了有关铁路、矿山、电讯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

中国政府在“俄蒙协约”签订前即向沙俄提出抗议,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于11月7日发表声明,重申“概不承认”俄国与外蒙所订任何条约,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议”。北京市民举行“反对俄国奸计大会”,报刊纷纷揭露沙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连日持票往俄国银行兑换现金,商人抵制俄货。孙中山致电参议院,要求“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3000多人在东京集会,强烈谴责沙俄。蒙古爱国王公宣布“蒙古拥护各族合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并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议,通告世界各国,决不承认沙俄炮制的“俄蒙协约”。

沙俄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对袁世凯政府进行讹诈。中俄于1912年11月开始在北京举行谈判。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追认了“俄蒙协约”及其附件,“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声明虽然载明“俄国承认中国在

外蒙的宗主权”，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却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设治、驻军、移民。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

根据《中俄声明》，自1914年9月起又举行中俄蒙恰克图会议，并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用中华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北京政府承认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种特权。但是，会后沙俄唆使外蒙当局借词“谢绝”接受册封专使，并多方阻挠外蒙派员来北京，以致册封仪式延至1916年7月方始举行。

十月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权失去了靠山。1918年，北洋政府派军队开进库伦，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

沙俄在策动外蒙“独立”的同时，还强占了我国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沙俄通过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纪》，早就强占了包括原属定边左副将军管辖的唐努乌梁海的10个佐领、原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淖尔乌梁海的两个旗，以及科布多以西的大片我国领土。1907年，沙俄在乌梁海中部一带地方建立殖民据点。武昌起义后，沙俄派出“边疆特使”窜入该地区，发号施令，阻挠我国政府派官员进入该地区行使主权。1914年6月，大批俄军侵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唐努乌

梁海地区 17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此,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也未声明放弃中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俄国的边界,早在中俄《尼布楚布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中便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沙俄任意破坏界标,派遣间谍分子进行颠覆活动。1900 年沙俄出兵东北时,竟在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建造营房,驻扎军队。清政府不得不提出中俄双方根据条约重新勘界立标的要求。1911 年 12 月,在齐齐哈尔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两国疆界虽基本上按照旧约,但沿着这条边界线,沙俄又侵占了我国 1400 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沙俄和外蒙叛乱集团的煽动下,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总管胜福、力和扎等于 1911 年 9 月向清政府提出撤走政府官员和军队、不准移民、移交政权财权的无理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绝。他们勾结沙俄和外蒙军,于 1912 年 1 月占领海拉尔,宣布“独立”。接着进犯满洲里,被击溃。俄军和外蒙军增援反扑,占领了满洲里。胜福等在满洲里成立“自治政府”。中国政府派兵平叛,沙俄以“调停者”出面干涉。1915 年 11 月,北京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会订呼伦贝尔协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规定非经俄国准许,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该区;将来中国“敷设铁路,尽先与俄国借款”;承认沙俄与伪组织签订的各项“合同”。1920 年 1 月,呼伦贝尔盟重新回归祖国。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科左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等,在沙俄煽动下,于 1912 年 8 月举兵叛

乱,分三路进犯洮南府,散发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北京政府及时调兵平叛,叛军败逃外蒙。10月底,沙俄派遣外蒙军数千人,分三路南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浩济特旗与苏尼特旗,察哈尔都统调兵狙击失利。昭盟郭尔罗斯左旗台吉多尔济公、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札普于11月乘机攻陷开鲁。热河驻军派兵平叛,官布札普败逃外蒙。外蒙军自1912年10月到1913年9月,在内蒙古的西二盟和锡盟的全盟、昭盟的克什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许多地方,烧杀抢掠。北京政府出兵讨伐,到1916年收复了内蒙古全境。

西北边疆的分裂危机

武昌起义后,新疆的革命党人联络哥老会众,于1911年末至1912年5月,先后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噶尔等地起义响应。沙俄乘乱出兵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我国西北边疆又一次出现分裂危机。

沙俄先以护侨、“增设领署卫队”为名,于1912年5月调派200多名哥萨克马队进入伊犁。6月,俄兵800多名侵入喀什噶尔。旋又借口“策勒村事件”,不断增兵。策勒村(今策勒县)是于田县的一个大镇。沙俄非法指派的“商约”间谍分子色依提在策勒村一带大量出售“通商票”,诱骗中国居民加入俄籍。1912年6月中旬,他公然贴出“通告”,煽动群众“从速投俄”,并“擅将殷实户民拘去,逼令买票投俄,不从者关锁累日”。群众纷纷向政府控告。6月24日,色依提聚众顽抗,开枪打死前来传讯他的兵士2人和群众1人,打伤1人。激愤的群众焚烧了他们盘踞的房院,击毙、烧死歹徒29人。沙俄即增兵

500 余人侵驻喀什噶尔城外。8 月,俄军炸毁北门,冲入城内挑衅。不久,又增兵千余,积极备战。喀什噶尔提督兼外交特派员、革命党人杨缵绪扩编部队,秣马厉兵,在谈判中坚持严正立场,断然拒绝俄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后因袁世凯政府压迫杨缵绪与俄方妥协,1913 年 10 月 1 日,双方签署结案。此后,俄军先后撤出伊犁、喀什噶尔。

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时,就指使外蒙军袭取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进而攻取阿尔泰。1912 年 9 月,新疆援军进至距科布多五站的大营盘。10 月,当东三省地方部队进军外蒙古平叛,科布多的外蒙军大部撤回时,新疆省军集结近 20 营,准备乘机收复失地。1913 年 6 月,外蒙军分三路进犯,察罕通古驻军抗击。在俄军的协助下,外蒙军于 7 月间连续两次大举进犯,驻军迎头痛击,获大胜。袁世凯下令不准进军,杨增新也主张妥协,中国军队因而未能乘胜追击。

不久,沙俄一面借口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的事件,派兵 1500 多人于 9 月侵驻承化寺(今阿勒泰县等地);一面收买阿尔泰地区旧土尔扈亲王帕勒塔,宣布阿尔泰“独立”。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于 10 月 12 日先后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草案”、“中蒙军队停战协定”,听任俄军占领阿尔泰。北京政府下令将帕勒塔撤职,宣布由他非法签订的所有条约一概无效。

1914 年,俄军一股伙同外蒙向西侵袭,一股从斋桑泊向东进犯,侵入阿尔泰地区西北部,并非法移入俄国农民 300 余户,抢种哈巴河、布尔津河一带土地,强占水渠,伐树盖房,捕鱼设渡。由于中国军民的强烈反抗,沙俄不得不撤走部分侵略

军,但仍留驻骑兵两连。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当地各族人民奋起截击沙俄侵略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驱逐出境。1919年,中国政府把阿尔泰地区改为阿山道,划归新疆省。

西姆拉会议及麦克马洪线

达赖十三世于1904年7月英军侵入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等的“护卫”下仓惶出逃,打算投奔沙俄,至库伦被清政府截留。1908年8月,达赖辗转到了北京。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竭力笼络达赖,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英国谅解和庇护的达赖,于1909年11月回到拉萨。

1909年6月,清政府令川军2000人调驻西藏,英印当局公然表示“反对”,唆使西藏三大领主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一面不断派人去江孜和锡金、印度勾结帝国主义分子,一面下令叛军在昌都以东阻击川军。1910年2月,川军在江达粉碎了叛军的最后抵抗,进入拉萨。达赖带领少数亲随逃到印度大吉岭。清政府再度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沙俄和英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清政府的提出“抗议”,迫使清政府取消对达赖的处分。6月,英军进驻印藏边境的郎塘,英使威胁清政府说,一旦达赖回藏,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

武昌起义后,达赖十三世与英印总督密商,随即派其亲信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西藏部分大农奴主即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驱汉”命令,组织“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并进扰西康藏区。英军也屯集边境,以为声援。叛军的围攻未能得逞,英军即借“调解”名议,首先胁迫江孜、日喀则

两地川军在“和平协议”下缴械，然后武装护送达赖回藏。达赖等于1913年1月进入拉萨，宣称“独立”；英军则借口“护商”，侵入拉萨。

广大西藏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独立”，认为西藏“独立”就“有外力侵入之虞”。西藏僧俗人士拒绝接受英国提出的把西藏变为其保护国的六项条件。当时，英国驻锡金行政官、英国侵藏政策的积极推行者柏尔承认，广大西藏人民“不欲其在政治上”与祖国“分离”。

北京政府曾令四川都督尹昌衡及云南都督蔡锷派兵进入西康。西康藏区的叛军被击溃后，又命令入藏平叛，英国公然出而干涉，以不承认民国政府相要挟，叫嚣“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被迫接受了这一无理要求。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操纵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会上，英国唆使西藏“代表”提出西藏“自治”的五项要求。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也提出：“中国承认西藏独立”，自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和云南阿墩子以西为西藏境界，英国与西藏单独订约等六条提案。这些荒谬要求为中国代表所拒绝。之后，麦克马洪又提出一个所谓“折衷方案”，把西藏、青海、西康及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统称之为西藏，其中金沙江以西地区之为“外藏”，以东地区称之为“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则“中藏共管”。1914年4月27日，英国提出一个条约草案，主要内容有：“承认外藏自治”，其“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

督”；“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权”；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判决之”。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条约草案。7月3日，英国勾结西藏地方“代表”私行签订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并正式声明，凡英国同西藏地方当局本日或他日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会议宣告破裂。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从来没有讨论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秘密换文中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

第三节 新时期的曙光

一、农村经济的变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在农村造成一个大的变动。但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仍然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

1. 封建土地关系出现若干变化。在土地占有形式上，官

田、公产私有化的现象,在辛亥革命以后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过“丈放”的名义转归私人,数量大,地段相对集中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公产多属寺、观、会馆和宗祠的占地,主要被大小军阀和外国教堂直接提卖或强占,地权转属私人。由于北洋政府和清朝废帝相互勾结,再加上外国教堂在义和团运动后不断以索取赔偿损失为借口夺占土地,中国各种官、公田产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大量转为私田。

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还突破了一些宗法关系的束缚,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农村卖地族人优先购买的传统。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法令,国民是平等的,国民手中的任何私产,包括土地地内,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土地卖于何人,当然也归田主自由选择。尽管农村的宗族势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买卖,还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势力的限制,开始自由交易。这就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影响:一是土地买卖因此愈加频繁,土地兼并有增无减,土地集中的现象更为严重;二是在土地转手较快的地区,逐渐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缚,先改永租佃为长期租佃,进而向短期租佃发展。

在地主阶级的构成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在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军阀和其他军阀。他们依仗权势,在自己的地盘上吞夺公田,圈占荒地,强买民田,短期内便掠夺了大量土地。袁世凯在河南有地 400 顷,张敬尧在霍邱、倪嗣冲在阜阳各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李厚基在苏北徐海一带有地 200 多顷。在当时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军阀的。二、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手中积累了相当

的资金,又怕投资新式企业冒风险,宁肯投资土地坐收地租,然后再把地租收入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成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三、外国教堂传教士和外商。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强占土地或通过买办到农村收买土地,招民垦种,或直接经营农场。

在地租剥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有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发达的江、浙等许多省份,货币地租约占地租总额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如江苏昆山的押租田,1905年占全部租田的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达72.9%,1914年还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时虽然要退还佃农,但地主却因此已多得了一笔息金。押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地主利用农民破产求佃者日多的机会,对佃农加强制约和剥削的一种新手段。

2.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后都有增长。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公斤,1919年增至263.4亿公斤。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商品量增长较慢的是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

为了满足经济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不完整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1904年到1909年和1914年到1919年两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作物所占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大豆由8%增长到9%,油菜籽由15%增长到21%,花生由4%增长到10%,芝麻由4%增长到8%,棉花则由11%增长到14%。经济作物耕种面积的扩大,势必影响粮食的种植面积。在同一时期内,粮食作物除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种的耕地面积不是持平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产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到五四运动前夕,大豆60—70%产于东北,其播种面积竟占到东北耕地面积的50.7%;花生80%产在山东,其播种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烟草45%产在河南,也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9%。这不仅形成了一些新的专门农业区,而且出现了专门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进一步加速这些地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以及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当然,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经济作物种植区和商品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种变化并不大。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而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要。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茶叶、甘蔗,因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另外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大豆、烟草等,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给帝国主义的一些

垄断组织直接深入中国农村、干预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机会。例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以供给农民种籽、指导种植技术和将来收购产品为条件,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烟草,几年后坊子附近的麦田大部改成了烟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专业户受到外国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些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国闻名的手纺织区,河北高阳县,1917至1919年最盛时年产布500余万匹;河北定县,1915年最盛时输出土布400余万匹。在全国闻名的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烟产量,1916年为2400万磅,1920年增为7200万磅。在全国著名的榨油区,仅东北哈尔滨附近的油坊就达2000余家。

随着农村手工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者出现了两极分化,其中又以手纺业主的分化最为明显。广大农民织户破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向商人领纱织布、仅拿微薄工资的织户。如河北高阳的这种织户在1912年占全部织户的34.5%,到1917年增为69.2%。而少数资金雄厚的织户,雇佣织工,扩大生产。这种资力雄厚的织户,一般是农村的地主和富农。

3. 农垦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垦植荒地”的鼓励下,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有了显著增加,10余年间有300多个,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省,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历年设立的这类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

有 34 家,1919 年增为 41 家。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这类公司多设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一般规模不大。如上海资本家穆湘瑶、葛敬中在郊区杨思乡创办的蔬菜种植场,重庆商人赵楚梅等在广元坝创办的树畜公司等。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如广东华侨陈国圻在黑龙江汤源县创办的兴东公司,有资金十五六万元,自备拖拉机和面粉机,招工垦荒种植小麦,经营机器磨面,兼营畜牧等业务。所得粮食、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由梧桐河运入松花江,上销三姓、伯力,下运哈尔滨等地,获利丰厚。这些农场都采用雇工劳动,并引进了部分农业机械和新品种,产品供应市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二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它们一般都划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事业,雇工劳动;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坐收地租。这类公司以江苏省出现最早,数量也最多,仅苏北一地就有 50 多个。三是利用特权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它们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和内蒙的官地放垦区,一般规模较大,常由官方办理垦务的机构和地方军阀、豪绅巨贾互相勾结组成的。这类公司名为垦务,实为土地投机组织,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实体,与一般生产性的农垦公司有很根本的区别。总之,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来看,它们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农垦公司发展十分艰难,有的夭折,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到 20 年代末即陷入了长期衰滞状态。

中国的农村经济,在辛亥革命后虽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产连遭破坏,农民倍受剥削掠夺。当时,北洋政府为镇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不断增加军费,1916年1亿余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亿元,其他开支还不计算在内。而常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赤字非常严重。北洋政府为解决如此巨大的开销,于是大肆向人民进行搜刮掠夺。一是大量发行公债,从1912年至1919年,实发额达3.06亿元,为清政府实发额的五倍以上。二是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由于所铸铜元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单铅子每百枚可获纯利银洋一角余,双铜子每百枚至少可获银洋二角六分。至于纸币发行更是名目繁多,混乱异常。各地军阀往往擅自发行军用票、金库券、加印官票和军需兑换等,票额越来越大,币值越来越低。如张作霖1917年发行的大洋票,到20年代低到只有原价的1/4。三是增加田赋、盐税和其他杂捐杂税。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田赋正税在辛亥革命后有很大增长。有的地区增长50.6%,而田赋附加税则增长了二至三倍。盐税自1913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后,收支权都操在外人手里,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擅自增加盐的附加税捐。据估计,全国盐的正附税在辛亥革命后约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盐价飞涨,民不聊生。至于各种杂捐杂税,更是不胜枚举。北洋政府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增加收入,归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从而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

辛亥革命后,人祸之外,天灾也几乎连年不断。据北京局部不完全统计,1913年全国受水、旱、风、虫等各种灾害的地区,不下6.5亿多亩,1918年受灾区域仍有6100多万亩。

1914 年到 1918 年四年内,农户减少 1564 万多户,耕地面积减少了 2.6 亿多亩,荒地增加了 4 亿多亩。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饥民成群、盗匪四起,还有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财产。再加上连年战火、兵匪抢劫、拉夫派差,使生产陷于停顿,交通四处阻塞,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已把广大农民推向更加悲惨的境地。实在难以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不得不愈来愈多地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去。

二、民族工业的发展

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诞生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为止,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 700 个,资本总额仅 1.3 亿多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外,还有不少商界人士参加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 1912 年 12 月 5 日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 年 1 月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1915 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

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终究解除了清政府原来对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南京临时政府关于“振兴实业”的舆论宣传,和为此而着力提倡国货运动,激励了工商业者投资开办工厂,爱国华侨也竞相归国投资办厂和努力推销国货产品。1915年日本提出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人民更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一时间人人以用国货为荣,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压力。这种障碍和压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有所缓和。根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总额为5.7亿余两,1915年减至4.5亿余两,减少了1/5左右。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与此同时,由于交战国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和日用百货,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为4.03亿两,除1914年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到20.5%。由于商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多年来入超逐年严重的情况也有所缓解,由2亿多海关两减至3000多万海关两。进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国内市场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

建,新增企业资本到 1.3 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 50 年的投资总额。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 年为 43448 马力,1918 年为 82750 马力,约增长了一倍。

在辛亥革命后开办的企业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针织、印刷等轻工业也有不少进展。纺织工业,1913 年前全国共有 231 家工厂,资本 3254.7 万元,到 1920 年已增到 475 家工厂,资本 8275 万元。纺纱业 1913 年共有纱锭 65 万枚,到 1919 年增为 118 万枚。纱厂的盈利也很丰厚,16 支纱在 1914 年每包盈利为 19.58 元,1917 年达 36.93 元,1919 年更高达 70.56 元。同一时期,布机由 2016 台增为 2650 台。厂数和纱锭、布机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以往 20 多年所有积累的两倍多,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面粉业在辛亥革命前基础薄弱,在 1896 年至 1912 年的 17 年间,民族资本开设的面粉厂才 47 家,占国内面粉厂的 52.2%,生产能力占 39.8%。而 1913 至 1921 年的 9 年间,全国就增立了 123 家面粉厂,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 105 家,占全部新设厂的 85.4%;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 82.2%。被誉为“面粉大王”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在这一时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 2 个厂、4 个粉磨发展到 11 个厂、300 多个粉磨。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 至 1914 年每年入超都在 200 万担以上,从 1915 年起开始出超 1.9 万余担,到 1920 年,出超达到 300 多万担。

其他如火柴业,1911 年全国 30 家左右,到 1919 年增加了 43 家,1920 年又增加了 23 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针织业是这一时期的新兴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素来盛销中国的德国衫袜,来源告竭,货价昂贵,各地针织工厂一时风起云涌,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设备先进的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到1922年,上海装有电机的针织厂有8家,其中以1917年创办的中华第一针织厂规模最大,有210台织袜机,52台罗纹车,246台织袜头机,26台摇纱机。这种情况在上海以外的工厂很难见到,外地工厂普遍使用手摇机织制。印刷工业在辛亥革命后,也随着学校、报馆、杂志社和书店的日渐发展而不断兴旺。中华书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诞生的,并以率先出版中华民国小学语文课本打开局面,以致“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竭力应付,基础于是乎立”。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宣化的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80万吨到1919年增至330万吨。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1913年只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的62%。在运输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有133230吨,1919年增为287592吨,六年增加了115%。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15家,资本1.1488亿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42家,资本1.0276亿元。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25个,1919年,增加到43个。拥有资本1200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现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实力不断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要求也日渐强烈。

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改变。

首先,中国民族工业是趁欧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发展是很短暂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又都卷土重来,中国的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逐渐萧条。出口量猛增的面粉战后急剧下跌,马上转为入超。其它行业也是如此。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兴旺发达的景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其次,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的发展多集中在轻工业,

发展较快的部门：一是为帝国主义战争提供战争物质的面粉业、纺织业等；二是帝国主义禁止出口的机械五金业，中国的机械五金工厂在1920年已由战前的101家增至252家；三是帝国主义顾不上的针织等行业。因此，中国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还是跟着帝国主义市场的需求转，发展是畸形的、零乱的，根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三，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上百万元的大公司，但发展较快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据统计，从1903年到1908年，注册公司数是127家，资本总额为512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2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40.5万元。从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册的公司数为124家，资本总额2442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公司41家，每个公司的平均资本为19.6万元。辛亥革命后每年平均新注册的公司虽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厂的平均资本却少了一倍多，显然是小资本多于大资本，中小厂家增多之故。

第四，中国民族工业即使在发展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以纺织和采煤为例，一直到1913年，中国75.6%的机械采煤工业、46.7%的纺锭和59.2%的布机，还是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趁欧战期间积极在华扩充势力。它出兵强占青岛，不仅把德国在该地的所有工厂都据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东各地开矿建厂，很快就拥有了130多家厂矿企业。日本这时在对华贸易方面，已取代英国而跃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华新设了五家银行，接近同时期外国在华新设银行的2/3；在抢夺利权方面，独占了这一时期的铁路投资，实力急剧膨胀。美帝

国主义在这期间也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到1919年,在对华贸易和航运方面都仅次于日、英而跃居第三位。

民族工业发展中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后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都由于软弱无力而归于失败。

三、工人阶级的成长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万人左右。他们虽然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数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无锡等工业城市及矿区;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面粉等企业。帝国主义在华厂矿,由于规模大投资多,集中工人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国开设的厂矿,也往往因为技术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学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是常见的。中国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世界罕见的。1919年前后,一般产业工人,不过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满铁企业中的华工工资仅相当于日人的1/4;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5分。工时一般是12小时,有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星期日多无休息。根本没有劳

动保护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1913年一年间就发生事故2000余起,死伤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国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罢工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乱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文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起见,决定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

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的7年间,罢工达130多起,比辛亥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一倍还多。1916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为17次,1917年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仅头5个月间就达19次,反映了工人运动日益走向高涨。罢工的规模也大多超过辛亥革命前的斗争。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罢工、1917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918年三新纱厂工人罢工,每次都有几千工人参加。工人罢工中还出现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已由分散发展到联合斗争。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为响应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总同盟罢工,1915年苏州丝业工人举行全行业的同盟罢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罢工举行罢工,1917

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等支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罢工而罢工。这些罢工表现工人阶级无私团结的阶级品质。

辛亥革命后工人罢工,多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不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举行的。但罢工也日益明显地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工人成为这两次斗争的主力,并用同盟罢工把斗争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对袁世凯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日本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斗争。长沙等许多地方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袁世凯卖国。1916年天津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老西开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国帝国主义者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就企图把老西开并入租界。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法国公使乘机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并于次年10月17日强占了老西开。北洋军阀政府已表示“未尝不可”,承认了法国的要求。天津人民却立即掀起反抗怒潮,举行数千人公民大会,声讨法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国企业中的工人决议实行同盟大罢工。11月14日,首先在法国经营的工厂、电灯公司、电信局开始同盟罢工,其他工种的中国工人也相继罢工,甚至巡捕、男女佣工“亦全体告退”。罢工工人以一致行动,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增薪收买、分化破坏行动。在天津工人大罢工的有力推动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积

极罢工支援。天津罢工斗争坚持五六个月之久,取得一定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新的斗争。1912年,上海出现以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它是改良性质的工团组织,既有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也有资本家参加,后被反动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出现了早期的工会组织,曾领导过罢工和在争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会也都先后被破坏。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日趋高涨,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开始由自在的阶段向自为的阶段转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阶级条件。

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过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的工作,资产阶级文化同封建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但资产阶级文化没有动摇封建旧文化的根基。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黑暗重新笼罩大地。与政治上的反动相适应,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在思想文化方面掀起了一股十分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尊孔读经,祭孔祀天,企图以此

诋毁和摧残一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在这股反动思潮面前,资产阶级比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更为软弱。他们对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流缺乏必要的认识,忽视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与斗争。一些资产阶级文化代表人物或者偃旗息鼓,或者旁徨苦闷,甚至与封建遗老们同流合污,成为复辟帝制的帮凶。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探索救国的真理。随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1880——1942年)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洪流中。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逐渐成为激进青年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们提出了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第一次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他要求青年解放思想,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1916年2卷1号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底《新青年》由上海迁到北京出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李大

钊(1889——1927年)、胡适(1891——1962年)、鲁迅(1881——1936年)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人。从此,《新青年》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青年》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新青年》杂志联系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建立一个像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还提倡个性解放,平等自由,成为自主、自由的人;科学主要是提倡自然科学,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和无神论。《新青年》于1918年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鬼神迷信的文章。当时国内不少地方有人设坛扶乩,宣传鬼神附体,有专门的《灵学》杂志,还组织了灵学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倡“以科学代替宗教”,宣传无神论,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哲学,鼓励青年发扬活泼上进、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识到,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建立和巩固共和政体,必须对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和尊孔思想进行批判。他们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批判了封建的儒家思想和旧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李大钊、易沙白等著文揭露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动实质。陈独秀认为孔子学说是中国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主张

毁掉全国孔庙,认为人格的独立、政治的民主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势不两立;李大钊也是个反孔主将,他认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他称那些尊孔复古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他们不能姑息,要烧掉他们的书,杀掉他们的人,使他们永远绝迹。在批孔中,四川学者吴虞以言论激烈而名声大噪。他从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封建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批判。他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而封建伦理道德由巩固家族制度而巩固了专制主义。吴虞把“麻木不仁的礼教”比作“洪水猛兽”。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了反封建斗争中一个勇猛顽强的文化战士。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从封建礼教“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中揭示出“吃人”的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方面对封建宗法制度及旧礼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和进行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一次改革。在内容上,“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方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讲对仗”,“不辟俗字语”。同年2月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这样把反封建的斗争与反对文言文、老八股、提倡文学革命结合起来。在这次文学革命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

《药》、《阿Q正传》等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新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文学革命做出了贡献,也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还对妇女解放、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把这些问题也作为批判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和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宣传了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对袁世凯破坏共和、图谋复辟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实际上也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补充。领导这次运动的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其性质仍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这次新文化运动有其严重的缺点。新文化运动是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新文化运动的实际效果。《新青年》还回避当时反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开始曾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缺乏政治斗争的自觉性。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的评价带有形式主义的偏向,认为中国文化一切皆坏,西洋文化一切皆好,对祖国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钱玄同,他为反孔而主张“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显然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片面的

和错误的,它不能解决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对以后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尽管新文化运动有诸多缺点,但这并不妨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搏斗。新文化运动以磅礴的气势给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这次运动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更进了一步,给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对启发人们的理智、启发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起了极大作用。它促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还为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各种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因此,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以五四运动为其开端的中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文化上做了准备。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它在中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受到鼓舞,开始

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这就使得 1915 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变成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运动。

1919 年 5 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 2 万多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阐述,成为当时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此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1920 年 5 月,《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编为《劳动节纪念》专号,其中发表了李大钊的《May Day 运动史》一文。同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从 1919 年 5 月起,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 6 个月,其间刊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最早的全译本和一定数量的介绍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革命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每周评论》在五四后也不断刊登有关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和土地法、婚姻法等。《国民》杂志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等译文,连载了《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介绍性文章。1920 年 8 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此外,《资本论自叙》、《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相继问世。列宁的著作亦开始流行。

与此同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纷纷出现。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达 100 多人,另外还有长沙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天津周恩来

等组织的“觉悟社”，武汉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等。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讲坛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一些学校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的讲座。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开始形成一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李大钊在五四前就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着重大作用。他连续发表许多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化》、《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比较系统地、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渴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的良师益友。陈独秀的思想在 1920 年出现明显的突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李达、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一批知识青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性吸引着有志于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先进青年，一代新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培育下成长着。

六、“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生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各种学说和流派都有人研究、信仰和宣传，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想流派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生活上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实用主义

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约翰·杜威(1895—1952 年)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在哲学观上否认主观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他认为凡能取得一时“成功”或“效用”的就是真理;在历史观上鼓吹阶级调和与点滴的社会改良。1919 年 4 月,杜威应邀来华讲学,先后在 11 个省作过讲演。他的讲演录,先后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实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在知识分子中有比较大的影响。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1919 年初,他连续发表了《不朽》、《实验主义》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胡适把实用主义称之为实验主义,宣称实验主义的哲学“只是一种形容问题的方法”,他把这种思想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宣扬这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胡适的方法论虽然有些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但由于实验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的客观性,其方法就成为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的东西。“五四”时期,实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它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1919 年 7 月 20 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认为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奉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很明

显,胡适的用意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人们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胡适的观点自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由此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

是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工人运动中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思潮,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政权的条件下,组织基尔特管理生产,实行生产自治,产业民主,而由国家负责产品的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罗素(1872—1970年)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0年9月,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的讲演分别刊登在《时事新报》、《晨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一时轰动中国思想界。罗素在各地的讲演中,大肆攻击十月革命,反对中国走俄国道路,宣扬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而不应该提倡社会主义。

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为首的研究系,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积极鼓吹者。罗素讲学之时,他们在《时事新报》上开辟了《社会主义形容专栏》,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发挥罗素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张、梁认为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在当时只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太穷,必须开发实业。第二是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是“太越级”了,所以中国没有必要进行社会革命运动,更没有必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

罗素及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理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成分,

如肯定资本主义发展在当是时中国的社会意义,不同意在当时的中国就实行社会主义等。但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工人运动,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成立共产党。所以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的迎头痛击。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这不仅引起军阀官僚的极端仇视,也遭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对。1919年7月,胡适借着杜威来华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之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历数谈“主义”的种种“教训”,嘲讽谩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用比较隐晦曲折的笔法,竭力反对“进口”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正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他极力引导人们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而反对所谓“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即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政治革命。

李大钊看了胡适的文章后,在昌黎五峰山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李大钊首先从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必须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样,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才能解决的希望。接着,李大钊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

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它们造的谣言”。最后,李大钊明确指出:“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李大钊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认为没有“阶级竞争”,“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这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也是要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论争。论战的双方是《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要成员,论战所涉及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向何处的原则问题。因此,这场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通过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

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年)、俄国的巴枯宁(1814—1876年)等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刘师复等人都曾宣传过无政府主义。“五四”前后,黄凌霜、区声白是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强权的国家,

幻想通过宣传和暗杀等手段建立一个生活平等、工作自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互助友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五四”前,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五四”后,在人们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时,许多不满于社会黑暗,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前后纷起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占着相当大的优势。

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正当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之际,黄凌霜、区声白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从1920年9月起,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使大批激进的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不少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此外,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先后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不少人还都曾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做过多方面的尝试。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社会,探索改造社会、追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第二章

北洋军阀的覆灭

第一节 皖系军阀的统治

一、皖系军阀的对内政策

从 1916 年 6 月段祺瑞任内阁总理起到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在整整 4 年的时间里,虽然段祺瑞曾三度下台,但大部分时间他以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身份控制北京政权,即使下台后也以其它形式操纵北京政坛,所以,这 4 年被称作皖系军阀统治时期。

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卖国。其对内专制独裁表现之一是以内阁制架空总统黎元洪,使府院政潮不断,造成北京政局极不稳定。

段祺瑞对内专制独裁表现之二是肆意破坏民主共和制

度,拒不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为此南下发动护法运动。段祺瑞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意见,认为中华民国已由张勋复辟所推倒,现在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他们援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依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

为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段祺瑞纠集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在北京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1918年7月底,选举揭晓,其中属安福系的议员竟占议员总数的80%强。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产生的,且安福系占有多数议席,所以人们又称之为安福国会。

皖系对内专制独裁表现之三,是扩充皖系势力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段祺瑞是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直接继承者,孙中山南下广东护法,建立起护法军政府,西南军阀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支持孙中山,尤为段祺瑞所不容。他决心以北洋武力制服西南,1917年10月,段祺瑞调大批北洋军南下湖南。由于北京政府内部直系、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武力统一”宣告失败。

二、皖系军阀的对外政策

皖系军阀的对外政策是投靠日本。为取得日本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

战。他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通过各项借款,把中国的大量权益出卖给日本。例如,他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等名目,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的满蒙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抵押给日本。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订立了所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些军事协定以中日共同防御苏俄为名,使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军和军队出入我国东北和蒙古和特权。协定签定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东三省北部。

三、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为了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于1917年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伙伴,所以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在国内舆论的推动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三方面要求:(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共有七项希望条件;(二)取消“二十一条”;(三)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前两项提案被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予以拒绝。在讨论山东问题的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以日本曾在对德作战中遭到“不小的牺牲”为由,无理地提出日本应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岛屿及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则从法理上和情势

变迁上论证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将胶济铁路、胶澳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双方展开激烈的舌战。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4月30日,英、美、法在“最高会议”上通过了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其中规定:德国将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特权无代价地让与日本;德国在胶州领土内的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均归日本所有;德国将关于胶州领土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项档案文件移交日本。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没有维护住自身的主权,反而在这场帝国主义的肮脏交易中被人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全国人民无不十分悲愤。5月3日,北京学界、商界、军界、政界分别集会,其中以青年学生最为激进。当晚,1000多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群情激愤,当即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四)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同时,北京高等师范等校学生也在秘密活动着。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学生们手持各色小旗,上面写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口号。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发表演说,宣读宣言。宣言剝切陈词,动人心魄。会后,学生们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不少市民也加入游行队伍。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受到

外国巡捕的无理阻拦,反复交涉近2小时,仍不得通行。学生们愤慨异常,转往东长安街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在曹宅学生们不见曹汝霖,盛怒之下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北洋政府派大批军警赶来镇压。这时绝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脱者被抓去32人。

5月4日晚,北京各校学生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斗争。第二天,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全国各界人民的有力声援迫使北洋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

但是,北洋政府又在同日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第二天,徐世昌竟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理。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5月11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签名要求挽留蔡元培;13日,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为力争挽蔡,一致提出辞呈。全国各地要求挽留蔡元培的电报也纷至沓来。在广大师生的团结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14日,北洋政府不得不以总统徐世昌的名义下了挽留蔡元培的指令;但又同时下令慰留“请求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并责成北京及各地方当局加紧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罢课,连同中等学校,罢课

人数达 2.5 万人。学生们组成“十人团”，上街讲演，宣传反帝爱国；展开广泛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时发行《五七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等。

五四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驻华使馆多次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日本驻华舰队频繁调动，进行军事恫吓；京、鲁两地的日军及各地日本浪人也多方寻衅，妄图制造事端。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也联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北洋政府顺从帝国主义的旨意，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6月1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公然为卖国贼辩解，诬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越轨”。6月3日，数百名学生不怕威胁，继续上街讲演。反动军警逮捕了 170 余学生；4日，学生们加倍行动，又有 700 余人被捕；5日，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很多人身背行李，作了入狱准备。

与此同时，天津、上海、长沙、南京、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杭州、苏州以及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学生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全国各地学生勇敢地走在了爱国运动的前头，他们的爱国热诚，唤起了各阶层民众，汇聚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洪流。

六三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极大震动。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工人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开始举行罢工；同时，上海商界宣布总罢市；在这之前，上海学生已于 5月26日实行总罢课。这样，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实现了。五四运动进入到新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

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

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受到中外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淞沪警察厅按照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急电出示布告,声明要追究、查办罢工工人;反动军警肆意殴打、拘捕上街宣传的学生,强迫商店开门。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和商团也纷纷出动,驱赶爱国群众。

6月9日和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高潮。继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造纸等行业工人罢工后,上海海员和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至此,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人数达六七万。整个上海陷于瘫痪。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九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杭州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众也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样,五四运动突破了爱国学生圈子,发展成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全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6月5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11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上海各界民众于12日集会游行,庆祝这一初步胜利。

但是,斗争并未结束。6月17日,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成了五四运动的又一个主要目标。¹⁹

日,山东各界请愿团到京,先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前请愿,代表们冒雨跪在新华门前。23日,请愿团代表晋见徐世昌,声泪俱下,表达了山东人民拒签和约的强烈要求。山东人民的请愿活动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响应和支持。27日,天津、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在京联合请愿;同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据统计,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接到的拒签和约通电7000份,通电一致警告代表团“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旅居法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于6月28日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中国代表只得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

至此,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际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首先,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从时代特点来看,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成为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已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标已不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从五四运动的阶级阵容看,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走上领导中国革命的阶梯。从指导思想看,五四运动已经有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所指引的方向则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由于这些变化,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

其次,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姿态加入斗争行列,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事实给革命知识分子以重要启示,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因此,从五四运动开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此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沟通这两者的联系,正是五四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工人运动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节 直系军阀的统治

一、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

直、皖两系军阀矛盾久已有之。大战期间,皖系军阀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实权,一面企图武力统一西南,一面觊觎着直系的地盘。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也不示弱,他们在美、英的支持下,从各方面进行倒段活动,并同奉系张作霖暂时取得和解,企图问鼎北京政府。1920年初,形成了直、苏、鄂、赣、豫和东北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由吴佩孚任“讨贼军”总司令,皖系由段祺瑞任“定国军”总司令,奉系张作霖通电讨段,派兵入关助战。战事在河北浦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线展开。结果,皖军全线崩溃。7月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一结束,直、奉两派军阀争夺权力的斗争就尖锐起来。直系吴佩孚在英、美的支持下,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引

起也想染指这一地区的奉系张作霖的极度不满。1922年1月,听从张作霖摆布的北京政府梁士诒内阁在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的逼迫下下台。奉军又一次大批入关,准备和直军决战。4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津浦、京汉两线北段展开激战。5月初,奉军大败。6月,张作霖退回关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自治”。直、奉双方议和罢兵,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所控制。

“法统重光”与“曹锟贿选”

直皖战争中直奉联合打垮了皖系,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奉系,从此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给直系的统治制造一个合法的依据,同时打倒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吴佩孚导演了一出“法统重光”的政治骗局。1922年5月15日,在吴佩孚的指示下,直系一些将领要求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要求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去职。这一政治主张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诱惑力,得到一部分人尤其是旧国会议员的响应。这一主张使总统徐世昌的地位失去法律依据。完全清除了安福系的影响,同时使孙中山的护法失去目标,达到直系控制的全国的政治统一。在吴佩孚的逼迫下,6月2日,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6月11日,黎元洪入京供职,8月1日,旧国会复会。

吴佩孚的恢复法统,只不过是直系统治的政治装饰而已。黎元洪和旧国会,完全是直系的傀儡。一年后,曹锟踢开黎元洪,自己做了总统。为使国会议员选举他为“合法总统”,他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继以每张选票5000到1万元的价钱购买了500多名议员。1923年10月5日为总统

选举日,他又效法袁世凯故伎,派大批军警包围议会会场。曹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民选”的大总统,这就是曹锟贿选。贿选是对民主政治的极大讽刺,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丑闻。所以当时人们称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称国会为“猪仔国会”,称曹锟为“贿选总统”。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是北洋军阀中力量较大的一派为吞并异己、实现专制独裁统治的一贯政策。吴佩孚曾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反对者,但当直系打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后,他也积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一方面向北对张作霖作战,一方面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把势力伸向南方,同时还策划和指使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进攻福建、广东、四川和湖南。

各省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地盘,反对和抵制“武力统一”,纷纷倡导“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湖南是“联省自治”的急先锋,早在1920年驱张之后,社会各界就提出地方自治以免再招南北纷争的侵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提出了“湘人治湘”的口号,并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沪的湖南名流群起响应,湖南自治运动一时达到高潮。1922年1月,省议会制定了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

湖南的自治运动为其他省所效法。1921年1月,四川军阀刘湘通电宣告“四川省完全自治”。4月,贵州军阀卢焘通电主张“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奉战争失败后宣布东三省自治。各省军阀以自治为名,行割据之

实,真正民主意义上的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重点争夺的地区。大战期间,日本趁英、美等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在中国扩张势力,一度出现了日本独霸中国的趋势。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急剧增长,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力求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美、日矛盾日益尖锐。此外,英、日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

1918年,美国就提议组织日、英、法、美四国银行团,包揽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借款,借以打破日本独占的格局。经过长期的争执,1920年10月,新四国银行团协定在纽约签订。

为了进一步限制和削弱日本势力,协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又提议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诸问题。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吵,通过了三个公约,即:(一)美、英、法、日签订的共同镇压远东人民的《四国公约》。这个公约拆散了英日同盟。(二)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吨数为五、五、三之比,以此确定海上强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实际上是美英联合挟制日本。(三)《九国公约》,又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这个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又提出了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因此,这是一个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协同侵略中国的强盗协议。

华盛顿会议期间,在美、英代表的“调停”下,中、日代表经过“直接交涉”,达成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虽然规定日本将侵占的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又规定中国必须将该地区全部划为商埠,准许外国人在这里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职业。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须以 5340 万金马克“赎回”胶济铁路;在路价未偿清以前,应选一个日本人为车务长,一个日本为会计长。这样,胶州湾只是由日本的势力范围变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共管的商埠,胶济铁路仍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中国政府并未真正收回山东主权。

总之,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优势,却又为美国实现控制中国的计划创造了条件,并造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及早期革命活动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从 1920 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最早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 年

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伴送到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建立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组织。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双方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陈独秀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建党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后来,陈望道、赵世炎、李达、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刘伯垂等也陆续参加。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离开上海分赴各地,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而后又陆续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管组织、宣传工作。

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进行了建党活动。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接触,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与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交谈多次,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这次北京、上海之行,使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7月,毛泽东回到长

沙,创办文化书社,8月又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这样,长沙的建党工作就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开展起来。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王尽美与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励新学会的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1921年春,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陈独秀在广州指导、帮助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改组了原来的组织,使之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21年三四月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成员有张申府、越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此外,在法国还有三个共产党性质的团体,即新民学会的在法会员、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主要成员有蔡和森、罗学瓚、李维汉、蔡畅、向警予、李富春、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垂等。此时,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等已在酝酿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这就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另外,日本留学生中也出现了共产党小组,成员只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人,他们都是在国内参加共产党小组后去日本的。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把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并以上海发起组为核心和纽带,建立了联系,这就为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党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担负着筹备和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重任。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穗,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2月,他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寄到上海。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随即,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并与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得到各地共产党小组的积极响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大会代表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和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的。

经过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

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纪律和吸收党员的条件、手续。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工人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三、中共二大的召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等12人,代表195名党员。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问题。大会发表了宣言,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已划分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两大营垒;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问题,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现阶段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也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斗争,因此,无产阶级要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结成联合战线,促使革命的迅速成功。根据以上分析,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为中央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政党或派别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共二大提出这个彻底革命的纲领,表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二大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也没有提出工农大众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

四、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

香港海员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受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为了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苏兆征、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向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激起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0余万。英帝国主义者对此极为恐慌,他们采用各种手段阻止和破坏工人的斗争,均未得逞。为了争取罢工胜利,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港回穗。3月4日,正当大批工人步行回省,行至九龙附近的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的射击,打死工人六人,伤数百人。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更激起工人的愤怒,他们向全国通电求援,誓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军政府和全国工人给香港工人以各种援助,京汉路的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北京、汉口之间。在全国工人阶级的声援下,经过56天的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释放被捕工人,答应增加

15——30%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 大罢工和“二七惨案”

中共二大后,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党继续大力领导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由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得到迅速发展。仅1922年8月,较大规模的罢工就有:上海海员罢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和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9月又有粤汉路武长段铁路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工人罢工。

这一时期,湖南是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省份。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到1922年秋,湖南已建立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4万余人。9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发动下,安源路矿1.7万余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路矿当局企图解散工会和俱乐部,要求发放长期拖欠的工资。罢工取得胜利,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签署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13项协议。

同年10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罗章龙、邓培等的具体指导下,开滦煤矿5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建立工人俱乐部。英国资本家勾结北洋政府,调集军警进行镇压。罢工斗争坚持25天,终未达到预期目的。工人们在增加少许工资的条件下忍痛复工。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早在中共一大以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党的北方区

委,利用军阀吴佩孚伪装“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的机会,迅速建立和发展了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六条铁路的工会组织。到1922年4月,仅京汉路全路就有16个工会,3万多有组织的工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数百名代表齐集郑州后,吴佩孚却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吴佩孚又派军警捣毁和封闭了总工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

总罢工命令下达后,长达1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3万多工人在3个小时内实现了总同盟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和伟大力量。工人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汉口英国领事召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解决罢工。2月7日,吴佩孚在汉口、长辛店、郑州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50余人惨死,300多人受伤,1000余人被开除。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罢工。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了支援中国工人罢工的宣言。

京汉铁路大罢工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这次斗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只靠工人阶级孤

军奋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

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更加残酷,工人运动遭受挫折,暂时转入低潮。

早期的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从事农民运动。

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1922年,彭湃在家乡海丰县发动和组织农民,1923年1月,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会员达10万人。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随后,陆丰、惠阳、紫金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30万人。1924年,彭湃将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各县设分会。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湖南也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1923年4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刘东轩到衡山岳北、白果一带发动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发展到10万人以上。

第四节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

一、改组革命党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陷于彷徨与苦闷之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他在上海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支持和鼓励学生的爱国斗争,并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群众。孙中山从这一爱国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觉醒后的巨大威力,并隐约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约》总纲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的纲领,表示要“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国家”;规定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总部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等。《规约》还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员权利与义务等,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虽然谈不上是彻底的改造,如原来的成员纷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现象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但它毕竟是一个进步。孙中山准备用这个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它体现了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二、第二次护法战争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由孙中山在任大元帅期间亲自培植起来的粤军陈炯明部受到桂系的压迫,不得已调往闽南驻防。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战争爆发,8月,孙中山在上海传令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讨伐陆荣廷,粤桂战争亦打响。经过2个多月的战斗,粤军于10月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收复了广东。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宣布继续护法。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重申维护民主政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维护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之和平,再度揭起护法旗帜。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后,陆荣廷集重兵于梧州准备反攻广东,并联络北洋军阀为后援。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率粤军与李烈钧的“滇黔赣讨陆联军”分路向桂林、柳州、南宁、龙州等地进攻。9月,陆荣廷兵败逃亡,广西平定,两广统一。

10月,孙中山提请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11月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大举北伐,但遭到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驻军桂林后,陈炯明主持两广并负责北伐饷械,但他阳

奉阴违,打出“保境息民”的旗号,暗中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勾结,使孙中山入湘北伐计划受阻。陈炯明还派人暗杀了拥护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孙中山被迫变更北伐计划,于1922年4月督师回粤。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免去了陈炯明广东省长、内务部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但仍留陆军部长一职,以促其悔悟。5月上旬,孙中山又发布北伐令,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取道江西北上;随即发布了总进攻令,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江西。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接着进占吉安,直逼省会南昌,一时声威大振。

当孙中山重新树起护法旗帜时,陈炯明即和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暗中勾结。粤军平定广西后,陈炯明踌躇满志,公开与孙中山相对抗。孙中山在前方筹划北伐,陈炯明则在后方多方掣肘,密谋破坏北伐和颠覆广东政府。北伐军深入江西后,陈炯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所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由广西南宁东进,进攻广州,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本兼各职,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6月,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陈炯明迫不及待,于14日囚禁了廖仲恺。16日凌晨,又令叶举等部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等帮助下脱险。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率“楚豫”、“豫章”等海军各舰和部分陆军反击叛军,并电令入赣的北伐军迅速回师镇压叛乱。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纷纷通电声援孙中山讨逆。但是,由于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回师途中受到南北夹击,损失严重,不得不于7月下旬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孙中山在反击叛军近2个

月后,终因孤军无援,于8月9日改乘英舰“摩轩”号,离广州再赴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第二次护法斗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三、孙中山的 伟大转变与改组国民党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立场,进行过多次奋斗。但无论是“二次革命”,倒袁斗争,还是护法运动,都先后遭到失败,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世界及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受到新思想的启迪,看到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十月革命后不久,从1918年夏季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有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苏合作问题。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鼓舞。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络,希望苏俄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了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的愿望。1921年8月,他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同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同马林

会晤,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要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二要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些建议都得到孙中山的赞赏。1922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会晤和商谈。通过这些会晤,孙中山进一步加深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认识,逐步坚定了联俄的信心。1922年8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北京,孙中山与越飞多次通信联系。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越飞;不久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揭示了联俄政策。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在确立联俄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包含了革命要依靠工农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思想;旋即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孙中山还指定一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干部担任国民党本部及某些地方支部的负责人。这些都表明,国民党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同年2月,孙中山得到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的支持,回到广州。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努力巩固与发展同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三大以后,更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从内部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1923年7月,李大钊在北京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一起重建北京国民党组织,到11月,北京的国民党员总人数达到千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约占1/3。毛泽东也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赴湖南秘密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扩大国民党和孙

中山的革命影响。10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广东团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广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正在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远在巴黎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等也同当地国民党代表商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于1923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同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12月,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促进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和努力工作,使孙中山更加坚定了联共决心,大大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以蒋介石为首、有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党、政、军组织情况。不久,苏俄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鲍罗廷来华。10月,孙中山委任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参加并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随即,孙中山正式委任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张继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协助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工作。孙中山还密电李大钊南下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接着,孙中山委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李大钊为候补委员,鲍罗廷为顾问,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间,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临时中央执委会还对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大会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代表的推选等作了认真讨论和具体部署。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是他晚年作出的符合人民意愿、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决策。它得到许多国民党人,特别是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大力赞助,但也引起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阻挠和反对。就在改组宣言发表的当天,与孙中山有着较深私人情谊的邓泽如、林直勉等 11 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孙中山毫不动摇,亲笔批驳邓泽如等的污蔑不实之词,重申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性,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稍后,孙中山又发表《致全体党员书》,并多次向国民党人发表演说,反复耐心地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严厉批评那些散布流言的人。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义无反顾的坚定立场,保证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四、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

西湖特别会议

共产国际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促使国共进行合作。

早在 1922 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在荷属殖民地爪哇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在中国南方同国民党接触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并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党内的联合统一战线。马林的建议为中共中央所拒绝,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 年 8 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到上海,建议中共中央再召集一

次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张太雷。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张国焘等人反对马林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势必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党的独立性。李大钊等人基本同意马林的主张,认为中共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陈独秀虽然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但他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他可以服从。经过两天的讨论和马林的说服,最后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中共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与孙中山合作,但孙中山反对党外合作形式,因此,党外合作形式是难以实现的。而西湖特别会议将党外合作改为党内合作,这是国共合作酝酿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中共三大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这个指示,是由马林于同年5月带来中国的。而恰在这时,由于二七惨案的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迫切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增加。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妥善解决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正式制定统一战线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

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 30 多人,代表全党 420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而残暴,不但有封建军阀势力,而且有帝国主义势力。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敌人。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因此,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极其必要的。另一方面,会议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最大的压迫来自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不但工、农小资产阶级能参加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参加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立场;同时,他们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们合作。因此,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也是可能的。

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倾向,同时也不同意陈独秀与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的偏向。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和激烈争辩,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决议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

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要“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决议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共三大正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从而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动员和组织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30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人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165人,其中有廖仲恺、于右任、张秋白、何香凝等著名国民党人和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孙中山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5人组成主席团。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各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期间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要坚持联俄联共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批判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的空言和谬论;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方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中国国民党有了一个适应时代和革命需要的主义,并且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的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

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围绕着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问题展开尖锐的斗争。1月28日上午,广州代表方瑞麟趁孙中山没有与会,提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章程上添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公开挑战。李大钊当即予以批驳,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合作诚意和原则立场;廖仲恺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反驳谬论,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方针。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同意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议决要努力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坚持淘汰不纯分子,整顿各级组织,严明党的纪律。这就标志着中国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从而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张国

焘、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月31日,孙中山主持中央执、监委第一次会议,组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推定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谭平山、廖仲恺、林伯渠分任组织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戴季陶、邹鲁、许崇智分任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军事部长;会议还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当地党务。

大会进行期间,1月25日,传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亲自到会宣布这一噩耗,紧急动员由大会去电表示哀悼;并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业绩,重申向苏俄学习的决心,要求国民党改组后能像列宁领导的革命党一样有组织、有力量。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胜利完成和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国民党一大及其各项重要决策体现了革命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政策上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黄埔军校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定在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的帮助下,1924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第一期学生入学上课。6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建立时,苏俄政府无偿提供了开办经费,运来了武器装备,派遣了几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到校担任教

官。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设置了党代表的政治部;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开设了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政治课程。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军校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到军校担任各项负责工作;并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优秀青年报考军校,使之成为军校的骨干。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国内,11月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学生中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并以黄埔军校革命军人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等青年军人,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后任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与学生一起生活、操练,深得学生们的拥护。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丰硕成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推动了革命武装的建立,保护和支持了工农群众运动,为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农运动的复苏

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这天,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随后,中共北方区委恢复了京汉、京奉、正太、陇海各路工会。

安源工会由于工作基础好,善于斗争,没有受到摧残。安

源工会领导工人在 1923、1924 年举行了五一节万人示威游行。在此期间,工人工资有了提高,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因此,当时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

在广东,由于国共两党的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较快地发展起来。1924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在广州革命政权支持下,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妨碍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这次罢工的胜利,打破了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的沉寂状态,是工人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起点。

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4 年 6 月底,在国民党中央赞同下,共产党人彭湃等开始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 1924 年 7 月到 1926 年 9 月,讲习所共举办了 6 期,培养农运人才 770 余名。1925 年,广东省 37 个县有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 62 万人。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广东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在此期间,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都有了新的发展。

第五节

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一、江浙战争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结束后,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一直把持着北京的中央政权。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

了夺取在华的独占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进一步挟持东北的奉系军阀,同时又拉拢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以对抗在英美势力控制下的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于是,奉直两系之间又开始发生了新的矛盾冲突。

1923年10月12日,浙江督办卢永祥率先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地位,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公文往来。一时间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一带成了反直系的中心。这时,浙江的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形成为反直的三角同盟。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拔除列阵浙江的卢永祥,切断反直三角的南北联系,除了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外,在南方则派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2师师长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率部进入福建,企图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率兵北上。同时,曹锟、吴佩孚还调动部队从闽、赣、皖包围浙江卢永祥部。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早有打倒卢永祥,夺取淞沪之意,因此和直系军阀一拍即合。而此时的卢永祥已看出齐燮元联直的企图,因此,也与奉系联手结盟,与齐争夺权势。

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为谋犯广东,任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以福建军阀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但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此时统一不久,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大本营革命力量和群众运动正在巩固和发展之中,孙传芳入粤企图一时难以实现。而福建一省又难以容纳孙、周二军阀同时并存,所以孙传芳开始谋求向浙江方向扩张势力。此案经曹锟、吴佩孚同意后,孙传芳联合苏督齐燮元、皖督马联甲、赣督蔡

成勋、闽督周荫人共订图浙计划。此时，卢永祥则联合其部属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组织浙沪联军相对抗。江浙双方积极备战，借口则随时可寻。8月24日，江苏军阀齐燮元以浙江军阀卢永祥容纳被直系军阀周荫人击败的福建皖系军阀臧致平、杨化昭为借口，联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军阀逼迫卢永祥解散臧、杨部队，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招纳叛亡”的卢永祥。9月7日，北京政府发出“褫卢永祥、何丰林官勋，并免本兼各职，令齐燮元督部剿办”的通令。卢永祥起兵反对，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

江浙战争爆发前，江、浙双方的军事部署是：一、江苏军阀方面：孙传芳在建瓯组织了闽浙联军总司令部，派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联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与直系有关的军队，共8万余人兵分四路攻守。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任指挥；第二路驻守宜兴，由陈调元任指挥；第三路攻广德，由王普任指挥。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任总指挥。第四路攻仙霞岭，由孙传芳任总司令。二、浙江军阀方面：以浙、沪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部组成浙沪联军，共9万余人，分三路攻守，由卢永祥任总司令。第一路以何丰林、臧致平为正副司令，率部守上海；第二路以陈乐山、杨化昭为正副司令，率部攻长兴；第三路以张载扬、潘国纲守江山。卢永祥自己准备带兵直冲南京。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的胜负，关系着反直三角同盟的共同命运。因此，在战前张作霖派杨毓珣到杭州，表示奉军一定入关相助，并先汇300万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

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苏军一路沿沪宁线首

先发起进攻,由青阳港进攻黄渡,一路沿太湖西侧由宜兴进攻长兴。同日,卢永祥发表了讨曹通电,并传檄西南各省请其共同出兵讨伐直系。接着张作霖、段祺瑞都有通电予以声援。与此同时,齐燮元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卢,可是代理内阁总理顾维钧因是嘉定人,不想迎合奉系军阀出卖故乡,迟迟不下讨伐令。

在此情况下,从9月3日开战以来,双方在黄渡、浏河一带进行了阵地战、濠堑战,每天都是拂晓开炮,中午休息,午后3时再继续开炮,傍晚停止,双方谁也不出兵。双方每天公布的战绩都是“阵地没有变化”,这是历年来军阀混战中打得最“文雅”的一段。后来,浙军首先发起攻击,在黄渡、浏河一带打败了苏军,进展颇为顺利。这时,孙中山因和奉皖两系有反直联盟关系,即决定出师北伐,声援卢永祥,在大本营会议上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卢永祥得到孙中山的支援,进攻益烈。但是,由于第二路陈乐山部绕道太湖以西,企图攻占宜兴,进窥武进以击苏军之背的计划遭到失败,使浙军的局势发生变化。齐燮元率部遂趋重于宝山、嘉定、淞江方面,直接威胁卢永祥的后翼。此时,浙军闽边战事又败,孙传芳部的孟昭月旅出击仙霞岭,于9月16日攻占江山,直通杭州。浙军第2师又在此时发生内变,余部由衢州退守仙游,浙军闽边战线由此被攻破。

9月17日,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决定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并在浙江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张载杨辞去浙江省长职务,由浙江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务。9月18日,卢永祥发表了“移沪督师”的通电,同日将浙沪联军总司令

部移驻龙华,第2路军陈乐山部也由长兴调回沪杭线防守嘉兴。此时,奉天张作霖得知浙江战局变化的消息,即致电卢永祥,表示“誓同生死”,但却迟迟不见发兵。19日,齐燮元率部乘势进攻南翔,上海已可以听到轰轰隆隆的炮声了。

这时,由于浙江代理省长夏超在杭州暗通孙传芳,使孙部得以顺利进驻浙江境内,使浙军战局急剧恶化。卢永祥被迫决定放弃浙江,将所部集中在松江、上海一带继续与齐、孙军作战。当卢永祥决定放弃浙江的时候,派周凤歧代理浙军第2师师长,责令其率部为保卫家乡而战。不料,夏超早已通款于周凤歧,使浙军无力再战,孙军长驱直入。9月25日,孙传芳部攻入杭州,随即转赴嘉兴与陈调元部会合,筹划会攻松、沪。

在此期间,北京政府于9月20日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督理浙江善后事宜;22日任命夏超为浙江省长;25日任命齐燮元为暂兼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何丰林等人已被罢免一切职务。10月初,齐、孙率部连续攻下青浦、嘉定等地。浙军被围在松江、石湖荡一带,已无力再战。10月3日,孙、卢两军在松江、石湖荡一带又开始交战。卢军不支,于9日退出松江,孙军直抵龙华。12日,卢永祥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战守问题,臧致平、杨化昭两人主张战斗到底,陈乐山则认为浙军已元气大伤,军无斗志,腹背受敌,已无法再战下去了。卢永祥见败势已定,即日宣布下野。13日偕同何丰林乘轮东渡日本。

当卢、何两人决定通电下野的时候,皖系“军师”徐树铮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34号住宅召集浙沪联军残部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員不甘心就此失败,又推举徐树铮为浙沪联军总司令,继续抵抗。徐树铮在上海麦根路收集溃兵,建立最

后一道防线,企图固守。15日,当徐树铮回到租界内的住宅时,被上海工部局抓捕,其企图率领残部固守的计划遂告失败。同日,鄂军张允明旅首先开进上海,通电由齐燮元至沪维持地方政务。22日,齐燮元率部至沪。至此,激战一个多月的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二、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地区积极经营储备武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壮大声势,并与粤、浙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直系政权。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同盟关系,于9月4日发表通电,谴责曹、吴政府,并以援助卢永祥为由,组织“镇威军”,向山海关、热河一带增兵。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25万人编为六个军,以姜登选为第1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李景林为第2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以张学良为第3军司令,会同姜登选部,攻山海关九门口;以张作相为第4军司令、吴俊升为第5军司令,作为援军,部署于锦州、兴城、绥中一带,防止直军从海上登陆,并随时策应两翼作战;以许兰州为第6军司令,由西面的开鲁攻打赤峰,而后向承德开进。

9月13日,京奉线火车停驶。15日,奉军分兵两路向榆关和朝阳出发。同日,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挑战电称:“日内将派员乘飞机赴京,藉候起居”。

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的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

电召吴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战任务。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赶赴北京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等和全体阁员以及北京城的高级文武官吏都到车站排队恭迎。当日,曹锟发布讨伐张作霖电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将所属部队共17万人,分三路出兵。其兵力部署为:以彭寿莘为第一路军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路军司令,出兵赤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路军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设10路援军,分别以曹钺英、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鄂、田维勤、张治公、李绍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司令,随时准备投入战事。

在奉军发动进攻之前,直军主力第一路军已开进榆关中立区。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军将领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使直军海上进攻计划始终未能得手。奉军的空中力量优于直军,因此,奉军飞机先后在榆关和秦皇岛一带投弹轰炸,破坏直军的阵地。

9月15日,奉军分两路进攻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部和前去增援的王怀庆部第13师,是三路直军中兵力最弱的一部。自15日至22日,奉军一路进展顺利,接连占领开鲁、朝阳并开始向凌源发起攻势。同时,在榆关中立区,奉直两军主力开始发生战争。20日,张作霖邀请沈阳领事团的教士传话,除表示尽力保护中立区侨民安全外,并称因战争需要将派飞机前往秦皇岛轰炸直军的大本营。因此,请外国侨民先行撤离战区,由榆关到秦皇岛的外国舰队也请先行离开。

这时,直军第三路军的战斗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一线向平泉开进,会同第二路军进攻奉军的侧面。但是,第三路军的行动比较迟缓,9月23日,冯玉祥才与陕军师长胡景翼率

部离开北京。走到怀柔时,部队又停顿下来,借口交通不畅,叫士兵一面修路一面开进,因此,行动更加迟缓。此时,热河方向战况十分紧张,奉军已突破直军的东部防线,正向承德开进。吴佩孚连连电催第三路军迅速开赴前线阻敌,并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挥第二、第三路军联合作战。

奉、直两军主力在榆关地区相峙数日后,自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军处于守势,居高临下,占据地理优势。但是奉军精锐部队第3军在张学良、郭松龄的指挥下,前仆后继,奋勇攻击,双方死伤惨重。10月7日,在奉军的强烈攻势下,直军力不支敌,九门口被奉军攻破。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见守城无望,畏罪自杀。

由于榆关前线形势危急,吴佩孚急调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出发到滦州坐阵。12日,吴佩孚前往榆关巡视战况,亲自督阵,使直军前方的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榆关激战之时,热河战线的奉军于10月9日占领赤峰,15日,直军第三路军争夺赤峰,不攻而克。原来,这一路的奉军已奉命向榆关秘密移动,攻占赤峰的目的不是占领,而是为了调动直军。

奉军将主力集中在榆关一带,发动全线猛攻,先后又攻占了石门寨、山海关,于10月17日开始进入关内。吴佩孚凭关据守的作战企图失败后,率部退至秦皇岛,又以舰队运兵3万余人,向榆关方向增援,企图挽回直军的颓势。但是,由于此时冯玉祥秘密率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遂使直军士气大伤,吴佩孚原定的作战计划全盘打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刚发动的时候,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就设想两种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阻止吴军再回来,同时逼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的巡阅使。这是排吴不倒曹的计划;另一种是吴佩孚打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10月15日,王承斌和冯玉祥在古北口会面时,预见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将不利于吴。19日,冯玉祥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的急电,催促冯部按预定作战方案迅速发起攻势,以策应榆关方向的作战,电文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同时,冯玉祥看到战情报告,得知直军在榆关之战中牺牲惨重,已势衰兵竭。在此情况下,冯玉祥认为回师北京的机会已经到来,便电令孙岳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回南苑,同时下令所属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即刻回师北京。

冯军沿途切断电线,封锁消息,并以昼夜兼程70公里的行军速度,迅速杀回北京。10月22日晚9时,冯军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率先开回北京。随后,陕军胡景翼师也开进通州,隔断了吴佩孚与京东方向的联系。

10月23日,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1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在电文中,他们把直奉战争说成是吴、张两人的“私斗”,痛斥吴佩孚“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以掌握,视疆吏若仆从,逞一人之忿,兴孤注之师……,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警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冯玉祥在此采用了倒吴而暂不倒曹的办法,还想利用曹锟这个傀儡总统来收束前方的军事,以制止吴佩孚的反抗行

为。

由于冯军秘密回师北京，曹锟在 23 日上午接到通电后才知冯军回京。随后，孙岳率兵进宫，以保证“总统”的安全，同时，逼迫曹锟表态，给吴佩孚一个适当的名义让他体面下台。24 日，内阁通过决议发表四道命令：一、停战言和；二、撤消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 3 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10 月 25 日，公府卫队曹世杰旅被缴械，从此，曹锟便处于冯军的直接监视之下。同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 1 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司令兼第 2、第 3 军军长。

另一方面，吴佩孚在榆关前线接到冯玉祥 10 月 23 日通电后，当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通电，以迷惑军心。24 日，查明情况属实后，吴佩孚又寄希望胡景翼未必加入政变之事，即任胡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取代冯，并派张敬尧到通州传达命令。结果，胡景翼把张敬尧扣留起来。25 日，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 3、第 26 师各一部约 8000 余人乘车回救北京。26 日，吴佩孚把司令部设在天津，军队到达杨村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以待后援。

此时，吴佩孚唯一的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上，调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进，两路夹击进攻北京。

北京政变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

线,而山东督理郑士琦,是一个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如果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上来,就有可能控制这条交通要道,以便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力量连结起来,使自己战败后转入到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机动地位。可是,吴佩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己仅抽调少数兵力回救北京。而此时,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动摇,已不可能与声势方张的奉军相抗衡。

在此期间,由于北京政变后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佩孚还存有幻想。因此,在10月26、27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马联甲、周荫人、杜锡珪、蔡成勋、杨树庄等人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旅等,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援吴。

但是,各省援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此时,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到吴佩孚的地位十分危险,便充当中间人,奔走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协调冯、吴言和。这种调停仍无效果。

10月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从翼侧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干线,因此,榆关的直军土崩瓦解一般从榆关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3万余支,吴佩孚多年经营的直军主力至此也已基本瓦解。

11月2日,冯玉祥的军队由廊坊东进,占领了杨村和北

仓，俘获了北京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由天津被迫移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南下攻占唐山、芦台。吴佩孚在军粮城也不敢久留，便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在此期间，山东督理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佩孚率部假道通过山东。同时，郑士琦还派兵南下炸毁了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与此同时，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截断了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的援吴军，也都被阻止不能前进。这时，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了空，自己南下津浦路又受阻。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一艘，劝吴乘车到塘沽登舰南下。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自塘沽出海南逃。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5日起到11月3日止，一共打了50多天，以直军主力的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的狼狈遁逃而告结束。

三、临时执政府的统治

临时执政府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等宣布脱离直系，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先是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直系颜惠庆内阁，成立亲冯的黄郛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告终。然后，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一、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年号，皇

室成员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另拨 200 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四、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11 月 5 日，溥仪被迫出宫。

北京政变后不久，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趋激化，但两派都没有力量单独控制北京政府，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很有可能北上。为了阻止直军北上，冯玉祥于 10 月 26 日发出拥护段祺瑞的电报，请段祺瑞出山。11 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段祺瑞自 1920 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下野，寓居天津，但仍注意着时局的发展，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局势为段重新出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继张作霖、冯玉祥诸人拥段电文发出后，“各省将领及军、民长官皆纷纷乘机表示意见，通电拥段”。段祺瑞一时成为各省一致拥戴的中心人物。

段祺瑞于 11 月 22 日离津入京，24 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同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25 日，段祺瑞任命唐绍仪、龚心湛等人为外交、内务等总长。临时执政府开始行使中央政府之职权。12 月 9 日，英、美、法、意、日等国正式承认临时执政府。

临时执政府从政治体制上来说，近似于总统制。临时执政相当于总统，不设国务总理，执政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执政府取消民国法统，废止国会，国务员副署仅是形式。临时执政集行政、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可谓高度集

权。但由于段祺瑞是在失去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奉系、冯系的矛盾中就任临时执政的,因此,他不可能拥有实权。

善后会议

执政府统治伊始,就召开了“善后会议”。善后会议是段祺瑞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对抗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而召开的。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据段祺瑞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者:一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为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三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济,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超过30人。国民党人反对善后会议,故未派代表参加。但西南各省军阀均派代表出席。

2月19日,段祺瑞在善后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会议着重解决财政和军事两大问题。他希望通过会议将地方财政、军事大权收归中央,削减地方军阀的军事实力,以达到和平和统一。他以临时执政身份向会议提交了25个议案,诸如,收束军事大纲案、裁兵案、拟定军费标准案、核定各省区预算案等。由于各地军阀正欲扩张势力,扩充地盘,所以军事、财政方面的提案不可能实现。西南地方军阀提出“联省自治”案,以使其割据统治合法化,自然得不到段祺瑞和正欲向全国扩张的最大实力派奉系的通过。善后会议矛盾重重,于4月21日不欢而散。但善后会议的召开为执政府的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善后会议后不久,4月25日,段祺瑞下令取消民国法统,《临时约法》与曹锟贿选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概行作废,国会不复存在,参众两院院址由内务部接收,作为法政大学、

女子大学校址。至此,“民国初期之议会政治,乃告一段落焉”。

1925年,临时执政府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一些变化。7月30日,设立咨询机关临时参议院。12月26日,公布《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总理,又为执政府平添了几分“民主”色彩。

金佛郎案与关税特别会议

所谓“金佛郎案”,是指法国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自1905年以来庚子赔款的电汇赔款方式,而采用金佛郎折算的方式。继美国、苏俄相继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文教事业之后,法国于1922年同意有条件地退还赔款。其条件之一是将部分赔款用作中法实业银行的复业基金。该行原为中法合办,后因经营不善,于1921年倒闭。因该行曾吸收了中国军政要人的大批存款,所以法国要恢复中法实业银行,得到中国军政要人的支持。条件之二是要求中国付给法国的赔款,改变按各国流通货币为准的电汇方式,而使用硬金,即金佛郎。金佛郎本属子虚乌有,只表示法国纸佛郎应有相当于金佛郎的含金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纸佛郎贬值,根本无法与金佛郎等价。如按金佛郎折算,中国支付法国赔款则需多付。法国政府以不批准华盛顿会议有关协定,要挟中国政府接受其条件。对于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苛刻条件,段祺瑞执政府竟于1925年4月予以接受。段祺瑞的卖国举措遭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许多爱国团体和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

执政府承认金佛郎案后,法国批准了九国公约。根据华盛顿会议精神,由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10月26日,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中国等 13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在中国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中国代表在会议上表现出强硬态度,提出:(1)各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2)中国自动裁厘,并非关税自主交换条件;(3)关税自主后一定时期,实行固定税率。列强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只好原则上同意上述提案。11月19日,关税特别会议通过《中国关税自主及裁撤厘金案》,“除中国外立约各国,特此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约定中国与各国间之现存条约中之关税之上限制一切废除。”至此,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 80 余年的片面协定关税制度在形式上废除。这是执政府时期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件大事。

奉浙战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奉系军阀大举南下,仍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1924年11月皖系的段祺瑞被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一切听命于张、冯二人。12月11日,段祺瑞根据张作霖之意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和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等职,以江苏省长韩国钧兼任江苏督办;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

这时,张作霖为谋求在长江流域扩张势力,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卢永祥也企图趁机解决齐燮元的残余势力,以报在江浙之战中失败之仇,便借奉军南下之机,再次向齐部发动进攻。齐燮元面对奉军大举南下,感到势孤难敌,不得不于12月14日按照临时执政府的命令办理交卸,自行到沪暗约孙传芳共同抗卢。

1925年1月10日,卢永祥于南京就任宣抚职后,即召集旧部,进兵沪宁线,企图彻底解决齐燮元的残余势力。而此时的齐燮元因得到孙传芳的援助,于1月11日秘密令驻沪苏军旧部驱逐分治上海南、北两地的张允明、宫邦铎部。齐燮元自称为浙沪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孙传芳为第2路军总司令,于14日突然出兵占领苏州,使沪军与集中于镇江的齐燮元旧部联成一气,形成了一股新的军事势力与南下的奉军和卢永祥抗衡。段祺瑞恐怕事态扩大,为了安抚孙传芳,特于16日任命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以表示临时执政处事公正,对闽、浙并无侵害之意。17日,又派陆军总长吴光新南下,表面上是去查办齐燮元,实际上是为了调和孙传芳,使其中立。孙因此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与齐的军事联盟出现裂痕。而张宗昌率领的奉军这时则与卢永祥部会合,向沪宁线的齐军步步紧逼。

自1月17日起,张宗昌的奉军会同卢永祥部与齐燮元部大战于丹阳、无锡之间。由于孙齐军事联盟的破裂,齐军势单力孤,在奉军和卢永祥部的大举进攻之下,很快溃败。1月25日,齐燮元败退上海,旋乘船东渡日本。齐军残部无首,一部被孙传芳乘机接管。29日,张宗昌率奉军1万余人抵达上海,又将齐的一部败军缴械收编。至此,齐燮元的苏军不复存在。

张宗昌率奉军抵进上海,引起了孙传芳的惊恐和不安,为接收齐军残部的一些事情,张、孙两部发生了争执。2月3日,在吴光新的居间调停之下,孙传芳与张宗昌签署了江浙二次和平条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

交上海总商会保管”。这时,虽然齐、卢二次战争告一段落,但是,由于奉军对段祺瑞和吴光新对上海调停的处置不满意,又开始了奉浙战争的酝酿。

4月24日,段祺瑞应张作霖的要求,特派张宗昌为鲁督;8月3日,因卢永祥辞去江苏督办职务,8月29日,段祺瑞又任命奉系杨宇霆为苏督、姜登选为皖督。在此期间,奉军又以“沪案”之事为名,派兵进驻上海,并建立戒严司令部。孙传芳对此大为不满,对奉系势力的南下感到不安,便暗中联络浙沪旧部和直系政客吴景濂、张英华、刘永谦等人,策划抗奉对策。

9月下旬,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在南京、蚌埠两地就职。此时,由于奉浙之间战争气氛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段祺瑞又派吴光新到长江一带奔走和平,劝告奉、浙两军切勿诉诸武力。但是,由于段的傀儡角色,这一切奔走已无济于事。

10月初,孙传芳在杭州召集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出兵讨奉的任务。商定由孙传芳率兵首先进攻上海,而后由福建督办周荫人带兵到浙江打接应;江西督办方本仁派部下邓琢如为援浙军前敌总指挥。皖南镇守使王普、江苏第4师师长陈调元以及下台的直系军阀齐燮元、马联甲等也都派代表参加了杭州讨奉军事会议并答应出兵策应。

会议结束后,孙传芳以“国庆”(10月10日)阅兵为名,向松江、长兴两地集结兵力。段祺瑞得到这个情报后,于10月7日又派陆宗輿匆匆到杭州做最后一次调和,孙传芳拒和。此时,张作霖也急召关内四督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于双十节前赶回奉天,讨论对付孙传芳兴兵讨奉之事。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在奉系4督准备回奉之时,孙传芳已分兵5路

向驻沪奉军发起了进攻。第1路军以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为司令、第2路军以北军第4师师长谢鸿勋为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的任务;第4路军以北军第2师师长卢香亭为司令、第5路军以浙军第2师师长周凤歧为司令,担任由长兴进攻苏州的任务;孙传芳自任第3路军司令,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

10月1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以奉军在上海欺压百姓、压迫工农运动为名,呼吁各国派员来沪进行调查,骗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此为由向奉军发动了进攻。

奉系军阀们没有料到孙军会如此神速发动攻势,一时陷入被动。这时,奉军从榆关到天津、浦口、南京、上海一线,恍如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兵力分散。而此时的冯玉祥部又在后面积有重兵,如趁机出兵加以截击,就会使奉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险境。为此,杨宇霆决定缩短战线,保全实力。10月14日,杨宇霆命令邢士廉旅迅速由上海退出,并且在通电中解释“前因沪案发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酌调军队,宣布戒严。现在沪案已解决,应将戒严司令名义取消,将所部军队撤退,并将江苏警务处移驻上海,以资镇慑”。15日,杨宇霆又邀请姜登选到南京讨论沪宁、津浦两线撤军的问题,并授意姜向孙传芳保证“苏不犯浙”,请其“念及同窗之雅,毅然止戈”。可是此时的孙传芳不肯再讲老同学的交情了,同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伐奉系。

10月16日,孙军第2路占领上海,第4路占领宜兴,随即又向苏州、无锡开进。在孙军到沪和奉军撤沪,两者之间相距仅一小时左右。

由于奉军对孙军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退兵十分迅速。因而,孙军的进展也十分顺利,一路进军几乎兵不血刃。只是18日在丹阳附近陵口时,未及退走的邢士廉部与孙军前锋小有接火,随即奉军则向镇江退走。

18日晚,杨宇霆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得悉奉军败退消息,但已无法脱身。此时,苏军将领陈调元率苏军第4、第10师留守南京已把杨看管起来。杨以洗澡为名,借机逃出南京城,弃下守城奉军,自身渡江乘车逃走。

19日,驻守南京未及撤走的奉军第8师大部被苏军第4、第10师包围缴械,除一部渡江逃走外,师长丁春喜被俘。20日,孙传芳到南京后,即派谢鸿勋师渡江追击奉军,奉军又退往蚌埠。21日,驻防泗县的皖军倪朝荣旅开到淮关,电促姜登选下野,姜见奉军大势已去,无力挽回败局,于23日被迫辞职离开蚌埠,奉军也由蚌埠向徐州方向退却。

奉军虽然退出南京、蚌埠一线,但是并未战败。张宗昌于10月21日统率援军到达徐州,摆开战场,准备与孙军大战一场。但在此时,孙军却占据蚌埠后不再前进。原来孙传芳在此期间与退据湖北的吴佩孚和北方的冯玉祥已预有密约,迫切希望有吴佩孚鄂军或冯玉祥的国民军接替进攻徐州的任务。不料吴、冯两部未能履约。26日,张宗昌调兵由陇海路新安镇忽然进攻海州,苏军白宝山部不敌败退。奉军又沿运河南下进攻清江浦,苏军马玉仁部在城外战败,只好困守孤城。此时,孙传芳调动苏军郑俊彦、陈调元两师前去增援,才遏止了奉军在东线的攻势。

11月1日,张宗昌又在津浦路发动进攻,用铁甲车装载

白俄军冲锋前进。前线皖军见到“洋兵”助战都很害怕，由任桥一路败退到固镇以东。此时，孙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一面拆毁铁路阻止奉军前进，一面派陈仪、谢鸿勋 2 师绕到奉军的后面截断退路。孤军冒进的白俄军和奉军一部，受前后夹击，突围无望，只得举手投降。在这次战斗中，白俄军有 300 余人被杀。张宗昌所派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也在新桥站被擒，所部鲁军第 47 旅全部被包围。张宗昌又派褚玉璞率部增援，接应鲁军第 47 旅反攻突围，但未能如愿。11 月 3 日，鲁军第 47 旅被缴械解散，褚玉璞见救援无望，便率部在宿县、夹沟之间布阵，与孙军相峙。

此时，冯、奉两系破裂在即，张作霖自感战局于己不利，便命令张宗昌不要再战，保全实力退守山东。因此，张宗昌于 11 月 7 日下令退却。邢士廉、许琨、毕庶澄等部也由海州、宿迁退回郯城、台儿庄，褚玉璞等部由宿县、徐州退回韩庄、临城。11 月 8 日，孙军占领徐州。20 日，孙传芳通电自徐州返杭。从此，苏、浙、皖、赣、闽五省遂为孙传芳割据。奉、浙战争也宣告结束。

郭松龄反奉之战

奉浙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奉系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新派以杨宇霆为首，旧派以张作相为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在新派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之间互相倾轧，由来已久。特别是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奉为尊师，这更使其他同僚

所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部主攻山海关一线,立有战功。可是奉系获胜,大军入关后,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等均居要职,得到各自地盘,唯独郭松龄一无所得,后来欲求热河都统,也因杨宇霆在张作霖面前做梗而未能如愿。于是,郭感到愤愤不平,与杨水火不容。但由于杨受“大帅”倚重,“少帅”也无可奈何。因此,郭便暗中筹谋从奉系中分裂出来,与冯玉祥联合反奉。

1925年3月,冯玉祥所部的国民军占领了河南全省,按照冯、张原定协议,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可沿京汉线向豫、陕、甘一带发展,但因屡受奉军阻挠,使原定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当奉浙战争爆发时,冯玉祥即准备借机反奉,后因奉军及时收拢至徐州一带,牵制了河南的国民军。同时,北京附近的奉军,也向驻守京城内的国民军采取了三面包围的形势,冯、奉大战又一触即发。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便利用奉系内部矛盾,派员与郭松龄联合,达成了反奉的秘密协定。

在奉浙战争期间,张作霖派张宗昌、李景林南下专力对付孙传芳;派张学良为“京榆一带驻军军长”,郭松龄任副职,专力对付冯玉祥。此时,由于冯玉祥派员与郭秘密联系,使张氏父子动了疑心。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力量对付东南5省的孙传芳反奉联盟,张学良于11月13日突然携带妥协条件到天津,对冯军作了让步。11月20日,冯、郭两人又一次达成密约;由郭率部从榆关正面回师反戈驱张,冯率部进攻热河以作支援。同时,郭松龄又拉拢李景林加入反奉同盟,并代李向冯玉祥提出三个条件:一、划直隶、热河两地为李的势力范围;二、冯军可驻保定,但财政收入仍由李统筹支配;三、黄河以北

直隶各县均由李军驻守,但可开放天津海口以供冯军使用。以上三条冯玉祥表示可以接受。

11月22日,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奉,郭察觉他的活动已被张氏父子查觉,召他回奉是不怀好意,便决心提前行动。当天,郭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的建议,以改造东北政局,他将竭诚予以拥护。这种“反父不反子”的态度,一是由于郭和张学良有着深厚的交情,二是利用张学良的名义起兵,可以减少奉系内部的抵抗。张学良听了郭的建议,不禁为之骇然,但他未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用“可以考虑”予以搪塞。他们分手后,张学良立即在天津东站上车,用双车头挂着三节专列车厢,加足速率向关外急驰而去。由于锦州铁路被毁,不能通车,张学良途中改往葫芦岛,准备由海上返回沈阳。在这以前,冯玉祥曾建议郭扣留张学良,但郭不忍心下手,否则张学良是没有逃出天津的可能的。

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班师回奉,倡导和平之举。当场扣押了不肯签名附和的第5师师长赵恩臻、第7师师长高维岳、第10师师长齐恩铭、第12师师长裴春生等30余名军官。正在这时,姜登选的专车开到滦州车站,郭派人把姜迎到司令部后即扣留。24日,郭发出了班师回奉的电报,并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张作霖接到电报大吃一惊,为稳住郭,马上下令罢免杨宇霆,劝郭切勿意气用事。

李景林因为家眷均在沈阳,根据事前约定暂不举兵响应,只是暗中相助。李在郭的通电之后也用委婉的词句劝告张作霖下野,他的眷属即在沈阳被扣为人质,吓得李景林再也不敢多动了。

同一时期,冯玉祥一面宣布对郭、张的分裂内争保持“中立”,一面把部队迅速调往北京,并派兵出喜峰口直趋热河,威及奉军。

11月25日,郭军由滦州向榆关出发,为了减少沿途奉军的抵抗,以期一鼓而下直达沈阳,郭所下命令都与张学良联合署名。为此,蒙蔽了不少人跟着反戈,使郭的队伍有所扩大。

11月26日,张学良在葫芦岛接到他父亲的命令,叫他迅速设法安抚郭军。因此,张学良当天便乘镇海舰直达秦皇岛,电召郭前去面谈。郭未应召前去,却写了一封回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之所赐。拼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同一天,姜登选在滦州被郭枪决,所扣押的30余名军官被解往天津交由李景林看管。张作霖派飞机前往滦州、秦皇岛一带散发传单,用张学良的名义召抚所部弃郭来归,但没有效果。23日,张学良从秦皇岛乘船到达大连,与杨宇霆同回沈阳,商讨抗郭反戈之事。

11月27日,郭军占领榆关,29日占领绥中。30日,郭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至此,张作霖见郭反叛之心已无可挽回,便下令讨伐,并悬赏80万元捉拿郭,提头来见者8万元。同时还将郭的父母扣押起来。

12月3日,郭军与退守兴城的张作霖军在大雪之中展开了一场鏖战,张军不支退往锦州。郭军紧追不舍。5日,张军又退守大凌河北岸,并破坏了大凌河铁桥以阻止郭军前进。

此时,奉军主力几乎全部开进关内,关外只留有2个补充旅,面对起兵反戈的郭军主力根本无法阻挡。因此,张作霖大

为恐慌,请出沈阳日本总领事内田转达,要求郭军暂缓前进愿意和平交出政权。郭表示张下台后可聘为最高顾问,张学良可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将政权交还给他。同时,段祺瑞拟就命令革去张作霖本兼各职,派郭继任奉天军务督办,只等郭军进城,即予发表。

但是,张作霖用的是缓兵之计,与此同时,他派张学良到兴隆店设立司令部,在辽河左岸建立了最后一道防线。8日,又派张作相回吉林调动援兵,同时又令黑龙江吴俊升率兵迅速来援。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利用奉系内讧的时机,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东租借地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99年以及日本在满蒙享有种种特权的条件,张作霖都予以接受。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帮助张维持政权并予以必要的援助。9日,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由辽阳移驻沈阳。12日,张作相率领吉林军回到沈阳。13日,吴俊升率领黑龙江骑兵由洮南经四平开抵沈阳。这样一来,张作霖的地位有了保障,便收回了和平让出政权的宣言。

在此期间,郭松龄率部于12月12日从正面占领白旗堡,右翼占领营口,正待向纵深开进时,同一天,日方突然宣布营口为中立区,不许郭军开入市内,并不得沿辽河两岸作战,不得侵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20华里内,南满铁路拒绝运送郭军。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于13日又率部由营口河北站渡河,又被日军阻止,只得退往田庄台。

而这时,日方却允许张作霖利用铁路从吉、黑两省调动援军。因此,张作霖得以集中全力在正面设防,并利用调动军队之机从侧翼迂回郭军右翼,使郭军两路进攻受阻,并造成左右

夹击之势,对郭军构成威胁。

12月14日,郭军由白旗堡进攻新民,由于气候严寒,战斗时打时停,久攻不下。19日,日方加派一混成旅到沈阳代张守城,沈阳兵工厂也由日军驻守。于是,张作霖让自己的卫队也尽数开往前线作战。同一天,郭军第二次进入营口,因日军干涉只好又退出。20日,郭军占领新民,与张军沿巨流河隔岸对峙。

此时,张作霖部的骑兵旅于芷山绕道冷口出关开到兴隆店,接着富双英、刘震东各团也脱离郭军投奔张学良。于是,郭松龄以重兵压城的优势转为分化瓦解之局。

12月23日,张军左翼黑龙江骑兵师5000余人,绕出新民向白旗堡郭军司令部实施突然袭击,同时,飞机也在新民城上空投弹,全城燃起大火,郭军在地面和空中的配合攻势下陷于极大混乱之中。24日,郭逃往新民城,请求日本领事分馆转电沈阳吉田领事,表示可以弃军向张投降,乞免一死。张作霖回答,郭军官兵一概可以不究既往,只有郭一人为奉军所切齿,不能保障其生命安全。同一天,吴俊升部骑兵冲进新民,郭逃至日领事分馆寻求避难,日方拒绝收容。郭只好偕同眷属和秘书长林长民等退出来,林在路上被流弹打死。郭找到一辆推车,让妻子剪发易服,装扮农妇坐在车上,自己化装成为农夫推车而行。在行至老达房附近时,遇到黑龙江骑兵营长王永清搜索前来,郭急忙躲进当地一农家菜窖内被活捉。

张作霖闻讯后大喜,电令将郭押解沈阳讯办,随后又怕途中逃走,于是又临时下令把郭夫妇从汽车上拉下就地枪决。同一天,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率残部向张学良投降,巨流河之战到

此结束,郭松龄从起兵到身死正好一个月。

三·一八惨案和执政府的垮台

执政府在冯玉祥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成立的临时政府。由于冯玉祥国民军日益倾向革命,执政府只能在奉系的羽翼下维持局面。张作霖、段祺瑞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对外屈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全国人民掀起卫个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

1925年10月,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联合福建督军周荫人发动了反奉战争,孙传芳组织所谓浙、闽、苏、皖、豫五省联军击败奉军。吴佩孚乘机再起,在汉口通电自受14省拥戴,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拟由河南进攻徐州,与孙传芳会师,直系势力复起。

冯玉祥部国民军于北京政变后沿京汉线向南发展,1925年3月占领河南全境,复向陕甘发展,但屡受奉军压迫,冯、张矛盾激化。直系反奉战争打响后,国民军参加了反奉战争,向奉系控制的山东、直隶发展。在全国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奉系内部矛盾激化。郭松龄秘密与国民军取得联系,于10月23日在滦州倒戈,兵出山海关,直逼奉系老巢沈阳,张作霖十分惊慌。日本出兵援张,郭松龄兵败被杀。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国民军却乘机大为发展,于11月前后打败奉系李景林,控制京津,占领了直隶全境,并和河南联成一片。

11月2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爆发了“首都革命”。北京各学校、各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以及广大群众共5万多人齐集神武门前,举行游行示威。会后,群众高

呼“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首都革命”是共产党人试图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北京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直奉的联合,吴佩孚、张作霖互相致电,表示谅解。直奉联合以共同“讨赤”名义,进攻国民军。1926年1月,在奉直压力下,冯玉祥通电下野,随后赴苏联考察。奉军入关,直迫天津。吴佩孚军挺进河南,占领开封、郑州、河南国民军全部溃败。

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得到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3月12日,日本蓄意制造了大沽口事件。3月12日下午3时,日本军舰2艘驶入大沽口,奉系军舰数艘尾随。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制止日舰驶入,日舰竟向国民军开炮。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反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纠集英、美、法等《辛丑条约》缔结公使于3月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炮台等5项要求,限18日前答复。17日,各国军舰20余艘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恫吓,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向执政府请愿。当请愿群众行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时,段竟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李大钊、陈乔年皆在斗争中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军阀政府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于3月20日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声讨段祺瑞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起来继续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影响。3月21日、25日、27日，天津、上海等地各人民团体先后召开大会，为死难烈士致哀，向段祺瑞执政府抗议。

三一八惨案后，直奉军继续对国民军进攻。在直奉逼近北京时，段祺瑞企图与奉军里应外合，消灭城内国民军，但阴谋败露。4月9日夜，国民军鹿钟麟部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闻讯逃入东交民巷，执政府从此垮台。国民军在直奉军阀压迫下，退出北京，撤至绥远和甘肃。

四、西南军阀的演变

西南军阀是指割据西南六省(粤、桂、滇、黔、川、湘)的军阀。

经过两次粤桂战争，陆荣廷在两广的统治已被推翻，但陆荣廷的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陆荣廷在直系的支持下于1922年8月返回广西，宣布复任北洋政府委任的“广西边防军务督办”之职。这样，广西出现了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等三大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

1924年1月，陆荣廷试图统一广西，进兵桂林，讨伐沈鸿英部。6月，正当陆、沈在桂林大战之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联合兴兵讨伐陆荣廷，攻下省会南宁，陆部或逃或降，大部被肃清。9月，陆率残部退入湖南。10月9日，通电下野。陆荣

廷在广西的统治从此告终,代之而起的是李宗仁等新桂系的崛起。

滇系唐继尧 1920 年 3 月挑起川滇战争,驱滇军入川被川军逐出。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以士兵厌战为由于 1921 年 2 月班师回滇逐唐。唐被迫通电辞职,出走云南。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一年后,唐继尧又击败顾品珍,重执云南政权。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唐继尧企图乘机夺取广东政权,于 3 月 19 日发出通电,声明已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副元帅职,同时声明加入国民党。唐的卑鄙行径遭到广州政府的严厉谴责,其阴谋破产。1927 年 2 月,唐继尧部下龙云、胡若愚等 4 人发动兵变,唐继尧“光荣”下台。5 月因病去世。云南政权转移到龙云之手。

湘系,1919 年湖南将北洋军阀张敬尧驱逐后,谭延闿自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0 年 11 月,谭延闿下台,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执掌湖南军政大权。1925 年,广州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而湖南是北伐必经之地,湖南人民为迎接北伐军,于 1926 年初掀起了驱赵运动。3 月 11 日,在各方面的逼迫下,赵不得不辞职。25 日唐生智就任代省长职。

川系军阀的演变最为迅速。1919 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1920 年 12 月为刘存厚所取代。1921 年 6 月川军各部驱逐刘存厚以后,刘湘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掌握了四川军政大权。

黔系军阀、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在南北纷争中追随唐继尧,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1920 年被补选为军政府政务总

裁。但随着黔军的不断发展,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成为黔省实力人物。刘、王矛盾不断加深。11月,王文华策动黔军兵变,逼刘显世辞职。1923年3月,滇军击败贵州省长袁祖铭的军队,占领贵阳,扶持刘显世重新当上贵州省长。刘显世名为贵州省长,实则滇军傀儡,10月被迫辞职,贵省军政大权由滇系唐继尧控制。1925年1月,唐继尧为联合袁祖铭黔军攻川,发表通电,黔省内政,概由黔人自理,将贵州军政交还给袁祖铭。

第六节

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中苏协定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的权益。列强即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政府,欺压中国人民。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中苏协定的签订更推动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于1919、1920、1923年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在尊重中国主权和放弃帝俄侵略中国所得的特权的基础上同中国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国代

表顾维钧、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北京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与前俄国政府所订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之外的一切特权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中苏协定的签订，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热情，一场要求全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由此兴起。自1924年7月开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纷纷组织反帝同盟，召开群众会议，发表通电和宣言，开展反帝废约的大宣传。9月3日至6日，北京反帝大同盟发起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反帝运动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人在废约运动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24年7月，《向导》发表文章指出，“废约运动即是民族运动”，“国际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是不会独立自由的”。1924年底，废约运动与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在一起，声势更加浩大。

二、孙中山北上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第二次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孙中山从辛亥以来的政治斗争的实践中也认识到国会问题、法统问题、护法口号已不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而赞成召开国民会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全国之统一,毅然决定应邀北上。临行前,于1924年11月10日,他对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明确宣布北上的目的是:对内要“打倒军阀”,使“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为除不平等条约。他还主张,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先召集一个由现代实业团体和反对曹、吴的各军及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组成的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召集的日期及选举方法等。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促成国民会议的运动高潮,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的会员达几十万人。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广州北上,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北京各界10万多人在冒着严寒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军阀政府以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为同善后会议相对抗,善后会议期间,一个由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各界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00多人,代表20多个省区的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讨论了有关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系列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些决议虽然不会被军阀政府所采纳,但这次会议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北上抱病起程的。由于旅途辛苦，劳累过度，肝癌复发，经医生再三治疗，终无见效，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享年59岁。临终时，他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咐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依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伟人逝世，全国哀悼，各地都举行了追悼会。在北京，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市人民极为悲痛，先后有70多万人到孙中山灵前致祭。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追悼大会，并结队前往孙宅悼唁。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了唁电和《告中国民众书》，《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都出版了悼念孙中山的特刊。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

四、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

中共四大

在统一战线日渐巩固，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时，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人阶

级如何参加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党如何领导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高潮问题。大会的主要贡献是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还正确地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大会回顾和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民党内已形成左、中、右三派力量,确定中共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针是扩大左派,批评和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此外,大会还制定了有计划开展工农运动的方针,并决定在全国积极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总之,中共四大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会议的缺点是对革命实践中已日益紧迫的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武装问题没有明确的决定;对资产阶级右翼力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也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二大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中共三大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这都是党不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成果。但是,无论二大或三大,都没有明确阐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持有严重的右倾认识。他在党的三大前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各阶级》两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的主体,把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轻视工农的力量和作用,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

然是资产阶级把握政权”，从而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打伤10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成为五卅反帝风暴的导火线。

第二天，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上海35个社会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援工人罢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于24日召开1万多人的追悼顾正红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但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甚至扬言要进行“公审”。这更激起上海人民的愤慨。

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提出要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也在5月25日举行会议，重组有共产党人杨之华、郑复他等参加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指导工人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2000多人组成宣传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出动巡捕肆意逮捕爱国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拘押学生100多人。上海各界民众上万人涌上街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巡捕又开枪射击，打死10多人，打伤几十人，

逮捕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把上海各阶层人民进一步卷入了反帝斗争的洪流。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并决定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场斗争。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6月1日,上海十几万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同日,5万学生开始罢课,绝大多数商人也实行罢市。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斗争得以实现。6月7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主要代表中小商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召集了有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主要有:撤退帝国主义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释放被捕学生、撤销印刷附律等提案、惩凶、赔偿、道歉等。中共中央特别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在《热血日报》和《向导》、《中国青年》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真相,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发表宣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并创办《民族日报》,由杨杏佛主编,作为国民党反帝宣传的舆论阵地;执行部还组织了工人救济会,募捐援救罢工工人。

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英、日帝国主义向上海增派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野蛮枪杀中国人民。据统计,在5月30日到6月10日的12天里,帝国

主义者制造 9 次流血事件,打死 60 多人,重伤 70 余人,轻伤不计其数。帝国主义还一面以“司法调查”、召开“关税会议”,引诱上海资产阶级,一面以停止借款、供电相威胁,企图分裂、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国民党右派戴季陶鼓吹“缩小范围”、“友谊协商”,对帝国主义表示妥协,破坏反帝运动。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和国民党右派的蛊惑下,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将工商学联合会的 17 项交涉条件修改为 13 项,删去了撤退外国军队等重要条款;决定 6 月 26 日单独停止罢市,开市营业。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这一决定,退出了反帝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奉系军阀也秉承帝国主义旨意,派军队进驻上海,宣布戒严,下令封闭工商学联合会,继又封闭了上海总工会,秘密杀害了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鉴于上述情况,为了保持工人力量,维护已经取得的斗争成果,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策略转移。9 月,罢工工人先后复工,学生也复课上学。

五卅运动充分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勇敢的先锋队、革命的领导力量,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动摇性、妥协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死敌。五卅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一页,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提高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威信。五卅运动后,反帝斗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广州、北京、南京、汉口、天津、长沙等几十个城市相继举行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人参加的反帝集会和游行示威,许多农

民也加入了斗争行列。据估计,全国各地直接参加这一运动的达 1280 万人。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都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总之,五卅运动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引向了新的高潮,标志着革命大风暴的到来。

省港大罢工

在支援五卅运动的全国反帝斗争浪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 1925 年 6 月开始的香港和广州工人大罢工。通称省港大罢工。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香港各行业工人于 6 月 19 日开始罢工;21 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23 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动下,广州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黄埔学生军和从香港返回的罢工工人共 10 万人举行反帝集会。廖仲恺主持了大会,刚从东征前线回来的周恩来和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国军警的疯狂扫射,当场死亡 52 人,重伤 170 余人,造成震惊海内外的沙基惨案。这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仅香港一地,罢工工人激增到 25 万,其中 13 万陆续回到广州。

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了香港和沙面租界各工会代表大会,议决产生了罢工的最高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推选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会党团书记、总顾问。罢工委员会设有法院、监狱;组织了 2000 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由共产党人赵自选任队长、邓中夏为

训育长。纠察队封锁了香港和沙面租界,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罢工委员会还设立工人医院和宣传学校,创办《工人之路特号》。张太雷、肖楚女等经常撰写文章,教育、激励工人,指导罢工运动。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也发表了大量指导罢工斗争的文章。国民党左派和广东革命政府对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持。廖仲恺担任了罢工委员会的顾问,经常和苏兆征、邓中夏等一起研究情况,维护工人权益;他还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积极开办贫民医院和小型生产合作社。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拨款 1 万元给罢工委员会作为经费。

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被封锁的香港成了“死港”、“臭港”、物价猛涨,商店倒闭;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萎缩,赤字增加。据估计,罢工期间,港英政府每天损失达 180 万元。罢工委员会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接来广州”的政策,这就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使英帝国主义处于孤立境地。省港大罢工也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以苏兆征、邓中夏为首的罢工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 16 个月之久,直到 1926 年 10 月,经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郑重讨论,才决定自动结束罢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第七节 国民革命的高涨

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叛乱事件。

广东商团成立于1912年,本是商人的自卫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所操纵,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1924年夏,陈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违法私运入口,被广东政府查获没收。商团寻机发动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游行活动,商团武装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商团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叫嚣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英国出动军舰,为商团助威。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十分危机之中。中共和广东各界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孙中山调集政府军、黄埔学生军平叛。15日,商团被缴械,商团叛乱的平定,给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着广东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还有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均拥有较强实力,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陈炯明的主力共6万余人,在各派军阀中实力最强,对革命政府威胁最大。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联合江西军阀,分三路进犯广州。15日,广州留守政府决定组织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三路进兵: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许崇智所部粤军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为左路,攻河源。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右路军统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勇猛进军,连克东莞、常平、平湖,11日占领深圳,肃清了广(州)九(龙)路敌前哨部队,然后乘胜挺进,于14日克复淡水,这时,因左、中路的滇、桂军迟不进兵,右路军实际成为东征军主力。20日,右路军占领平山,然后暂置惠州于不顾,挥师东进,在海丰农民群众支援下,先后攻克海丰、潮安、汕头等地。3月13日,右路军又与叛军激战于棉湖,虽牺牲惨重,但终于大破敌军。至23日,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等地,残敌逃往闽赣边界。第一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主力,胜利结束。

当东征战事方酣的时候,担负左、中路进攻任务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心存异志,暗中勾结陈炯明和滇系唐继尧,按兵不动,陷右路军于孤军奋战。继而又于4月间从

东江撤回广州,发动叛乱,占领广州电报局、火车站和一些政府机关。6月6日,右路军奉命回师,镇压叛军。11日,在工人、农民支援下向叛军发起总攻击,仅一天半时间,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平定了杨、刘叛乱。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等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内政等部长。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曾着手组建国民政府,但考虑到粤境军阀林立,大本营制易于应策,就暂时保留了这种政制。1924年7月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指挥政府处理一切政务,从而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对政府及其政策的领导和监督。因而,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的革命政策。

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中央再次酝酿并提出改组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问题。第一次东征和杨、刘叛乱平定后,初步稳定了广州局势,政府改组工作得以实施。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大本营政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4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员及代行大元帅职权的名义,通电发布国民政府改组决议案,宣布设置国民政府掌理全国政务,以委员若干人组成,并设置军事、外交、财政各部等六项改组办法。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史称“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制采用委员制,选举汪精卫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

长,孙科为交通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聘鲍罗庭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国民政府的职责为:“履行先大元帅之遗嘱,凡遗嘱所叮咛告语者,即国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实现者”。内外政策为: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仿照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对内,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自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已失之主权,而还之国民,以符主权在民之旨”,“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从而实现“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国民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大力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支持民众运动,一面致力于广东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

为实现军政的统一,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1925年7月6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许崇智等8人为委员,汪精卫任主席。决定取消带有封建色彩的以省名为别的地方军队名称,统称为国民革命军。8月1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先通电宣布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4日,谭延闿、朱培德、程潜等联合发表通电,宣布所部均交军事委员会统辖,以示拥护国民政府统一军队之指令。26日,国民革命军正式统编组成。先后编成8个军,共约10万人。第一军以原黄埔军为基础编成,蒋介石任军长;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第六军程潜任军长;

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国民革命军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制度及各级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以确保军队的革命化。统编后，广东境内各自为政，形同割据的各派旧军阀部队，被改造成一支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为打倒封建军阀而战的新式的革命军队。

军政的统一，为广东财政及民政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出任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整顿和治理财政。首先，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原各军防区内的财政收入由政府接管，统一征收；一切费用包括各军军饷由国库统一供给。其次，建立统一的国家预算制度，力求收支平衡；第三，统一税制，取消苛捐杂税及种种不良征收制度和机关，废除厘金；第四，统一关税，实现财政关税自主权；第五，建立国民银行，统一币制，改善信贷；第六，发行公债，开发实业等等。各种财政治理措施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国库收入大幅增加。国民政府还致力于民政的统一，以前，广东境内各军拥兵自重，政府号令不能统一。1926年7月初，国民政府宣布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以监察政府各级官吏的行为，惩治违抗政令及贪赃不法的官吏，政府还设立法典编纂委员会和司法行政委员会，以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教育主管机关，负责指导监督地方教育行政。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制度，并积极扶植各地革命教育等。

国民政府的成立，广东军政、财政、民政的基本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之机，纠集残部，重新占领东江

地区,对革命力量展开疯狂的反攻。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陈的旧部邓本殷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江叛军相呼应,围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各路叛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东征军组成。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万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第一纵队为中路,以何应钦为纵队长,为东征军主力;第二纵队为右路,以李济深为纵队长;第三纵队为左路,以程潜为纵队长,总预备队为朱培德的第三军。10月1日,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开始东征。陈炯明将其主力1万余人集中于惠州地区。惠州为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城高墙坚,易守难攻,素称“南方第一坚城”。陈炯明企图先据险顽抗,再寻机反守为攻。为破惠州,东征军把部队分为攻城军和野战军两部分。10日,东征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13日开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数度强攻受挫,伤亡十分惨重,第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虽多处受伤,仍冲锋在前。在猛烈炮火掩护下,14日,东征军终于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歼灭了叛军主力,很快收复了东江地区,东江的收复,结束了陈炯明祸粤的历史,为平定南部军阀邓本殷创造了条件。

邓本殷原为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后,邓在南部组建高(州)、雷(州)、罗(定)、阳(阳江、阳春)、钦(州)、廉(州)、琼(州)、崖(州)“八属联军”,并于8月宣布八属自治,邓本殷表面上在孙中山、陈炯明之间保持中立,独树一帜,实则与陈沆瀣一气,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共谋推翻广

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开始时,邓本殷出兵阳江,企图进犯广州,策应东江叛军。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同时南征,任命朱培德为南征总指挥,四路进兵,先后克复阳江、肇庆、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下旬攻克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为革命势力统一。

同时,以李宗仁、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势力,在广东革命势力支持下,于1925年2月中旬歼灭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主力。7月,又打败入侵的滇军,统一了广西全境。李、黄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1)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6月1日,广西省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

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民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后方基地。

二、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国民党改组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原党内一些军阀、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保留下来,他们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主张“清党”,即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从而构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邓泽如等右派分子,就通过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6月18日,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又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指控:“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冀从速严重处分”。随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右派分子群起响应,先后提出类似的“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护党特刊》。在国内报刊发表大量要求清党反共的文章。在共产党人和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努力下,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0次会议,否决了“弹劾”案。8月15日至21日,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就该问题通过两项专门决议。会后,颁布《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精神,及国共合作之必要,要求党员消除误解,加强团结,共赴国民革命。“弹劾”案是国共合作后右派分子一次有组织的反共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反共气焰更加嚣张。戴季陶(1891—1949年),早年曾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国民党改组前后,就怀疑并消极抵制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逝世后,伴随着“五卅”反帝风暴的来临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国民党左右派分化日益显著。为适应国民党右翼势力反俄反共的需要,戴季陶迫不及待地抛出一套反共谬论,充当新老右派反共的急先锋和政治代表。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

季陶极力主张建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并要求把他所篡改的三民主义确定为国民党的最高指导原则，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指导思想。6月至7月，戴季陶连续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和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时人称其为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抹杀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革命性质，鼓吹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2000多年来的儒家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主张“仁爱是革命道德基础”的阶级调和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在国民革命中“应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其核心则在于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国共分立。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形成“两个中心”，这是党内所有混乱和纠纷的根源。提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即国共合作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信仰，不可能长久。主张发挥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以图国民党的巩固和生存。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老右派篡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思想理论工具。此后，西山会议派的背叛分裂活动和蒋介石策划的反共事件，均是在这一反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为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相继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严厉的批驳。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广州、武汉、北京等各地革命群众也参加了反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后半年，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变本加

厉。以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为活动据点的新右派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并在京、沪等地网罗反共分子,建立分支组织。同时,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老右派骨干则密谋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实行反共“清党”,为打击左派力量,8月20日,右派分子阴谋暗杀了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参加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国民政府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逮捕了嫌疑人犯,打击了右派势力。胡汉民、许崇智被蒋介石借助廖案排挤出广州,其他右派分子也纷纷逃离广州。

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等右派分子12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是一次公开背叛孙中山三人政策,分裂国民党的会议,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右派分子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从11月23日至次年1月4日,历时43天,共举行了22次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会议把“解决共产派”作为中心议题,公然反俄反共。

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党部,公开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西山会议派又网罗各地右派分子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二大”通过《肃清共产分子案》等反动决议,产生伪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后来,他们还创办一些反动刊物,进行

反俄反共宣传。

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相配合,给予有力回击。西山会议召开前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该会为非法会议。各地党部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1925年12月11日,国民党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再次斥责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处理。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到会代表256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会议决定接受并努力实行总理遗嘱,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确定反帝、反军阀、反官僚买办阶级的革命纲领。为整肃党纪,严惩西山会议派,会议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参与西山会议的12人提出书面警告,责其改正,如不接受警告,则应开除党籍。戴季陶未经中央许可,即以个人名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以致发生不良的影响,惹起党内纠纷,由大会给予恳切训令,促其猛醒,不可再误。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国民党二大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势力,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推动了国民革命的继续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选举问题上的无原则让步,导致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崛起。戴季陶、孙科等仍被选入中央执、监委员会。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为跻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并掌握军政实权的显赫人物。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常委之列，他一面标榜自己是“总理的唯一信徒”，一面又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极力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企图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开始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926年3月，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蛊惑人心。18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派人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声称并无调舰命令；蒋的爪牙则大造谣言。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强令他们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严重挑衅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两广区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坚决回击；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采取妥协的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也被辞退回国，结果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严重打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因蒋介石挤压离广州出国。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

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 1/3;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发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这是蒋介石进一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提案。对此,陈独秀、张国焘继续妥协退让,要求与会的中共代表签字接受这个提案。这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分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蒋介石等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绝对优势。不久,蒋介石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开始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三、北伐战争前的军阀混战

刘、杨联合驱袁之战

1925 年春夏之间,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杨森,以武力消除异己,欲独霸四川,发动了所谓“统一”之战,从驱逐驻防绵阳一带的第 10 师刘斌部开始,先后击败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等部,将他们原驻防地全部占领,迫使他们退至重庆附近,依靠刘湘庇护。两月之间,杨森部增至 19 个师、12 个混成旅,防地扩展到南迄合江、东至荣昌、北达梓潼等地,据有 70 余县。这时,川系大小军阀均感到杨森的威胁,刘湘也感到实力有限,即使综合众人之力,也不足以与杨抗衡。于是,又求助

于雄踞于川南一带的黔军袁祖铭部，共击杨森部。于是组成川黔联军，公推袁祖铭为总司令，赖心辉为东路总指挥，周西成、田颂尧分任南路和北路总指挥，于7月初与杨森部交战，至10月底，川黔联军击败杨森部。11月初杨森逃至武汉，再次投靠了吴佩孚。

川、黔联军击败杨森部后，各军为了分赃，特别是川军履行对袁祖铭的许诺未能兑现等问题，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又与以袁祖铭为首的黔军发生了矛盾冲突。1926年1月29日夜，袁乘刘部移动之机，策动刘湘的何金鳌部哗变投袁，并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2月4日，何金鳌通电就任袁祖铭委任的川黔边防军第6路司令。此乃袁、刘由联手到交恶军事冲突的开端，也是爆发刘湘、杨森联合驱逐袁祖铭之战的导火线。

杨森自“统一”失败，出川投吴后，正值奉浙战争爆发，吴佩孚正扩充武力，大肆封官，为拉拢川、黔军阀，以壮声威，委袁祖铭为川黔讨贼联军总司令；刘湘为川黔联军后方筹备司令，杨森为四川讨贼联军第1路司令。杨虽不甘心屈就于袁、刘之下，但因走投无路，只好暂任栖身。此时，川系各派军阀因群凶无首，都在袁的手下忍气吞声。为了联合驱袁、实行川人自治，他们捐弃前嫌联名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认为机不可失，于2月27日离武汉赴宜昌，3月1日抵万县。遂在万县成立四川讨黔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共10个师，约7万余人。

袁祖铭看到杨森重返四川，军势甚威，咄咄逼人，在已经与刘湘兵戎相见的情况下，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定对杨

暂取忍让方针。但为了预防万一,以便为将来退据川、黔边境留后路,袁决定先将上游泸州占领,与所属驻防叙南的黔军联成一片,做到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乃于3月30日命周西成等部向泸州发起进攻。袁本以为攻泸是一着好棋,但事与愿违,不仅未能取下泸州,反而因此启衅于驻守泸州的赖心辉,并由此连带及驻守宜宾的刘文辉等人,树立起更多的敌人。刘文辉认为黔军与川军已反目为仇,今日攻泸州,难保日后不进攻宜宾。于是趁袁部在泸州西进作战时,于4月下旬,分兵三路由江安、横江、李庄同时向驻守叙南的黔军吕超部发起进攻,并一举攻克黔军防地。袁祖铭只好令吕超率残部退往合江,以保将来回黔归路。

刘湘见杨森起兵反袁,认为联杨驱袁的时机已经成熟。杨见刘、袁已失和,受袁逼迫,有联合驱袁之意,乃派员间道赴蓉,与刘协商川系军方一致对外,合作驱袁,两人一拍即合。5月5日,刘、杨兵分两路,东西夹击黔军,均以夺取重庆为主要目标。以刘湘负责西路,杨森负责东路,分别组织作战机构,开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西路军方面,刘湘委任王缙绪为西路前敌总司令,统率蓝文彬、鲜英等师,由资内东下,集中于隆昌、荣昌一带,向驻守永川、璧山的黔军进击;以赖心辉的李之甫部为第1路军,由泸州向对岸的小市一带黔军进攻;刘文辉部则由叙南继续向败退纳溪、赤水间的黔军进攻。东路军方面,杨森委任唐式遵为前敌总司令,王陵基为总指挥,率3万余人由开县、万县等地出发,向长寿、涪陵攻击。

此时,黔军在四川境内的驻地为重庆、江北、巴县、永川、璧山、长寿、涪陵等10余县。袁祖铭知刘、杨已联合出兵讨黔,

大战迫在眉睫,立即采取紧急应付措施,以驻防长寿的黔军第4师师长何光厚为东路前敌总司令;以驻防江津的贵州军务督办王天培为西路总司令;以驻在綦江的贵州省长彭汉章为第3路总指挥;以周西成部为预备队;袁本人统率警卫部队坐镇重庆,分兵御敌。

5月4日,川军东路长江北岸的杨森部,已由垫江进至长寿,向驻守该县葛兰场的黔军何光厚部发起猛攻。杨部官兵复仇心切,作战非常勇敢,鏖战数日,将何部击败。15日攻占长寿县城,驻防黔军被迫退守江北县的张关铁山、黑石子等隘口,构设防御工事,准备顽抗。杨部直逼黔军阵前,在当地民团的配合下,佯作声势绕过张关铁山,进至江北的古路坪、一碗水等地切断黔军后路。黔军不知虚实,仓皇后退。杨部乘机占领张关铁山,19日直逼江北城下,重庆城内已闻炮声。川军东路长江南岸的杨森另一部,由丰都向涪陵进击。涪陵为乌江流域门户,是袁祖铭最后退守川、鄂、湘、黔边境的必经要道,一直为黔军第1师师长李晓炎驻守。李率部依山傍水,设防固守,并不对阵应战,致使南岸杨军进退无计,双方相持多日。直至袁祖铭重庆弃守后,李率部退入小河,杨部才进入涪陵。

当东路军进攻江北时,西路刘湘部集中在中隆一带的部队于5月5日开始向驻守永川的黔军杜文举师发起进攻。激战两日,抵进永川城下。11日夜,刘部再举攻城,黔军被迫弃城逃走,退保壁山。16日,双方又在壁山激战,一举再占壁山县城。18日又攻至重庆西北的老关口。黔军只好退守浮图关。由于大江相隔黔军退却不及,一部被缴械,一部渡江退保重庆。至此,东西两路川军攻渝之战,在重庆城郊同时展开。22

日拂晓,刘、杨联军开始环攻重庆城。这时,黔军已经军心涣散,毫无斗志了。袁祖铭自知势孤力弱,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决计退守川黔边境。22日下午,袁祖铭与王天培率部由南岸向江津、合江方面退去;彭汉章率部向南川、彭水退去。刘、杨大军遂于21日下午克复重庆。缴获黔军枪万余支,殿后部队被刘、杨部全部缴械,旅长穆瀛洲率部投降。

刘、杨二人考虑黔军停留川边,将遗后患,决心乘胜利余威,一举将黔军驱逐出川。因此,仍分兵两路横扫黔军。在刘、杨强大攻势之下,袁祖铭只好率部撤出川黔边境,经小河及黔北铜仁等地退往湘西一带,另谋发展。6月6日,刘湘将成都城防治安,交与刘文辉负责后,退离成都返回重庆,继续行使其川康边务督办兼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职权。杨森仍驻兵万县,防区扩展至长、彭、涪一带,直达刘湘防地的庇连处。刘、杨携手驱袁战争就此终止。

国奉直南口之战

1924年10月,第2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为冯、张两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但都未能履约。在浙奉战争中,吴佩孚又东山再起,组织“讨贼联军”讨奉。翌年10月,孙传芳联络国民军起兵反奉,并将奉系驱逐出苏、皖两省。国民军第2军邓宝珊部乘机夺取了对山东的统治权,与张宗昌的奉军在泰安发生激战。随后孙岳率国民军第3军配合第2军进攻直隶督办李景林,与李、张的直鲁联军在保定、沧州一带进行混战。同时,冯玉祥为从内部搞垮张作霖,又从奉系内部拉出

郭松龄倒戈反奉，而后再战败了李景林，乘机夺取了天津，推进山海关。这时，英、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反对中国革命，又联合起来，共同压制国民军。受其影响，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也结成联盟，共同进攻国民军，出现了奉直联合反攻国民军的局面。为此，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1日辞职下台，将全权交给张之江。

1926年初，张作霖和吴佩孚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了攻势。奉军再度入关，进抵唐山。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李景林率残部举行暴动，接应张宗昌鲁军进占天津。吴佩孚率部沿京汉线北上，集结在保定。此时，国民军第2、第3、第4军将领纷纷率部降吴，使吴的声势复振。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保存力量，除派张树声去奉天见张作霖议和外，又授意部下电请吴佩孚收编本部。但吴对冯已失去信任，坚持冯部必须无条件投降，接受缴械改编。同时，张作霖又以冯有鼓动郭松龄倒戈之仇，拒绝议和。为此，冯玉祥再度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段祺瑞下台，重新拉出曹锟帮助拉拢直系将领，并让出京畿地盘与直军将领田维勤，国民军开往西北垦边。但吴佩孚仍坚持拒不收编。这样，国民军与奉、直两系就只有戎兵相见了。

4月15日，国民军为了缩短战线，摆脱三面被围的被动局面，主动撤离北京城。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将部队由热河撤回防守多伦；以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守平地泉、丰镇，掩护通往绥远、

甘肃的通道。

针对国民军的兵力部署,吴佩孚率直军主力在张宗昌直鲁联军的协助下,担任南口正面的攻坚战;奉军的吴俊升部和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击国民军后背;阎锡山亦派晋军出大同,截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三路围攻将国民军歼灭在塞北草原之野。

但是,直吴与奉张手下的将领却另有打算。一些高级将领对奉、直联手讨伐国民军始终采取保留态度。此时,直军方面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伺机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暗中准备率兵进娘子关,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地盘。奉军方面,李景林因暗中曾支持过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在孙、靳发兵后回师天津,截击入关的奉军。冯玉祥既然与孙、靳、李等有以上默契,遂于5月18日由韩复榘指挥石友三、方振武、徐永昌等部猛攻丰镇、阳高。随后宋哲元也率北路军加入战斗。由于国民军的突然进攻,使奉、直联军措手不及。至30日,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所有。吴佩孚得知这一情况后,始率领刘玉春的卫队旅北上,31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后,即下令免去靳云鹗第1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由吴自兼第1军总司令。6月28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晤后,第二天即令张宗昌将李景林缴械,逼李下野。

张作霖、吴佩孚镇压了内部反叛后,吴佩孚即偕田维勤视察前线,下达总攻击令,限3日攻下怀来以拊南口之首。但田维勤部多系国民军第2、第3军改编,不愿再对国民军弟兄作战,在战场上经常发生反叛事情。7月12日,田部的陈鼎甲旅突然开到妙峰山,宣布改投冯军。妙峰山是北京西山的一条支

脉,山北就是冯军的阵地,陈旅在山南又可以截断门头沟与长辛店的交通。因此,吴、田两人急忙调兵围剿叛部,无力攻击怀来冯军。这一事件刚刚平息下来,田部第4旅的两个团又在清水涧投靠冯军。而吴的另一路主将魏益三,又是郭松龄的旧部,过去曾与冯军合作,现在也不愿为奉、直两系卖命。对于这种情况,吴佩孚也一筹莫展,战事进展甚为迟缓。

张作霖看到这种状况,遂于7月19日起重新调整进攻南口的兵力部署,将正面进攻南口的吴军调到侧翼,由三家店沿永定河进攻国民军第2、第3、第5军残部。南口正面阵地青龙桥,改由奉军和鲁军主攻,并配以邹作华的几个炮兵旅,任命张宗昌为前敌总指挥。同时派奉军主力第3、第4军团共四个军的兵力,在第3军团长张学良的指挥下由南口东侧,经永宁、延庆直插南口背后,向南口展开猛攻。8月14日,奉军第10军于珍部攻下南口。15日,张作霖在通电报捷中说:“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在整个通电报捷的电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军。吴佩孚见到通电甚为恼火。

其实南口也不是奉军攻下来的。在此以前,7月20日吴俊升率部攻占了榆树沟、门头口,22日又占领多伦。此时阎锡山也配合反攻。在这三面压力之下,冯玉祥为保存实力,决定国民军全部向绥远退却。8月13日,南口冯军全部撤离,而此时奉军的大炮仍不断轰击,直到当地有人来报告时,才停止了炮击。至此,国、奉、直南口之战结束。

8月下旬,阎锡山收复了晋北全部失地,并于25日占领

平地泉,为了阻止奉军假道灭虢之举,他请奉、鲁军勿再西进。一面收编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人为晋军,帮助阻击奉军,一面派商震为绥远都统,礼送国民军其他各部撤出绥远。为时四五个月的北洋军阀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结束了。

国奉直南口之战,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场大战。在这次战争中,奉、直两系老牌北洋军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以扼制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保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面对奉、直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虽经英勇奋战,但因缺少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终于力不支敌,最后在奉、直、晋的联合围攻下,国民军惨遭失败,退往西北。从此,北方各省便完全陷入奉、直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四、北伐战争

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直下,奉直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

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1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2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3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4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5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6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7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8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35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5省,拥有兵力20

万人。奉直军阀总计兵力 75 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 1926 年 7 月 12 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 7 月 25 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1926 年初,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讨吴驱赵运动。3 月 12 日,吴佩孚的附庸、湖南自治省长赵恒惕被逐出长沙,由湖南省防军第 4 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代理省长,宣布拥护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4 月,吴佩孚任命原赵恒惕部师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率部进攻长沙,唐生智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5 月,国民革命军派第 7 军第 8 旅和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 4 军叶挺独立团先期入湘,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 月初,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了正在向安仁进攻的敌人,并乘胜追击,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 7 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唐生智的第 8 军,在金兰寺击溃叶开鑫部。北伐军初战告

捷,粉碎了吴佩孚企图打垮唐生智、重占湖南的阴谋,扭转了湖南的战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7军、第8军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8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州、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4、第7、第8军直取武汉;第2、第3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6军和第1军的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19日,第4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7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22日,第8军攻克岳阳。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8师和湖北暂编第4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1个混成旅和1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2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

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8月26日晨6时,第4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26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27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27日上午又攻占咸宁城。8月30日,北伐军又向贺胜桥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守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见败势已定,逃至汉口,据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军兵分3路,乘胜直逼武汉三镇。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军、第4军、第7军主力进攻武昌;左路以第8军的3个师和夏斗寅的鄂军第1师进攻汉阳;右路军以第1军一部迂回进攻汉口。武昌城高地险,中路军在进攻战斗中,打得非常艰苦。9月3日、5日两次攻城未果。敌以高墙重炮,负隅顽抗,北伐军前仆后继,死伤官兵千余人。遂改用封锁围困。在此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总罢工,拒绝给吴佩孚制造武器。北伐军兵临汉阳城下时,守军刘佐龙师起义。6日,北伐军进占汉阳。汉口守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逃往黄陂、孝感。7日,北伐军进入汉口,并乘胜进占武胜关。吴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师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围困30余天后,守城之敌弹尽粮绝,斗志已失。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内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云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防守保安门的第3师师长吴俊卿与北伐军议降,打开保安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北伐军俘获守城司令刘玉春,全歼守敌2万余人。至此,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除少数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军歼灭。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作

战遂告结束。

北伐军在江西、 福建、浙江等地的胜利

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会同驻赣部队2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布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1路攻赣南,以第2军第5师和第5军第46团协同独立第1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1路攻赣西,以第3军和第2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1路攻赣西北,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9月19日,第6军军长程潜命第19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

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1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6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2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3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7军,在箬溪重创孙军1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北伐军各路又未能协同作战,德安得而复失。与此同时,第6军进攻永修失利,第3军也在乐行、乐化受挫。10月11日,第2军和第1军第2师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损失,被迫于13日撤退。

此时,虽然北伐军在南昌进攻战斗中未获成果,但两湖战争结束后,北伐军第4军从湖北赶到江西,使北伐军的实力大增。这时,孙传芳的后方出现了极不稳定的局面。浙江省省长夏超于10月16日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入闽后,孙传芳在闽部队纷纷倒戈。10月29日,北伐军攻克临川,截断赣闽通路,继续向南浔铁路沿线发起攻击。11月初,第7军再克德安,第4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二个师,截断了南浔铁路。九江、永修、乐化等地孙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1.5万人。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孙传芳此时在江西的主力部队10余万人,除少数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绝大部分被歼灭,孙传芳本人从九江乘军舰逃往南京。蒋介石遂率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

在福建战场上,听命于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辖四个军共3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趁国民革命军主力北伐

远征广东兵力薄弱时机,亲率大军南下,分三路进攻广东。10月上旬攻占蕉岭、松口、饶平地区,在永定设立行营。为了粉碎周荫人进攻广东的企图,何应钦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和第14师主力袭击周部后方,一举攻占永定行营。此时,在北伐革命的影响下,周部占据蕉岭第2军的两个师宣布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夺回松口,歼灭周部的第3军。迫使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往长汀。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进占长汀。在此期间,独立第4师等部队一路北进相继占领漳州、泉州、莆田、永泰等市镇,逼近福州。12月初,自赣东入闽的第2军第6师进占建瓯,切断了闽、浙孙军的联系。孙传芳部驻闽海军起义,驻福州的1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不战而下福州。周荫人率残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国民革命军占领。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将吴佩孚和孙传芳打败后,这时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也感到不安起来。11月,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在天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组成“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就任总司令,并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同一天还开会确定了“安国军”的反攻计划:孙传芳从浙江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

军援孙作战,接防孙传芳在苏北、皖北的地盘,然后分两路进攻鄂东和江西;张作霖的奉军则由京汉线援助吴佩孚。会议结束后,直鲁联军便沿津浦路南下,把势力伸入到苏皖北部。孙传芳将从浙江撤至沪杭、沪宁两线整顿的部队,重新整编为5个方面军及直辖部队,准备以浙江为前进基地,向江西发动进攻。但是,浙江方面的军阀对孙传芳联奉不满,不愿孙的势力控制浙江,内部矛盾重重。12月11日,早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的浙军第3师师长周凤歧,在衢州通电,宣布归顺国民革命军,并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正式就任军长。周凤歧部掩护北伐军攻浙部队集结衢州,经由龙游、兰溪向富阳、杭州推进。浙江省省长陈仪宣布自治。孙传芳闻讯后,恐杭州有失,急派孟昭月第8师,于22日突入杭州,包围宣布自治的省政府,扣押了省长陈仪。这时,在绍兴的第1师遂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9军,派兵守备钱塘江南岸,与孙军夹江相峙。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总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主力,然后会师南京。根据上述计划,北伐军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东路军仍以第1军为主,由何应钦为总指挥,辖6个纵队,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入浙江,进攻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3、第6、第7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下辖江右军和江左军。程潜指挥江右军3个纵队,由赣北入皖南,策应东路军作战。李宗仁指挥江左军3个纵队,由鄂东向皖北,阻止直鲁联军南下,相机夺取苏州、合肥;西路军以第4、第8军为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部分兵力巩固武汉,

以第8军主力挺进豫南,控制京汉铁路南端,牵制河南之敌。另设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指挥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应全局作战。

1月上、中旬,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6、第19军先后在富阳和宁海之战中失利。东路北伐军为打破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从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开始东进,先后占领兰溪、金华、桐庐、诸暨等地,于2月18日占领杭州,21日占领宁波。孙传芳在浙江的残部向淞沪溃逃。浙江全境为北伐军平定后,蒋介石即任命其随员担任了浙江的军政要职。继福建之后,浙江又完全被蒋介石控制。

在安徽方面,由于孙军中王普、陈调元部起义,中路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驻安庆、芜湖。在江苏方面,中路军的江左军由长江北岸指向临淮、蚌埠;江右军由芜湖以东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军攻占南京。这时东路军也进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彻底溃败,残部由扬州退往淮阴、泰州一带。

五、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

权。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正式办公。

1日至3日,武汉10多万市民连续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码头讲演时,英国水兵登岸干涉,竟用刺刀驱逐宣传队员和听讲群众,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几十人,制造了汉口惨案。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团体500名代表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议决对英斗争八项条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责令英国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拆毁英租界的水袋、电网,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装,由国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则即敦请武汉政府封锁和收回英租界。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交涉条件,表示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5日,武汉各界400多团体30万民众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八项条件;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冲入英租界,摧毁了租界内的沙包、电网,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汉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以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汉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发生英国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几万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军舰。次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并于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陈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与英

国驻华公使阿马利的谈判中严词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恢复租界原状的无理要求,顶住了英国政府企图调派军队来华的武力威胁,终于迫使阿马利分别于2月19日、20日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壮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同时,全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6年10月,当孙传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战场,上海兵力空虚和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进军上海时,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孙传芳击败,起义遭到失败。

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上海总工会于19日组织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几天内罢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万。21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进入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动,起义又遭失败。

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担负领导。周恩来和江浙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和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寿华等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建立有严密组织的 5000 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训练,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和各级指挥部,派人详细侦察敌情,制定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3 月 11 日,铁路工人首先罢工,破坏了直鲁联军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20 日北伐军白崇禧部进至上海西南郊龙华,上海守敌惶恐不安。周恩来等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21 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各行业 80 万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占领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电报局、火车站等要害部门,攻占了警察署和兵营。起义开始后,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到龙华,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继续执行蒋介石命令按兵不动。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 30 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于 22 日下午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胜利后,召开了由全市工商学各界代表参加的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委员会”,决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次胜利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也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第八节 国民革命的转折

一、国民革命局部受挫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

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便资助吴佩孚大批军火,并炮轰北伐军。9月5日,又借口川军杨森扣押撞沉中国木船的肇事英轮,炮轰万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余人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1927年1月,英水兵又先后在汉口、九江制造“一三”和“一六”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英怒涛,起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期间,英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制造“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舆论。英国政府还曾极力拉拢日、美、法等国,以图实现各国联合武力干涉。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

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到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大肆抢掠,劫祸波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和平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迁都之争与恢复党权运动

两湖、江西相继为北伐军平定后,武汉已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宣告成立,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执行12月7日在广州业已中断的中央及政府的最高职权。徐谦任主席,叶楚傖任秘书长,鲍罗庭任总顾问。下设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四部。从此,开始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一直力主迁都武汉。但是,12月31日,当迁往武汉的第二、第三批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到达南昌后,他却改变主意,主张改迁南昌。究其原因:一方面,他看到武汉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两湖地区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已成立的临时

联席会议中力量较强,唐生智的第四、八军也已控制了湖北,因而,深感在武汉已难以实现其以军权控制党政,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另一方面,11月初南昌克复后,蒋的总司令部迁入南昌,其嫡系军队则部署于江西、福建,企图以南昌和江西为依托,进攻苏、浙、沪,经营东南。因而,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勾结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截留途经南昌的部分委员,召开了所谓“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借口“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并于5日正式通知武汉,改都南昌,从而挑起“迁都之争”。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否决了迁都南昌的主张,并电促蒋介石来汉解决争端。12日,蒋到达武汉,继续坚持迁都南昌,遭到联席会议成员的严厉批驳。各级党部和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纷纷通过集会、通电等方式,表示定都武汉的要求。2月8日,滞留南昌的委员集会决定迁至武汉。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正式办公。从而挫败了蒋介石阴谋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企图。

北伐出师后,随着蒋介石军事独裁倾向的日益严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迎汪复职、恢复党权”的运动浪潮,即希望所谓的左派领袖汪精卫,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现以党治军,以党治政,恢复、重振党的权威。迁都之争后,恢复党权运动更加高涨。为遏制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分裂国民党的行径,1927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执行三大政策,扶助农工运动;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又推举

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实施。邓演达、吴玉章等发表文章和演讲,揭露蒋介石的军事独裁。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努力下,通过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削弱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一系列决议和训令。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设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职,均由军委会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免,总政治部不再隶属总司令部,改归中央军委领导。所有这些都是对蒋介石权力的削弱。但是蒋介石仍被选为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团成员,并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的军权并没有削弱,因此,这些规定,已无力约束羽翼丰满,决心反共分裂的蒋介石。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加紧寻求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筹备另立中央。他曾派戴季陶、黄郛等亲信与日本联系,争取支持,并向英美表示“友谊”,要求援助。帝国主义各国也对蒋介石进行威胁利诱。日本外相市原积极推行其分化策略,以促使革命阵营内蒋介石为代表的“稳健派”与共产党等“过激派”的分裂。江浙财团允诺只要蒋介石反共和镇压工农,就给予经济支持。因而,蒋介石的反共态度迅速明朗。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演,攻击武汉政府和共产党。3月6日,蒋指示爪牙惨杀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成为其公开转向反动的起点。然后,蒋从南昌经九江、安庆、南京赴上海,一路制造了一系列殴打、枪杀工会农会干部,捣毁工会农会和左派国民党党部的事件,并准备在以上海为

中心的东南各省发动大规模反共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大买办、大地主和帮会流氓头子会面,策划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并通过租界为蒋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蒋介石筹集了巨额资金;以黄金荣、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作出了组织大批打手的保证。同时,蒋介石将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军缴械或调离,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4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吴稚晖、张静江等召开反共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提出“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叛逆有据”,要求蒋介石给以“非常紧急处置”。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赶走鲍罗廷和分党两件事情。随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制止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指使吴稚晖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派流氓地痞监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同时又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一枪一械,还给总工会送去了“共同奋斗”的横匾以麻痹群众。

在这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他不但没有任何应变的精神准备,反而于4月5日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

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要求革命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同蒋介石之流“互相尊敬”、“开诚合作”。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的命令。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军队越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转交给了蒋介石。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佩带“工”字号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布置好的反动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又指使流氓、党棍占据上海总工会，查封工会组织，捕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工人纠察队员就死伤300多人。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动暴行；会后，群众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到宝山路游行请愿，途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军队的袭击，当场牺牲100余人，伤无数。时值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军阀也于4月15日在广州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动军警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等地也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北方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公使团的支持下，不顾外交惯

例和国际公法，竟派军队包围、袭击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吉力、张挹壮等 35 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28 日又以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 20 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二、国共合作的破裂

马日事变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把持下迅速右转。1927 年 4 月底，国民党中央应汪精卫要求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5 月 8 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20 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斗争地主是“扰乱”秩序，要求各级党部予以“制裁”。22 日，汪精卫下令制止赤化运动，扬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领袖。

武汉政府的右倾，助长了从湘赣鄂各地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和右派对工农运动的恶毒攻击；驻扎在两湖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日益公开反共和反对工农运动。5 月 17 日，独立 14 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叛变，并乘虚进袭武汉。只是由于北伐军第 11 军第 24 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镇压，才击溃了叛军。

5月21日,在武汉政府所辖第35军军长何键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该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也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20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领袖,这就是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马日事变成为汪精卫、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计划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军围攻长沙,但由于陈独秀反对而未能实现。

5月27日,第3军军长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也在江西开始“遣送”共产党人,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

七·一五政变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作出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党员、5万工农组编新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等人认为指示中的各项任务都无法执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指示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甚至将这一指示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成了汪精卫集团叛变的一个“借口”。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就分共问题达成协议,即唐生智所部调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交国民军驻防。随即,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会密令严查各地共产党机关,武汉政府也于17日免去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职务。19日,冯玉祥到徐州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

举行会谈。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冯玉祥还在国民军及其管辖地区开始遣送共产党人。

面对武汉政府的日益反动，陈独秀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遭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批评。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第二天，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在此之前，国民党另一位左派代表邓演达于6月30日化装成查电线工人离开武汉，后与苏联顾问一起到达莫斯科。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告别信中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反人民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央的一切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和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三、地方政权的更迭

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

刘文辉与刘成勋在川系军阀中,早年曾为好友,二刘防地相连,可以畅通无阻。但刘成勋部驻守的新津、双流、彭山、雅州等地却为刘文辉进出川境的交通命脉。刘文辉总为生死命脉为他人所扼而不安,因而有排除隐患、夺占要点之意。在1926年春夏之间,刘文辉借刘湘、杨森发动驱逐袁祖铭之战之机,策划了“夜袭蔡州”的故伎,欲夺新津,直捣雅州。不料事不机密,为刘成勋得知,作了严密戒备,使刘文辉未能得手。从此,二刘之间互不信任,结下宿怨。同年11月,刘成勋接受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23军军长,虽坐镇川边,但兵力不足万人,且川边地瘠民贫,筹办军饷给养困难。同时,刘文辉被任为第24军军长。但刘文辉部兵力较强,且给养充足,装备较好。因此,刘文辉也想趁刘成勋兵力尚不足时进行吞并,以绝后患。

1927年初,刘湘奉蒋介石的命令,统一四川局势。刘湘暗中联络刘成勋、赖心辉,拟向保定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所部开刀。此时的刘成勋正为刘文辉图谋吞并之事感到不安,遂积极靠拢刘湘,进行作战准备。刘湘又将刘成勋的23军加以改编,把原23军嫡系部队和边军部队进行混编。刘成勋任军

长兼第4师师长。

刘湘联络刘成勋等人之事，为刘文辉察知，深感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威胁。加以素来感到自己的防区为刘成勋控制，于是暗中调兵遣将，开始部署对刘成勋部的作战。刘文辉在发动进攻之前，做了许多舆论工作，借川南民众之口，历数刘成勋“十大罪状”，并通电讨伐。同时，刘文辉还探知，刘成勋部虽经扩编，但各将领因权限不明，人事失平，而各自心怀鬼胎。刘文辉即利用这一机会，对刘成勋所部各将领进行分化和收买。

1927年6月8日，刘文辉派遣第10师师长夏首勋为总指挥，率张清平、蔡玉龙两部，兵分3路：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在进攻之前，刘文辉通电宣布：刘成勋部队中任何一部，自愿接受改编者，均竭诚欢迎。

此时，邓锡侯、田颂尧因为同受刘湘的威胁，对刘文辉剪除川南刘成勋部表示支持。在刘文辉和邓、田等人的策反下，6月中旬，驻防自流井的第3师杨芳毓部，宣布与刘成勋脱离关系。6月15日，刘文辉任命杨为第5路第3混成旅旅长。随后，刘成勋部其他将领为保存实力也不愿与刘文辉部硬战。因此，当刘文辉发动进攻时，刘成勋部不战而退出彭山、双流、丹棱、大邑等县，向新津、邛崃集中。与刘文辉稍事接火后，又自行撤离。

刘文辉左路蔡玉龙部一路无阻，越过彭山，在擦耳岩一带高地与刘成勋部激战数小时，随后刘成勋部退至蒲江城。刘文辉部尾随追击，刘成勋部慌乱之中闭城不及，蒲江遂又被占。刘成勋部又一路败退名山。

6月15日,刘文辉中路夏首勋部与右路张清平攻至邛崃县城东南时,受到刘成勋部顽强抵抗,使夏部进攻首先受挫。原来刘成勋以为不战而让出数县,可以缓和刘文辉的进攻,殊不知刘文辉继续尾追不止。刘成勋为此特调集数团兵力,冒死作战,反复冲杀,战事初起激烈异常。可是,刘文辉部连得数县,士气正旺,而且兵力又倍于刘成勋部,刘成勋反扑数次,便难以持久。此时,张清平率部赶到,两路同时进攻,到16日夜半,邛崃县城被攻克。

邛崃失利后,刘成勋率部撤往甘积堡、黑竹关、百丈驿一带,以保卫雅安。在此期间,刘成勋已调西康边防军第1混成旅一部于6月10前在雅安、沙坪一带布防;调第3混成旅由西昌开至雅安增防;任第4混成旅旅长贺中强为前敌总指挥,积极部署,固守雅安。同时向重庆的刘湘求援。

刘文辉也深知雅安系刘成勋的生命线,绝不会轻易弃守,于是,命令夏首勋速克雅安。夏领命后,兵分3路攻取雅安;中路由夏亲自指挥,取道五沟、将军庙向雅城推进;右路由张清平部取道大碧、大兴场进攻雅城;左路由蔡玉龙部取道汪庄、严桥向雅城进击。刘成勋部兵不力敌,刚刚接火,即溃退城内。

6月24日,刘成勋在雅安军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贺中强率兵2个团,从雅安经沙坪向城外反击。战斗约2小时,贺部伤亡过半,退回城内。刘成勋见状,知雅安已难防守,遂令所部向荥经集中待命。当日晚强拉人1夫运输辎重,城内秩序大乱。拂晓,刘文辉部占领雅安。刘成勋率部到荥经后,等待刘湘增援。刘文辉部继续占领李坝、金鸡关、周公山等要地。此时,成都至雅安间的要道均为刘文辉控制。

刘湘见刘成勋如此不堪一击,便不再予以理睬,对刘成勋的多次求援也无动于衷。刘成勋在无可奈何之中,于6月29日发出下野通电。至此,二刘之战结束。刘文辉吞并刘成勋部后,重新任命刘成勋部的各位将领,趁机安插亲信,为其所属。

龙云与胡若愚云南之战

1926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滇、黔、川等西南地区的军阀纷纷易帜,拥护北伐,可是西南地方的军阀头面人物唐继尧,不仅没有与广州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反而进一步加紧了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加紧反共反革命的活动。在大革命高潮来临之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唐继尧,遭到了拥护北伐部属的反对。1927年2月6日,驻守云南的四个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打着拥护北伐旗号,发动了倒唐的“二六政变”。唐继尧倒台以后,虽然成立省务委员会主持云南政务,但难以协调各派的不断纷争,形同虚设,因而,在云南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为了争夺权力,滇系军阀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发动“二六”政变时,龙、胡、张、李4个镇守使,名义上都拥有1个“军”的番号,实际上兵力都不足为“军”。龙云、胡若愚各有2个旅;张汝骥虽然也号称2个旅,实则兵力不足3个团;李选廷则兵力更少,只有1个多团的兵力。唐继尧有近卫军4个旅,计8个团。在“二六”政变后,8个团为龙云、胡若愚平均收编。因此,龙、胡两人又兵力相当,各霸一方。张汝骥虽然也参加倒唐事变,但因听命于龙、胡二人,又因力量稍弱,没有收编唐部,心中感到不快;李选廷自知力弱,虽想投机,又

力不从心,甘愿退出,不过其态度倾向胡若愚。结果是龙、胡之间首先展开了权力之争。张汝骥因对龙不满,故与胡联盟,进一步壮大了胡的力量。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龙、胡、张均以个人名义派员向蒋介石政权疏通关系。此时的蒋介石尚未插足到滇系军阀之中,为了在滇系军阀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蒋在表面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龙、胡、张三人互相制约、争斗,自己则在暗中进行挑动。

1927年6月14日凌晨,胡若愚与张汝骥达成协议:许诺驱除龙云后,胡、张二人主持云南军政。遂派出大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官邸。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想组织反抗已经来不及了。龙云约250人的卫队被胡部解除了武装,龙云见反抗无望,便企图从后门逃走,但是住宅四周已被团团围住,龙云困守在官邸中正在待机求援,胡部的炮兵向龙云住宅开炮,弹片四飞。一块弹片打在玻璃窗上,炸碎的玻璃片恰巧飞进龙云的眼中,结果使龙云这只眼终生失明,成了“独眼将军”。龙云见逃走无望,求援无门,只好投降。胡若愚命令部下做了一个铁笼子,将龙云囚在其中。

龙云的妻子李培莲和其家里的人到法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法国总领事卢希比出面调停,提出4项条件:一是龙云自动下野,部队交省府善后;二是龙云暂移居法国领事馆,随后携家眷经越南转赴日本考察;三是同去日本的翻译,由省府任选;四是龙云在日本考察期间,省府酌予补助经费。但是,龙云不愿进领事馆做难民,也不愿到日本考察。同时胡也不愿以这样的条件调停。

在6月14日凌晨,胡发动对龙云事变的同时,龙在昆明

的部队及其他一些将领也遭到了胡部的突然袭击和围捕。当时,龙在昆明的部队主要驻在北校场。事变发生时,在龙部团长高荫槐带领下突出胡部的包围,向富民方向撤退。龙云的主要将领卢汉、孟坤等人在家中听到枪声后,也急忙逃出昆明,先后到达禄丰、元谋,辗转找到高荫槐。因此,在胡若愚发动的“六·一四”事件中,龙云虽然被囚,但龙部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就为龙云部以后东山再起,留下了资本和基础。

奇怪的是,蒋介石在龙云被囚禁的当天,又发出命令,任命龙云为 38 军军长;胡若愚为 39 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 18 师师长。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又加剧了滇军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

胡虽然囚禁了龙云,但迫于各派滇系势力的声援和强谏,未敢加以杀害。龙云所部乃推出滇军元老胡瑛暂代 38 军军长,指挥部队从滇西向昆明反攻。7 月上旬,祥云一战,胡、张部不支败退昆明。龙部乘胜逼近昆明。在龙部重兵压城的逼迫下,胡若愚挟持龙云向昆明以东撤走。胡在撤退时,托部下周钟岳守城处理军政公务,并叮嘱三事:一、尊重省务委员会及地方公意,相机移师滇东,以免扩大战祸,请 38 军尊重和平,勿事追击;二、张汝骥被困禄丰,杨瑞昌部驻扎蒙自,请 38 军勿再与为难,胡部亦保龙云的安全;三、俟张、杨两部集中后,略事整顿,即参加北伐,请后方能及时补充饷械。胡若愚挟带龙云退到昆明东郊大板桥后,恐 38 军尾追,乃与龙云签订了“板桥协议”后,礼送龙云返回昆明旧部。

龙云回到昆明后,于 8 月 13 日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改组了省政府,清除了一帮与胡、张有联系的政客。由于龙

云毁约,驱赶胡、张旧部友好,又引起新的矛盾争端。胡、张自感兵力不足,难以向龙云部发起进攻,便与四川的刘文辉、贵州的周西城相联系,重新向昆明反攻。从9月底至10月初,龙与胡、张二部在曲靖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双方对峙长达40多天。这时,驻在滇西的唐继尧旧部,又趁昆明城防空虚,曲靖战事紧张,直捣昆明。龙云被迫从曲靖撤军回救,方解昆明之围。

1927年冬,胡、张再求援于川军,向昆明进军。龙云率部据城固守,胡、张二部久攻不下,由于弹药、给养缺乏又缺少攻城重武器,于1928年初便撤离昆明之围,再寻战机。龙云几次与胡、张二人交锋,以谋略和实力取胜,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1月17日,蒋又通过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4天以后,又任命龙云为第13路总指挥。由于蒋的支持,龙云在云南的实力大增,地位上升,使胡、张二人不再敢轻易起兵反龙。但是龙与胡、张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胡、张二人暗中发展与龙云抗衡的势力,准备与龙云再战。同年秋,贵州局势发生变化,黔系军阀内部李燊和周西城之间发生战争,龙应李求援派出大部兵力,开进贵州。乘机报黔军周西城部支援胡、张二人反龙云之仇。1929年初,蒋桂战争期间,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率兵深入贵州,与李燊联合向与桂系有关联的周西城发动进攻。5月底,周西城战死,李燊入主黔政。正在这时,昆明战事又起。胡若愚、张汝骥二人趁龙云率部在贵州之机,再度率兵逼近昆明。龙云接到昆明战事吃紧的消息后,急忙率部回援,在昆明外围两军又大战一场。龙云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法,故意以劳师远征,不堪再战,将胡、张部引到碧鸡关附近,依托有利地势,一举大败

胡、张部。胡、张二人率残部退往金沙江畔，在华坪、永北一带暂住休整。

龙云为了乘胜解决胡、张势力，以绝后患，一面笼络当地彝族土司，帮助建立武装，拨发弹药，与胡、张部进行武装对抗，一面派军渡过金沙江，绕道江北从后面包抄胡、张部。胡、张部虽经顽强抵抗，但终因兵力不足，缺少援助和给养，于1929年底以失败而告终。胡在战败后化装只身逃走，张汝骥被龙云俘虏后，因不肯合作为龙云所杀。至此，龙云又与胡若愚长达3年的云南之战遂告结束。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1926年8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南口大战失败后，主力部队受到严重损失，重武器丢弃殆尽，尚存10余万人向西北方向退却。1927年夏，冯玉祥占领郑州、开封后，又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形势。张作霖强大的奉军正虎视于北，号称30万的张宗昌直鲁联军，盘踞在陇海线上随时可西上。此时，冯玉祥的同盟者国民党正在进行混战，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与唐生智开战；张发奎回师广东与李济深夺权并向黄绍竑开战。因此，蒋介石、李宗仁都在为各自军事集团的利益整军备战，已无力再出兵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摆脱困境，以直隶、京津地盘为饵，争取阎锡山与自己结成同盟，于9月初对奉军开战，以解北方之忧，冯部则可集中兵力对付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阎部对奉开战后，初期作战进展顺利。张作霖为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奉军全部兵力于10月中旬开始反攻，阎部抵挡不

及,至11月退守雁门、蔚州、井陘几个关隘,奉军直逼山西境内,太原岌岌可危。冯玉祥为援助阎锡山保住山西地盘,迎接国民党军北伐,于10月中旬兵分3路,以第18军军长鹿钟麟为右路军总指挥,率第10、第18、第20、第21、第27军;以第6军军长韩复榘为中路总指挥,率第5、第6军和骑兵第2军;以第3军军长孙良诚为左路总指挥率第3、第4军和左路军左翼第23、第26、第28军对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展开攻击。由于冯部多系入豫后收编的一些杂牌军,战斗力比较弱,因此,在与直鲁联军的作战中,一开始即陷于不利的境地。10月13日,冯玉祥部与张宗昌部在马牧集交战,开火后不久,冯部左路军左翼刘镇华部即有梅发魁、姜明玉、憨玉珍3个师叛投张宗昌。这些叛军截断了陇海交通,使冯部阵地陷于困境,前线各军纷纷溃退至皖北一带。右路军总司令鹿钟麟只好率前卫部队绕道鹿邑、柘城退回开封。直鲁联军在叛军的相助下,连占归德、民权、兰封、考城,前锋直逼开封。冯玉祥为击破当面之敌,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其主力孙良诚的第3军和马鸿逵的第4军布防于杜良寨、杞县间;让石友三的第5军布于杞县城东;鹿钟麟的第18军集结于杞县、太康之间;刘镇华剩余的5个师布防于考城,以防御张部刘志陆的第13军、潘鸿钧的第24军和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向归德以东迂回袭扰敌人的后路;韩复榘的第6军和孙连仲的两个师集结于开封、郑州一带为总预备队。10月23日,张宗昌部沿陇海铁路西进,与冯部守备部队在正面发生激战。26日起,自黄河南岸至杞县100公里的战线上,冯、张两部主力展开全面决战,战斗异常激烈,短兵相接,昼战夜夺。27日,韩复榘军投入主战场进行作战,

30日拂晓与石友三军并力进击,一举攻破直鲁联军在杨固集的阵地防线。11月1日,孙良诚军攻克兰封,铁路正面之敌也被击溃。2日,孙军又进占内黄。3日,分头向归德、考城追击溃敌。5日,韩复榘军和庞炳勋军攻占归德。6日,石友三军追逾马牧集;鹿钟麟军回兵归德。包围考城的刘志陆军、潘鸿均军等直鲁联军见势不妙,仓皇退走。冯部各路军乘胜截击,俘直鲁联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另缴钢甲火车5列、大炮40余门。是役,为冯部出潼关以来俘获最多的一次大胜仗。

兰封之战结束后,张宗昌为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定在何应钦率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未渡淮河前,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宗昌坐镇徐州,以鲁军首领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以第13军军长刘志陆为右路总指挥,率第13、第18、第19、第21、第22、第24军和第1、第2、第3挺进军,共5万余人由城武、单县进攻考城,直取开封;以第6军军长徐源泉为中路总指挥,率第4、第5、第6、第7、第15军,共5万余人沿陇海路正面向西推进;以第2军军长张敬尧为左路总指挥,率第2、第8、第26、第30、第32军,共约3万余人由夏邑向杞县、太康挺进。

冯玉祥为防御直鲁联军的进攻,在兰封大捷后,即把出击到归德、砀山的部队撤回,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将孙良诚的左路军集结于兰封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将石友三部防守杞县东北地区;鹿钟麟部除留少数部队守防归德外,主力撤到太康、杞县待命;韩复榘部控制郑州一带;为加强防御力量又调刘汝明部出潼关东进,警备陇海路沿线。

11月16日,张部刘志陆率军首先向驻考城的冯部刘镇

华军发动进攻。激战3日,刘镇华军撤退至考城西瓜营一线,刘志陆率部继续西追,攻势甚猛,形成孤军冒进之势。但此时徐源泉、张敬尧两路因在兰封之战中曾受重创,均畏战不敢急进,这就为冯玉祥各个击破直鲁联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冯首先严令刘镇华、马鸿逵两部在正面顶住刘志陆右路军的猛烈攻势;然后以孙良诚军的吉鸿昌师,向考城以北迂回攻击;以梁冠英师由定陶切断直鲁联军的后方联络线。24日,孙良诚开始攻击,将刘志陆部包围于考城一带,经5天激战攻克考城,击毙其第24军军长潘鸿钧,俘旅长以上军官4人及官兵2万余人,缴获枪万余支。孙军乘胜直追,又攻克菏泽、单县,将直鲁联军第2挺进军围困于曹县。至1928年1月19日,攻克曹县,挺进军军长、原叛军师长姜明玉自杀。

在此期间,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各部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至12月1日,韩复榘部占领砀山,3日进迫徐州城下,占领陇海车站,切断了津浦路,将张宗昌、孙传芳部围困于徐州城内。石友三、鹿钟麟、庞炳勋等军也先后到达徐州外围的卧牛山、二十里铺、三堡车站。这时,何应钦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也临近徐州。为迎接沿津浦路北上的何应钦中央军,冯玉祥抽调刘汝明军迅速肃清陇海线的土匪,同时又令各军沿途策应何部入徐作战。12月14日,何部第1集团军第1军团赶到徐州外围,与冯部会合。何、冯即率部分路向孙传芳、张宗昌守徐州的部队进行攻击。激战两昼夜,于16日晚孙、张率残部北逃,徐州克复。至此,冯玉祥与张宗昌的兰封、考城之战遂告结束。

四、宁汉纷争和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三足鼎立”的中国政局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内政局形成了蒋记南京政府、汪记武汉政府和奉系北京军政府三个反动政权鼎立的局面。

南京政府，成立于四一二“清党”的腥风血雨中。4月15日，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部分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决定在南京另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选举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日，发表《国民政府宣言》。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进行反共“清党”。18日，其发布的秘字第一号令为《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首批通缉鲍罗庭、陈独秀等共产党领袖及邓演达等革命者193人。5月17日，国民党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邓泽如任主席，并在各省市县组织清党委员会。21日，公布《中国国民党清党条例》。25日，南京政府通令所辖各省遵行该条例严厉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期的“清党”。

武汉政府曾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政权，5月中下旬开始逐渐转向反动，至七·一五“分共”，完全成为汪精卫集团控制的反革命工具。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权的分立，史称“宁汉分裂”。郑州会议后，武汉政府唐生智统率大军沿江而下，“东征讨蒋”；南京政府则从徐州调回李宗仁第七军以“西征讨

共”，双方在江西、安徽结合部形成严重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

北方的奉鲁军阀在宁、汉双方北伐军打击下退出河南、江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6月中旬，决定组建北京“安国军”政府。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赋予张作霖以军政独裁大权。张发布“息争令”，提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企图继续盘踞东北、京津，及山东、苏北地区，以苟延北洋军阀摇摇欲坠的统治。

总之，七·一五政变后，南京、武汉、北京三个反动政权，均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政治、军事上互相敌对，国内政局更为纷繁复杂。

龙潭之战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新、老军阀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但蒋、汪之间的权利之争仍非常激烈。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的极力反对，蒋介石于8月14日被迫下野，宁方也坚决要求汪精卫下野。此时，败投奉系的孙传芳则趁机组织安国军，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图谋恢复江浙地盘，准备向国民党军发动反攻。孙传芳部下辖5军，在夺取徐州后，兵分3路准备再渡长江，继续向南进军。与此同时，奉系东北舰队“海圻”、“肇和”、“威海”等大型舰船，搭载飞机及兵员自青岛南下，以牵制国民党军驻在长江下游的兵力，配合孙传芳的安国军渡江作战。孙传芳大军临近长江北岸后，面对大江前横，难以飞渡，制定的渡江作战计划非常慎重

和秘密,渡江地点的选择,以在龙潭车站对江偏东的大河口为主要抢渡地点,以浦口和扬州二处为次要渡江地点,另设镇江、下关等几处地点实行佯动,以吸引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为抢渡长江,围攻南京创造条件。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孙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同汉方合作,遂放弃了要汪精卫下野的要求,并派桂系将领胡宗铎前往武汉,迎请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南京办公。由于宁方妥协,汉方响应,宁、汉合作成功。8月2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汉方要员前往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商,并电请宁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要员前去参加会议。李宗仁遂于22日乘“浚蜀”号兵舰到九江赴会。西北军冯玉祥派代表刘骥也参加了会议,协商宁、汉统一合作大计。会议作出两项决定:第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宁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第二,武汉东征军,以程潜的第6军开往南京以西,协助李宗仁的第7军作战;第12军的陈嘉祐由江西进入安徽,会同刘兴的36军、何键的35军向安徽北部出击,协助宁方肃清津浦线南部之敌。

在此期间,张宗昌由山东到北京,用孙传芳部南下的胜利诱惑张作霖出师南征,张作霖接受了张宗昌的建议,决定在北、中、南三方面同时展开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在河北威迫阎锡山部;在河南进攻冯玉祥部;在津浦线,由孙传芳全权指挥,奋力南进,并派渤海舰队南下,助攻吴淞口,以壮孙部渡江声威。8月18日,孙传芳下令进入浦口的炮兵向对岸的海军舰船开炮,并对狮子山炮台猛轰,实施佯攻,以牵制对岸海军,调动蒋、桂军队,实则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在大河口强渡。对岸舰

炮进行还击,双方炮战历1小时左右始息,随后,孙军一部循运河南下,布兵于扬州、仪征之间。浦口炮战,揭开了龙潭之战的序幕。

8月24日,孙传芳趁蒋、桂军兵力部署尚未就绪,南京城兵力空虚,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九江开会的有利时机,部署了渡江作战的任务,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10师师长郑俊彦为第1路总指挥,率第3、第7、第10、第14师;以第13师师长刘士林为第2路总指挥,率第4、第8、第9、第11、第12、第13师;以江苏第3师师长马玉仁为第3路总指挥,率本师兵分3路由浦口、大河口、扬州三处渡江。以主力郑俊彦、刘士林两路,直取南京;以马玉仁部切断沪宁线,侧应夺取南京战事。25日,郑俊彦部分乘民船在大胜关偷渡,适逢李宗仁自九江参加宁汉合作会议后,陪同谭延闿、孙科乘浚蜀号军舰返回南京,途经乌龙江附近时发现江面上有大批部队乘船渡江,感到很奇怪,经用旗语询问,对方竟不作回答,李宗仁判明是敌军在偷渡,即下令开炮轰击。这时陈调元也乘兵轮由南京去芜湖,见浚蜀舰与民船互相交火射击,判定是在与孙部渡江队伍作战,遂率部直接参加作战。海军司令陈绍宽也急忙派“楚有”、“楚谦”等舰前往助战,经过一番猛烈舰炮轰击,郑俊彦偷渡的队伍因乘民船过江,火力不支,被浚蜀舰和陈调元部击退。是日晚,江上浓雾弥漫,孙军又于划子口、大河口等处乘黑夜在乌龙山、燕子矶一带偷渡成功,立刻占领乌龙山。

李宗仁、谭延闿回到南京后,立即命令一周前入卫南京的嫡系李明瑞师、陶钧师、胡宗铎师沿南京江面布防;同时命令驻京沪线及淞沪的何应钦、白崇禧率第1军的5个师急速增

援南京。

8月26日拂晓,孙部第2路军的第9师,在师长段泽承的指挥下,乘江面大雾,又在正面抢渡成功。接着第8师、第13师在师长崔锦珪、刘士林的指挥下也随后渡过长江,对南京外围的栖霞山、南北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猛烈攻击。守军第1军陈继承的第22师,是由预备第2师新编的部队,战斗力很弱,经过近一天的激烈战斗,即被孙部突破南京外围阵地。孙部随即攻占了龙潭车站和附近高地,与先期占领乌龙山高地的部队连接成一线,切断了京沪路。27日,孙部上官云相、马宝珩、陆殿臣的第4、第11、第12师也渡过长江,加强了孙部攻城的力量。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苦战,孙军的第2路军各师虽然渡江作战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也使孙部受到了意外的重大损失。原来,国民党军海军司令杨树庄在孙军渡江作战前已被孙传芳收买,答应在孙部渡江时海军采取中立态度,不料杨树庄在渡江前又被国民党军重新控制。当孙部渡江时,派出舰队在江面上往来游弋,用重炮轰击孙部渡江的船只,使猝不及防的大批孙军未及过江便船翻人亡,毙溺江中。面对这种情况的变化,行伍出身的刘士林不知所措。于27日晚在龙潭车站召集各师师长参加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对策,第4师师长上官云相主张集中全力攻取镇江,这样既可乘胜夺取上海,也可在失败时由镇江北渡,据守扬州。第11师师长马宝珩则主张沿当年驱赶杨宇霆的老路进攻南京,直取国民政府老巢。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争执不下,虽经彻夜商讨,但刘士林未能及时做出抉择。

27日拂晓,李宗仁指挥桂军的3个师,由西面反攻栖霞山;何应钦指挥第1军与5个师由东南两面进攻龙潭车站。由此,国民党政府军和孙传芳的联军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搏斗。30日清晨双方为争夺黄龙山、青龙山等制高点都几易其手,进行了反复的肉搏。海军第二舰队诸舰自江面列阵向孙军齐射。孙军也在高地架设大炮向舰队猛轰,双方弹如雨下。蒋、桂军在海军舰炮火力支援下,沿着龙潭车站和栖霞山之间的江岸向孙军发起攻击,渡过江的孙军死伤遍地。孙传芳亲到龙潭督战,令江北炮兵向国民党军猛轰。从早7时起,历时3个多小时,双方炮击不断,战况尤为激烈。由于孙军顽强抗击,蒋、桂军几次进攻受挫,战场多次出现危急。国民党政府军各师将领亲临前线作战,何应钦部第1师师长刘峙头部受伤也不下火线,率部拼死力战;第14师师长卫立煌背水而战,在水中指挥战斗;李宗仁部副军长夏威、第1师师长李明瑞、第2师师长陶钧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军在作战中士气旺盛,无人退却。由于南京外围交通便利,第14军、第17军、第40军、第44军分别在其军长赖世璜、曹万顺、贺耀祖、叶开鑫的指挥下,均迅速调往南京投入龙潭战场。孙传芳部在龙潭遭到国民党猛烈反击的第3天,第2路总指挥刘士林弃军逃走,各师师长也丧失作战取胜的信心,纷纷弃军逃回江北。此时,孙部盟军张宗昌部被沿陇海路西进的冯玉祥军所牵制,无法抽调部队去援助孙部。战至8月31日,渡江的孙部第2路军死者2万余人,由于伤亡惨重,无法继续抵御蒋、桂军的进攻,全线动摇,溃逃到江边,可是归路又被海军截断,遂麇集在堤岸后面的芦苇丛中摇动白旗,缴械投降。被俘者近2

万人,残部万余人分乘小船或泅水逃向江北。此役,孙部 6 万多人的武器装备,全部弃失,国民党政府军则利用所获装备,将何应钦的第 1 军扩编为 2 个军;将李宗仁的第 7 军也扩编为 2 个军。龙潭之战,以孙传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龙潭之战,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时间虽然较短,但战况空前激烈,尤以国民党军陆海协同作战,更为有着其明显特点。宁、汉双方协手作战,一举击溃孙传芳部,使南京转危为安。

宁汉纷争

蒋介石下野后,其追随者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也纷纷辞职。南京政府为桂系掌握,宁汉合流遂加快了步伐。19 日,汉方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决定“迁都南京”。随后,武汉党政要人先后赴宁。汪精卫以国民党正统自居,9 月 9 日由宁赴沪,竭力运用政治手段统一国民党各派势力,却倍遭冷遇。西山会议派和胡汉民、吴稚晖等各派反汪势力,攻击汪反共过迟,迫汪下野。11 日至 13 日,宁、汉、沪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谈,决定三方平分秋色,联合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以实现统一,否定了汉方正统和汪的领袖地位。汪陷于孤立,被迫于 13 日通电下野。15 日,又在南京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16 日,特委会成立。20 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同日,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特委会和新政府名为宁、汉、沪三方合组而成,实权却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掌握。汪精卫愤而重返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

否认特委会,并联合唐生智,进兵安庆、芜湖,直逼南京。宁汉合作又转为对立。10月下旬,宁汉战争爆发。桂系联合程潜、朱培德、杨森、冯玉祥、李济深等各派军事力量,西征讨唐。11月中旬,唐生智兵败辞职。桂系占领武汉,控制两湖。10月底汪精卫看到唐军势必失败,秘密南下广州,联合李济深、张发奎,树起国民党中央旗号,继续与南京将委会相抗。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返沪。为重新上台,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不断制造事端,与特委会发生冲突,同时联合汪精卫压迫桂系同意暂停特委会职权,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12月3日至5日,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在汪精卫提议下,会议决定蒋介石复职,并由蒋介石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28日,中央特委会正式取消,由于11月11日共产党乘粤桂战争之机发动广州起义。各派反汪势力指控起义系汪派勾结共产党所为。11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9人,汪派人马纷纷逃亡。

特委会的取消和汪派的失败,为蒋介石重新上台铺平了道路。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势力拥戴下通电复职。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党务、政府及军事组织方面的议案20余项,主要内容:(1)整理党务。规定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务进行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邓演达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党籍和职务,停止联俄政策。(2)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改选了中央

执、监委员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5人为中央常委。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分会。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改组国民政府。改选了国民政府委员、常委,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选举产生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节制指挥”陆海空各军。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五、第二次北伐战争 与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1928年初,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在会议中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趁南方混乱之机,在北方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两部的征讨作战。1月2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讨伐阎、冯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杨宇霆为第4方面军军团长兼大元帅府参谋长;以张学良任京汉线总指挥;以张宗昌为津浦线总指挥;以孙传芳为鲁西总指挥。同时,还研究制定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方案。其要点是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一带取攻势。阎、冯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讨奉。蒋、冯、阎、李4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取得暂时统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

全国军政大权,整编了所有国民党的军队。2月9日,蒋介石视察徐州,改编了第1集团军,自兼总司令,并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19日,改编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编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及两广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共4个集团军,约27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应钦留守南京;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第4集团军一部留守南方,一部为北伐军预备队。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北伐。4月7日,蒋下达北伐军总攻击命令,蒋方分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3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迄苏北的海州,绵亘1000多公里。10日,北伐军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第1方面军担任先行任务,分左、右两翼从鲁南北进,率先向驻鲁的张宗昌部发起攻击。鲁军闻风而逃,蒋军不占而进韩庄,然后越过微山湖,占领夏镇、鱼台、台儿庄、郯城。20日到达兖州、济宁一线。第2集团军主力从鲁西向东开进,攻打孙传芳部。孙良诚部4月15日攻占巨野、嘉祥。16日又占济宁,截断了孙传芳的退路。孙传芳看到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被迫慌忙后撤。至此,张宗昌、孙传芳两路之敌弃阵而逃,蒋冯两军于4月22日在泰安外围会师。又经一个星期的攻城作战,4月29日,泰安守敌缴械投降,津浦路防御攻势严重危急。为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张作霖急忙从吉林、黑龙江调来吴俊升军,在津浦线的德州一带设防。同时又在京汉线的保定、长辛

店加设两道防线,从侧翼加强对京津的防护。针对奉军防御部署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4月27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陇海线上的野鸡岗会晤,决定加快进攻步伐,进占济南。由冯玉祥指挥京汉线上的作战,蒋介石率部沿津浦线继续北进。4月29日,第1、第2集团军一部抵达济南近郊,第2集团军主力到达东阿、平阴以北地区,西翼占领肥城,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张宗昌见济南难守,于30日晚渡过黄河向北逃跑。孙传芳也于5月1日清晨离开济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当日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

正当蒋军陶醉于胜利进入泉城的欢乐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闻名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3日上午,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向蒋军进攻的命令。侵入济南的日军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国民党第40军3师7团的2个营为攻击目标,乘该部团、营长均去师部开会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蒋军因没有长官指挥,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其中第2营全部被日军歼灭。第7团团长闻讯后不敢组织反击,丢下全团官兵仓皇而逃。40军的第92师因被定为济南卫戍部队,进行英勇反击,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派员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令停火。威胁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命令部队停止对日军还击。日军借济南事件为名,大肆残杀济南军民,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共有3652人被杀害。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蒋介石却妥协退让,下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在此期间,京汉路上,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除派孙良诚方面军协助第1集团军在山东方向攻打张宗昌、孙传芳部外,其主力于4月6日对直南奉军开战。奉军此时将晋军逼回山西后,抽出其精锐部队对豫北的冯玉祥部作战。4月中旬,由第3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戡翼翹指挥的6个军,向冯部安阳、彰德一线进攻。同时第7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也指挥直、鲁联军5个军,向南乐一带的刘镇华第8方面军防守的南乐、濮县一带阵地发动进攻。奉军攻势甚猛,安阳、彰德阵地几度易手。同时刘镇华部防守的南乐、濮县也被褚玉璞军攻陷,刘部退至内黄、清丰一带构筑工事继续坚守。由于南乐、濮县的失陷,使得安阳、彰德一线阵地更加危急,奉军为击破彰德冯军阵地,以重炮日夜轰击,并以步骑兵连续冲锋肉搏,双方死伤累累。为解彰德之危,冯玉祥令韩复榘率第6军由漯河星夜北上,4月16日到达彰德以南。4月17日拂晓,韩亲率部队向奉军左翼猛攻,连下30余村堡,韩部师长3人、旅长2人身负重伤,战况尤为激烈。奉军在韩部的猛烈进攻之下,集中精锐顽强抵抗至深夜。韩见进攻一时难以得手,遂下令把部队撤回彰德。双方你争我夺,在彰德附近激战20余天。至月底,由于阎锡山晋军再次出山向京汉路运动,奉军恐后路被截断,乃主动后撤。5月1日,奉军全线撤退。濮阳、观城的直、鲁联军也于2日遁走。冯部乘胜全线追击,3日收复邢台,5日收复大名。主力部队于16日到达石家庄,与徐永昌率领的晋军右路军会师,然后向北京挺进。

在京绥路方向,奉军于4月初率先对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兵分三路发动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

攻怀台；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由于奉军先发制人，晋军一度被逼回山西。当冯玉祥部在彰德进攻受阻，战事危急时，曾向阎屡电求援。4月底，阎命令第12军军长任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率右路军部分兵力出娘子关与奉军作战。同时又命右路军副总指挥杨爱源率第2、第3联军沿滹沱河东下，于5月8日攻占平山，后又连续攻占灵寿、行唐等地，威胁奉军后路，迫使攻击彰德的奉军解围北逃。阎锡山率晋军总部于5月9日占领石家庄。

5月16日，冯玉祥部也到达石家庄，阎、冯会晤后决定：冯部向京汉路以东发展，以策应津浦路方向的作战；阎部兵分两路，右路由阎亲率，沿京汉路正面北进，另一路由左路总指挥商震率领沿京汉路以西地区前进。为了集中兵力，阎还将守卫雁门关一带的4个师调到石家庄以北地区，将张荫吾指挥的第5、第7联军调出灵邱向涞源集结。

张学良、杨宇霆率领的奉系第3、第4方面军团，在负责对阎部作战失利后，决定重新调集重兵于方顺桥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与晋军决战，以保卫北京门户保定。5月15日，阎锡山的部队进至方顺桥附近，徐永昌指挥的右路军与冯玉祥部的韩复榘军相衔接。因韩部奉命南撤，奉军趁虚而入，把徐永昌率领的晋军右路包围于方顺桥附近。奉军进占领满城、康关之后，便向徐部发起进攻，徐部遂告危急。这时，由雁门关调回的李培基、杨士元二师到达唐县，阎乃急令驰援，并调张荫梧部李生达师由武山绕击奉军之背；由吴藻华师攻击侧翼一亩泉的奉军，激战两昼夜，始将奉军击溃。30日，李生达、杨士元两师又向满城南大固店追击，左翼奉军才完全溃退。此时，在右

翼的清风店、定州一线的京汉路正面，奉军攻势凶猛，炮火不断，晋军官兵死伤枕籍。阎又以赵承绶、孟兴富师出定州击奉军侧背。由于两翼奉军已被阎部击败，京汉路正面奉军见保定南部要隘尽失，再也无心恋战，遂解围退走，阎军遂占领方顺桥。31日，奉军放弃保定。阎部又进占保定。

这时，津浦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已退到沧州，蒋介石、冯玉祥率第1、第2集团军已渡过黄河，深入直隶腹地；京汉线上，阎锡山、白崇禧的部队已越过保定；京绥线奉军张作相部已退至京西怀来；此时日本又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占领济南，并在南满增兵；6月1日，北伐军又攻占沧州，由津浦大举向京津推进。这时，京汉、京绥方向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对张作霖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张作霖见北伐军大兵压境，败势难免，为保存实力，于6月1日下令停战议和，3日退出北京，并声言为避免牵动外交，决定将其第3、第4、第5、第7方面军撤回关外。4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8日，阎令其部下商震进城接收。10日，阎去天津接收。冀、察、绥3省遂落于阎锡山之手。至此，国民党南京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权覆灭。

第三章 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

第一节 国民党全国统治的确立

一、国民党实现全国统一

1928 年春,南京政府的北伐部队逼近了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京、津地区,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支持张作霖,并直接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破坏南京政府的“统一”战争;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兑现“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的条款,并威逼张作霖及其军队退回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控制之下的要求。

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还有所抵制。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

资本势力,伸入东北,以牵制日本,这使日本大为恼火。

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黄郛、王正廷分致“觉书”声明,“战争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间……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并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队在锦州、榆关一带加紧布防,并扬言,不许任何军队进入东北。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决定率军退出北京,撤回东北,并向日方提出,因已不再与国民党军作战,不需补充军费,所以取消《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这更激怒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派人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的铁桥下下面预先安放炸药,准备暗杀张作霖。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车离开北京。6月4日晨,当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时,张作霖被炸,很快毙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接到奉天督府“立即返奉”的电报,巧妙地避开了日军的封锁,悄然化装返回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张学良顶着日本方面的重重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

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是日起,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抛弃代表北洋军阀统治的红、黄、兰、白、黑五色旗,而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东北改旗易帜,一方面使张学良由北洋系的旧军阀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新军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的毅然归顺中央,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挫败日寇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新疆的杨增新迫于形势,于6月11日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委任杨增新为省政府主席。7月19日,热河汤玉麟也通电拥蒋,宣布易帜。

新疆、热河、东北改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二、国民党的初期的内政和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训政”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其中规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执行之”;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训政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剥夺人民的权力,使“五权”操纵在国民党手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

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曾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表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但由于后来抗战爆发,“训政”无限期延长,直至1948年3月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才宣告长达20年的“训政”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在制定“革命方略”时提出的训政思想。孙中山的所谓训政,就是训导人民使其懂得民主政治,“主权在民”是孙中山训政思想的重要原则。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思想是以蒋介石的“以党治国”论作为核心内容,它完全抹煞了孙中山的“权能分离”、彼此独立又互相制约、以防止个人独裁的思想精华。强化了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统治,使国民党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党。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对外则推行亲帝反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其外交的总方针必然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南京国民政

府对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集中表现在对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等的处理上。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进行谈判。南京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残杀中国军民的血腥事件,但南京国民政府在交涉过程中竟把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一手制造的“南京惨案”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并且在3月30日解决宁案的正式换文中,南京政府卑躬屈膝地向参加制造南京事件的美、英、法、意、日等国政府“深表歉意”承认美国军队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答应向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赔偿一切损失,惩办“凶犯”,保证今后“决不施行同样之暴行及鼓动”。宁案的处理,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屈辱投降的反动本质。

继宁案处理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又与日本进行济案的交涉。日本代表坚决否认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责任,反而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于1929年3月28日,与日本签订了解决济案的《济南协定》,日本答应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安全。至于中国所受严重损失问题,协议规定由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个协议,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城市,杀伤中国军民万余人和造成无数财产损失的罪责,一笔勾销了。

南京国民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同帝国主义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1928年6月15日、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两次发表对外宣言,指出: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期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

订;旧约已期满新约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

“改订新约”,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关于关税自主问题,1928年7月25日,美国为了树立对华外交优势,首先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整顿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形式上也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但又规定缔约双方“在彼此领土内享有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这实质上是美国“利益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翻版。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税则和陆、海关税创造了条件。但缔约国在所订条约中又继续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如《中英关税条约》的附件中,即规定对英国货物所课税率,最高不得超过1926年关税会议所规定之税率。按最惠国待遇之规定,此项亦适用于其他各国。这又限制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规定税率。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更是毫无结果。当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有英、美、法等国。到1928年条约期满的有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6国,除日本外,其他5国均在与中国订立的新约中规定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原則,但又作了如下保留:中国对此5国行使司法权的方式须经双方同意,并须多数国家同意废除时始行废除。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照会条约未满期的英、法、美等国,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由于各国的抵制而未付诸实施。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另行颁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规定自

1932年元旦起施行。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又匆忙通令暂缓实行,取消领事裁判权也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改订新约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一项重大外交举措,它使中国一些主权得以恢复,增加了关税收入,否定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这是在国民革命的冲击下,帝国主义作出的一些让步,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与人民要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一切在华特权还相距甚远。

南京政府一方面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制造反苏事件,推行所谓“对俄绝交”政策。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广州起义。南京政府乘机诬蔑“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恒为宣传赤化藏匿共党之所”,“为发纵指示之地”,并撤销对驻在关内各省的苏联领事的承认,关闭各省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及商业机构。1929年7月,蒋介石指使中东铁路中方负责人以武力接收由两国共同经营的中东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制造了中东路事件。7月18日,中苏断交。8月,在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乘机进行干涉,实现中东路的国际共管。但苏军很快打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从而打破了美国插手东北的阴谋。12月,双方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事件以前的状态。

三、新军阀混战

四川同盟军反对刘湘之战

1926年6月,刘湘、杨森联合驱逐袁祖铭之战胜利后,刘湘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暗中挑动杨森部下进行倒杨活动。1928年5月18日,在刘湘的公开支持下,第20军倒戈反杨攻下万县,迫使杨退守开江、开县,速电第28军罗泽州求援。杨在罗部的配合下,击退反戈部队,直逼涪陵,与罗部会师。杨为报刘湘怂恿其部下倒戈之仇,曾约罗趁此机会西上讨刘,进攻重庆。但又顾虑两部力量有限,恐难取胜,故未行动。但是,杨、罗此次联手行动却为以后八部同盟反对刘湘之战奠定了基础。由于刘、杨再次交恶,刘湘转而联合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等,拟在资中召开会议,重新进行权力分配。同年9月23日至28日,刘湘、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召开资中会议,决定:一、统一意志(即四人勾结);二、裁缩军队(即裁减异己部队);三、组织省府(取消赖心辉,抬出刘文辉);四、统一军民财政(即集权于二刘)。资中会议,是以“二刘”为核心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次会议,把杨森、赖心辉、李家钰、罗泽州等人排除在外。许多人怨恨刘湘集权,欲联合攻取重庆,与刘湘决战。于是,杨森、赖心辉、李家钰、罗泽州、陈书农、黄隐互相密商,并决定约集刘存厚、郭汝栋等八部结为联盟,于10月10日组成“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军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四川同盟军),公推杨森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同时又以刘

介藩为总参谋长,并设参谋团于合川,负责作战计划,统一部署。经军事会议决定:杨森所部由邻水向江北进攻;黄隐的第7混成旅由合川经静观场协攻江北;陈书农的第12混成旅由铜梁经壁山进攻重庆;赖心辉部由江津经白市驿进攻重庆;郭汝栋部由长江南岸进攻重庆;刘存厚部为机动。

刘湘看到8部联盟已成,即将环攻重庆,形势十分严重,遂自动将资中、内江两地让给刘文辉,以换取刘文辉的支援,牵制江津赖心辉部及大足、铜梁的陈书农部。自己则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在重庆方面采取重点防守,于青木关、凉亭关一带,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准备节节抵抗,以阻击来自铜梁方面的进攻;置重兵于江北县境的张关铁山、龙王庙、一碗水地区,以迎击由合川、邻水、垫江方面前来进攻之敌;集中优势兵力于重庆、江北两城,以备增援及最后决战。刘湘亲临江北前线壁山县督师。壁山,是刘湘主力蓝文彬师的防地,战事将起时,蓝即先派部队在城外的青杠坡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准备死守。可是当陈书农的第12混成旅由铜梁向壁山进攻时,蓝部略事抵抗即弃城退守青杠坡防御阵地。陈旅随即进占壁山县城。这时,罗泽州部因抢先进攻江北,孤军冒进,已被刘湘击溃。陈旅因怕误入蓝部伏击区域,因而停止前进,退守壁山县城以待后命。

罗泽州师,按照计划,本应与杨森部配合,同时进攻江北,并担任主攻任务。但罗为了抢先占领重庆,企图大捞一把,便提前3天出兵,由邻水向江北进攻。罗师的右翼是陈鸿文的第11混成旅、罗成璋独立旅及熊玉璋第21旅一部;左翼是王元虎的第22旅及谢元圻的第5混成旅。由于罗急于冒进求成,

在行军途中与刘湘部队遭遇,刘湘部先声夺人,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双方激战一天一夜,死亡枕籍。罗泽州由于孤军冒进,后续部队接应不上,在无援的情况下,只好向邻水败退,刘湘部尾追不舍,使罗师伤亡惨重。

在罗师溃败三天之后,杨森部赶到张关铁山,向守军刘湘部仰攻。由于地形易守难攻,杨森部屡攻受挫。刘湘又将攻打罗泽州的部队调到张关铁山增援。杨部受此前后攻击,伤亡之大,比罗泽州师还要惨重。激战两天两夜,杨汉域师和雷忠厚旅几乎战光,终于不支,被迫败退。刘湘部乘胜追击,直趋下东各县,将杨森原驻防地,全数夺占。杨森此时正在前线督师,见大后方被乘虚攻占,只好率残部退集渠县,依靠罗泽州,维持现状。

此时,由于罗、杨主力被击败,其他各部四川同盟军,不敢再轻举妄动。黄隐的第7混成旅,由合川只进到静观场;赖心辉因惧怕刘文辉袭其后路,也只派一路兵力进至渝西走马岗;郭树栋则只派出为数不多的队伍,进至重庆南岸黄桷垭附近,后闻罗泽州、杨森两部均已败溃,遂各自退回原防地。至此,四川同盟军反对刘湘之战遂告结束。

蒋桂战争

1929年3月至6月,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与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为争夺在湖南、湖北、广西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928年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西征唐生智和北伐奉张的过程中,白崇禧部进驻华北,黄绍竑部占据

广西,李宗仁率第4集团军驻防武汉。同时,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又大力支持桂系。桂系势力的急剧发展,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于是,蒋介石决心铲除桂系的势力。

1929年初,蒋介石在全国编遣会议上,采用“削藩”策略,排除异己,削减其他各派军阀势力的企图失败以后,便积极策划使用武力来消灭异己。蒋介石当时心目中的劲敌本是冯玉祥,但因冯的实力较强,割据的西北地盘又连成一片,特别是对冯玉祥部下的收买瓦解工作尚未奏效,因此一时难以下手。而此时的李宗仁部,不仅兵力较弱,而且兵力分散,从广东到冀东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大部分部队又是收编的唐生智湘军,蒋介石对桂系内部的策反工作也已见效。因此,蒋介石决定首先对桂系开刀,并作了一系列的部署:首先通过汪精卫拉拢收买在日本的唐生智,给其以巨款使他回国去冀东收回被桂系收编的旧部,扣留白崇禧;其次是拉拢张发奎,使张部从江西西部侧击粤汉路,威胁桂系的后方;三是通过杨永泰拉拢俞作柏,鼓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四是通过郑介民收买陈济棠、陈铭枢等反对李济深;五是派黄郛、邵力子贿赂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讨伐桂系。通过上述一些活动,使桂系孤立起来,为蒋介石下一步兴兵讨桂创造了条件。

1929年2月,蒋、桂为了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桂系因蒋介石运给湘省主席鲁涤平大批军火,而深感不满。认为蒋介石插手湖南,扶持鲁涤平,是寓有牵制桂系之意,决定先发制人。遂以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以“潜运军械,阴谋破坏”为由,于2月19日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

继任。并派 52 师叶琪部、15 师夏威部由鄂入湘,赶走了鲁涤平。蒋介石则针锋相对,以军队“编遣”期间,政治分会无权任免有关特定区域内官员为名,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同时调动军队,由南北两路合击武汉,令缪培南、方鼎英师由江西逼取鄂南;夏斗寅、刘峙师自豫皖进击鄂东北。为了迎击蒋军,桂军分别集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师于鄂东北,何键师和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于湘东北。是年 3 月中旬,李济深率粤方代表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到达上海,蒋介石借口调停湘案,电请李济深北上赴京。李于 3 月 13 日抵达南京,21 日即被蒋介石囚于京郊汤山。至此,蒋介石消除了粤桂联合的顾虑,决定出兵讨伐桂系。

3 月 26 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在下达的《讨伐令》中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还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28 日,蒋介石命令朱培德为讨逆军第 1 路总指挥,率第 3、第 5 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以截断桂军退路;以刘峙为第 2 路总指挥,率第 1、第 2 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 3 路总指挥率第 6、第 7 军,由南阳、信阳出发南袭武汉;以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蒋介石设讨逆行营于九江,亲自坐阵督师,计划分两期作战:第 1 期以攻取武汉为目标,第 2 期肃清湘南、两广之桂军。31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各路军迅速攻入鄂境,进逼武汉。同时,蒋介石又采取分化瓦解手段,派员收买了桂军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4 月 2 日,当蒋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

杨腾辉即率部连夜撤往孝感、花园一带，于3日宣布服从“中央”指挥。李、杨两部倒戈归蒋，使桂军防守出现缺口，蒋军不战而入。桂军见大势已去，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线撤退。4日，蒋军进入武汉。5日，蒋介石以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接着又令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1、第2路追击司令官，率部对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部实行武力追剿。同时又以金钱、官职进行收买。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逼迫下，胡、陶、夏等人联名通电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武汉桂军遂全部瓦解。

蒋介石在集中力量，解决武汉桂军的同时，又通过重新起用唐生智，收拾了平津的桂系势力。为了将驻在滦东的白崇禧部赶出平津地区，蒋介石派唐生智携巨款去河北，由天津赴唐山，收买了被白改编的旧部。3月20日，唐的旧部李品仙等人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白崇禧见势孤难敌，便弃众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南下香港，所部重归唐生智指挥。蒋介石旋命唐生智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第4集团军移驻石家庄。

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和平津的桂系实力后，于4月19日、24日先后下达命令，发布了“以根本铲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并以由桂投蒋的何键为讨逆军第4路总指挥，率湘军由湘南攻桂林；以陈济棠为第8路总指挥率粤军由广东肇庆、英德一线直取梧州；以龙云为第10路总指挥，率滇军由滇北经贵州攻占柳州。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逃回广州，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救党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由白崇禧、黄绍竑率兵分两路向

广东进攻,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挽救政治上的失败。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进行一场血战,桂军战败,退回广西。李、黄回师广西后,又经过几次反击作战,把入侵广西的湘军打退,但粤军却从东部深入广西境内。在此期间,蒋介石把李明瑞、杨腾辉部从湖北,经上海运至广东。在路经南京时,蒋介石从陈济棠处拨出80万元给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作军费,时行收买,指令李、杨两部与广东粤军合兵作战,消灭李、白,彻底征服广西。

6月2日,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到达梧州,然后沿邕江进抵桂平附近。由于粤军与李、杨两部配合作战,龙云部又从贵州方面杀来,白崇禧、黄绍竑无力抵挡,由广西南部的龙州败逃越南,残部交给许宗武、韦云淞率领。当李、杨两部到达桂平附近之后,他们经过谈判协商,认为双方都是广西的部队,不应当在自己的家里打仗,况且不管谁胜谁败都对广西人不利,而对蒋介石和陈济棠有利。于是,双方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许宗武部让开河防,让李、杨部渡过邕江,李、杨部则允许许部在广西存在,不对他采取军事行动。韦云淞部也与李、杨部达成同样的条件妥协。俞、李、杨这种作法,显然违背了蒋介石“根本铲除”的意愿,保留了李、白残部,为李、白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基础。7月,俞作柏在南宁市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职,从而组成了以俞作柏为首的广西省政府,第一次蒋桂战争遂告结束。

蒋冯战争

1929年10月至11月,蒋介石和冯玉祥为保存军事实

力,扩张统治势力在河南地区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誓师响应北伐,取得了河南地盘,统治势力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张。蒋介石看到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治的地盘又联成一片,感到对自己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威胁,便采用拉拢手段,与冯“义结金兰”,企图以此来稳住冯玉祥。但蒋、冯之间互相排斥,暗中扩充势力,矛盾一直不断。在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上,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合伙抛出的编遣方案,明显企图是削弱冯玉祥西北军的军事实力,冯以生病为由拒不出席会议,于1月底秘密由南京返回河南,蒋、冯之间的矛盾冲突遂表面化。3月28日,中日两国签定解决“济南惨案”的协定,其中规定日军自胶济线撤退,冯系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防济南。但蒋介石初电令孙良诚勿入济南,后虽同意“按原定计划接防”济南,但又另派陈调元部驻守胶东,牵制孙良诚部。山东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冯玉祥更为不满,蒋、冯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

4月初,蒋介石进兵两湖,攻打桂系时,冯玉祥在邵力子的疏通下,表面上虽打出了拥护中央讨桂的通电,暗中却部署重兵于豫东和豫南,其意图是蒋战败即派兵渡江夺取南京,桂系战败则出兵武胜关夺取武汉。桂系在鄂失败后,冯系韩复榘、石友三两军进至鄂北花园。蒋介石为稳住韩、石两部,在武汉召见韩、石,以犒赏军队为名,进行收买。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末期,预感到蒋在打败桂系后,将会向西北军开刀。于是他在北联晋军拉阎锡山共同反蒋的同时,大力调整部队。4月24日,冯玉祥在开封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认为桂系之所以失利,就在于战线拉得过长,李、白对将领

失去控制。遂决定缩短战线,撤退山东部队,收缩鲁、豫兵力,集结河南。接着,孙良诚电辞山东省政府主席职,率部撤离山东,移驻陕西。随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也率部撤离河南进入陕西。冯部还将武胜关隧道和陇海线上的重要桥梁炸毁,以迟滞蒋军的调动,阻其进攻。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护党救国”,推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请冯率部反蒋。

面对蒋、冯间的紧张局势,蒋介石采取了边用兵、边分化的策略。一方面制定了“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计划,令朱培德的第1路军集结于徐州、开封之间;刘峙的第2路军在信阳、襄樊一线待命;唐生智的第5路军部署在洛阳、郑州一带。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惜以重金收买冯玉祥的部下。4月间,蒋在武汉召见韩、石两人,就以巨款收买,使其萌发叛冯投蒋之心。后又继续策动韩、石破坏冯玉祥的西撤计划。5月22日,韩、石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即委任韩当西北军总指挥,任石为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在行政上,蒋委任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同时,蒋还策动冯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投蒋,委任刘镇华为讨逆军第11路总指挥、马鸿逵为第15路总指挥,杨虎城为新编第14师师长。这样,在蒋介石的一手策划下,西北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分化。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严缉拿办。冯玉祥遭此重大挫折,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委宋哲元代理总司令,只身去山西说服阎锡山共同反蒋。阎锡山却劝冯玉祥下野出洋,表示愿陪冯一

起出国。冯处境困难,决定以退为进,表示愿意下野出国。阎却在6月下旬诡称共商反蒋大计,邀冯入晋,把冯玉祥软禁在五台山,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

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分化西北军得手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原局势,又派嫡系将领蒋鼎文率第2军驻扎在武汉地区,南控湘赣,西制川鄂;命顾祝同率第1军驻守徐州,南掩京沪,北控苏鲁;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则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起用唐生智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其旧部开赴豫西扼制西北军东出潼关,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将冯军困毙于西北荒漠地区。

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押冯玉祥极为愤慨,再加上陕、甘、宁、青西部地区土地贫瘠,给养极其困难,都愿意投蒋打阎,以打开生路。遂由鹿钟麟出面拉拢韩复榘和石友三,重修旧好。这时,韩、石两部叛冯投蒋不久,仍处在蒋的嫡系部队包围之中,颇为不安,正想摆脱困境。他们在鹿钟麟的劝说之下,表示愿意合力攻阎,以报扣冯之仇。何应钦闻后,当即答应接济军火给养。阎锡山听说此事后,极其恐慌,并意识到西北军仍拥有广大地盘和雄厚实力,仍听从冯玉祥的调遣,于是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表示愿和冯共同反蒋。冯为防止蒋、阎勾结,决定拆散其联盟,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即响应。因此,西北军又由联蒋攻阎变为联阎反蒋了。

10月10日,退驻陕、甘的西北军在代总司令宋哲元的指挥下,发动了反蒋战争。接着,40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指河南。第1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线东进潼关,再入豫西;第2路为孙连仲、刘汝明部,由孙连仲指挥,出紫金关,东取南阳;第

3 路由张维玺、吉鸿昌率领,从汉中、兴安出鄂豫边的老河口,循白河东进,威胁襄樊。后两路得手后,进取武汉,与两广的张桂联军取得联系,共同倒蒋。

10 月 11 日,蒋介石下令讨伐西北军,决计将冯军“歼灭于潼关——紫金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蒋介石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总参谋长;以唐生智率领第 5 路军的第 5、第 8、第 10 军等部,在郑州以西进攻冯军,阻其由潼关东进;以方鼎英所率第 1 路军的第 3、第 4 军等部,集中于叶县、舞阳、西平、郾城一带,西击冯军;以刘峙所率第 2 路军的第 1、第 3 军等部,集结于鄂北广水、花园、樊城、老河口一带,相机北进;另调四川杨森部至荆州、沙市一带为后卫。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上旬,蒋、冯两军在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一线和豫西的浙川、紫金关一带发生激战。冯军三路出动后,初战甚为得手。孙良诚指挥的第 1 路军从左翼很快打败洛阳守军徐源泉部,进抵登丰、密县;宋哲元指挥第 2 路军的冯治安军,从中路攻下临汝,孙连仲指挥刘汝明军也进抵西峡;张维玺、吉鸿昌部也从南路进至老河口一带。蒋介石见冯军攻击顺利,战局发展与己不利,便亲至许昌督师指挥作战。11 月初,宋哲元、孙良诚两路军在防守陇海线黑石关要隘庞炳勋第 2 路军的配合下,正待部署军队夺取许昌和郑州时,不料蒋介石又和阎锡山达成协议,蒋给阎拨去月饷军费 680 万元,并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在蒋的高官厚禄收买之下,又倒向蒋介石方面,不仅违背了诺言,按兵不动,而且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阎的这一反叛行为,使冯玉祥及其西北军受

到很大打击。左路军孙良诚部在唐生智、方鼎英部的拼命阻击下,放弃密县、登封一带阵地后撤,因掩护撤退的魏凤楼军过早放弃龙门,孙良诚部在后退时被徐源泉部截击后部,受到很大损失,在蒋军前后夹击之下,孙良诚进退无路,准备接洽投蒋,以保全部下。宋哲元在中路得知这一消息后,恐腹背受敌,遂下令前线的本路军及庞炳勋军向潼关撤退。至11月底,在蒋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西北军孤立无援,军事指挥上又无法统一,冯玉祥令其主力退回陕西。至此,冯玉祥反蒋战争遂告失败。

唐、石联合反蒋之战

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唐生智和石友三在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支持下在河南进行反对蒋介石的作战。

自从北伐战争以来,唐生智一直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武汉政府时期,唐生智因与张发奎支持汪精卫反蒋,被李宗仁、程潜讨伐下台,军队被桂系吞并,唐被迫出走东洋。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进兵两湖,讨伐桂系时,经汪向蒋极力建议,唐又从日本回国,从桂系手中收回旧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汪精卫的改组派没有获得如意好处,汪就派其党徒到处煽动与蒋有矛盾的部队起来反蒋。唐生智在蒋桂战争中,虽然率其湘军主力尽力助蒋讨桂,但蒋获胜后,唐并没有得到蒋的信任却被派驻郑州,唐去南京见蒋陈述己见又几乎被蒋扣留,因此,唐回到郑州以后反蒋之心更加强烈,积极寻找反蒋的势力结成联盟。

石友三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在蒋冯战争中，蒋介石通过高官厚禄的诱惑，使他叛冯投蒋。但蒋获胜后却把他的部队从亳州调到了河北的德州，安徽省主席的职位被蒋留给了亲信陈调元。石为此嫉恨如仇，虽在刚刚投蒋不久，却又起反蒋之心。当时在投靠蒋介石的西北军将领中，韩复榘、马鸿逵、石友三都是寄蒋篱下，不受重用，倍受歧视。他们三人同病相怜，互相庇护，秘密结成小集团。

唐生智认为这个小集团可以利用成为他反蒋的同盟者。于是在1929年11月主动与他们进行联系。在此期间，石、韩也与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总部接上了关系。当唐生智与韩、石串联反蒋时，韩为壮大力量又派员去徐州与石、马秘密会商。马鸿逵看到这是一个卖友求荣的好机会，会后立即到南京向蒋介石告密。蒋由此而信任马鸿逵，对唐、石、韩则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并准备暗中解决唐、石等人。

就在蒋介石暗中准备解决唐、石的同时，国民党改组派总部也派人到唐、石的部队中进行策划，委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4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5路总指挥，并约定在适当时机共同起兵反蒋。在改组派的串通下，唐生智除了早已与阎锡山、冯玉祥有联系外，又串通了各地大小反蒋势力，与陕西的宋哲元、湖北的夏斗寅、湖南的何键、河南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文辉等都接通了关系。唐生智特别重视联络阎锡山，派大员袁华选专程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和冯玉祥，进一步策划联合反蒋之事。此时的阎锡山因受到蒋介石的猜疑，有心再度联冯反蒋，唐生智之请正中下怀。袁华选转达唐意，只要阎同意反蒋，唐即拥护阎为领袖。于是，唐、阎达成协议：阎派联络员到唐生

智部,并开出 50 万的支票充作唐部的军费。唐生智在郑州发动反蒋行动后,阎锡山即在太原发表讨蒋通电。经过上述联络活动后,唐生智认为联合反蒋已经成功,石友三也积极做好准备。

这时,蒋介石已侦知唐、石的反蒋活动,便采取分而治之、投其所好、诱其就范、而后聚歼的计谋,针对唐、石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1929 年 11 月下旬,蒋介石声称要委任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职,令石率部到安徽接任。石并不知是计,于 11 月 26 日奉命将部队开到蚌埠,准备接管安徽省政。11 月 27 日,石友三赴南京谒蒋,以为会立即得到高官、地盘和巨额军饷,没想到蒋却要石抽调部分力量去广东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石立即醒悟这是蒋为拆散他的实力所施的一计。为了保存实力,对抗蒋分而治之的计谋,石提出亲率本部人马,全部赴粤。石原本以为蒋不会同意他的这个要求,没想到蒋却非常痛快,不仅同意石部全体南下,而且还许诺石任广东省主席。蒋指示石将部队带到浦口集结,然后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乘轮去广东。本性多疑的石友三,对蒋的这一出人意外的决定感到困惑不解。回到蚌埠大本营后,国民党改组派驻军代表帮助分析认为,这是蒋企图将石部诱上木船,在长江东下途中缴械。石恍然大悟,于是决定将计就计,乘其兵力集中,东下浦口时起兵反蒋。石秘密通知唐生智,约定在 12 月初到达浦口时同时举兵。为了麻痹蒋,石对蒋则表现得非常顺从,按时把部队带到浦口“待船”。

就在石率部东下浦口时,蒋介石对唐生智部开始实行重兵包围,加强对郑州的封锁,使其孤立,待机围歼。这时,石友

三也发觉蒋对唐部的行动,不断把南京方面的军事情报向唐通告,当石电告唐,蒋介石已派何成浚去武汉,转平汉线督师,让唐提防小心时,唐回电请石专一在浦口行动,湖北、河南之事他已有安排,并告知石友三,驻扎在山东的高桂滋部已表示与他们合作反蒋,请石在浦口举兵可无后顾之忧。最后,唐、石二人商定:蒋已有查觉,事不宜迟,石友三部由浦口进攻南京,唐生智部下直取武汉。

12月2日深夜,石友三在浦口车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兵反蒋。先把蒋介石派到石部的代表、兵站总监卢佐扣押,随后以数十门大炮排列在长江北岸,突然向南京城猛烈开火。同时派便衣队潜入南京城内,乘机扰乱。浦口的公安局、保安队、护路队等地方武装,全部被石部缴械,南京城里也陷于混乱之中。浦口的炮声一响,唐生智即在郑州发表早已拟定好的东(1日)电,列名者有75人,宣布联合反蒋。12月3日,唐又在郑州善乐园召集各团体机关开会,作了关于时局的讲话,提出放弃蒋介石颁给唐部的第5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4路军”,并发表了《拥汪联张电》,公开进行反蒋之战。

蒋介石虽已有所防,但没想到石、唐会这样快起兵反蒋。这时,两广战事未停,石、唐又起兵,蒋军主力集中在两广地区正与桂系作战,一时难以调回与唐、石部作战。蒋介石为解决肘腋之乱,便急忙于12月3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决定:争取阎锡山、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唐、石之乱即成无头之鸟。对唐、石二部,则重点打击唐部,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进行牵制,而不予以重点打击。会议过后,蒋即派吴铁城以

劳军为名去东北拉拢张学良；派内政部长赵戴文去山西劝说阎锡山反唐；向马鸿逵发出训令，率部切实维持好徐州秩序；另派新编第20路军冯铁裴部从浦口向北进击石友三部；另调集蒋系主力进攻唐生智部。

阎锡山与张学良在唐联络起兵反蒋时，已有过来往。阎在拟写反蒋通电时曾征求张的意见，填写了“党事由党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之语，意在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但是，阎的通电尚未发出，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一是唐起兵后，没有按照原来的约定，在通电中拥护阎为领袖，却发表了《拥汪联张电》。阎认为唐言而无信；二是阎的“军师”赵戴文及时赴晋劝阎反唐起了转化作用，使阎锡山由原来的联唐反蒋变为联蒋反唐；东北的张学良在吴铁城的劝说下，也表示反对改组派，支持蒋介石讨唐。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联合讨唐。阎还在太原召开群众集会张贴标语，大造反对改组派、反对唐生智的声势。结果，允诺给唐部的50万元空头支票还没有来得及兑现又收了回去，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蒋、阎、张的关系打通之后，蒋、阎相约；阎锡山从山西、河北向河南出兵；马鸿逵、韩复榘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系军队从南向北进攻郑州；阎、蒋南北夹击唐部。蒋并允许阎支配河南省政权。阎在垂手可得河南地盘的诱惑下决定出兵讨唐。

阎锡山态度的变化，立刻引起反蒋联盟的变化。原来唐生智在东电上列名的75名将领，纷纷发表声明，否认他们参与唐、石反蒋之事。12月15日，唐生智的老部下何键，不仅否认他曾同意列名反蒋，反而列举揭发唐的罪状，通电声讨唐生

智。12月20日,由阎锡山领衔,原在唐生智东电上联名反蒋的将领,如马鸿逵、万选才、刘茂恩、刘镇华、王金钰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反对唐生智。在这种情况下,石友三与韩复榘商定,石投靠阎锡山,韩仍依靠蒋介石。12月21日,石友三在率部移至河南商丘后,发表“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的通电,投靠了阎锡山,后又率部移驻新乡,以免再遭蒋系军队的追歼。

蒋介石见唐、石联盟已破裂,石已投靠阎锡山,便顺水推舟,命令石友三部归阎指挥,不再追究石反蒋的罪过,但令其率部参加讨唐之役。西北军此时反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宋哲元部在唐生智发出反蒋东电后,曾发表通电声明支持唐军,当各派将领纷纷改变态度时,宋哲元又随众反唐。这样,唐生智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与蒋较量的力量。

在唐生智集团内部,意见也不统一。⁵¹ 师师长龚浩,曾在12月3日的会议上提议,应当先借重于蒋介石发展自己的势力,马上反蒋为时尚早;如果一定要反蒋,也要速战速决,不宜拖延。可是,唐生智听不得不同意见,对龚浩的这一有益的意见没有予以考虑,反蒋之战打响以后,唐生智又贻误战机,不肯迅速南下。12月20日前,汉口空虚,国民党机关纷纷逃往南京。夏斗寅曾从鄂西密电唐生智,请他迅速南下,占领武汉,夏愿为内应。但唐生智迷信于阎、唐联合,待阎起兵,推迟南下。结果阎锡山变友为敌,夏斗寅见势不妙,也参加反唐军的行动,使唐生智四面受敌。

12月9日,蒋介石在国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决以武力平定唐部。随后,调其嫡系刘峙等部队沿平汉线北上,进攻

郑州。阎锡山派孙楚、杨爱源部从河北、山西向南推进。12月19日,蒋介石电令“讨逆军”全部归阎锡山指挥。这样,河南境内的王金钰、刘春荣、韩复榘、石友三等都在阎锡山的麾下参加讨唐作战。南京政府为了加强讨唐作战力量,又购买了6架飞机参战。12月20日,蒋系部队在平汉线发起总攻。蒋鼎文、夏斗寅等师,经大小数十战,相继攻占了遂平、汝南;晋军于12月20日从北面抵至郑州,其中徐源泉部从鄂北攻入河南;驻在南阳的杨虎城部于1930年元旦之夜又袭击了唐军的供应站驻马店,给唐部以拦腰截击,加速了唐部的崩溃。唐生智本人已从郑州进至驻马店以南地区,遭此袭击后,唐又率领主力进行反攻,因兵力不足,适这时又天降大雪,平地雪深三尺,人马难以行动。唐率部徘徊在豫南,进退无路。潜伏在河南的情报头子戴笠,将唐部的狼狈情况电告蒋的总部,1月3日,蒋遂命刘峙指挥豫南前线蒋军向唐部发起猛攻;命驻南阳的杨虎城率其陕军向唐生智总部驻马店再次发动袭击;阎锡山亲到郑州督战,委托韩复榘为北路总指挥,督率王金钰、王钧等部渡过黄河,沿京汉路南下。唐生智在两面夹击之下,失去了抵抗力,进退失据。1月6日,唐生智致电阎锡山,请求只身出洋,所部听候改编。随后,唐生智化装潜逃,经开封到天津隐居。1月9日,唐部先后到河南漯河集中。13日,唐残部只好在刘兴、龚浩的率领下投降。所部被蒋、阎两军缴械收编。至此,唐生智、石友三的联合反蒋之战彻底失败,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拉起的两支“护党救国军”也土崩瓦解了。

1929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动乱不止,战祸不断的一年,内战的地域殃及大半个中国。其中接受汪精卫国民党改组

派“护党救国大同盟”中央委任的“护党救国军”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其各地大小反蒋势力也云集四起。然而，所谓的“护党救国军”却都一个一个被蒋介石打败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和独裁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却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了。

桂粤联军反蒋之战

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粤军张发奎部，为保存军事实力，取得对两广地区的统治权，在广东西部地区 and 广西省境内与蒋介石军事集团进行的一次战争。

蒋桂战争结束后，蒋冯战争又起。国民党改组派首领汪精卫看到内战不息，有机可乘，便在香港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会议，号召各地武装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派人与拥汪派的张发奎、唐生智联系，要他们发动反蒋战争。而蒋介石此时已经注意到张发奎在鄂西收容了桂军残部，势力日益膨胀，因而命令张所统率的第4师，调往陇海路休整，并限于9月20日前乘轮到达浦口。张估计蒋必在汉口或浦口将其所部包围缴械，时机迫切，不容久待。张与汪精卫取得联系后，于9月17日电告蒋介石，提出三项主张：一是取消违法乱纪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二是根本铲除党内腐化、恶化势力；三是敦请革命元勋回国，主持大计。这是张发出反蒋的信号。次日，张即率部由宜昌驻地取道湘西回桂，目的在与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部会师，一同进取广东，在广州另立政府，拥汪精卫出面，与蒋介石抗衡。

在张发奎率部经湘返桂途中,汪精卫特派薛岳去南宁会晤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请俞起兵倒蒋,与张发奎一同攻粤。俞以到广西主政才三个月,仓猝起事,恐给人以可乘之机,考虑再三,犹豫不决。汪精卫以张率部师行途中,不容再缓,逼俞立即表态。俞不得已于9月27日在南宁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并以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同时发表反蒋通电,欢迎张发奎部返桂。

蒋介石闻讯后,于10月2日下令免去俞、李本兼各职,另以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8路军副总指挥,以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主任,又用重金收买李明瑞部的第44旅旅长黄权任独立第5师师长。10月7日,蒋命陈济棠督率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个师沿西江而上进入广西,目的给俞、李施加军事压力。同时经黄权转告,允给俞、李10万大洋下野。10月13日,俞、李率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和俞作豫部离开南宁,分赴百色、龙州一带。

汪精卫在香港接到薛岳的报告,知悉俞、李率部离开南宁,非常不安,恐怕亲蒋的吕焕炎率桂军堵截张发奎部,便请李宗仁重返广西收拾桂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认为这是他们东山再起的好机会,便同意与张发奎合作,共同攻粤反蒋。10月31日,张发奎率部经湘西进至龙胜县城,随即便派员与广西将领接洽,达成默契。11月初,张率部继续向灵州、长安一线前进。11月11日,张接到桂林方面的来电,告知:“接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令,任李宗仁为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主传达所所长,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相与一致讨蒋靖粤”。张接电后决定率部兼程入

粤。17日,张在同安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职。24日,张率部到石桥镇与黄绍竑会晤,商讨进军靖粤部署后决定:1. 李宗仁以中央传达所长名义,统一指挥第3、第8路部队入粤讨蒋作战;2. 李宗仁为方便和汪精卫、张发奎的联系,任汪派要员陈翰誉为第8路总司令部参谋长;3. 张发奎的第3路经怀集、广宁到清远;李宗仁的第8路经德庆、肇庆、四会到清远。两路部队定于12月6日在清远会师后发起总攻。

蒋介石对桂、张联合攻粤早已作了充分准备,在张率部返桂的同时,除已命令陈济棠以第8总指挥统率余汉谋、蔡廷锴、蒋光鼎、香翰屏、李杨敬5个师先后进入两广地区外,又派朱绍良的第6路谭道源、陈继承、毛炳文3个师由赣援粤。另外,蒋又令何键的第4路部队由湖南进攻广西,从北部牵制桂系。在粤方面委何应钦为广州行管主任负责指挥入粤部队作战。

桂、张联军入粤作战部队共有五师五旅。其中桂系部队有五师一旅,分为二个纵队,第1纵队以吕焕炎为总指挥,下辖许崇武、梁朝玠两师和封克鲁旅;第2纵队以杨腾辉为总指挥,下辖梁重熙、黄权、蒙志三个师。张发奎的部队共有四个旅,即:邓龙光的第10旅、黄镇球的第11旅、吴奇伟的第12旅、陈芝馨的教导旅。两路兵力共有5万余人。

11月24日,第3路在张发奎的带领下经冈寨、下黄冈一线抵达清远、高田、上岳一带;第8路在李宗仁的带领下经都城、下茅墟、肇庆进至清远。

12月6日,李宗仁在清远下达总攻击命令。7日晚,第3

路和第8路第1纵队由横石、第2纵队由洲心墟渡过北江，击溃沿江守军一部，继续向粤攻击前进。8日，第3路到达花县外围，张发奎即以吴奇伟、陈芝馨2旅为右翼，进攻花县、两龙墟；以邓龙光、黄镇球两旅为左翼夺取新田、石角。左翼对阵的蒋军为朱绍良、毛炳文、陈继承三个师。9日，邓龙光旅在新田率先破敌，攻占石角。10日，在右翼陈芝馨旅一部协助下，又将石角玉象山一线蒋军击溃。此时，邓旅士气正盛，本应乘胜直追逃军进击广州，但因右翼方面战场吃紧，邓旅追至李溪时，奉命回师增援两龙墟。

此时，右翼吴奇伟旅，8日晚在莲湖击破谭道源部，即占领花县。9日下午，陈芝馨旅进取玉象山，吴旅追敌到两龙墟受敌顽强阻击。10日至11日，战事完全集中在两龙墟战场。蒋军为蒋光鼎、蔡廷锴两师，凭坚固工事与张发奎部作战，将张部阻隔在两龙墟外围。11日中午，黄镇球旅在进攻中严重受挫，旅长黄镇球受伤。张又令邓龙光旅继续进攻。12日，守两龙墟的蒋军在空军的支援下，对张部展开突然反击，张部被分割为数段，收拢不及，损失惨重，又与第8路军接应不上，张发奎不得已于13日下令撤退。14日，张部退至琶江集结。

李宗仁率领的第8路军，此时正在进攻军田。由于第8路军多系新编部队，战斗力较弱，又因无重火力助攻，所以，军田久攻不下。李宗仁接到第3路军在两龙墟进攻受挫，退却琶江的文电后，恐左侧背受到威胁，也下令部队撤出军田。13日，白崇禧致电张发奎：“接兄文电，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分由芦苞、白泥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到军田，谓贵部已向原路退回，故德（李

宗仁)季(黄绍竑)两公决心暂撤回北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随后,第3、第8路都经广宁、怀集撤回广西。李宗仁原拟率部撤往梧州,并派一部先行抵梧,但部队尚未到,梧州已被陈济棠部进占,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率部退往平乐休整。12月28日,桂、张联军到达平乐。

1930年1月5日,李宗仁在平乐整编部队,决定将第3、第8路军的名义撤消,各自恢复以前的番号。改编后的番号是:张发奎任第4军军长,下辖第4、第12师;杨腾辉为第7军军长,下辖第5、第8师;黄绍竑兼第15军军长,下辖第1、第3师和教导师。这3个军仍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

此时,粤军分兵向平乐、荔浦进逼,而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又公开宣布反李拥蒋,并在玉林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吕的倒戈,使桂、张联军前后受敌,形势至为严重。李、黄、白、张在平乐举行会议,决定由白崇禧指挥杨腾辉的第7军和梁瀚嵩的教导师及黄瑞华的警卫团,阻击正面进入平乐、荔浦之敌;同时,由黄绍竑率第4军、第15军主力远征桂南,解决吕焕炎叛军,以固后方。

黄绍竑1月9日率部由荔浦进抵柳州,吕焕炎在南宁的守军营长杨俊昌、覃兴即前来联系,黄告杨、覃应适时发动兵变,解决吕部守军,拿下南宁。随令第15军于1月13日由修仁出发,第4军随后跟进。19日,第15军许崇武师袭占桂平,梁朝玘师袭占贵县,吕焕炎从贵县逃至玉林固守。而杨俊昌、覃兴等人于18日突然发动兵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吕部在南宁的蒋武、张寿两团解决,并且获得了一批储存在南宁

的武器装备。黄绍竑即提升杨俊昌、覃兴、岑建英为团长,令他们驻守南宁。驻守在宾阳的吕部伍朝栋、韦恒心2团率部移至黎塘,向李宗仁投诚。至此,李宗仁讨吕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1月下旬,朱绍良统领的第6路3个师进入平乐。李宗仁在宾阳,令梁瀚嵩教导师由荔浦向平乐开进,令白崇禧率第7军全部及在宾阳归顺的伍朝栋、韦恒心两团固守荔浦,准备迎击蒋军。

梁瀚嵩师于1月29日由荔浦进到栗木,击退敌警戒部队。次日到龙窝,又败敌1个团。进至平乐对岸时,却被优势的蒋军击退。白崇禧为了诱平乐之敌全部过漓江西岸,仍令梁瀚嵩师继续佯攻。2月1日,梁再率部进击。2日,蒋军毛炳文师和谭道源师倾巢出击,企图围歼梁瀚嵩师。梁见诱敌任务已完成,便率部迅速退回荔浦。

白崇禧见毛、谭两师西渡漓江,认为机不可失,急令杨腾辉率第7军全部为左翼,攻占马岭;以梁瀚嵩师及伍、韦两团为右翼,进攻栗木;以黄瑞华警卫团佯攻阳朔;以唐生明部由荣城袭扰平乐敌后;白崇禧则亲率第8师一个团为总预备队。对毛、谭两师形成合围之势。2月4日,白崇禧下令总攻。5日,左翼一举攻占马岭、栗木。6日,又败敌于龙窝。7日,残敌分散数处逃过漓江,退往八步。10日,桂军追至八步,残敌又退至信都、开建转往梧州与陈济棠部会合。至此,桂北之战已获胜利。但粤军余汉谋、香翰屏部正沿容苍公路进援玉林,企图解吕焕炎之围。为此,白崇禧电告黄绍竑,请他放弃玉林,退守浔贵,候他率第7军到后再一同破敌。12日,白率第7军到柳州准备南下玉林。

可是黄绍竑此时已令第4军远征南路,一时调不回来。当黄得知粤军沿容苍公路急援玉林时,急调张发奎回师北流阻敌,可是此时李汉魂师在高州,邓龙光师在廉江,要数日后才能到达北流。黄迫于形势,遂改令第4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附近,以阻止粤军的前进,但第4军主力未到,粤军已迫近,不得已又退向北流,粤军再次进逼北流。这时,白崇禧急电黄绍竑,重申不要孤军作战,继续后退,寻机再战。可是黄没有采纳这一正确意见,令第4军和第15军主力与粤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鼎3个师在北流附近进行决战。从13日至16日,桂、张联军主力与粤军主力苦战4昼夜。张发奎第4军和第15军的梁瀚嵩师因连日奔袭,劳师远征,兵力疲惫,在劳逸悬殊的不利形势下,终于败北。桂、张联军只好退到贵县防守。形成了桂、张联军与粤军隔浔江对峙的局面。北流一战,桂、张联军损失重大,特别是张发奎第4军尤甚。战后,张部缩编为第34、第35、第36团。至此,桂、张联军反蒋之战又以失败告终。

蒋、冯、阎中原大战

1928年6月,国民党新军阀通过第二次北伐,将奉军驱逐出关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阀集团间为了分配地盘和统治权力,矛盾冲突逐渐尖锐化。同年7月11日,蒋介石接受政学系智囊人物杨永泰建议的“削藩”策略,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一些主要军官在北平(现北京)汤山举行会议,讨论缩减军队的方案,提交8月初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审议并得到了通过。

1929年1月,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讨论军队缩减方案,

蒋介石借此机会,首先集中力量削减冯玉祥的实力,而对阎锡山则实行拉拢手段。阎锡山当时兵力不足 12 个师,蒋介石不但保留了阎部 12 个师的番号,而且还允许补充足额。阎锡山虽然也看破了蒋介石借编遣会议削弱异己的企图,但是,他看到自己据有闭关自守的有利地盘,可以坐山观虎斗,因而,在编遣会议中也对蒋介石采取了虚与委蛇、见机行事的方针。

1929 年初至 1930 年初,蒋介石先后在两湖、粤西、豫西、豫南等各次军阀混战中打败了李宗仁、张发奎、冯玉祥和唐生智等人后,军事势力更加强盛。这时,被打败的各路军阀已无力再与蒋抗衡,不仅其他一些杂牌军阀惴惴不安,“山西王”阎锡山也感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军事威胁。这时,蒋介石也对阎锡山改变了过去那种拉拢敷衍的态度:原来在和阎锡山联手讨伐唐生智时应允的每月拨给晋军的 80 万元军饷也不再拨付;阎锡山要求发行公债以偿付“北伐战争”垫付的军费也不予批准;原来由阎锡山控制在手的天津海关、长芦盐运使署等华北的重要税收机关,也由宋子文派人前来接收,如此等等。在蒋介石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阎锡山终于决心揭起反蒋的旗帜。这时,由于其他各派军阀在蒋介石的打击之下,实力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只有阎的晋军还保持一支完整的兵力,因此,晋军就成为国内各反蒋派系所瞩目的重要力量。

1930 年初,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等人先后来到太原与阎锡山共同策划讨蒋。计有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刘文辉、孙殿英、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马鸿逵、刘湘、何键、樊钟秀、井岳秀、任应岐、刘镇华、万选才、宋哲元、陈调元、金树人、岳相如、刘恩茂、刘桂棠、

刘春荣等全国各地大小军阀均派代表参与酝酿。东北军阀张学良也派其秘书王树翰前去太原联系共同反蒋行动。太原一时各路军阀代表云集,成为汇合全国各地反蒋力量的政治中心。

阎锡山在采取军事行动前,首先作了一系列的舆论准备:2月10日,以“礼让为国”为辞,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3月13日,又授意其部下商震通电劝阻阎锡山辞职;3月14日,李宗仁、张发奎以及冯系将领鹿钟麟等57人联名发出了拥护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的通电;3月21日,阎、冯又联名发出倒蒋通电;4月1日,阎、冯、李宣布就职。此时,全国各地大小军阀纷纷发表通电,拥护讨蒋。

4月初,阎锡山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分析研究讨蒋之战的军事形势,确定作战方针是:河南战场采取攻势防御,将蒋军主力牵制在陇海、京汉两线;山东战场采取攻势,得手后即全线出击,夺取徐州和武胜关战略要地,而后各路围攻南京。其兵力部署是:桂军为第1方面军,李宗仁为总指挥,由广西出兵湖南,北进武汉;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冯玉祥为总指挥,由郑州地区沿陇海路东取徐州,并防守许昌以北地区;晋军为第3方面军,阎锡山为总指挥,由河北沿津浦路南下进攻济南,而后会师冯部,围攻徐州,进兵南京;石友三指挥所部为第4方面军,由新乡东进,主攻济宁、兖州,配合晋军会攻济南;此外,反蒋联军还内定:张学良为第5方面军司令;刘文辉为第6方面军司令;何键为第7方面军司令;樊钟秀为第8方面军司令。此外,还有孙殿英、刘茂恩、万选才、刘春荣、刘桂堂等

各地军阀参战,总兵力约 70 万人,以西北军和晋军为主力迅速展开于陇海、平汉、津浦各线。

4 月 5 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与此同时,蒋介石方面也集中了 30 余万人的兵力,编成 4 个军团,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讨伐阎、冯反蒋联军。其兵力部署是:令韩复榘为第 1 军团总司令,指挥所部防守山东禹成地区,阻止晋军南下;刘峙为第 2 军团总司令,率蒋军主力,集结于徐州、砀山、宿县等地展开,准备在陇海路沿线对阎、冯军主力作战;何成浚为第 3 军团总司令,指挥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军,布防于驻马店至漯河地区;陈调元指挥预备军团集结于济宁、菏泽一带地区。在兵力数量对比上,蒋介石方面虽处于劣势,但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且又为蒋介石一手控驭,因此,蒋介石针对反蒋联军兵力分散,战线过长,难以协调统一的弱点,采取了南截桂军入湘,北堵晋军入鲁,主力固守徐州、南京,分化瓦解阎冯联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4 月 23 日,阎、冯联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以石友三部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前进;以万选才部为中路,由归德(今商丘)向砀山前进;以孙殿英部为右路,由亳州向蒙城前进,揭开中原大战的序幕。

5 月 1 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令各部队于 10 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1 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命令,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中原大战爆发。

战争初期,在陇海线上,由于孙殿英、万选才部均系河南

土匪收编的部队,地形熟悉,又加上阎锡山委任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故孙、万、石三部初战卖命,进展甚为迅速,蒋军伤亡颇众。蒋介石和其参谋长杨杰亲自督战,指挥其主力第2军团奋力作战,并派飞机轮番轰炸,始将孙殿英、万选才部赶回亳州和归德(今商丘)。孙、万两部据守亳州、归德,蒋军久攻不下。蒋介石通过豫籍军人政客张钫,以大量金钱收买阎、冯联军中的豫籍将领刘茂恩。刘因未能获任河南省主席而对阎、冯不满,被蒋收买后便在宁陵诱捕其中路总指挥万选才献给蒋介石,宁陵不攻自破。蒋军又趁势攻下归德等地。在陇海路正面作战的晋军孙楚、杨效欧等部,由于刘恩茂的出卖也受到很大损失。蒋军则乘胜沿陇海西进,连续攻占了柳河、民权,进逼兰封、杞县。由于中路被蒋军不攻自破,孙殿英部被困守亳州,石友三部也在鲁西被阻不能前进。为了挽救陇海线上的战局,阎锡山急忙从华北调去杨耀芳、张会诏两个军前去增援。晋军深沟高垒,配备200多门大炮,日夜向蒋军轰击,使蒋军攻势受阻。蒋介石为击败晋军,调陈诚率其第1师向晋军阵地右翼扩张。晋军徐永昌部向冯军鹿钟麟部求援,鹿派其部下孙良诚率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等军向陈诚部发起攻击。梁、吉等部利用黑夜冲入敌阵,以大刀砍杀,使陈诚部伤亡重大。刘峙急忙派顾祝同军支援,梁、吉部佯退,诱使顾军深入,纷纷掉入冯军的陷阱内。梁、吉部趁机回师反击,杀得陈、顾两军大败而归。左翼的石友三、刘春荣等军也乘机反攻,陈调元军节节败退,至6月上旬,被赶回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蒋介石见陇海线战事吃紧,又从上海调来熊式辉部投入作战,始稳住阵地。

在平汉线方面,战斗也非常激烈。冯军左翼为樊钟秀、任应岐、刘桂棠等军,防守小商桥、逍遥镇至西华一线;阮玄武、张维玺、田金凯 3 个军防守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刘汝明军在浙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军。以上各军称为南路军,由张维玺统一指挥。5 月 16 日,蒋介石命令何成浚发起总攻,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军于临颖。6 月 4 日,樊在许昌城督战,被蒋军飞机炸死。冯玉祥派邓宝珊接任樊钟秀第 8 方面军总司令,并派其西北军劲旅孙连仲率其第 5 路军向许昌增援,进攻漯河。阎锡山也派赵承绶骑兵集团突袭周口,派刘桂棠部在西华与岳维峻的陕军作战。为了配合桂军进攻武汉,冯玉祥于 6 月 10 日下令平汉线各军全面进攻,激战 2 昼夜,何成浚军向漯河南溃败。南路军总指挥张维玺和邓宝珊等人主张乘胜追击将蒋军逐出武胜关。冯玉祥却因此时桂军已退出长沙,认为不宜再分散兵力,未予采纳,遂在漯河至北屋渡一线建立阵地与蒋军对峙,将孙连仲等主力部队移往陇海线,以致错过了消灭南路蒋军的有利时机。在此期间,桂军被粤军困扰在桂北一带,李宗仁见短期逐出粤军已不可能,遂决定放弃广西,于 5 月中旬北上。李宗仁、黄绍竑、张发奎分兵 3 路入湘。与唐生智、何键等部队合为一股,一路进军,所向披靡。6 月 3 日,桂军进占长沙。何应钦派来阻击桂军的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军也被战败逃回湖北。6 月 8 日,张发奎、白崇禧指挥的两路军攻克岳州,李宗仁率桂军总部人员随即进驻岳州,指挥部继续北进。黄绍竑指挥第 3 路军也正在向衡阳跟进,准备攻占武汉后与冯玉祥沿平汉路南下的部队会师。正在这时,桂军的后方交通枢纽衡阳,突然为陈铭枢指挥的蒋光鼎、蔡廷锴两

师攻占。李宗仁见后路被切断,遂放弃继续北进的计划,回师围攻衡阳。此时,桂系联军数万人跋涉数千里,疲乏已极,辎重尽失,给养中断,又无重兵器,围兵在衡阳坚城之下,攻取无术。6月底,粤军主力跟进至湘南。两军决战于湖南,桂军又被战败,遂向广西撤退。沿途又遭到广东陈济棠、云南龙云等部的围攻。与此同时,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组织的红军又先后攻陷百色等左右江流域城镇。在此形势下,李、白、黄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北上参与中原大战了。

在津浦线方面,由第2路总指挥傅作义指挥的本军和李生达、冯鹏翥两军展开了对韩复榘部的作战。5月,傅指挥所部发起进攻,韩部稍作抵抗便撤至黄河以南,凭黄河天险固守。6月26日,晋军以炮兵掩护渡河,韩部遂又撤往胶济线。晋军占领济南后,又向南推进至泰安、大汶口一带。正当傅作义指挥所部南进时,阎锡山接到密报说傅与张学良有来往,遂派第4路总指挥张荫吾率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到济南组织2、4路军联合指挥部,以分傅的指挥权。张到济南后,和傅意见不和,屡次发生摩擦。阎见此状况后,乃令张荫吾沿胶济路发展,将韩部赶到胶东;傅作义则率军沿津浦路南下,与马鸿逵、夏斗寅两军激战于曲阜。由于兵力不足,曲阜一直未能攻下,形成胶着状态。

蒋军由于在陇海、平汉两线受到冯军打击,兵力损伤较多,士气大为低落,蒋介石对能否战胜阎、冯已缺乏信心。为此,在6月初,开始策划和平运动,委托于右任、李石曾出面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调解蒋、冯、阎之间的战争纠纷。李石曾为此去沈阳请张学良出面调

解,张于6月12日致电阎、冯,表示愿做调解人。21日和22日,又先后致电阎、冯,主张以郑州、开封划作缓冲区,双方撤回前线部队,立即停战议和。阎、冯因对形势估计错误,一心想要倒蒋,因而拒绝了于、李、张三人的调停意见。

蒋介石见谋和的意图未能实现,唯一的办法只有强令部队和阎、冯等决一死战。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却出现了蒋军十分有利的发展态势。

中原大战爆发后不久,由于刘恩茂的叛变,孙殿英部即被蒋军围困于亳州城。阎、冯以孙殿英在北伐战争中曾有过坚守卫辉3个多月的守城经验,为了牵制蒋军的主力,决定将计就计,命令孙率部死守亳州。从5月中旬开始,蒋介石派王钧指挥滇、黔、湘等杂牌军8万多人将亳州城团团围住。孙部虽然达到了牵制蒋军的作用,但近4万人困守孤城2个多月,城内存粮告罄、弹药不足,每日战事不断,不仅居民死伤累累,士兵饿毙者也日日发生。蒋介石为减轻侧背威胁,多次派与孙殿英有历史交往关系的旧军阀张钫、靳云鹗、王翰鸣等人以金钱和委任状诱降,但均被孙拒绝。孙困守孤城,不断向冯军求援,但冯军远在300多公里以外,且又被蒋军层层阻隔,一时无法驰援。困至6月中旬,蒋军再次发动攻城之战,孙求援愈急,冯玉祥见如不迅予解围,孙有可能投蒋就范,便派孙连仲、孙良诚率十几个师急速增援。为了隐蔽行动,部队昼伏夜行,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跋涉,孙连仲、孙良诚率部于6月30日拂晓突然抵达亳州城下,一举击溃围攻亳州的黔军杨胜治师,将孙殿英的部队接应突围。三孙的队伍会师后,冯玉祥下令其合力攻占宿县、蚌埠,但因部队长途跋涉过于疲劳,而阎锡山又没能及

时接济给养,以致未能实行。亳州的放弃,使蒋介石解除了后顾之忧,腾出了近 10 万部队转战于陇海和津浦线。从此以后,阎、冯联军即由主动转入被动的局面。

6 月底,张发奎、李宗仁的联军在衡阳战败后退守广西,蒋介石即将蒋光鼎的第 19 路军投入津浦线战场,另调湘军李韞珩师由青岛登陆,合力增援陈诚、夏斗寅和韩复榘,从津浦和胶济两线转入反攻。刘峙则指挥津浦路部队向北反扑,傅作义孤军难支,率部败退。蒋军于 8 月 6 日夺取泰安,15 日进入济南与胶济线的韩复榘部相接应。此时,晋军在鲁的部队退回黄河以北。

蒋军在津浦、胶济两线反攻得手后,阎锡山派员到郑州给冯玉祥送去大批银元和面粉,要求冯在陇海线展开攻势,以解救津浦线的危局。冯玉祥于 8 月上旬以徐州为目标,兵分 7 路发动进攻:左翼由孙良诚指挥梁冠英、吉鸿昌两个军出睢县向宁陵进攻;中路由孙连仲指挥其第 5 路军由太康进攻归德;右翼由孙殿英率其第 3 路军出柘城攻马牧集;另有防守铁路正面的徐永昌指挥的晋军 4 个军,铁路以北的刘春荣部和鲁西南的石友三部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令郑大章的骑兵集团深入蒋军后翼;宋哲元部为总预备队。

8 月 6 日,冯玉祥指挥陇海线各部队开始总攻击。孙连仲部首先将防守河堤岭的蒋军击溃;孙殿英部也攻下马牧集。但宁陵因有蒋军重兵把守,又加以连日大雨,黄河泛滥,作战不便,致使孙良诚部久攻不下。冯玉祥又将宋哲元部加入左翼,协助孙良诚部作战。但因运输困难,给养不能得到及时补充,攻打宁陵作战遂成胶着状态。两军对峙于归德以西、宁陵以北

的野鸡岗、内黄集一线。在此紧急形势下,蒋介石拟由陇海路正面及归德以南地区总退却,正在这时,蒋介石从无线电通讯中截获石友三叛阎投张(学良)的密电。于是蒋介石打消总退却的原定计划,悬赏全线坚守。双方激战了7天7夜后,因连日倾盆大雨,陇海线的争夺战始告暂停。

冯玉祥在陇海线发动攻势未果后,阎、冯联军的军事形势急剧逆转。蒋介石除了抽调津浦线部队南下增援陇海线外,又抽调部队加强平汉线的何成浚方面军的作战。正当这场反蒋战争危急时刻,以汪精卫、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官僚政客却在北平召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北平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为此,阎锡山放下战事准备在9月9日到北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9月6日开始全面转入反攻,首先以重兵对防守平汉线漯河至北屋渡一线的张维玺南路军进行猛攻,同时命令徐源泉、杨虎城等部向巩县、洛阳进攻,以威胁冯军的后路。张维玺在两翼遭受威胁的情况下,遂率南路军7万余人退据新郑。在东线方面,蒋军也分成若干纵队,由兰考、太康、杞县向淮阳、周口进攻。在蒋介石的全面反攻下,冯玉祥为了保存力量,集中兵力,一面派宋哲元率部防守郑州至潼关间的陇海线铁路交通线,一面命令南线和东线的部队向郑州附近集结,拟联合徐永昌指挥的晋军组织防线,顶住蒋军的进攻,以便将自己的军队撤往陕甘,晋军撤回山西。不料防守洧川、尉氏一线阵地的梁冠英、吉鸿昌部,经蒋介石派张钫以河南同乡关系进行策反投降了蒋介石。梁、吉二部放弃阵地,让开大路,使得顾祝同率领大军直插郑州以南,将

张维玺指挥的南路军及接应张军的冯治安军和邓宝珊的第8方面军共8万多人在新郑一带被全部包围缴械。随后,防守陇海线西端宋哲元第4路军的魏凤楼军在巩县被缴械;葛云龙师在洛阳向徐源泉投降。同时,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和平息争”的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派于学忠、王树常率两个军入关。在此败局危急的情况下,冯玉祥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举行军事会议,主张将阎、冯军队撤往黄河以北,据黄河天险与蒋军继续作战。但是阎锡山怕冯玉祥乘机侵占其山西的老巢,不予采纳,反而准备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及其他职务,下野出洋。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罢兵息战。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至此,阎、冯离开军界,晋军和西北军分别为张学良、蒋介石所改编。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蒋介石通过这场空前的军阀混战击溃了阎、冯、李等实力派的军阀,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再能同他较量的军事力量了。在中国实现暂时的、形式上的统一。这不仅使他的独裁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张、蒋讨石之战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初,石友三借宁粤战争爆发之际,率部背叛张学良,反对蒋介石,张、蒋联合在河北地区同石友三进行的一场大战。

石友三原系冯玉祥的旧部,是一个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小人。早年给冯当过马弁,为人机警强悍,受到冯的赏识,历由

班排长不断升至师长。石虽为冯一手所提拔,却在危急关头屡次弃冯他投。1925年秋,冯的国民军在南口大战中被打败后,石友三和韩复榘投靠了阎锡山。北伐战争中,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参加北伐后,石又回到西北军。1929年5月,冯与蒋介石决裂,石与韩复榘又背冯投蒋,并由蒋空口许诺为安徽省主席。同年蒋桂战争爆发,蒋调石部的第13路军去粤进攻李宗仁部,石因得不到蒋的信任和许诺,在率部南进浦口时又与唐生智联合反蒋,炮轰南京府。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前,石友三驻军新乡,阎锡山任石为第4方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但山东为晋军控制,石友三无权任免官吏、征收税赋,成为徒有其名的省主席,因此心怀不满。在中原大战中趁晋军败走济南时,石友三利用东北同乡关系又投靠了张学良,径自放弃鲁西阵地,撤往黄河北岸,致使冯、阎联军侧翼暴露,给蒋军进攻造成有利态势,导致了郑州外围阵地迅速崩溃,加速了冯、阎反蒋之战的失败。石友三在中原大战中,因再次倒戈投靠他人,不仅保存了原有实力,而且在撤到黄河北岸后,沿途又收缴了晋军败兵的残部及武器装备,实力更加强大,成为拥有5万多人的一支军阀力量。张学良为了拉住石友三这支武装力量,请蒋介石又重新恢复了石的第13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部驻在以顺德为中心的冀南20余县范围内整训部队。

石友三虽然投靠了张学良,但是因为石反复无常的为人,张对石也不得不加倍提防。石也因为自己和东北军素无渊源,而感到时时疑惧。石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利,就和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挂了钩。1931年4月,国民党因蒋介石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而造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粤方为准备北伐蒋介石

石,扩大军事力量,派员到各地联络反蒋势力。石友三经粤方要员李汉魂联络,趁此机会又开始反对张、蒋,投靠粤方。6月初,石趁张学良病重之机,活埋了张派往石部的秘书长张云责,决心先发动对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当时,石友三反张不仅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支持,还有山东韩复榘、豫南吉鸿昌、晋南孙殿英、大名刘桂堂等军阀势力以及在天津做寓公的阎锡山也与石建立了盟约,决定于石发动对东北军作战后,晋军即出兵娘子关,北上夺取平津;韩、吉等人在山东、河南一带阻蒋北援;日军则在关外同时动手,夺取东北。但是,当晋军的徐永昌、杨爱源正拟出兵时,宋哲元部离晋另就,与孔祥熙谈妥,由孔每月拨给宋部230万元,并讲定如晋军出兵攻张学良,宋部即进兵太原。徐、杨二人为保住山西地盘,未敢出兵东进。此时,与石友三约定共同起兵举事的韩复榘、吉鸿昌等人也因料事不妙未敢动兵。因此,石友三发动的与张学良东北军之战,一开始就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形势。

针对石友三的背叛活动,张学良抽调东北军5个旅入关,并编组了于学忠、王树常两个集团军部署在平汉、津浦两线准备对石友三作战。当时,张学良根据石友三的兵力部署判断石友三发难后必取北平,因此,配置5万多人于保定以南的方顺桥一带,并拟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7月18日,石友三在顺德就任粤方政府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石在粤方的支持下感到有恃无恐。19日,发表了反对张、蒋的通电,除留了1个旅防守顺德外,以主力孙光前的第1师和程希贤的教导师为前锋;亲率沈克的第3师,朱启明的第4师居中;以米文和的第2师殿后,共5个师另2个

旅约6万余人,沿平汉铁路向北进攻,企图攻占平、津。东北军白凤翔骑兵旅先与石部先头部队接触后,稍事抵抗,便且战且退,将石部诱至方顺桥一带与正面步兵守军交战。石军先头部队向方顺桥东北阵地猛攻三昼夜,未能突破前沿。先头部队进攻受挫后,石又令中路沈克的第3师出完县迂回东北军后方,沈却借此率部脱离战场,在完县投降了东北军。

7月23日,张学良通电讨石,东北军组成“北路集团军”,以于学忠为第1军团总指挥,在望都、保定一带迎击石军;以王树常为第2军团总指挥,在河间、沧州之线待敌。同时,南京政府也组成“南路集团军”,以刘峙为总司令官,下辖刘镇华的第1军团、顾祝同的第2军团、王钧的第3军团北上。24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石友三。随后南、北两路集团军,夹击石部。刘峙率南路3个军团北上后,一举解决了留守顺德的后方部队。与此同时,北路王树常率领的第2军团也从津浦路压了过来。晋军商震部在张学良的劝说下,改变了中立态度,脱离阎锡山的束缚,以北路集团军第3军团总指挥的名义,率其部队3个旅出兵讨伐石友三,于28日夺取了石家庄。至此,石友三部已陷入东北军、蒋军、晋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是日,石率其主力在望都以东地区向东北军发起反攻,企图突出重围,沿津浦路南下与山东韩复榘靠拢,但激战三昼夜,未能突破东北军的防线。31日拂晓,东北军发起全线总攻,石部由于伤亡惨重,已力不支敌,向安国县方向溃逃,晋军、蒋军又从西、南两个方向进行包围、追击。石见败局已定,遂于31日晚拟强渡滹沱河,逃到山东托庇于韩复榘。但由于大雨过后,滹沱河水突然暴涨,使石部拖延了渡河的时间,当石率部队到达南岸时,东

北军王树常的第2军团主力已布好阵地。同时,蒋军第1军团的胡宗南师也赶到了深泽以南,当即将石友三部包围。石率其残部继续顽抗,战至8月3日,石友三率其残部2万多人突出重围,逃向山东。其前敌总指挥、第1师师长孙光前,第2师师长米文和被俘。8月5日,蒋军占领顺德石友三的老巢,又收编其残部3000多人。石逃至山东后,在韩复榘的庇护下,隐匿在济南,后逃至天津日本租界,充当了可耻的汉奸。南京政府令韩收编石的残部,至此,石友三部土崩瓦解。张、蒋讨伐石友三之战遂告结束。

宁粤战争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把胡非法扣押起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各派反蒋势力再次联合起来,聚集在广州,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盟主的反蒋联盟。陈济棠自感反蒋力量不足,便联合李宗仁部和张发奎部共同反蒋,形成了以陈、李、张三大军事力量为主的军事支柱。同时,蛰居香港的汪派政客,也在广州开府,另立中央,寄希望于陈、李、张起兵讨伐蒋介石。

5月28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根据非常会议的选任,由15人组成国民委员会,以汪精卫首任国民政府主席,陈济棠任军事部部长,李宗仁任参军处参军。广州政府成立后,为抵御蒋介石的武力威胁,首要的问题是整顿武装,加强军事力量,准备与蒋介石军队作战。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非常会议召开第2次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

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 3 人为常委。同时整编部队，将陈济棠的第 8 路军改称为第 1 集团军，陈为总司令，下辖第 1、第 2、第 3 军，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敬扬分任军长。在此基础上，陈又借机扩充军队，增编 1 个教导师、2 个独立师、5 个独立旅、8 个独立团及炮兵团、战车营等部队，使其军事势力大为增强。将李宗仁的桂系军队改称为第 2 集团军，以李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下辖 3 个军，以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分任军长。桂系也同样借机扩充实力，从国外购置大量军械装备部队。同时，广州国民政府还扩充了海、空军，并以陈策为海军总指挥，以张惠长为空军总指挥。为联络其他武装力量参加反蒋作战，派员去北方石友三部和江西第 19 路军处做联合反蒋工作。许崇智、唐生智也提出要收编旧部，率兵反蒋。因此，广州国民政府非常会议召开的第 2 次会议上，颇有一番积极反蒋的热闹景象。

但是，参加非常会议的各派反蒋力量，心怀异志，都只顾本派别和个人的私利，想尽力捞取更大的权力，因此，难以形成团结的力量，会议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陈济棠以自己的实力强大，在会议中大搞拉帮结伙，恐怕别人夺去他盟主地位；汪精卫以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大，不甘屈就于陈济棠之下；胡汉民派则想另立国民中央，担心汪派的人马操纵非常会议。因此，非常会议召开后不久，就出现了分裂，汪精卫因不满陈济棠骄横跋扈，到处安插亲信，于 8 月气走香港。汪走后，陈又决定向蒋介石求和，但李宗仁认为不在军事上取得进展，蒋介石是不会同意和平解决的，因此，积极主张出兵。陈同意桂军出兵，攻打湖南衡阳，粤军在粤、赣地区作战。但是，从广西

到衡阳,蒋军沿途修筑了很多工事,衡阳更是何键在湖南的重要军事据点,不打硬仗就无法轻取衡阳。白崇禧看出陈济棠一箭双雕的用意:既把桂军推出两广地区,又能借蒋的手削弱桂系的实力,因此,借故劳师远征,向陈索要 200 万元军费,陈不肯出资。因此,桂军行动便告吹。

陈济棠见桂系不肯出兵,便通过吴铁城、张继等人向蒋介石提出求和条件,要求南京承认他们既有的地位,和平解决宁、粤争端。但蒋又不肯付出代价与陈调和。陈见求和碰壁又回过头来与桂系合作。同时,陈又召开粤军师长以上会议,强调粤、桂团结的重要性,表示要消除分歧,统一反蒋行动。并派粤军一部赴湘、赣、闽边界地区,以示积极行动。又自动让出潮梅地区给桂军驻扎,请李抽调桂军一部到粤省协助防守。在这种情况下,陈又派人到香港请汪回广州维持广东局面。于是,汪于 8 月 29 日又从香港返回广州。

9 月 2 日,陈在汪精卫等人的督促下同意开始出兵北上。其作战方针是:对江西采取守势,对湖南采取攻势。进攻湖南的部队以桂军为主力,粤军李敬扬的第 3 军配合,分三路先取衡阳。桂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于 9 月 5 日从桂林到兴安向桂军布置北进计划。11 日,广州政府委任陈济棠为粤、桂联军统帅,统一指挥粤、桂联军北进。粤、桂联军集中 5 万余人逼近衡阳,唐生智也随军前往。何键惧怕唐生智分化他的部队,急忙在湘军中进行统一意志的行动,并把原唐生智的部下调开。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何键与桂系、唐生智重新联合起来,急忙派刘文岛、顾祝同、周佛海等入湘,帮助主持军政事务。9 月 6 日,刘、顾、周 3 人到长沙后,即与何键召开军事会议,根据

蒋介石的旨意,决定由顾祝同部固守衡阳,必要时从江西抽调3个师入湘助战;何键的湘军集中于长沙附近,名义上是保卫长沙,实际上是将桂、粤联军与何键的湘军分开,防止他们串通起来,又把粤方派到何键部的代表扣押起来,在广东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予以释放。9月13日,蒋介石又令何应钦率蒋军一部入湘增援。何键已查觉蒋对己的不信任,为表示对蒋的忠诚,特电南昌行营,欢迎何应钦率部队入湘。

9月17日,桂、粤联军看到湖南蒋军的形势起了变化,遂改变了作战计划,兵分两路,粤军李敬扬第3军向东,防御江西蒋军入湘,桂军继续进攻衡阳。由于衡阳顾祝同部严兵固守,桂军集结城外没有发动强烈攻势。因而在衡阳以南地区形成对峙状态。

此时,蒋介石最担心的还不是广东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他连续发动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都被红军打破,红军的声威大震,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革命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并存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对付红军的反共战争,对宁、粤之间的争斗,则力求“和平统一”,因此,蒋介石采取了和平对粤,全力剿共的方针,并呼吁粤方用心剿共,双方的矛盾不必诉诸武力,可以政治解决。至此以后,宁粤之争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斗争,宁粤战争也由此而中止。

宁粤战争中止后,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亲自到南昌任剿共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疯狂反共的政

策,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灾难,特别是蒋介石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存亡关头,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

第二节 中间派别的产生

一、第三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一部分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士重新集合起来,他们一方面不甘心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不满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又从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得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错误结论,企图在反革命的国民党和革命的共产党之间另立一个新党,走另外一条“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在上海正式成立。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兼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主编,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分任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大力开展组织工作,在上海、北平、香港分别设立中央直辖区、北方区和南方区干部会,以指导各所属省、市工作,并在全中国11个省区和3个市区建立了地方组织。

“第三党”以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为主要目标，主张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平民政权”，使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所谓的“平民群众”包括“各种工厂的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他们设想，先由这些平民群众组织各种职业团体(如工会、农会等)或准职业团体(如学生会、妇女会、士兵会等)，再由这些团体联合起来，选出代表，“自动”召开国民会议，组织中央和地方的平民政权，“以推翻军阀官僚的统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权”。邓演达还曾提出过建立“平民革命军”的问题，以图造成人民的武力来“保持”政权。

“第三党”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主张原则上实行土地国有，目前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过渡政策。具体步骤是：由国民会议制定土地法，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及最低额，由国家发行 50 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将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包括土地没收为国有；所有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由国家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所得土地不准私自买卖。“第三党”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它不赞成采用革命的手段，反对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农民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这又不能不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第三党”积极开展反蒋斗争，在政治上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同时，还大力策动军事反蒋活动。邓演达利用他曾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有利条

件,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分化、瓦解和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当时,在陈诚的第十八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以及杨虎城等部队中都有“第三党”的活动。1931年夏,“第三党”成立了由邓演达直接领导,有黄琪翔、季方、邓宝珊等参加的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和华北同时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骨干分子,准备分赴各地指导起义工作。

“第三党”的反蒋斗争引起了蒋介石的仇恨和恐慌。蒋介石派特务侦查、跟踪,还派其亲信王柏龄同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当局共同策划,伺机逮捕邓演达。邓演达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8月,在为训练班讲课时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和帝国主义巡捕逮捕。“第三党”的武装起义计划随之取消。11月,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了邓演达。宋庆龄为此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这一罪行。

邓演达牺牲后,“第三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但其成员继续坚持抗日反蒋斗争。

二、改组派

改组派即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至1930年间国民党内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是国民党内的在野反对派。改组派的上层,除个别反蒋民主人士外,大多是投机政客。它的下层主要是一批处在彷徨苦闷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职员。

1928年5月,陈公博在《贡献》上发表《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及《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正式打出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号。随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等人又主办了《革命评论》和《前进》等刊物,抨击南京政府,主张“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促进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主张复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其思想和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月底,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奉汪精卫为领袖,“以原汪派的二届中央委员组成领导机构”。改组派曾一度在国内建立了15个支部,在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国建立了海外组织,会员最盛时达万人以上。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鼓吹改组国民党,号召改治反蒋,改组派认为,自北伐胜利以后,“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致使“本党的中央不能健全,本党的主义不能实现,本党的政策不能确定”。“今日南京之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对帝国主义是投降,对封建主义是屈服,再也看不见三民主义的实行”。特别是蒋介石以独裁代替民主,委派代替选举。因此他们断定,只有推翻蒋介石统治,改组国民党才能“挽救没落的中国国民党”,实现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达其“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之理想。

第二,反对其他政党和派别,尤其仇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改组派篡改歪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攻击共产党是“代表流氓屠杀民众”,扬言对中国共产党要“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第三国际则要“暴露其指使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要“指责其东方政策的错误”。对第三党则“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批评其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诱善于觉悟分子”;对西山会议派、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等等,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第三,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建立“农工小市民联合战线”。改组派企图以“农工小市民”为群众,以“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相号召”,争取农工支持,以达到向蒋介石夺权,或者分权的目的。

改组派一打出倒蒋旗帜,便遭到蒋介石的坚决镇压。从1928年7月起,南京国民政府便下令查禁取缔了改组派的《革命评论》、《灯塔》、《前进》等报刊。次年3月,国民党三大又通过了对付改组派的“整饬党纪通令”,给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开除顾孟余党籍3年,永远开除陈公博等的党籍。1930年2月18日蒋又派特务刺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沉重打击了改组派。1930年8月,改组派联合冯、阎、桂、张掀起反蒋的中原大战,结果因石友三倒戈,张学良的通电拥蒋而失败,汪精卫召集的北平扩大会议也匆匆收场。1931年1月,汪精卫在香港通电解散改组派。

三、人权派

人权派因创办《新月》杂志宣传其主张,故又称“新月派”,是20年代末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它代表自由资产阶级

的利益、愿望和意志,活跃于1929至1931年。人权派是由一批留美归国的学者名流为骨干组成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罗隆基等人。

1928年10月,国民党公布了《训政纲领》,在训政名义下确立起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因此引起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胡适、罗隆基等人的反对。因此,他们通过结社,办刊物和讲学等方式集结势力,指责国民党的弊政,“希望国民党的反省”。他们相继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论人权》、《我们走那条路》等系列文章,宣传自己的人权思想。1930年,人权思潮达到了顶峰,胡适等人把主要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讨论有关人权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汇集成册,冠以《人权论集》出版,鲜明地提出了人权派的政治主张。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反对思想专制,主张言论绝对自由。胡适在《人权论集·小序》里面公开指出“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言外之意,就是说蒋介石也是可以批评的。罗隆基在《告压迫自由者》与《论人权》中所提出人权包括言论、思想的绝对自由。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针对蒋介石的思想专制,明确指出人类文明不断进化,就因为人民思想解放,不断铲除旧传统,有人独立思考,提出疑义,使思想不断地发展。应该允许公开辩论、讨论,他认为用灌输式和机械式的宣传,只能造成群盲;搞思想统一,也只会出现三种情况:有思想的人变成革命者;趋炎附势者变成投机家;无思想者成为盲从,这样的统治是很不稳定的。人权派以此警告蒋介石独裁政权,只

有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充分的自由民主,才能更好更稳固地统治人民。

第二,反对党治、人治和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和人权。他们认为国家要保障人权只有依靠法律。“如果党不受约法制约,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的权利”,那么,“今日党治,实为‘军人治党’”。他们既反对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党治,更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个人独裁。罗隆基的《论人权》,从六个方面阐述了他们对人权的看法和主张,提出人权三条件,即维持生命、发展个性和培养人格,以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指出国家的功用是保障人权,法律也是为人权而产生,为保障人权而服务的。

第三,“组织贤能政府,实行专家政治”,人权派认为,国民党的“文官制度”,是中国吏治的“死路”与“自杀”。因为国民党当局“用人尽党人先用,裁人尽非党人先裁”,一些贪赃妄法之徒,封建文人墨客,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大爷袍哥,均加入了国民党,而成为“党人”,并居要职。由这样“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要把治理国家这件大事办好,“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要刷新政治,必须首先实行“专家政治”。他们主张“只问行政,不管主义”,认为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政府的关键是有人民委托的治权和有专家知识的行政。“组织贤能政府,实行专家政治”是人权派的最高理想,这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政的欲望。

总之,人权派的思想核心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们虽然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但不主张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新

军阀的统治,只要求国民党政权允许他们自由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容纳他们这些专家到政府中去做官,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得到一些改良。但就是这样的主张,也为蒋介石所不容。1930年11月,罗隆基一度被捕。胡适也被国民党教育部给以“警告”处分,被迫辞去了上海公学校长的职务。

四、乡村建设派

乡村建设派,初期也称村治派,由持有乡村建设主张、理论的人和团体构成。“乡村建设”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梁漱溟的村治运动、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阎锡山的村政建设等汇合而成,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国性的一种思潮和运动。

乡村建设始于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广识字运动。1930年,他以平教会的名义办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愚、穷、弱、私”,根源在于“教育不能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主张用教育来“改革社会”,“复兴农村”。他主张搞四种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试图通过这种“平民教育”,使农民“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使民族得以复兴。平民教育派在初期主要是依靠外国特别是美国教会势力的扶植。

和“平民教育”理论声气相通的是梁漱溟的“乡农教育”理论。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

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所以“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搞“乡村建设”，即建立以“乡农教育”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依靠“乡村自治”来建设“乡村文明”。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在邹平县开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接着在菏泽等地开设乡村建设实验区，研究和推行“乡农教育”。

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是在黄炎培倡导下于1927年5月正式成立的。它认为中国社会只存在“有职业”与“无职业”的区别，试图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并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办法”。职教社的这些主张和活动顺应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很快波及全国。1929年起，职教社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改进方面，提出“富教合一”的主张，先后在江苏一些地方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组织农民垦荒造田、修筑水坝、种桑养蚕，推广新农具、新品种，开办民众学校、动员农民戒烟戒赌、讲究卫生等，使改进实验区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职教社农村改进事业一开始就受到封建地主势力的阻挠、破坏，加之农村改进事业耗资巨大，1935年被迫自行中止。

尽管乡建派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其活动在当时也产生过一定影响，给当地农民带来一些好处。但无论是“平民教育派”，还是“乡村建设派”，他们都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否认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

地革命,试图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复兴农村,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这种“和平”、“改良”的思潮麻痹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

第四章 共产党领导的 工农武装割据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 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一、革命低潮中的崛起

南昌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工农大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的“分共”活动日趋加紧。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机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此期间,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鲍罗廷提议中共“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此时,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仍与中共保持统

一战线关系,企图凭借中共力量,借武汉国民党“东征讨蒋”之机,摆脱武汉国民政府控制,渐次经南昌移师回粤,排挤桂系,攫取广东。遂令所部由鄂东南进至赣东北的九江、德安地区,坐视时局发展,待机行动。

张发奎第2方面军战斗序列为第4军、第11军、第20军,合约3万人。其中第4、第11军是战斗力较强的两支部队。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多在第2方面军。计有共产党员叶挺任副军长兼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3个团,由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由共产党员王尔琢、孙一中控制的第25师第74、第75团,由共产党员范荃任团长的第11军第10师第30团。第20军军长贺龙正炽热地追求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无产阶级革命。

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屠杀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变,决心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之后,又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集合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即在广东成立新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重建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再次举行北伐。为执行“依张回粤”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指派李立三、邓中夏赴九江,会同谭平山、叶挺,共同筹划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并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政治与军事等方面做好迎接回师广东的工作。

汪精卫集团“分共”以后,竭力拉拢张发奎“清党”反共。张

发奎虽然还与中共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他“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有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于7月19日抵达九江,又收到中共中央发给张发奎部中共负责人的指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这时九江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发生急剧变化: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明显右倾,不仅出席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而且决意在第二方面军内“清党”,还电令叶挺、贺龙所部迅速集中德安,图谋解除叶、贺的兵权;第4军、第11军、第20军又正面临着被驻南昌、临川、樟树的朱培德第5方面军及由萍乡向南昌急进的程潜第6军危害的危险。面对严峻的形势,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和聂荣臻等于7月20日在九江召开会议(史称“谈话会”)。会议认为,由于张发奎政治态度日趋右倾,“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叶挺部“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九江同志的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等人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会议决定。7月25日(一说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会议根据加伦(广东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

问,大革命失败后,曾参与中共中央军事决策活动,后随贺龙第20军参加南昌起义)的提议,决定南昌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为加强对起义的组织领导使起义获得成功,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构,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事实上谭平山自始至终参与了前委的活动)。会议还决定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亦称谓第2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大队,平(江)、浏(阳)农民义勇队等中共领导和掌握的武装力量,迅速由武汉开往南昌参加起义;约请在武汉、九江的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迅速到南昌准备参加起义后的革命政权;迅速向转入地下斗争的中共负责干部通报南昌起义决定等。

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与谭平山会晤,表示对起义热烈的响应。接着,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在九江举行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28日前,叶、贺两军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央请求批准。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秘密抵达九江,向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邓中夏及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关于南昌起义和土地革命为口号的决定。周恩来在离九江潜往南昌前,指定聂荣臻到马回岭,与周士第、王尔琢、孙一中一起,将第4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活动。7月24日,汪精卫、孙科等人到达庐山,召集了

有第2、第5两个方面军高级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军队中的“清党”,协谋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此情况,星夜下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贺龙、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第20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会后,叶挺、贺龙置张发奎电令于不顾,毅然率部开进南昌,起义军完成了集结。到7月底,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泽覃、高语罕、廖乾吾、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中共干部相继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广东北江农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和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部分学员也相继赶到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与先期潜回的朱德会合。当日,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委对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因准备工作不及时,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在其他起义领导人赶到南昌之前,由周恩来、叶挺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筹备革命政权。起义即将举行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的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作为中央代表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的。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周恩来接电后经同前委成员商议,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一切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

南昌,前委即开扩大会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复电为由,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坚决表示起义“还是干”,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叶挺及周逸群则明确指出,“暴动断不可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一致主张起义如期举行。前委扩大会议激烈争论数小时,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问题。31日晨,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因叶、贺未上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陪同汪精卫、孙科到南昌。此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起义。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根据前委决定,起义部队加紧了起义前的直接准备。叶、贺两军分别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前委的起义决定与命令;各团、营受领了任务,并处罚了反动军官;部(分)队制定了战斗方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党、团和工人活动分子会议。是日晚9时许,第20军一个副营长到第5方面军警卫团告密,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前委决定提前两小时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指挥的第20军,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以及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战方案,突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经过激烈战斗,到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守军全部肃清。起义军共歼守军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子弹70多万发,山炮、平射炮和迫击炮数门。还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群众。

受周恩来之命到马回岭主持第4军第25师起义的聂荣

臻,得知南昌起义已经胜利,即与第73团团长周士第、第74团参谋长王尔琢、第75团第1营营长孙一中等共产党员秘密商定,以“打野外”(即野外训练)为名,分别将所部拉出营房,集结德安,尔后向南昌开进。8月1日下午1时,部队按预定计划开出营房向德安急进。张发奎得悉第25师大部离开马回岭开向德安火车站,即刻带第25师师长李汉魂及卫队营乘火车由九江驰向德安。途中遭到起义部队的阻击。张发奎、李汉魂落荒而逃,卫队营被起义部队缴械。2日(一说3日),聂荣臻、周士第、孙一中率领3000人赶到南昌,与起义军主力汇合。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农民义勇队等武装,在开向南昌途中分别受阻。后转至江西修水、铜鼓,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大队途中于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改编为第4军教导团,由叶剑英兼任团长,后参加了广州起义。

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7名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和江苏、顺直、福建、新疆、湖南、山西、湖北、东北、甘肃、江西、四川、安徽、绥远、浙江、广东、广西、上海、哈尔滨等地及海外华侨支部代表共40余人。叶挺向会议报告了起义经过。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即林伯渠)、贺龙、郭沫若、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晖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等25人为委员,由宋庆龄、贺

龙、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等 7 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农工运动、党务等委员会以及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会议宣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于最短期间，当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以便指导全国革命运动，使其有更正确更迅速的发展。”

革命委员会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文告。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革命委员会决定：吴玉章任秘书长，刘伯承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任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卫处长，姜济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决定南昌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 4 集团军第 2 方面军番号，下辖第 11 军，由第 10、第 24、第 25 师编成；第 20 军，由第 1、第 2、第 3 师编成；第 9 军，由原第 3 军教导团、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编成（实际兵力约 1 个营，缺编拟在南下途中扩充），全军 2.3 万人。任命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理）；郭沫若、章伯钧任方面军政治部正副主任；叶挺兼代第 11 军军长、第 24 师师长，蔡廷锴兼代第 11 军副军长、第 10 师师长；韦杅任第 9 军军长、朱德任副军长。周逸群任第 20 军第 3 师师长（该师在临川正式组建）；聂荣臻任第 11 军党代表，廖乾吾任第 20 军党代表，朱克靖任第 9 军党代表。

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响亮的回答,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开始。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昌各界群众。8月2日,数万南昌群众举行庆祝南昌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多达600余人。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攻取广州。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未经休息、整顿,急促撤离南昌,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征途。部队沿抚河南进,计划经瑞金、寻乌入粤。时值盛夏酷暑,路途遥远,官兵武装行军,加之对共产党和武装起义的认识不足,在给养、医疗严重困难的条件下,“军心大为动摇,逃跑的极多”。从南昌出发不久,蔡廷锴率第10师脱离起义军开走。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1/3以上,子弹丢弃过半。8月8日,起义军抵达临川,休整3天后继续南进。其间陈毅等百余名兼程赶上起义军,肖志戎、李井泉率领临川农军参加起义部队。2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抵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地区。是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已作好截击起义军入粤的部署:调钱大钧部9000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其前锋前出壬田;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企图将起义军堵截于

江西境内。26日,贺龙指挥第20军对钱大钧部前锋1个师发起进攻,迅速击溃其3个团,乘胜进占瑞金,钱部败退会昌。前委获悉,钱大钧部4个师以会昌为中心,依托贡河组织防御;黄绍竑部先头师已进至雩都东南地区。28日至30日,起义军以第11军第24师占领会昌西北的洛口阻击黄绍竑部,集中主力1万余人,猛攻会昌,经激烈战斗,攻占会昌,虽歼粤军6000人,但自损1700人。“经此战役,叶、贺两军共有兵额1.16万人”,而黄绍竑部9000人正在安远、寻邬一线严阵以待。为避免与黄部决战,以保存革命力量,前委决定改变入粤路线,由福建长汀,再沿汀江、漳江进入东江地区。9月5日,第20军由瑞金进抵长汀,第11军由会昌转到瑞金,9日,起义军全部进抵长汀。周恩来在长汀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综合汇报了起义军南下以来的作战行动、目前困难、当前敌情及前委的日后行动计划。这是前委离开南昌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后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9月15日,起义军进抵上杭,19日,进入广东境内的大埔,并攻占了三河坝。但担任后卫的第11军第25师,此时还在长汀至上杭的路上。23日,起义军进占潮安、汕头,第25师进抵三河坝。

汕头,是广东省东部重要的海口城市,也是起义军南下广东计划夺取的要地之一。进占潮(安)、汕(头)后,前委即刻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发布保护民众团体和商、贸界通告,成立市级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工人纠察队,筹措粮饷等等。张太雷受中共中央指派,此时亦赶到了汕头,向前委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左派国民党”旗帜、打出工农革命红旗、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重大决策,并与前委共同

研究了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行动方针。

起义军进占潮、汕前后,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以黄绍竑部经丰顺(今丰良镇)进击潮安;以陈济棠部3个师和潮、梅警备部队共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经汤坑(今丰顺)进击揭阳,寻歼起义军主力。前委和参谋团决定:留第20军第3师、第11军第24师一部共1000人,驻守潮、汕,以主力6500余人于27日集中揭阳,向汤坑推进,迎击由河源来犯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同陈济棠东路军遭遇。经3昼夜激战,虽歼陈部3000余人,但自身损失兵力1/3,弹药近耗尽,遂退出战斗,向揭阳转移。此间,潮、汕已陷落。10月3日,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率部向海陆丰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拦腰截为两段。起义军大部溃散,一部被国民党军张望收编,余部1200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军第2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前委与革命委员会成员,辗转到香港。

朱德指挥第25师和第9军一部由三河坝撤出战斗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几经转战,到达湖南南部。

八七会议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彻底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决定今后中国革命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还有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军委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等,共20多人。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草案主要内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会议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决地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就是坚决清算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战斗檄文。文件明确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这些分析和批判，使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李维汉等9人；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7人。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为常委。

第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等投降主义者在武装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指出“他们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并明确提出:“现时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应当坚决地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斗争”。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夺取乡村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动势力进攻。

第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会议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最近“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田主实行减租。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些主张都充分说明了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认识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清算和结束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的阶段。

当然这次会议由于历史的局限,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二是在组织上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

干部单纯的工人成份；三是在反右倾的同时，没有注意和防止已经开始滋长的“左”倾情绪，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中共各级组织，执行暴动政策，准备武装起义。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已于8月3日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8月5日又向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省委立即开始秋收起义准备工作，并决定派毛泽东到湘南地区，任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南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策应南昌起义军。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拟定：以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目的在于“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推翻唐（生智）政府”；建议中央将在汝城的广东东江“惠潮梅农工救党军”暂留汝城，将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调到汝城，将南昌起义一个团转进汝城，组成相当的武装力量，确保湘南起义计划的实现。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湖南、湖北两省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不要只盯住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的群众基础比广东还要好，其组织比广东还要大，缺的是武装力量。他说：“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并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

派员；与彭公达一道到湖南，负责改组省委，组织领导全省秋收起义。8月16日，中共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到月底，新的省委召开多次会议，就起义纲领、计划、领导机构及与鄂南暴动之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其间，关于暴动力量与土地问题讨论激烈。毛泽东对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关于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坚持举行起义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于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把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省委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暴动；起义打出共产党旗帜，由共产党独立领导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毛泽东任师长，率该师会攻长沙；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湘中七县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长沙工人起义策应下，夺取长沙；由何资琛到岳州（今岳阳）发动农民起义，并负责与鄂南农民起义联络；彭公达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数日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规定两湖农民暴动必须于9月10日开始，毛泽东从安源来信提出11日起义，18日进攻长沙。据此，省委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随即通知湘中各县照此计划执行。

9月初,毛泽东抵达湘赣边界安源、铜彭地区后,即刻开展了起义的组织准备。按照湘中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部队,即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范树德任副团长,韩浚任参谋长,辛焕文任政治指导员。团、营指挥员多系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生。该团辖四个营,约2000人,战斗力较强。另一部分为工农武装,计有王兴亚指挥的江西永新、安福、莲花等县的农军一部(驻安源);安源矿区工人纠察队和中共党组织控制的矿警;余贲民、苏先骏指挥的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叶重开、罗荣桓指挥的湖北崇(阳)、通(城)部分农军。上述两部分武装力量共约5000人。毛泽东先到安源,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由毛泽东、王兴亚、潘新源、邓乾元、苏先俊、余洒渡、余贲民、钟文璋等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会议着重讨论、确定了起义武装的改编、番号、行动计划、部署等问题。确定:任命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贲民领导3个团;第1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鄂南崇通农军编成,钟文璋任团长;第2团由永、安、莲农军和醴陵部分农军编成,王兴亚任团长;第3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编成,苏先骏任团长。总指挥卢德铭、党代表毛泽东。这时,国民党军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各只驻有一个营,前委决定各团分头行动:第1团为北路,由修水攻击平江;第2团为南路,由安源攻击醴陵;第3团为中路,由铜鼓攻击浏阳。在歼灭上述3县国民党军之后,集中长

沙东郊,在各县农民起义武装和长沙城内起义工人配合下,会攻长沙。各团于9月11日开始行动,18日向长沙发起攻击。

1927年9月9日,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开始破坏粤汉铁路,以求切断国民党军南北联系。翌日,第1团由修水向平江方向运动。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1团进至修(水)、平(江)交界的龙门厂时,随该团行动的由余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突袭第1团后卫营,劫去全团辎重,驻长寿街国民党军1个营乘机发起攻击。第1团腹背受敌,损失1个营,团长钟文璋失踪。南路第2团击溃萍(乡)、醴(陵)交界的老关守军后,在醴陵四乡数千起义农民支援下一举攻占了醴陵县城,歼灭守军一部,生俘100余人,缴枪近100支;救出被反动派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成立了醴陵工农兵革命政府。醴陵靠近长沙,是沟通湘赣两省株萍铁路交通的要镇。国民党第8军第1师第2团两个营迅速沿株萍路向醴陵反扑过来;第35军教导团第1大队亦由醴陵西乡向县城推进,企图围歼起义军第2团于醴陵。第2团主动放弃醴陵改取浏阳得手。但部队进城后失去警惕,未能及时发现尾追之国民党军两个营的行动。追兵突然反攻浏阳县城,第2团毫无戒备,猝不及防,全团溃散,团长王兴亚去向不明。中路第3团由铜鼓西进,直逼浏阳白沙镇,与守军激战一小时,守军一个连抵挡不住,弃镇逃向东门市。第3团首战获胜,军心大振,12日乘胜进攻东门市。守军一个营又一个连,稍经接触即向达浒逃窜,第3团乘势进占东门市。9月14日,国民党军第3军第1师两个团由省援浏,“协同驻浏周营痛剿”起义军。第

3团被迫放弃东门市,北辙至上坪。在向长沙进攻的作战中,工农革命军先后受挫,受到不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再决定下步行动。19日,工农革命军第3团全部、第1团大部、第2团少许人员相继到达文家市,共1500余人。在此期间,省行委领导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部分农民革命军及农民群众按计划举行起义。虽说规模不大,但是给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不小威慑,拖住了部分湘军。

工农革命军集中文家市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浏阳城及东乡有国民党军和民团武装合约一个师;浏(阳)、醴(陵)边界有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合约1000余人;铜鼓、尤载有赣军约一个师;长沙国民党军几天内增到9000余人,第35军教导团亦将调防浏阳。工农革命军尚未摆脱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之威胁,仍处在遭受围攻而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在此形势下,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行动计划。毛泽东指出:原定的农民起义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可能攻占长沙,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放弃省委原定的计划。工农革命军应即刻离开便于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的湘东北,实行战略转移,卢德铭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余洒渡“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撤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徐图发展。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撤离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25日,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遭到赣军朱培德所部和当地

保安团的阻击,部队受到损失,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进。这时,师长余洒渡和团长苏先骏情绪十分低落,离队士兵日渐增多,两个建制团实力却不足 1000 人,战斗连队缺额严重。毛泽东开始考虑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9 月 29 日,工农革命军进抵江西永新县的三湾镇。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和设想,得到了前委的通过。首先调整了前委,由毛泽东、宛希先、何挺颖、陈皓、韩庄剑、张子清等人组成新的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接着对工农革命军的编制体制、中共党的组织、军队纪律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整顿。工农革命军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团”,直辖第 1、第 2 营共六个连,另编特务连和卫生队,实力共 700 余人;连队建立中共党支部,营、团建立中共党的委员会;建立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制度;连以上分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开端。

10 月 3 日,工农革命军进抵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与永新、宁冈两县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的具体情况,与井冈山北麓的农军首领、中共党员袁文才取得了联系。10 月中旬,工农革命军进抵井冈山西麓的湖南酃县水口地区。前委了解到,此时湘南,有国民党军许克祥独立第 3 师,土匪武装胡凤璋部,衡阳地区还驻有国民党重兵。工农革命军几经辗转,严重减员,实力不足 600 人。师长余洒渡借口离队出走,原团长苏先骏脱队而去。如此形势下,工农革命军若贸然转兵湘南,很难立足生根。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转兵湘南求发展的计划,率部调头向江西遂川

进发。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经遂川大汾、黄坳、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黄麻起义

大革命中,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七·一五”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黄、麻地区的革命运动遭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摧残。1927年4月间,黄、麻两县外逃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聚众数千人,在当地国民党驻军纵容下,疯狂反扑黄安、麻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麻城惨案”。6月间,国民党军夏斗寅部侵掠麻城等鄂东数县,所到之处,捣毁农协组织,捉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掠夺财物。“七·一五”后,武汉国民党认定黄安是“赤色县”,下令“清党”,强行取缔农协、工会,悬赏捉拿董必武为首的92名黄安籍共产党员。鄂东八县“清乡剿匪司令”皮宗仁纠集3000多反动武装,在黄安、麻城等鄂东地区到处烧杀抢掠,残害革命群众,破坏中共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中共黄安、麻城党组织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把全省划为七个武装起义区。其中鄂东地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罗田、蕲春、广济、阳新、大冶、鄂城等县。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鄂东地区革命力量,组织农民革命军,参加全省秋收暴动,省委组织了“鄂东农运指导委员会”,并派出80多名干部赴鄂东各县。由于此时鄂东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正处于此消彼长阶段,短时期内难以形成立即暴动的形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未能在鄂东实行。

1927年9月,中共黄安县委艰难的恢复了同湖北省委的联系,决定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经与中共麻城县委商定,决心两县共同行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起来没收地主财产,“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武装镇压土豪劣绅。由于两县县委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和某些领导的右倾,没有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成立工农政府和建立工农革命军的指示,除了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外,其他地区的农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加上国民党军魏益三第30军1个师又窜据黄安县城和进扰七里、紫云等区,这次行动只成为一次武装骚动,很快陷入停滞状态。但毕竟打击了反革命的势力,喊出了“武装起义”、“打倒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鲜明口号。

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接到黄麻报告,得悉两县尚有一定武装力量和相当的群众基础,还进行过武装骚动;同时考虑到鄂南起义已于9月下旬失败(鄂南是省委确定的重点起义区),鄂东的大(冶)、阳(新)和黄(梅)、蕲(春)两区暴动受挫,决心加强黄麻区的领导,以继续发动和领导黄麻区的武装起义。不久,符向一、王志仁和原在鄂南参加领导暴动的刘镇一、吴光浩等人到达黄安。旋即成立了由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委和由刘镇一为负责人的鄂东革命委员会,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任书记。符、王、刘、吴等人吸取了黄麻9月行动和鄂南暴动的经验教训,深入发动农民,加紧整顿两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赶制武器,积极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此间,黄安、麻城两县有组织的群众武装已有3万人以上,黄安有枪240支,麻城有枪100余支。与此同时,黄、麻两县逃

亡在外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去武汉国民政府“请兵”，策划进一步镇压革命运动。只是由于这时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集团与武汉国民党汪精卫、唐生智集团，为争夺国民党“正统”和抢占长江以南地盘展开混战，武汉汪、唐集团无力顾及黄麻土豪劣绅。这在客观上给黄麻起义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11月3日，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七里坪召开了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以黄安的农民义勇队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力量，加紧展开打击豪绅地主、没收其财物、分配其土地的斗争；而后配合群众武装，相机夺取黄安县城，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会后，黄麻的共产党员分别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七里坪、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乘马、顺河等区，着手武装进攻黄安的准备。10日，魏益三部1个营又窜扰七里坪，农民群众闻悉后纷纷要求去缴枪。于是中共黄麻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两县农民武装联合行动，夜袭七里坪，消灭魏益三部。魏部闻讯黯然退避黄安城。农民武装不战而屈人之兵，军心大振，2万余人聚集七里坪，示威游行，要求进攻黄安县城。中共黄麻特委决定成立由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的暴动指挥部，统一指挥和领导黄麻两县农民武装，攻打县城，举行起义。

11月13日，闻悉国民党军魏益三部1个团行将进驻黄安城。暴动总指挥部遂决定乘该团疲惫，立足未稳，围攻县城，缴其枪械。是日夜，调集黄安农民义勇队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3个排，共1000余人，动员农民群众2万余人，向黄安县进发。翌日凌晨，发起攻城作战，在城内市民配合下，全歼守城警备队，缴枪30余支，子弹90余箱，拘捕反动县长以下官吏15

名。这时,魏团尚在开进途中,距黄安城约10余公里。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主动将农军和群众撤出县城,转移七里坪。魏团慑于农军声威,虽进城却“夜不敢入睡”,于15日弃城退往黄陂。

16日,中共黄麻特委和暴动总指挥部率领农军浩浩荡荡进入县城,召开胜利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开展土地革命。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规定,将参加起义的黄安农民义勇队和麻城农民自卫军及配合起义的黄陂农民共300余人,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和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两路军,潘忠汝兼任第1路司令,戴克敏兼任党代表;吴光浩兼任第2路司令,刘文蔚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建立,标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建军开端。为着巩固基层革命政权,发展胜利成果,中共黄麻特委还分区成立了农民义勇队指挥部。在黄安,由戴季英、吴焕先、郑友梅分任七里坪、紫云、城区指挥;在麻城,由徐其虚、王树声、桂步蟾分任乘马、顺河等区指挥,两县义勇队约4万人。黄麻农民起义,武装进占县城,组织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的行动,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惊呼:“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清党委员、各局所委员等16人均被杀。此后日旬,农军踪迹已遍全县。……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其从者已达万人。”(国民党中央社1927年11月29日汉口电讯)。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豪

绅地主阶级联合策划军事进剿,企图扼杀黄安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于摇篮之中。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木兰山。11月底,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主力奉命去南乡开辟工作,留守黄安县城仅有革命军第2路1个排和义勇队60余人。黄安的反动势力即刻勾结驻河口的国民党魏益三部独立旅400余人,乘虚进犯县城。守城革命军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工人纠察队和市民积极配合作战。七里坪、紫云农民群众闻悉县城被围,立即分头集合万余人,星夜驰援;在南乡游击的工农革命军闻警后亦迅速回援。围攻县城的魏旅所部仓皇遁去。黄安保卫战,显示了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热情和坚强意志,也显示了革命军队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的强大力量。12月初,驻河南潢川的国民党军第12军教导师,沿麻城张店向黄安进击,沿途遭到乘马、顺河等地农民义勇队的节节阻击。于是改取宋埠、尹家河等地奔袭黄安县。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误认为进犯部队为会匪武装,与其展开激战。虽英勇抗击,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黄安县城失落。鄂东军损失很大,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接着,国民党军又进占七里坪、乘马、顺河及麻城县城。中共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2路党代表刘文蔚等先后遇难。随国民党军返回的黄麻豪绅地主乘机进行反攻倒算,所到之处,烧掠一空,大批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仅黄安北乡就有数千农民被杀,在麻城,反动派一次就集体屠杀400名农民群众。

12月下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陆续转移到黄、麻、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鉴于黄麻地区

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势力强大,为保存革命火种,以图日后发展革命,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汪奠川、吴焕先等人研究决定:由吴焕先、吴先筹、甘济时、程昭续等人率领农民义勇队,坚持黄麻地区的地下武装斗争;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等人率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共 72 人(长短枪 53 支)转移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活动,觅机打回黄安。

1928 年 1 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中共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并组成了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等人为委员的中共黄麻地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工农红军第 7 军及黄安、麻城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黄安、麻城农民起义,是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在中共黄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武装起义。起义以坚决的行动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地区的屠杀和进攻。在这次起义中建立的鄂豫皖边界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对于尔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创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广州起义

1924 年 1 月,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合作,建立了广州革命政府。后经过镇压商团叛乱、两次东征,从而巩固和扩大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使广州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1926 年 7 月,国共两党领导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发起了旨在打倒旧

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连战皆捷,于1926年10月初攻克武汉三镇。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1927年4月12日,窃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司令李济深,紧步蒋介石反革命后尘,在广州实行“分共”、“清党”,公开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他调动军队与警察,解除省港工人纠察武装,查抄工会、农会与群众革命团体,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一周之内,工人工会和群众革命团体20余处被查封,共产党人和革命者2100余人遭逮捕,包括著名共产党员刘尔嵩、李森、何耀全、肖楚女、熊雄在内的100多人被秘密杀害。中共广东地区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工会会员由20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工农革命运动落入低潮。

在此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广东的斗争日趋激烈起来。蒋介石因作战受挫,被迫下野,桂系李宗仁执掌南京政权;汪精卫不满大权落入李宗仁之手,于10月底到达广州,企望借助张发奎、拉拢李济深,另立中央与桂系抗衡;李济深与李宗仁同属广西,关系密切,联手倒蒋后,又怕李宗仁侵占广东,同时不满汪、张夺取他的权力;蒋介石下野后,宋子文赴广州与汪精卫密晤,答应支持汪、张共同倒桂。一向窥视广东的张发奎,打着“援李讨逆”旗号,由江西九江南下广州后,始则同李济深周旋,扩大自己的影响;继则联合汪精卫反对李宗仁;后于11月17日乘汪精卫、李济深赴上海之机,在广州发动倒桂政变,执掌了广州的军政大权。被赶出广州的李济深部及其他小军阀,仍虎视眈眈地瞪着广州,图谋卷土重来。

广州起义是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经过反复酝酿后决策的。“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工农革命后,中共广东区委预感到广东国民党军阀将步蒋氏后尘背叛革命,遂准备于5月初在广州、北江、西江、琼崖、潮梅、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后因李济深旋即发动了“四·一五”政变,起义准备不及而未果。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制定了《广东农运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郁、恽代英、黄平为委员的中共南方局(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两广等地暴动和政治、军事工作,并由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的策略。省委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3个暴动委员会,发动上述地区农民暴动,迎接南昌起义军入粤部队一举夺取广州政权,并将此暴动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同时派人分赴上述各地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很快复信批准广东省委拟制的暴动计划,但强调暴动“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10月初,中共中央获悉贺、叶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遂致信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认为夺取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暂时已无法实现,广东省委应立即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由于当时的条件,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广东省委。

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分析广东的政治形势,通过了《最后工作纲领》。《纲

领》认为,广州起义是一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为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在广东暴动的计划,“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拟制的;“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加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省委决定:“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省委会议结束,张太雷于15日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工作计划。中共中央认为广东省委10月15日通过的《最后工作纲领》“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共中央决定另为广东省委起草一个工作计划,并撤销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广东省委全面领导广东暴动。

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暴动是现阶段中共的主要行动方针。为此,中共中央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了广州,指定苏兆征、张太雷代中央起草《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其间,张发奎于17日发动了倒桂政变,夺取了广州的全部政权。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张发奎不得不全力对付桂系的武装反扑,广州城内的兵力异常薄弱。据此,《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指出,广东省委目前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采取十项措施促使工作计划的实现。这十项措施要旨是:省委发一个政治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战争;广州工人展开一切斗争,恢复工人工会,捣毁反动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形成全市政治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东江地区的工农革命军利用两广军阀部队在东江战争之机,准备进攻惠州、广州;广州市郊各县农民起来暴动,破坏交通,向广州集中;南昌起义军朱德余部由江西信丰开往老隆、兴宁、五华、紫金等地配合农民暴动;派军事干部打入驻粤国民党军下层,开展兵运,策动士兵哗变倒向农民革命军等等。17日夜,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并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12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和王亚强等出席,常委会一致赞成中共中央《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常委会认为,粤桂战争爆发,为广州起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会议还就起义的准备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立即暴动”夺取广州政权。为加强起义的组织领导,会后成立了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张太雷任总指挥,叶挺任起义军总

指挥,叶剑英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参加组成领导起义的还有杨殷、恽代英、徐光英、聂荣臻、诺伊曼(又译罗曼,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12月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广东省委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后致信省委,批准省委的起义计划。复信强调,广东省委在发动广州起义时,“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2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广州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广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为广州革命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式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广州武装起义。恽代英代省委起草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和《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作出“立即起义”决定及起义计划后,广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实质筹备阶段。

11月28日和12月1日,省委先后颁布《号召暴动宣言》和《紧急通告》第2号,号召广州及四郊的工人、农民及革命的士兵,“夺取一切武装”,“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12月,共青团广东省委亦发表宣言,号召革命青年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政府。”广州市委也印发大批传单,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暴动,消灭为个人抢地盘的军阀战争”。省委还大力发动和组织工会工人大批印发省委刊物《红旗》、市委刊物《工农小报》、香港海员支部刊物《中

国海员》及工会刊物《锤声》和《苦叫》等革命刊物和传单,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以及进步群众团体,造成武装起义的宣传声势,以唤起工农商学民众,准备参加起义。

根据省委决定,周文雍负责将原先以行业为单位分散组织的“义勇队”、“自卫队”、“剑仔队”、“自救队”、“维持队”等工人纠察武装,正式改编为“工人赤卫队”,统一编为7个联队。联队下辖大队、中队和小队。周文雍任总指挥、梁桂华任副总指挥,全队共计3000人,并组成敢死队、消息局、汽车队和破坏交通队等战斗组织。同时派人去香港、澳门、粤北等地,动员被遣散的省港工人纠察队员和罢工工人返回广州准备参加起义。为使赤卫队员迅速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徐向前等一批军事干部受命担任联队指挥员,负责进行军事训练,还秘密建立制弹厂赶制手榴弹、标枪、大刀,收集匕首、铁棍、木棒。在抓紧建立市区工人武装的同时,省委又指派黄谦、赵自选、张善鸣、叶季壮、赖松柏等干部分赴铁路沿线各县区,组织农军,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能调动指挥的正规武装力量有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部,省委特别重视对上述各部的组织发动工作。教导团官兵1500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00多人。为加强对该团的领导,11月18日,省委军委干部曾干庭受命到该团工作。12月4日,省委书记张太雷亲自出席该团中共地下党的会议,讲解广州起义的意义,号召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全团官兵准备参加起义,并就该团战斗任务作了布置。稍后几天,该团又秘密吸收一批进步官兵加入中共党组织。军事训练也加紧进行。警卫团官兵1000多人,团

长梁秉枢和部分指挥官均系中共党员,为提高该团无产阶级成分,省委曾利用招募新兵,选派 300 余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入伍,编为第 3 营;又通过第 4 军参谋长、中共党员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中共党员军事干部调入该团以加强中共对该团的领导力量。黄埔军校特务营及部分宪兵中,有一批中共党员,他们根据党的决议,积极展开兵运工作,准备参加武装起义。省委还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取得联系,指示该部参加广州起义,后因广州起义迅速失败而未执行计划。

为使中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了解起义的重大意义,广东省委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议于 12 月上旬分别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和工人代表会议。7 日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工人、农民、革命士兵代表,加上中共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暴动的行动计划》、起义政纲和多项苏维埃政府法令。会议宣布 12 日举行起义。在此前后,广东省委还开展了工人运动,发动工人和市民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

12 月初,中共在广州准备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速派其妻回广州与张发奎协谋消除共产党。由于教导团中的反动分子向张发奎告密和中共地下武装转运站败露,张发奎决定解散教导团,镇压共产党并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地决定,起义提前到 11 日举行并报告中共中央。

12 月 10 日晚 7 时许,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指挥员会议。会议由张太雷主持,参谋长徐光

英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宣布了起义行动计划,并对作战行动作了部署:教导团负责攻打沙河、燕塘和观音山;警卫团负责攻打第4军司令部、留守处和军械库,并向河南担任警戒;工人赤卫队负责攻打市公安局、保安队、警察署、省政府部分机关和火车站;教导团女生队和部分共青团员组成宣传队、救护队。起义军一律颈系红领带或臂戴红袖标。考虑到叶挺过早回广州不安全,直到起义前6小时才通知其回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徐光英等人赶到教导团营地北校场,宣布李云鹏任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任教导团第1、第2、第3营营长。随即按预定计划逮捕反动军官,当众枪决了参谋长朱勉芳。全团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叶挺作战斗动员,下达各营战斗任务。起义官兵撕下国民党军徽章,系上鲜艳的红领带,擎起斧头镰刀红旗,高呼革命口号,宣布武装起义,分东、中、西3路向预定攻击目标疾进。

叶挺、李云鹏指挥东路奔袭沙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国民党军一个步兵团,生俘600余人。旋即转兵燕塘,包围国民党军两个炮兵留守处,其中约一个营的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号召下宣布起义,余者1300多人被俘,起义军缴获各种炮30多门,各种枪1800多支和大批弹药,并控制了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市区的咽喉。第2营营长赵希杰指挥中路在工人赤卫队第2联队支援下,迅速攻占了广九车站;徐光英、叶镛指挥第1营在歼灭四标营附近国民党军学兵营后,直插市公安局,与先期攻击的工人赤卫队第1联队会合,歼灭了保安总队,攻占了市公安局,并将起义军总指挥部从大东门警察署

移进公安局院内。第3营营长饶寿柏指挥西路,在工人赤卫队第5联队 and 花县及市郊农军百余人的协同下,攻克了伪省政府和东山国民党军据点。

警卫团第3营在团长梁秉枢指挥下,处决了团参谋长等一批反动军官,宣布起义。随即向驻长堤肇庆会馆的第4军司令部、仰忠街的军械库和文德路的第12师留守处发动攻击。经激战,起义军攻克了第12师留守处。第4军司令部和军械库守军凭坚顽抗,又得到停泊珠江的军舰火炮支援,双方陷入相持状态。警卫团第2营起义后奉命在长堤一线警戒,防备河南之国民党军渡江增援。位于观音山的警卫团第1营一部抗拒起义,团长梁秉枢得悉即前往解除其武装,战斗中被反动分子开枪打伤,其职务由蔡申熙接任。这时,教导团一部攻克观音山要地。

工人赤卫队也按预定时间出击。第1联队攻打公安局;第2联队攻打7、8、2区警署和广九车站;第3联队攻打驻太平戏院的保安队和5区警署;第4联队攻打驻大佛寺的保安队和4区警署;第5联队攻打伪省长公署和德宣路的警署;第6联队攻打芳村警察局、驻石围塘的保安队和广三车站;第7联队机动作战。此外,花县的农军百余人,市郊西村、芳村、花地、聚农村等地的农民赤卫军以及广九铁路沿线的农军,纷纷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在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些越南革命者在起义中与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天亮前,起义军已相继攻占了市公安局、伪省府、国民党省党部、市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电局等地。珠江北岸市区除第4军司令部、军械库和中央银行等要点外,都被起义军

占领。11日下午,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离市区约20公里的黄埔军校,王侃予和吴展急忙率领军校特务营官兵渡过珠江赶往市区参加作战,途中遭国民党军阻击,伤亡较大,被迫撤退白云山,后折向花县。

11日6时,市公安局楼顶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绣着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大门口挂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横额。红旗、横额向全中国人民宣告: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在武装斗争中正式诞生了!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上午,张太雷主持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张太雷、叶挺、杨殷、周文雍等报告了苏维埃、军事、肃反和赤卫队各方面的情况,讨论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主席苏兆征(未到任之前由张太雷代理),内务兼外交委员黄平,肃反委员杨殷,土地委员彭湃(未到任前由赵自选代理),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会议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政纲等重要文件。政纲提出:广州政府属于工农兵;迅速组建工农红军3个军;坚决消灭一切反革命;禁止国民党的活动;工人8小时工作制,没收资本家房产;维护失业工人的利益和特权;封闭黄色工会等等。宣言指出: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奋斗的,“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

广州起义第一天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它没有触动张发奎在广州地区的主力部队,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就没有根本改变。起义前,曾有人建议武力包围张发奎等军政头

目住宅,因起义军兵力不够,建议未被采纳。战斗中,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等逃往河南,调动军队迅速组织反扑。张发奎下令:第5军驻河南的部队凭河坚守,驻韶关的2个团、驻石龙的第4军第25师、驻西江的第4军第12师和第26师1个团、驻江门的新编第2师2个团和驻黄埔的新编第3师1个团迅速回援广州,镇压起义。张发奎和陈公博于当晚赶往江门、肇庆继续调兵;黄琪翔坐镇“江大”舰,沿珠江炮击防守长堤的工农红军;朱晖日派反动的机器工会体育队潜入江北市区进行破坏。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法、日等国军舰也向工农红军示威。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形势相当严峻。

11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军事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叶挺审时度势,指出张发奎部兵力雄厚,距广州又近,疯狂反扑过来,工农红军将陷入四面包围,偌大个广州是很难坚守的。提议在张发奎部尚未逼近广州之际,主动撤离广州,移师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叶挺的主张得到聂荣臻等人支持,却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会议决定继续扫荡河北国民党军警残部,准备进攻河南李福林第5军,坚决固守广州,保卫苏维埃政权。

12日,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工农红军无力控制广三、广九、粤汉和珠江三路一水,张发奎所部得以从容机动猛扑广州。战斗在四面八方激烈展开,争夺观音山要地战斗尤为激烈。上午,第5军和新编第2师各一部共三个团,从北面猛攻观音山,教导团第3营在第1、第2营,工人赤卫队第1、第6联队各一部的配合下,顽强拼杀,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连续冲

击。下午,陈赓率教导团一部赶来支援,观音山阵地暂时巩固。第4军第25师从东面猛攻广九车站和沙河;第5军主力在“江大”、“宝壁”两舰炮火支援下,从南面猛攻西壕口、长堤。工农红军虽经顽强抗击,阻住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但各要点独立防御,彼此不能支援,工农红军伤亡逐渐增大。当日下午,张太雷在群众大会结束返回指挥部途中中弹牺牲,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失去领导核心。此时,国民党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各处红军纷纷求援。在此危急关头,叶挺、聂荣臻再次建议,乘国民党军合围尚未形成,工农红军掩护苏维埃政府迅速撤离广州或往北与朱德、陈毅部会合、或进海陆丰与彭湃的农军会合,以保存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同意了叶、聂的主张,决定13日凌晨前开始撤退,苏维埃政府成员撤往香港,非军事人员就地疏散,红军武装撤至江北地区。这时间,市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巷战,战线犬牙交错,指挥部与红军指挥员失去联系,叶挺、叶剑英、李云鹏等未能收到撤退的命令。结果除部分红军武装突围转移外,大部分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继续在要点或市区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突出重围的起义军1000余人改编为工农红军第4师,下辖3个团,叶镛任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途经花县、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地,进入海陆丰,同董朗、颜昌颐率领由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工农红军第2师会合,参加了彭湃领导的东江革命武装斗争。部分武装力量突围后转移韶关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辗转湘南,走上井冈山。突围转移到广西的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顺

利地转移到香港。13日下午,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陷落,反动派重占广州,开始对革命群众的大屠杀,仅14日至19日的6天内,就公开屠杀革命群众5700多人。白色恐怖又笼罩着广州。

湘南暴动

湘南地区是湘粤两省交通的枢纽地区,这里物产丰富,有造纸和煤炭工业,是农业与手工业掺和的社会经济。区内丘陵山地,五岭山脉横卧,湘粤大道和修筑中的粤汉铁路纵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当时湘粤两省军阀争相控制的要地。湘南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计划发展工农革命实现武装割据的一个重要区域。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特别是广大饱经沧桑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革命热情迸发,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普遍建立,并经受了尖锐的阶级斗争锻炼。“马日事变”后,尽管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遭到严重破坏,但农民武装基本上保存下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关于湖南农军“暂集中湘南”,与已在汝城的广东“惠潮梅救党军”合编为1个师,准备就地暴动的指示,郴县、宜章、桂东、永兴、资兴等县农军和“惠潮梅农工救党军”共约4500人,集结在汝城一带活动。7月,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奉中共中央军事部指派抵达汝城,整顿农军武装,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后因形势变化而未果。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公布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规定:湘省“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

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并指定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为中共湘南特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迅速制定了《湘南运动大纲》。规定:湘南暴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强调:湘南暴动要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为此,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下令,将已在汝城的广东东江工农武装继续留在汝城,由郭亮将平江、浏阳 1000 余农军带到汝城,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几个团开抵汝城,作为湘南武装暴动的基本力量。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计划,并转发中共湖南省委贯彻执行。由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湘、鄂、粤、赣四省形势急骤变化,毛泽东奉命去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暴动计划未能实行。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在湘南地区开创武装割据的设想。1927 年 10 月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转告朱德,“在不得已时向湘南发展。”11 月中旬,又指示中共湖南省委发动农民起义“割据湘西、湘南”。12 月再次要求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两次致信朱德,要他将部队带到湘南开创局面,并与毛泽东联络,共同造成工农武装割据。但是由于朱德、陈毅率部转辗,未能收到这两封信。这期间,中共湖南省委也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成立了陈佑魁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特委于 12 月在

衡阳召开了会议,正在加紧准备湘南年关暴动的工作。

朱德、陈毅虽然未能收到中共中央 12 月的两封指示信,但闻悉湘南桂东地区农军斗争形势尚好,决心率部折向湘南。当部队暂停江西崇义上堡时,驻湘南汝城县的国民党军将领范石生主动派员来同朱德联系,希望合作。滇军范石生第 16 军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范、朱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同学,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交往较深,该军内有中共党组织。贺、叶军南下广东时,周恩来给朱德写过组织介绍信,以备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经过起义军余部中共党组织讨论批准,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条件下,朱德、陈毅部改编为第 16 军第 47 师第 140 团,朱德(化名王楷)担任第 16 军总参议兼第 140 团团长。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并与湘南地区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时派毛泽覃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1 月终,朱德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决定 12 月中旬发动湘南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朱德、陈毅接到中共北江特委传达中共中央通知:朱、陈率部立即南下支援广州起义。部队行至韶关,广州起义已经失败,改编从广州撤出的起义武装 200 余人后,进抵韶关西北的梨铺头休整训练。是时,张发奎已发现朱德、陈毅部在范石生第 16 军,密电范石生解除朱、陈部的武装,拘捕朱德。范石生没有执行命令,而是给予一笔军饷,让朱、陈率部迅速脱离第 16 军另谋发展。

此时,国民党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在长沙及以北地区形成对峙。同时,国民党两广军阀爆发广东战争,驻湘粤边界的粤军主力已入粤参战,范石生第 16 军作为张发奎的预

备队亦处于战争状态。这样,湘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许克祥独立第3师(驻乐昌)和土匪胡凤璋部(驻汝城、仁化一带)。朱德、陈毅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率部向湘南地区发展。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由韶关北上,进入湘南,首战乐昌未果。部队转到乳头县的杨家寨(今属乐昌),与中共宜章县委接上了联系。当地人胡少海(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出身豪门,原在程潜第6军任过营长,在当地有知名度。胡因不满国民党军叛变大革命,弃甲还乡,并秘密参与领导农民斗争。朱德、陈毅经与宜章县委研究,利用胡在当地的影响,把部队伪装成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所部,公开开进宜章县城。果然,全城官吏劣绅听到胡少海带领军队进城,都出城迎接。县长还设宴为朱德、陈毅和胡少海等“官长”接风洗尘。宴间,朱德、陈毅部把劣绅官吏全部拘捕,将守城警察、民团400余人全部缴械(获长短枪360余支),举行了宜章暴动。宜章不战而下,武装暴动成功。很快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打出工农革命军的红旗。部队按照中共中央以前所给的番号,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团(原来号称一个师,实际只有一个大团,起义后新组建了一个团),全师1300余人。朱德说:智取宜章城“打响了湘南暴动第一炮”。

工农革命军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和独立团武装,对盘踞乐昌的许克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许克祥是“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于是,即以六个团进犯宜章,企图乘工农革命军在湘尚未站稳脚根,予以“剿灭”。朱德、陈毅决心坚决打败许克祥部,扫除湘南革命斗争的

障碍,许克祥视工农革命军撤出宜章是力弱惧歼,下令其部队尾随跟进寻求决战。许部六个团一字长蛇阵,又于运动之中。工农革命军创造战机,连打两仗,将独立第3师击溃,许克祥只身逃脱,其司令部与后方仓库亦被占领,生俘许师官兵1000余人。朱德说:“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许克祥遭到沉重打击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贸然进犯湘南。这就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湘南各县暴动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工农革命军打败许克祥独立第3师的消息传遍湘南。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人迅速赶到宜章,与朱德、陈毅协商发动湘南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各县县委亦派人与工农革命军联系,请求发兵支援农民起义。时值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重新开始,湖南的国民党军无力顾及湘南。在这种有利的时局下,朱德、陈毅将宜章独立团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陈东日任副师长,谭新任参谋长,留守宜章,监视许克祥和胡凤璋部。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北上,帮助各县农民起义。2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郴县大铺桥包围并俘虏国民党军第35军周南师两个营共六个连。郴县守军一个营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朱德、陈毅帮助恢复了中共郴县县委,建立了县、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了“插标分田”的运动。工农革命军作战的接连胜利,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了湘南各地农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震慑了各

地的地主武装。这时,工农革命军只要派兵一个排去支援某县,那里的中共党组织即可率领农军攻占县城。不到15天,工农革命军第1师相继进占了郴县、永兴、资兴、耒阳、桂东、汝城等县城,并帮助建立了县、乡、村工农兵政府。在此期间,祁阳、安仁、衡阳、酃县、衡山、零陵、江华、常宁等11个县也爆发了农民起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运动,在湘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农民武装起义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断壮大;郴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邓允庭任师长,夏明震任中共党代表,刘之至任参谋长;耒阳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师,邝庸平任师长,邓宗海任中共党代表,徐康任参谋长;永兴成立了赤色警卫团,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中共党代表兼参谋长;资兴成立了独立团,李中奇任团长,黄义藻任中共党代表。3月中旬,湘南工农兵政府在永兴宣告成立,陈佑魁当选为政府主席,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湘南工农兵政府领导下,湘南形成了分配土地和苏维埃运动的大好形势。在起义中,不仅扩大了正规军,组建了地方军,还组织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各种形式的梭标队、大刀队,前前后后共有几十万人,参加到了工农武装革命的行列。

但是,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中共湘南特委却在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用“赤色恐怖去刺激”农民起来革命;“焚烧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郴线)五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政策,严重脱离了工农群众,挫伤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1928年3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导下,新的中共湘南特委才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即开

始调整政策和策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于是湘南的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苏维埃运动,又转向比较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发展。

1928年3月,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新军阀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出洋而告结束。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命令。17日,进驻两湖的国民党军总指挥白崇禧调集第7军第2师、第13军第2、第3师,组成北线“协剿”军,由第7军第2师师长李朝芳任“湘南剿匪司令”,率部集结衡阳地区;广东国民党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集范石生等16军、许克祥独立第3师、胡凤璋第1游击军(约一个师),组成南线“协剿”军,由范石生任总指挥,集结乐昌地区。3月底,南北“协剿”军部署就绪,准备采取南北对进,两军夹击,一举“剿灭”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革命运动。这时,湘南工农革命军共有四个师另两个团一个营,共约1万多人。除工农革命军第1师外,其他各师各团、营均属农军,建立时间短,缺乏正规训练,枪枝弹药少,战斗力很弱。湘南处湘粤边界,交通比较方便,利于“协剿”军机动作战,而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反“协剿”作战。加上中共湘南特委一度实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和策略造成的不良后果此时并未彻底消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朱德、陈毅和王尔琢讨论决定:避开“协剿”军的进攻锋芒,实行战略退却,转兵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8年4月1日,湘南工农革命军及一些县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分两路开始撤退。朱德和王尔琢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撤出耒阳,向安仁转移;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2、第4、

第7师等部和宜章、郴县、永兴等县县委机关、苏维埃政府人员及其家眷，向资兴转移。旋即，湖南“协剿”军3个师相继进入耒阳；广东“协剿”军两个师先后进入宜章。湘、粤两省“协剿”军各自保守实力，谁都不主动去寻求与工农革命军作战，只在所到县区日夜“清剿”工农革命群众，摧残苏维埃运动。早在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传达特委决定：撤销秋收起义时建立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命令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改称第2师，迅速开赴湘南，参加湘南起义。3月中旬，毛泽东率部离开井冈山后，没有直入湘南，而是在酃县西部和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注视着湘南形势的发展。当湘粤两省“协剿”军逼进湘南时，毛泽东立即以第2团西进资兴，接应和掩护湘南工农革命军撤退。亲自率领第1团抵进桂东沙田，监视南线“协剿”军的行动，防止胡凤璋部经桂东突进酃县，切断工农革命军各部的退路，主动担负南侧的掩护任务。4月上旬，当胡凤璋部由汝城北进资兴，企图侧击转移中的湘南工农革命军时，毛泽东即指挥第2团南下潞口，迎击胡部；第1团则乘虚而入袭击汝城。胡凤璋部系土匪武装改编而成，素以占地掠夺为目标，闻讯汝城危急，马上调头回援汝城。湘南工农革命军南侧消除了威胁，免遭了损失。4月5日，朱德部占领安仁。为防止位于攸县的国民党军第8军第1师经茶陵进入酃县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保障工农革命军北侧的安全，朱德部迅速抢占茶陵，监视第8军第1师行动。4月13日，陈毅部到达酃县，并随之向宁冈转移。朱德部亦从茶陵撤到了酃县，并以一部控制酃(县)宁(冈)路上的沔渡，主力与毛泽东部第2团进入宁冈砦

市。毛泽东率第1团也从汝城返回酃县。在此期间,湖南国民党军第7军第2师、第13师第2师,分别跟在朱德和陈毅部队之后,却始终保持2到3天的行程,不敢贸然发起进攻。至此,湘南5县农民起义武装约8000人,胜利转移井冈山。4月中旬,毛泽东返回宁冈砦市,与朱德、陈毅会面。朱、毛两军胜利会师,宣告了湘粤两省国民党军“协剿”湘南起义的失败。会师后,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了井冈山斗争的新阶段。

鄂中、鄂西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湘鄂西地区是个地理概念,指的范围是:湖南的桑植、石门和湖北的鹤峰、五峰等县交界的湘鄂边地区;湖北的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公安和湖南的华容等县的洪湖地区;湖北北部的襄阳、枣阳、宜城边界地区;湖北西部的巴东、兴山、秭归交界地区。从1927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湘鄂西地区的人民通过举行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与改编农民武装,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使它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战略区之一。

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一边恢复遭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一边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从1927年9月开始,陆续发动起义,持续

近半年,中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年关(阴历)暴动两个高潮期。在沔阳县,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临时县委组织部分农军于9月10日夜袭戴家场,捕杀了恶大罪深的反动团防头子。接着沔东、沔西、沔中、沔(阳)监(利)边农民相继暴动,暴动农民成批地处决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吏,没收其财物,焚烧其地契,分配其土地。在暴动中建立起来的农民游击队,在邓赤中、肖仁鹄、刘绍南、漆子恒、杨光华等人指挥下,于12月初攻占沔阳县城,镇压了反动县长以下反动官吏10余人,救出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缴获团防武装枪枝弹药一批。旋即,农民游击队撤出沔阳城,采取内应外合,袭占监利的新沟嘴,全歼当地反动团防武装,缴枪60余支,并与王尚武领导的农民游击队会合,稍经整顿,即向监利县城发动攻击,全歼守城反动团防武装80余人,缴枪60余支。监利战斗后,中共鄂中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将沔、监两县农民游击队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5军”,肖仁鹄任军长,全军200余人。下编为一个团,赵文允任团长。工农革命军第5军是中共鄂中特委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它的建立为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湖南澧州邹资生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因湘军的围攻而转移到公安县境,与杨云祥领导的公安农民会合,在打“捧老二”(即打土匪)的口号下,举行农民暴动,开展打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控制了该县4个区,建立了一支30余人的公安县农民游击队。后于9月20日占领了公安县城。1927年底,李宗仁、唐生智军阀战争结束,桂军进占湖北,开始进攻公安县。游击队被迫退出县城,转移石首,与李兆龙、吴

仙洲领导的石首的农民武装会合,组成“鄂西游击大队”。这是中共特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除沔阳、公安两县外,在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

1928年初,中共湖南、湖北两省委又组织年关暴动。此时,贺龙、周逸群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上海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途经监利,找到了贺锦斋(贺龙的堂弟、原南昌起义军第20军师长,中共党员,起义军失败后受中共中央指派到鄂中活动)的游击队,并和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取得联系。根据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领导当地年关暴动。贺龙、周逸群将贺锦斋、吴仙洲、邓赤中和彭国才等分别领导的3支游击队组成“第49路工农革命军”,500余人、300多支枪,编成2个大队。经过10多天的连续作战,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反动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100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劣恶霸,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年关暴动。2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强攻监利县城受挫。于是贺龙、周逸群与中共监利、石首县委在焦山河召开会议,讨论第49路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针。由于组成工农革命军的各路游击队均系各地农民骨干,他们既不同意统一“上山”(去湘鄂边),又不愿意集体“下湖”(坚持洪湖地区),而是主张分开游击,各回本县坚持斗争。贺、周因肩负中共中央指令,开辟湘鄂边局面。有鉴于此,会议决定第49路工农革命军交由中共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指挥,贺龙、周逸群带10余人前往湘西北进行中央赋

予的任务,并商定:在湘西工农革命军组成后,于适当时机在公安、松滋一带与鄂中、鄂西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此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正规军在地方反动团防、土匪的配合下连续对鄂中、鄂西地区进行“清乡”。至夏初时,由中共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只剩下不足 30 人,活动在洪湖北岸;中共石首中心县委领导的第 49 路工农革命军余部由屈阳寿、段玉林等指挥,活动在石(首)华(容)监(利)一带;公安游击队剩余的不足 50 人枪转移到石首活动;陈香波领导的江陵县游击队转移到县东南的白露湖沿岸活动。游击队彼此失去联系,游击范围窄小,为躲避“清乡”,处境十分困难。

1928 年 5 月,周逸群从湘西北转回石首,正值国民党军第 18 军大举“清乡”。经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研究,将石首、公安和鄂中 3 支游击队共 100 人集中形成一支战斗力量,在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清乡”斗争。其间,游击队曾一度占沔阳(今沔城)东南 16 公里的重镇峰口,全歼当地反动团防武装,缴枪 30 余支。后又进攻潜江东南的拖船埠镇。在国民党“清乡”军步步紧逼、游击队员乡土观念严重、不愿远离本土的情况下,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决定再次将游击队分散活动。周逸群率领鄂西游击队转到石首、华容、监利一带,依靠当地群众和有利地形,昼伏夜出,四处游击。邓赤中率领鄂中游击队转到潜江的拖船埠活动,受了严重损失,邓赤中亦在作战中牺牲。是月下旬,因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被破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重建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果断地将特委机关由沙市迁到洪湖,特委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乡村,从发动广大农民抗租

抗捐抗粮抗税开始,为发展游击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群众条件。于是,各地停止了“无暴不动,无动不暴”的盲目暴动行为,转入秘密地发展中共地方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和少先队等组织。鄂西游击队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堵”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清乡”军,保存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29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已在监利、石首、江陵、沔县各县相继恢复和新辟了若干小块秘密根据地;建立了特务大队、天门(门)潜(江)游击队。段德昌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枪。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中区和湘西的华容、南县、安乡划归中共鄂西特委领导。在游击战形势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的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会后,中共鄂西特委乘蒋、桂两派军阀在鄂东、鄂南混战的机会,积极发展鄂西、鄂中的游击战争。集中江陵、石首、监利三县武装,编为游击第1大队(辖两个中队),邹资生任大队长,段玉林、段德昌任中队长,共有长短枪260余支,在三县境内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土豪劣绅,帮助建立农民赤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自3月中旬到5月,游击第1大队先后在江陵、石首、监利3县与反动团防作战数十次,获得重大胜利。消灭或击溃多股团防,一度攻占石首县城和监利东北的毛家口镇,共缴枪210余支,歼灭国民党军谭道源两个连。游击第1大队在斗争中严格执行中共鄂西特委规定的任务和政策,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助农民进行斗争,不急于进行反富农斗争;保护中小商人、取

缔暴利和高利贷。因此,所到之处,群众拥护,情绪高涨,纷纷起来组织农会,建立赤卫队,筹建区、乡工农民主政府。虽然在作战中付出了代价(如中共鄂西特委委员、游击第1大队大队长邹资生牺牲),但开创了鄂西、鄂中地区革命的新形势。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第1大队得到相当的发展(6月,驻新堤的国民党军江防大队60余人起义,参加了游击队)。为加强革命武装力量建设,中共鄂西特委将游击大队改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第3三个大队和教导队,王尚武、段玉林、卢先湖分别任大队长,王鹤、彭子玉、雷血分别任大队党代表。各大队辖三个中队,人枪各300余,共计1000余人枪。学习朱、毛红军建军经验,游击总队建立了政治部,中队(相当于连)以上设立中共党代表,并建立中共党支部、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阶级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建立了作战讲评制度,实行军事、经济民主。上述制度和措施的建立与施行,对于鄂西游击总队由农民游击队向正规革命军队转变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29年9月,湖北境内因为桂系军阀战败而其主力纷纷撤退,蒋介石的部队控制了湖北。随之,谭道源第50师和岳维峻第34师以大于游击总队10余倍的兵力,对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重点“清剿”。按照总队首长原定计划,第1大队应避开强敌,由洪湖地区转移到外线,到华容一带游击。行动中擅自改变总队首长计划,部队返回洪湖,遭到很大损失。大队长王尚武及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受伤。有鉴于此,中共鄂西特委决定:由段德昌指挥第

1、第3大队坚持内线作战,继续在洪湖地区游击;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2大队,跳到外线,到华容、石首、江陵一带展开积极的游击战争,内外线结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第2大队依据周逸群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展开游击战,积极破坏国民党军“清剿”计划。第1、第3大队在段德昌指挥下,依靠根据地人民,声东击西,骚扰和打击“清剿”军部队,并击溃“清剿”军1个团。11月,蒋冯矛盾紧张,战争一触即发,鄂西区的蒋系正规军调出大部。第1、第3大队趁机反攻,恢复并扩大了洪湖地区根据地。第2大队也恢复了江(陵)石(首)并开辟了华容根据地。在此期间,汉川游击队扩大到300余人,组成游击大队。

在游击战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为总结斗争经验,开创鄂西革命新局面,中共鄂西特委于1929年12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军事、组织、工农运动、土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及开展兵运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立了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选举了新的中共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9人组成,周逸群为书记。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西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独立第1师”(有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共10个中队,有枪一千数百支,人员约5000。王一鸣任第1纵队司令,段玉林任第2队司令。同时决定将长阳独立师(师长黄超群、党代表李步云)编为第3纵队(未实现);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级成立赤卫队,作为地方武装。并派

万涛赴湘鄂边迎接贺龙的红4军。红军独立第1师成立后,集中其主力在根据地内作战,以肃清反动据点,消灭团防、土匪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将“独立第1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后为邝继勋)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许光达任参谋长,纵队以下组织不变。段德昌任第1纵队纵队长,王鹤任政治委员;段玉林任第2纵队纵队长,李子和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共红六军前敌委员会,王一鸣任书记。第六军设军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开办了教导大队。4月,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布成立鄂西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为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工农革命军

第四军开展湘鄂边游击战争

1928年2月底,贺龙、周逸群率领10余人离开石首即经漕县、石门、江垭等地,顺利到达湖南桑植以北的洪家关。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贺龙就在家乡桑植一带领导农民进行反对豪绅地主和反对地方政权的斗争,在当地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和号召力。当地一些土著武装中,有的受过大革命的影响,有的即是贺龙的旧部。中共湘西北特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决定由贺龙出面,组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展湘鄂边的游击战争。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特委便联络了贺英、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领导的10几支武

装,共约 3000 多人。公开打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占领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农民,打土豪。同时,对部队进行改造。革命刚刚开始,国民党黔军第 43 军第 3 师第 5 旅龙毓仁部便向工农革命军发动进攻。工农革命军成立伊始,来不及整训,军政素质低,经三次战斗,就大部溃散。周逸群在战斗中与中共湘西北特委失掉联系而转回石首。贺龙并未因革命伊始就受严重挫折而动摇,重新联络和集中失散人员约 400 人,在桑植、鹤峰两县边界地区活动,并在 6 月黔军第 43 军开往鄂西时,击溃该军后卫一个连,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分。重占洪家关后,部队又扩大到 1500 余人。

7 月初,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找到贺龙,带来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撤销中共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为委员,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及其所在地区的地方工作;贺龙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群众通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中共党代表(未到职),黄鳌任参谋长,陈协平任秘书长。军下辖第 1 师,贺锦斋任师长,约 800 人以内。红四军的成立,为开展湘鄂边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一支骨干武装力量。部队在组织形式上得到了统一,但其成份复杂,思想混乱,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很弱。据此,中共湘西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造。由于战斗频繁和一些干部对改造部队思想不通,前委的决定在部队中没有很好的贯彻,只在士兵中发展了 40 余名中共党员。8 月下旬,红四军奉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指令,东进石门去配合南乡农民武装暴动。届时,石门南乡暴动

已经失败。前委遂决定在石门北部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基层组织和农会,建立乡、村工农民主政权。其间,遭到国民党第14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迎战,且战且退,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大部溃散。是时,桑植亦被反动团防袭击,红四军失去了后方。贺龙只得率领余部200余人,向西转移,于9月底进入鹤峰堰垭一带的大山中。

在堰垭山中,贺龙认真总结汲取红四军两次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在解决给养的同时,着手整顿部队,遣散老弱和动机不纯分子,吸收进步士兵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确立共产党在部队中的核心地位。经过整顿,红四军虽只剩下91人72支枪,但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官兵的军政素质有了质的变化,政治立场更加坚定了。堰垭整军,成为红四军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中间,又与上级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受中共湘西和鄂西特委的委托,接管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杨维藩为委员,贺龙任书记。11月中旬,湘鄂西前委闻悉:驻恩施、鹤峰地区的国民党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有进攻红四军之企图;咸丰、利川一带“神兵”中有中共工作基础,为避开国民党进攻锋芒,吸收“神兵”发展红四军力量和根据地,前委率部进入宣恩、咸丰、利川、恩施、建始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此行活动1个多月,收编了黑洞的部分“神兵”,消灭了利川的反动武装一部,三次进攻建始县城,歼反动县长以下100余人,缴枪枝弹药一批,又吸收了一批伐木工人入伍。红四军扩大到300余人,100余支

枪。12月31日,红四军进入邬阳关,与陈宗瑜领导的“神兵”取得联系,汪毅夫又在此组织了一支伐木工人武装。两股武装共300余人,编入了红四军。此时,马文德旅调去参加蒋桂战争。红四军乘虚而入,攻占鹤峰县城,并于翌年1月中旬,宣布成立了中共鹤峰县和鹤峰县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苏维埃政纲》和《耕田农有法令》。在全面着手根据地的建设的同时,红四军约1000余人集中整训;传达、学习中共六大精神;结合实际学习井冈山朱毛红军的建军经验,在部队中开展反对旧军阀思想和作风,开展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整顿和新建了四个中共党支部。这次整训,使红军在革命军队建设历程中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鹤峰革命根据地也初步建成。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打退了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3000余人对鹤峰根据地的进攻,歼其一部并击毙了王文轩;重新攻占了桑植县城,并将当地的反动团防武装或击溃或驱赶出桑植。到1929年6月,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终于打通连成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红四军有了一块稳固的战略基地。此时,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编为第1路、第2路两个指挥部共五个团,另有谷志龙第2旅,并建立工农赤卫队约2000余人。

湘西军阀陈渠珍为了恢复对其势力范围的统治,于7月初令其第1军独立旅向子云部进攻桑植。向子云自恃武器精良,令副团长周寒之带兵两个营1000余人向桑植攻击前进,企图由城西北15里的南岔渡过澧河,侧背攻击红四军。红四军首长决心隐真示假,诱周部渡过澧河,迫其背水作战,予以全歼。即以一部兵力与周部接触,佯为败退,以红四军主力隐

蔽集结于城北附近高地,待机出击。待周寒之部自南岔分3路从水滩口、南岔、龚家咀横渡澧水,进至关家坡一线时,红四军主力由西北高地勇猛出击。周部顿时大乱,仓皇后撤,未及渡河,大部就歼,周寒之亦被击毙,红军缴枪数百支。向子云虽遭到了严重打击,仍不甘心失败,力图报复。于7月中旬亲自率部2000余人,并纠集桑植、大庸、慈利等县团防武装,再度进犯桑植。红四军首长分析:向子云骄横自恃报复心切,势必驱兵猛攻,夺取县城。红四军将计就计,主动退出县城,待向部入城后,将其围歼。于是将红四军主力隐蔽于城北的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线,以一部于西界、茅岩一带设伏,准备截向部退路。7月15日晨,向部先头特务营从赤溪横渡澧河,顺利入城,其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形成一字长蛇阵。红四军抓住战机,3路伏兵猛然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入城的特务营。向部遭到突然打击,顿时一片混乱。红四军乘胜猛攻,并迂回向部侧后,控制赤溪渡口。向部退路受阻,被红军压缩于河滩上。一部分随向子云泅渡溺死于河中,大部分缴枪投降。是役,向部仅逃逸100余人,红军缴枪1000余支,取得红四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四军南岔、赤溪两战皆捷,军威大振,湘西军阀及团防武装自此不敢贸然发兵来犯。

1929年8月,中共湘西前委决心发动一次攻势作战,以扫除根据地四周的团防据点,消除根据地的隐患并向大庸、慈利扩展。上旬,红四军主力经6昼夜激战,攻占了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巢穴,其300多人枪的武装大部就歼,少部随熊窜逃。熊匪统治西教乡几十年之久,凭借险要地形,控制桑植、大庸必经要道,与红军作对。攻下西教

乡,则消除了湘鄂边根据地的一大隐患,此战有相当影响。下旬,红四军稍事休整后继续作战,相继攻占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击溃徐小桐、陈策勋等多股国民党地方武装。迫于形势,大庸、慈利一带的土著武装,纷纷向贺龙表示不与红军为敌,或愿意让出“防地”,或经常向红军通报“军情”。红四军的攻势作战,达到了预期目的,为日后的游击战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返回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参加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10月初,蒋介石与张发奎的战争爆发,双方大军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结。中共湘鄂西前委尚未查明国民党企图时,驻常德、桃源的国民党第52师吴尚部一个旅和陈渠珍部已逼近桑植。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抛弃桑(植)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待“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于是,红四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向西北转移。途中因侦察失误,遭到国民党军袭击,部队伤亡300余人,遂转移到鹤峰休整。10月下旬,红四军乘鄂西国民党地方部队兵单力薄,向五峰、长阳游击。12月攻占了长阳县城,帮助中共长阳县委建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在此之先,中共长阳县委曾于6、7月间领导数千农民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俊任参谋长;8月遭到国民党军张发奎部的进攻而失败,李勋牺牲,红六军溃散。在红四军帮助下,红六军余部组成了长阳独立师。随后,中共湘鄂西前委留下长阳独立师坚持原地斗争,率领红四军沿清江西上,相继攻占巴东、建始、恩施等县大部地区,消灭了当地的团防武装,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扩大到了长、

巴、建、恩等县。

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达鹤峰,向中共湘鄂西前委传达了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湘鄂西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同时,在鹤峰留下一个红军独立团,在桑植留下一支红军游击队,由汪毅夫(为前委负责人兼鹤峰中心县委书记)指挥,继续坚持湘鄂边区的游击战争。3月初,中共湘鄂西特委率领红四军由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东进鄂西与红六军会师的行动。其间,途经五峰、松滋、澧县,先后与川军郭汝栋部长26师、国民党独立第14旅彭启彪部周旋;与松(滋)、石(门)、澧(县)3县反动武装、国民党军戴斗垣旅激战,三进两退,最终于是年7月4日辗转进入公安县境,胜利实现与红军第六军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开始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以百色为中心的左江地区,与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包括恩阴(今田阴)、奉议(今田阳)、恩隆(今田东)、思林(今属田东)、东兰、凤山等10县;以龙州为中心的右江地区,西北与左江地区相连,西南与法属安南(今越南)毗邻,包括崇善(今属崇左)、养利(今属大新)、靖西、龙茗等10余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员韦拔群、余少杰等在东兰、凤山、沿河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农民运动。国民党叛变工农革命后,广西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但尚保存了一批干部和农民武装。1929年春,蒋桂新军阀战争爆发,广西的反动

统治秩序混乱,这给发展革命力量造成了有利形势,广西革命开始复兴。4月,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战败出走。6月,蒋介石委任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倾向进步,同情工农革命,靠近中国共产党。他们深知中共在广西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扩展自己的力量,防范蒋介石的算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共合作,派干部到广西协商共事。中共中央抓紧机会,与俞、李建立统一战线,先后从广东省委及中央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干部40余人到广西,与早期派往广西的中共干部雷经天、俞作豫(系俞作柏的胞弟)会合,开展广西革命形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

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一方面对俞、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领导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特别是注重抓兵运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职,争取兵权。张云逸担任了广西警备队第4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担任了第5大队大队长,龚鹤村担任了南宁市公安局长。这两个大队共6个营18个连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明瑞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兼任总队长。总队设3个营9个连,有学员1000多名。9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个连队都建立了中共党组织(不公开)。还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等办法,撤换警备队和教导总队中的反动军官和教官,剥夺他们的指挥实权。在士兵中加强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开展士兵民主运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积极慎重地吸收先进士兵加入共产党,为

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大力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警备第4、第5大队、教导总队,由军阀部队朝着革命军队的方向不断转变,面貌日趋焕新,领导权很快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伍。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正确领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的机会,加紧建立各地党组织,各地工会、农会组织。并以成立“护商大队”名义,经俞作柏同意,拨给韦拔群一批武器,装备东兰、凤山地区农军;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省政府委任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干部,进一步推进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随着各地农运的恢复和发展,广西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雷经天、韦拔群为省农协筹备处正副主任委员。到9月中旬,广西全省有共产党员420人,共青团员130人,中共县委(特支)和党支部24个,全省革命形势有较快的发展。根据邓小平、贺昌的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于9月10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讨论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选举新的中共广西特委,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和方针。在邓小平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对后来举行百色、龙州起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矛盾尖锐化。俞、李决心与广东张发奎联合反蒋。邓小

平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分析,认为俞、李执掌广西不到半年,势单力薄,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就打乱中共对广西工作的部署。于是在真诚劝阻俞、李权衡利弊、不盲目出兵参战的同时,作出了应变举措。与贺昌共同决定:将中共在广西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把共产党已掌握的武装力量撤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和左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于是中共广西特委及时派出雷经天等大批干部分赴右江和左江地区,筹建县委,加强农协,使右江和左江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得到加强,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忠告劝阻执意通电反蒋,随即出兵进攻广东。邓小平、张云逸等以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应加紧训练和保卫后方安全为理由,向俞、李建议,将这三支部队转入战争状态留守南宁。俞、李接受了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建议,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还接管设在南宁的军火库等机关。几日后,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指示:在蒋、张、俞、李军阀并战的形势下,广西必须加强对工农斗争和兵运的领导,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并“发展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1929年10月8日)。同时又要求广西特委继续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工作中心。此间,俞、李出兵反蒋已经失败,蒋系军队三个师逼进南宁,广西革命形势突变。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从广西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而是采取断然措施,争取主动。按照预定的应变计划,将警备队、教导总队等共2000余人和军火

库的近 6000 支步枪及大批弹药物资,分水路和陆路,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同时,对俞作柏、李明瑞、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留他们参加革命。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俞作柏出走香港。10 月底,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在广西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辖广西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起义后改称中共红 7 军前委)。在这之前,邓小平、张云逸一到百色,即召开了军队中的中共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公开在军队和地方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十大纲领”及一系列政治主张,用以发动群众;立即从南宁抢运的武器中拨出 5000 多支步枪和所需弹药,武装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并派出军事干部帮助训练;继续抓紧对警备部队的整顿、改造和充实,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反对军阀作风,“调训”屡教不改的旧军官与兵痞,扩军 1000 名以上;在军队和地方,继续建立和发展中共基层党组织,培训新的军事、政治干部,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所,为起义和建立根据地准备各类急需的干部。

正当左右江地区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时,广西警备第 3 大队 1000 余人,打着俞作柏、李明瑞旗号,进驻右江的平马、那坡(今属田阳县)地区,与当地豪绅地主相勾结,成为右江反动势力的支柱,还图谋火并俞作豫指挥的警备第 4 大队、镇压右江革命运动。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的周密计划和指挥下,警备第 4 大队(有 300 多农军配合)将第 3 大队缴械。获枪 1000 余支,镇压反动大队长熊镐。进而清除了武装起义的一大障碍,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成立红七、八军的指示传达到百色。邓小平立即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后,中共中央电示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广西工作。临行前,邓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李明瑞作了长谈并以前委名义约请李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毅然表示参加起义。此后,中共广西前委(邓小平赴上海期间,前委工作由陈豪人负总责)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邓小平的部署,迅速将左右江地区的警备队、教导总队和农军武装,编组成三个纵队:以原第4大队2个营为骨干,扩编为第1纵队,李兼任纵队司令,沈静斋任政治部主任,约1000多人;以原第4大队1个营、教导总队一部为骨干,加入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农军武装合编成第2纵队,胡斌任纵队司令,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约1000多人;东兰、凤山等县地方武装1000多人合编为第3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大团。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正式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仍由邓小平任书记。同一天,右江地区11县农会代表五镇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委员会代表共80余人,出席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政府成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的初步形成,广西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广西特委在邓小平领导下,加紧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准备的同时,也抓紧了发动左江地区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疏散行动中,俞作豫执行特委计划,将警备第5大队转移到左江地区,以龙州为据点,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打着俞作伯、李明瑞的旗号,就任左江督办,接管左江军政事务,扩充武装,使警备第5大队由原来的3个营1000多人枪,扩大到6个营2000多人枪,并加紧部队的整训和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为稳定和发展左江地区革命形势,派出了一批中共干部和革命青年深入镇、乡、村,宣传和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工会、农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共有11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各县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和工人赤卫队合约6000人。先后委任了龙茗、万承、宁明、明江、养利等县县长。11月中旬,警备第5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被桂系军阀所收买,胁迫两个营袭占龙州,举行叛乱。在李明瑞、俞作豫的指挥下,左江地区工农武装配合第5大队主力合围龙州,激战三昼夜,平息蒙志仁叛乱。此次作战,对部队是实战锻炼和考验,成为武装起义的预演。平叛结束后,邓小平从百色到龙州,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红八军的指示:分析了左江地区形势,确立了龙州起义计划大纲,(原定龙州与百色同时起义,因发生蒙志仁叛乱,而推迟);指示俞作豫加紧整顿、改造警备第5大队,等条件成熟时再宣布武装起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以第5大队为基础,加入农民赤卫军一部,改编为一个旅,李明瑞任总指挥,俞作豫任旅长,下辖2个团6个营,委任一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岗位的职务,成立了由徐开先任书记的中共左

江军委,以加强军事斗争的领导。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成立,大大推进了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只是秘而不宣。

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正式宣布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以原警备第5大队为骨干扩编而成,辖2个纵队,何家荣任第1纵队司令,宛旦平兼第2纵队司令,全军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推荐报上级批准,李明瑞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红八军军委。7日,邓小平由上海返桂直奔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与红八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左江地区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兼任书记(何世昌代理)。同时,调王逸接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红八军成立后,为发展根据地,保卫革命果实,除留第2纵队一个多营和农军、赤卫队一部(合约2000人)警卫龙州外,红军主力即分散在各地开展游击活动,清剿土匪武装,帮助地方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还抽调一批枪支武装龙州工人赤卫队。军部还开办了一所“军事政治训练学校”,招收100余名学员,培训所需的军事政治干部。

继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之后,又爆发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这对于国民党桂系军阀说来,是一个重重的打击。他们窥视到红八军主力分散,龙州空虚,于是调集第15军第11师3个团的兵力,联络左江地主武装4000多人,以突然动作,围攻革命根据中心龙州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缺乏思想

准备,被迫率领军部和第2纵队守城部队和工农武装2000余人,仓促迎战。浴血抗击一天,给进犯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后,率队突围。转移途中,俞作豫迫于形势,带几十名干部离队出走(后来被捕,在广州牺牲)。余部数百名官兵被国民党军收编。红八军第1纵队在分散游击中亦遭损失,为摆脱国民党军追堵,在滇桂黔边不断流动,历时半年之久。1930年10月间,进入右江地区,编入红军第七军。

百色起义胜利后,广西国民党军即开始进犯右江地区。为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红七军主力展开游击战争,以一部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在隆安与进犯的国民党军4个团,激战一场,将其重创后,转向桂黔边游击。6月上初,回师右江,歼灭桂军警卫第4团,收复百色、恩隆、奉议、恩阳诸城。与此同时,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人,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通过苏维埃政府颁发法规、条例,制定政策、方针,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鼎盛时期,革命根据地区域达20个县,人口达100万,武装力量达1万余人。当时李宗仁曾哀叹说:“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30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的作战计划,命令江西红军第1军团、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湘赣红军第3军团、鄂豫皖红军第1军、赣东北红军第10军和广西红军第2军,分别去攻占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等中心城市,首先夺取数省革命的胜利。中共红七军前委对中央赋予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等任务进行了认真讨论。邓小平和张云逸坚持

认为,在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已恢复对广西统治,统治基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几千人枪的红七军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不实际的;对岗(邓拔奇,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持主张执行党的指令。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会议决定红七军北上作战,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决议和作战计划,讨论了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的指示;选举新的前委,邓小平任书记,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李朝纲、黄一平等为委员;全军改编为师团建制,下辖三个师。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原第1、第3纵队合编为第19师,龚鹤村兼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下辖第55、第56团;原第2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合编为第20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黄治峰任副师长,下辖第58、第59团;第21师待组建,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黄松坚任副师长。全军共7000多人(不含第21师)。第19、第20两师,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北上执行中共中央指令,韦拔群、陈洪涛率领80余人打第21师番号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1月9日,红七军第19、第20两师开始由河池北上。原计划经庆远(今宜山县)直攻柳州。因庆远国民党军早有防备,部队绕道渡过龙江到罗城,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阻击,撤出战斗后,转到三防休整。12月5日,部队攻占融县(今融安县)未

果,旋即退至桂黔边的三江县境。此时,中共红七军前委闻悉:柳州、庆远等地国民党军已移师桂林布防,于是率部向湖南的通(道)绥(宁)进发。时值冬季,部队远离根据地进入新区,粮、弹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非战斗减员增加。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前委决定攻占武岗县城,以筹措粮饷,解决冬装。武岗未克,部队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年1月上旬,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总结部队此次行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日后行动方向。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从报纸上得知朱毛红军割据江西的消息,力主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拟将部队拉到湘粤边,寻机进入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会议决定采纳邓、张、李的主张。会后,红七军即离开全州,向湖南江华县进发。途中发现湖南国民党军已在宁远、蓝山地区设防拦截,于是折转向湘、桂、粤3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前进。在桂岭圩,部队进行休整,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此后,红七军向广东进发途中,在乳源县境遭到粤军三个团的围攻,部队伤亡很大。是役后,中共红军7军前委打消了在乳源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坚定了率部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决心。嗣后,红7军在邓小平(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时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一路征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参加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自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开始北上作战行动,到1931年7月胜利进入江西,部队沿桂、湘、粤、赣边境,艰苦转战数千里,历时10个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这既展示了红军指战员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

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三党”正视这个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乡建派则否认这个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找到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在各革命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1928年底,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等决议案陆续传达到各根据地,这对统一各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2月,湘赣边界特委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神圣权利。但是,《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就引起了一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不满。土地法还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这也是土地私有观念很深的中国农民难以接受的。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原则性的纠正。

1929年7月,闽西党组织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在邓子恢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了新的发展,如:规定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

出路,酌量分配土地;对富农不过分打击,根据贫农要求只没收其自耕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以争取其中立;对中农不没收田地,不使其受任何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不予没收;在土地分配方法上提出了“抽多补少”的原则,即不打乱平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平均分配。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的 50 多个区、600 多个乡解决了土地问题,80 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1930 年 2 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否定了按劳动力多少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雇农的作法,决定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会后,赣西南的土地斗争迅速开展起来,30 多个县分配了土地。6 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县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重申了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并针对富农把持肥田、以贫瘠土地让人的做法,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

1931 年 2 月,毛泽东针对农民不拥有土地私有权而不安心耕种的情况,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指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鄂赣、右江等根据地,共产

党也领导当地军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终于制定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的土地分配办法。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联合占农村人口 90% 以上的劳动群众,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一条彻底的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井冈山红军反“围剿”斗争

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反“围剿”

1928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 1 团在遂川一带游击,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 27 师以 1 个团又 1 个营(即第 81 团和第 79 团 1 个营)的兵力由吉安开进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暴动农军和工农政权的同时,又以第 79 团的 1 个营(300 人)进占了宁冈新城,准备“围剿”井冈山红军。毛泽东得悉杨如轩部进占宁冈的消息后,决心集中力量首先拔除这个据点,消灭该营。遂于 2 月 4 日率领第 1 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多次侦察发现:杨部 1 营共三个连,营部率一个连驻宁冈新城北街县府大院;另 1 连驻南街天主教堂;又 1 连驻南门

外选锋书院；城内还有靖卫团 100 余人。杨营误认为工农革命军仍在遂川，戒备松懈，每日清晨在南门外出操。经过充分的准备，工农革命军第 1、第 2 两团在赤卫队配合下，于 2 月 18 日拂晓，由南、北、东三个方向，对新城驻军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攻占新城，全歼该营和靖卫团，俘虏近 300 人。将杨如轩对井冈山的第一次“围剿”，击破于计划实施之前。战后，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杀不打，医治伤兵，愿留者欢迎，愿走者发路费释放的政策，进而形成了红军优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红四军第二次反“围剿”

1928 年 4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接应下，出湘南顺利地转移到井冈山。朱、毛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 月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不久又缩编为二个师共四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全军共 6000 余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中共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军参谋长。红四军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于实行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28 年 4 月 21 日，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军开始协谋对红四军进行“会剿”。也正是在此时间，红四军军委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向临近各县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达成上述战略目的，决定在赣省国民党军杨如轩师发动新的“围剿”之前，由毛

泽东率领第 11 师在根据地内,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工作,并以一部兵力监视永新和酃县、茶陵方向的国民党军动向;由朱德和王尔琢率领第 10、第 12 师出击遂川,进行发动群众和筹款的工作,以扩大红军影响和根据地。

4 月下旬,赣军杨如轩第 27 师第 79、第 81 两团,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湖南国民党军吴尚第 8 军第 1 师进占了茶陵、酃县地区。朱德、王尔琢率部出击遂川途中,在黄坳与杨师第 81 团后卫遭遇,经红军猛烈冲击,该团后卫溃逃五斗江。朱、王迅速查明第 81 团企图后,决定放弃出击遂川的原定计划,集中第 10、第 12 两师,攻歼杨如轩师第 81 团,尔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第 11 师会合,攻歼杨如轩师第 79 团,打破杨如轩的第二次“围剿”。于是,王尔琢率领第 10 师第 28 团向溃逃五斗江的杨如轩师第 81 团所部追击,朱德率第 10 师第 29 团直趋拿山,寻歼第 81 团主力。4 月底,杨如轩师第 81 团进犯五斗江,当即遭到红四军第 10 师第 28 团的痛击,该团大部被歼,一部败退永新。继而,朱德命令红军第 28、第 29 两团乘势进攻永新县城,将杨如轩师第 79 团第 3 营击溃,共缴枪 300 余支,迫使第 81 团余部丢弃永新逃往吉安,红军进占永新。此时,位于龙源口的杨如轩师第 79 团主力慑于就歼,仓皇退兵吉安。红 4 军又将杨如轩第 27 师对井冈山的第二次“围剿”打破于“围剿”发起之前。永新战斗后,毛泽东、朱德判断赣省国民党军必将在近期再次发动“围剿”。为准备新的“围剿”作战,红四军在永新只作短期群众工作和筹款后,遂回师宁冈。

红四军第三次反“围剿”

1928年5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第27师和杨池生第9师的5个团(一说:系27师和第7、第9师各1个团),再度进占永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其部署是:杨如轩第27师部率第79团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占据永新县城,其余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等地突进宁冈。这时,红四军第28团和第31团第1营,在朱德、王尔琢率领下活动在永新以西约70华里的小西区。在接到红四军军委关于赣军重占永新并企图以主力由龙源口等地进攻宁冈的情况通报后,朱德、王尔琢遂决定率领红四军4个主力营沿禾水河北岸大道直扑永新县城,首先袭击杨如轩的师部,打掉其指挥中心,尔后在赣军侧背寻机作战,以打乱赣军的进攻部署,达成击破其“围剿”之行动。根据朱、王的决定,红4军四个主力营由小西区出发,向永新城急进,于当日夜进至距永新城约30华里的漕田宿营。杨如轩误认为是永新赤卫队,命令第79团于次日前往漕田“清剿”。翌日晨,第79团由永新西进,同由漕田东进的红四军主力在草市坳遭遇。在地形不利于红军作战的情况下,朱德沉着果断,命令第28团从正面对第79团发起猛烈冲击;命令第31团第1营由北侧山地向第79团侧后迂回。杨如轩师第79团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红军前后突然夹击,队伍大乱,指挥失措,不到2小时,全团被歼,团长被击毙。朱德、王尔琢决定不失战机,率领红军直奔永新,打敌措手不及。正午时分,红军扑至城下,赣军正在吃午饭。红军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入城内,再歼第27师师部及

师直机枪连、炮兵队、工兵队、卫生队、输送队等独立分队,和第9师第27团1个营,击伤师长杨如轩。位于龙源口地区的赣军4个团得悉上述战况后,仓皇向吉安收缩。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赣省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取得了歼灭赣军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各种枪300多支(挺),银元20余担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的空前胜利。

红四军第四次反“围剿”

随着红四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5月20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进而统一了湘赣边界红军和地方中共党组织的领导;针对红军部分官兵对边界武装割据缺乏信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消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必胜信心。5月下旬,建立了由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政府”。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又以杨池生为总指挥,率领第9师和杨如轩第27师余部共5个团前出永新,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发动新的“围剿”,同时,请求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湘南国民党军出兵,协同“会剿”。在南京政府的严令下,湘军吴尚第8军第2、第3师于6月16日后进驻攸县、茶陵,参加对红四军的“会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鉴于湘军较强、赣

军较弱且经过红军三次打击有畏惧心理以及湘、赣两军貌合神离等情况,确立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决心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进犯之赣军。

6月22日,进驻永新的赣军出动3个团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七溪岭或老七溪岭突击宁冈。是时,进驻攸县、茶陵的吴尚第8军第2、第3两师却无行动迹象。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与四军军委(已由陈毅接替毛泽东任书记)遂于22日晚确定如下决心:由朱德率领第29团和第31团1个营,控制新七溪岭要地,准备打击企图由此突入宁冈之赣军;由陈毅、王尔琢率领第28团,从老七溪岭迂回赣军侧后,打乱其进攻部署,尔后与坚守新七溪岭的部队合击赣军,求歼其一部,以打破赣军第四次“围剿”;永新、宁冈等地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进犯之赣军,使其疲惫、消耗。23日上午,赣军1个团,向新七溪岭红军阵地多次冲击,都被第29团和第31团1营所击退。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军2个团多次发起猛烈的攻击。战至午后,将赣军击溃,接着转入追击,又在白口打掉赣军的前方指挥所,随即向龙源口迂回包抄。与此同时,朱德指挥的第29团和第31团1营,也在新七溪岭实施反击,将赣军1个团驱赶至龙源口,并与陈、王指挥的第28团并肩突击,将龙源口之赣军围歼。旋即,红四军主力乘胜进攻永新县城,迫使赣军总指挥杨池生率部逃向吉安,进而胜利地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是役,红四军共消灭了赣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获步枪400余支,重机枪1挺。战后,根据地群众翘首称赞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系指杨池生、杨

如轩及其第 9 师和第 27 师部队)。

四、关于中国 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

中共六大

1927 年后,中共依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始进入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革命形势,分析当时的革命性质,进一步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有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 84 人,候补代表 34 人,代表党员 4 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听取了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和瞿秋白所作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刘伯承的组织问题、军事问题等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军事工作等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首先,“六大”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

是不对的”。决议规定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彻底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并据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其次，“六大”指出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期，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决议指出，工农运动的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是，凡是能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因而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因此党的策略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再次，“六大”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尤其批评了盲动主义。大会指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会议同时认为盲动主义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结果是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丧失了革命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展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

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

大会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张国焘、蔡和森 7 人为政治局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全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克服了“左”倾盲动主义,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策略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对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区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共六大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这主要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营垒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和检验,中共逐步地认清和解决了这些问题。

古田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党内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红军也主要来自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士兵。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坏作风大量地反映到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来,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妨碍着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在红四军的共产党

组织内也同样存在着。

1929年9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红四军领导人陈毅的汇报,审定了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了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对解决当时红四军党内在若干问题上的认识分歧,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陈毅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第一,强调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最根本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它必须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实现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努力奋斗,这是红军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类型军队的根本因素。第二,重申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指出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除打仗外,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第三,着重分析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等)的表现、来源及其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第四,规定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军政一致、军民团结的原则,并对敌军俘虏采取正确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建设的丰富经验,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总结和理论上的论证,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许多人在从事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逐渐感到“工人是有势力,然而人数少了”从而提出了“怎样做中国革命”的问题,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3—1925年间,邓中夏在《农民运动》等文章中,就大声地疾呼:“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更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为中共后来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增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日益深入。1929年9月,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关于中国

革命应“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已包含着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形势及主观客观各方面的条件,回答了中国小块红色政权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毛泽东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各派系军阀间的不断战争,客观上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存在的地方,是有过国民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湘、鄂、赣、粤等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社会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发展和激化,所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必然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其政策的正确,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发展的主观重要条件。毛泽东还进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所阐述的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工农割据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

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后来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道路。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实际上是对“城市中心论”的否定。他认为,(1)“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政策。(3)“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与此相适应,他制定了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三级武装体制和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因而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起伏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 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1927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诉诸武力。会后,田中向天皇呈递了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着重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狂妄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国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显然,东方会议后,独占“满蒙”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无暇东顾以及中

国政府忙于内战、民生凋敝、国防空虚之机,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为此,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以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为核心的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先后四次秘密派遣特务,侦察中国东北地区,据以制定武力进攻方案。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满蒙”的方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断在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作为增兵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7月,关东军特务在长春北郊万宝山挑拨中朝农民关系,唆使朝鲜浪人强占农田,造成流血冲突;并在它统治下的朝鲜煽动排华风潮,借以动员日本朝野的反华舆论。8月,又利用陆军间谍中村大尉潜入黑龙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中国驻军处死一事,制造侵华舆论,加剧紧张局势,叫嚣必须“以武力解决”。关东军作好了随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准备,处于临战态势。战争已迫在眉睫。

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狂妄叫嚣,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隐忍自重”,“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中村事件后,又电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处处忍让,毫无戒备。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派遣守备队一部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大部

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内。沈阳全城一夜之间陷于日军手中;不到一星期,日军占领了本溪、安东(今丹东)、辽阳、海城、营口、抚顺、四平、长春等 30 余座城市,控制了 12 条铁路线,辽宁、吉林两省除辽西外,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裁决”上,命令全国军队同日军“避免冲突”,“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但是,操纵国联的英、法、美等国为了鼓励日本进攻苏联,不但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侵略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在侵占辽、吉两省后,10 月又进犯黑龙江省,11 月占领省会齐齐哈尔;随即南下进攻锦州,袭取辽西。1932 年 1 月初,日军占领锦州。2 月,又回头北进,夺取哈尔滨。至此,仅 4 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气吞下 3 倍于它本土的中国领土。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山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3000 万同胞从此惨遭日军蹂躏。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

工人阶级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

争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具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率先行动,9月24日,3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10月初,23家日资纱厂工人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酝酿同盟罢工,工人纷纷退厂。接着,上海各业80万工人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与此同时,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与香港的日商纱厂所有中国工人,一律自动辞工;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率领北平广大爱国工人加入全国抗日救亡队伍的行列。

青年学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学生们还纷纷向各地方政府请愿,并派代表或结队赴南京请愿。9月27日,沪宁两地学生2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外交部,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外长王正廷,捣毁其办公处所。11月26日,上海万余学生聚集“国府”门口,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他们“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各地学生乃改请愿团为示威团纷赴南京示威。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学生集队来京请愿”,但赴南京请愿示威的学生与日俱增。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联合举行大示威,示威学生在珍珠桥遭遇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死30多人,伤

100 多人,被捕 100 多人。青年学生的热血在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社会知名人士罗隆基、王造时、马相伯纷纷撰文,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抗日主张。工商业者开展了抵制日货和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北平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工商业组织先后表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和查禁封闭日货,纷纷成立专门抵制日货的机构。抵制日货运动,致使当年的日本对华输出减少 63%,在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在日本的军事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畏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压,自发奋起还击。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首当其冲的沈阳北大营守军东北边防军第 7 旅,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奋起还击。接着,沈阳公安总队在大东区同敌寇展开巷战。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毅然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组织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日军进攻嫩江桥的战役中,马占山亲临战场率部反击,历时 16 天,给敌人以重创,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马军以 300 多人伤亡的代价,歼灭日伪军 1400 余人。全国各界纷纷函电,赞扬他们“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民族之表率”。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其他阶层的

爱国人士也积极主张抗日，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起来抗日。空前规模的反日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刚调防淞沪不久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率领全体官兵奋起抗战。

战争初起，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狂妄叫嚣4小时结束战斗。许多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为上海的中国军队最多只能支持3天。但是，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战争演变为持久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历时30多天。2月上旬，日军不断增兵，并改派植谦吉为司令官。中国方面，张治中统率的第5军增援前线，投入战斗。2月20日植田下令总攻，日军倾巢而出。十九路军和第5军并肩作战，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23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以白川义则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增援部队前来上海。此时，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3个半师团，4.4万人；中国方面参战的兵力总共不过4.5万人。3月1日，日军开始全面总攻击，从正面突破十九路军江湾、庙行防线，又迂回到防线背后浏河一带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后援无继，当晚不得不作出战略撤退。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将士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广泛有力的支援。中共中央发

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直接参战;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展开热烈的支前工作,发动了沪西 54 家日商纱厂六七万中国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海内外同胞纷纷捐款、募集物资,支援前线。据十九路军军部统计,1932 年 2—7 月间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捐款达 715 万多元,其中来自国内的近 300 万元,来自海外的 400 多万元。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为“一·二八”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和其他各地民众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参军参战,据统计,仅与十九路军取得直接联系投入作战的义勇军就有 58 支。其中有来自北平、南京以至广州、湖南、四川等地的义勇军。不少社会知名人士集资或捐款创办伤兵医院,救死扶伤。宋庆龄、何香凝在杨杏佛的帮助下在交通大学内设立了国民伤兵医院,全体中外工作人员不领分文薪水,义务救护。上海的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和社会名流黄炎培、史量才、杜月笙等组织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党”也发表宣言,主张抗战到底,要求政府火速调兵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派遣其成员直接参加抗战。

“一·二八”抗战说明,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尽管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乃至尖锐的对立,但在抗击外敌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抗日救国这个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最重大的问题上,可以找到某种共同点。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凝聚力在“一·二八”抗战中再次得到了体现。

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积极拼凑由它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以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确立了“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的新政权的方针,并策动汉奸赵欣伯、臧式毅、熙洽、张景惠等成立各省伪政府。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窜到天津,将溥仪秘密挟持到东北。1932年2月,东北四省区傀儡头目张景惠等在日军的监视、控制下,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9日,溥仪沐猴而冠,充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当“国务总理”。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双方签署《日满议定书》,完全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确立了关东军对整个“满洲”的殖民统治。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充“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溥仪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关东军牢牢控制着实际权力,成为溥仪的“太上皇”,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日方的严密监视。伪满洲国中央各部 and 所属各省政,也都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掌握实际大权。在“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军不断增兵东北,在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特务、宪兵机构,残酷推行“治安肃正”、“归屯并户”和“三光”政策,任意逮捕、杀害中国居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1932年9月,日军对抚顺附近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一次就烧毁房屋800多间,杀害和平居民3000多人。

日本侵略者执行“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权开发东北的一切矿业资源。为此，关东军积极组织“经济调查”，炮制经济掠夺计划，以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为掠夺重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在东北最大的殖民垄断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还疯狂推行武装移民政策，霸占大片良田，抢掠大量农产品。据统计，东北出产的近 1/2 的豆类及其制品、近 2/3 的粮食被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严重破坏了东北的农业生产和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日伪当局强令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学校教育实行日语化，宣扬“共荣亲善”、“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对各级教师实行严酷的“整肃”，防范师生的抗日活动。

总之，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怪胎，东北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

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加强

“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处于中日矛盾、国共矛盾、内部派系矛盾等多种矛盾的漩涡之中。中日矛盾本属首位，国民党

理应审时度势,先解决主要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共御外侮。而蒋介石既心悸于人民力量壮大和各派势力的增长危及其统治,又把遏制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帝国主义身上,因而他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介石就针对日本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南方日益发展,以及汪精卫为首的广东反蒋派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尖锐对峙的形势,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通电,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即不能御侮,如果不先平定广东的反叛者完成国家统一,就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无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合流,蒋介石重新上台,四届二中全会上,他把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提到重要日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的威胁。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皖鄂赣湘5省“剿匪”会议,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政策。此后,蒋介石多次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

“安内攘外”政策,是蒋介石集团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确立的。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一运动也影

响到国民党上层集团,匪蒋派别纷纷打起抗日旗号,乘机倒蒋,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不抵抗政策已经声名狼藉,只能以推行“安内攘外”政策来掩盖其对日妥协退止,逃避人民的谴责。其次,蒋介石集团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视为“心腹之患,甚于外敌”,而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看成是“皮肤小病”。再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进攻上海,严重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激化了代表英、美派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起家的经济支柱——江浙财阀的所在地,是其政治、经济统治中心。因而,为了维护其统治和英、美在华的经济利益,提出“安内攘外,兼顾两难”的方针,企图在确保安内的前提下,“抵御外侮”。

法西斯统治网络的形成

蒋介石为了全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家机器,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

军事力量是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柱石。1932年1月,国民党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总揽其军令、军政事项。3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6月,军事委员会通令将国民党的军队统一编为48个军96个师,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由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为了加强这支正规化的“中央军”,还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购买

外国军火。1933年7月,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对师以上的高级军官施行“精神训练”,这是国民党强化军事力量的重要一环。除了正规军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建立了省以下的地方保安机构和保安团、队。到1934年6月,豫、鄂、湘、赣、皖、苏、浙、闽8省“民团”扩大到1700万人。

特务组织是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主要工具。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军队中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早在1927年底,陈果夫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这就是CC的由来。在1929年国民党三大上,陈立夫担任了中执会秘书长。二陈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组织部门和基层组织,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CC系集团。1932年初,以二陈为中心成立“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会长是蒋介石,核心人物有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等人。在陈果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党务调查科”(后扩大改称“党务调查处”),专门从事特务活动,它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处”的特务组织和活动后来扩大到各省市党政机关、文教部门以至经济机构。1932年3月,在蒋介石指使下,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以蒋介石为社长。尔后,在其内部还成立了一个更为秘密的内层组织“力行社”,并设立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等。复兴社的活动范围起初主要是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后来扩展到其他方面,复兴社设有以戴笠为处长的特务处和以康泽为头目的别动队,专门从事特务活动。这个特务系统后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称作“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特务组织逐步扩展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全国范围的特务恐怖统治。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基础环节。国民党通过推行保甲制度,逐步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统治网络。1932年8月,颁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先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又进而把保甲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国民党政府把一个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甲。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组织依照所谓“管、教、养、卫”的原则进行活动。“管”,即清查户口,稽查出入境的居民,监视居民言行,强制实行“连坐法”,强行订立保甲规约,在规约中强制居民承担各种义务;“教”,即进行法西斯的“党化”教育和反革命宣传;“养”,即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进行公开的敲诈勒索;“卫”,即抽选壮丁,编练民团,修筑工事,搜查缉捕革命者,镇压无辜百姓。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国民党的基层统治。

党化教育与新生活运动

国民党当局在加强常备武装、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还大力实施党化教育。南京政权建立伊始,便着手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党化教育,采用训练党员的方式训练学生。各地国民党党部纷纷成立了党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更换违反“党义”的教职员,审查和销毁不合“党义”的课本,以全面监督各校党化教育的进行。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通过了《确定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案》,依照这个宗旨,国民党当局制定了《大学新增党义课程标准》。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并对小学、中学、大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提出不同要求。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使党化教育方针更加具体化。

在以学校为主进行党化教育的同时,国民党还发起了一场所谓旨在“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进行的。仅1934年2月至7月期间,蒋介石就先后6次发表长篇演说,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逐步完善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方法、步骤,健全了领导机构。

1934年7月,由蒋介石自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在南昌宣告成立。蒋声称,新生活运动是三民主义文化、经济、国防、科技、地方自治和新生活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希望每一个国民都能以个人的良知良能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规定,以“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以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中心目标;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实施原则;以“由近及远,推己为人”为推行方式;将新生活运动贯穿于每个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

为了促进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也确实吸收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公共道德、卫生习惯等

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起到了一定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其实质却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用封建道德禁锢人们的思想,以配合了国民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成为强化法西斯统治的重要手段。

三、局部抗战的再度夭折

长城抗战

日本侵略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就以华北为基地向我国关内扩张,对华北实行蚕食政策。

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故意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轰临榆县城,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南京政府不予支援,1月3日山海关失陷。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进犯。热河守军万福麟、汤玉麟两部望风而逃。3月3日,汤玉麟截留250辆军用汽车装载珠宝财物、妻妾卫队逃离承德。日军以128个骑兵占领承德。全国舆论大哗,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推卸责任,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遗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并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以应付舆论。

日军占领承德后,中国军队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一线。3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长城各口,中国驻军顽强抵抗。在喜峰口,宋哲元二十九军将士奋勇御敌,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日军多次强攻,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在古北口,中

央军关麟徵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冷口驻军商震部黄光师也英勇抗击,日军未达目的。

长城抗战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士气与能力。中国官兵利用夜战、近战,使日军的优势武器难以发挥效力。全国各界民众热烈支援长城抗战,平津各报纷纷发表社评,要求国民党当局趁时实行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违逆民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对日妥协方针,派亲日派黄郛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

日军窥破蒋介石的态度,以加紧军事进攻来促使蒋介石的妥协。4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11日,冷口驻军弃守;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13日奉命撤退。日军随即猛攻南天门,中央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七昼夜。5月13日,中国军队奉命后撤。

与此同时,黄郛、何应钦在北平与日本代表频繁接触,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条件,并屡电前方部队按日军指定之线路撤兵。30日,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到塘沽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正式会谈;31日,熊斌在日方早已拟定好的不容更改一字的协定上签字。《塘沽协定》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福建事变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参加“剿共”战争后,抗日决心并未泯灭;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宣言使蔡廷锴、蒋光鼐受到很大触动。1933年夏,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一再催逼下进攻连城,遭到红军痛歼,损失惨重。蔡廷锴等决心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变抗日“剿共”为联共抗日反蒋,9月下旬,派陈公培与彭德怀进行停战谈判;10月又派徐名鸿进入中央根据地与红军代表潘汉年进一步会谈。26日,红军和十九路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准备实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同时,陈铭枢在香港与国民党内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陈友仁以及“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等筹划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

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福建事变爆发。大会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济深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星旗为国旗。

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文化教育上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原则;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实现关税自主等。

福建事变是“九·一八”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是

国民党内民主进步势力发动的反蒋抗日事变,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面临着新的民族危机而激起的新觉悟的表现,标志着国民党阵营的更大分裂,反映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引起很大反响。

蒋介石被迫变更原定的“围剿”红军计划,从江西“剿共”前线和京沪一线抽调 11 个师入闽“讨伐”,并在十九路军中进行频繁的利诱、收买活动。日、英、美等国的军舰也以护侨为名开抵福州、厦门,进行威胁。十九路军寡不敌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领导人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1934 年 1 月 13 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其领导人分海陆两路离开福州,大部分避居香港。福建事变失败。不久,蒋介石正式取消十九路军番号,十九路军这支闻名中外的抗日部队不复存在了。

四、国民党新军阀的再次混战

王家烈与毛光翔贵州之战

贵州军阀早期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黔西团练王文华、袁祖铭为主的盘江八属兴义帮;另一派是以贵州巡防营周西城、毛光翔为主的黔北桐梓帮。1921 年兴义帮首领王文华被刺后,袁祖铭率部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成为北京国民政府的帮凶,并对支持广州国民政府的川黔系军阀熊克武、石青阳等人作战。周西城、毛光翔则率部投靠了川东边防督办石青阳,驻军川南,在熊克武的指挥下夹击入侵川南的北洋军。

1924年,熊克武战败,率军入湘,周西城又投靠了袁祖铭,率3个旅驻军黔北。1926年夏,袁祖铭率部参加北伐,贵州遂成为周西城一统天下。1927年4月,由国民政府委任周西城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则成为周西城的妹夫。1928年秋,贵州发生了李燊龙图黔兵变,李燊龙率黔军第43军由鄂西打回贵州,同时勾结云南龙云在南策应。同年冬,李、龙两路大军攻逼贵州境内。周西城在1929年5月底率部在关岭镇与李、龙两军指挥作战中阵亡。周战亡后,毛光翔继任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和第18路军总指挥职务。但毛光翔是个庸懦无能之辈,只因是周西城的妹夫才得以继任,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将领的不满,特别是拥有兵力最强的副军长王家烈所不服。王是贵州桐梓人,在辛亥革命时投奔黔军,在周西城部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由士兵升至师长,对周在黔的扩张过程中出力最多,不甘心居于毛光翔之下,因而便为日后王、毛争夺贵州统治权之战种下了祸根。

毛光翔掌握贵州军政大权后,仍沿袭周西城的一贯方针,在人员的使用上,以出生桐梓为升迁标准,带有浓厚的封建地域观念。在对外防护上,以湘西为外府,派军队控制湘西,以保护鸦片输出通道,屏护黔境安全。1930年夏,彭德怀率领红5军团进攻长沙时,湘军告急,何应钦要求毛光翔出师增援何键,毛遂派王家烈率部入湘,由国民南京政府委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由于蒋介石扣押了胡汉民,形成了宁粤对立,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王家烈驻防湘西,受蒋介石的笼络,倒向南京方面。而毛光翔则因为依靠广西为通道向外输出鸦片,在宁粤对立中态度暧昧,表示中

立。在这种情况下,黔籍国民党军政大员何应钦、王柏群急于获得贵州的控制权,加紧对王部补充武器弹药,并从经济和其他物资保障上予以大力支持,策动王家烈伺机进兵贵阳,倒毛主黔。毛光翔得知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心中甚为恐慌。此时,黔境留有4师2旅兵力,共约1.5万余人,但战斗力不强,且驻防黔北各旅也有反毛投王迹象。王家烈率湘黔军有2师2旅,共约1.4万余人,但武器装备好,部队战斗力强,且又有何应钦等人的支持,驻防湘西,进退有路。毛光翔为防王家烈反叛,与部下第2师师长犹国材密谋电召王家烈回省述职,企图借机将其扣留。

王家烈此时心中早已有数,既已与何应钦联手,便不再听从毛光翔调动。因此,毛光翔几次电召,王仍拒不奉召回省。1932年2月,王接到省内密报,得知黔北防务各旅已发动反毛兵变,遂以第1师师长留守湘西,亲率教导师及简文波的第2旅向贵阳出发。王率部到达芷江时,接到南京军政部委任其为第25军军长的命令,为此更加气盛。王令其教导师副师长柏辉章率部昼夜兼程,直达贵阳郊外,抢占城外诸要隘,随后王率主力围逼贵阳,作攻城姿态。此时,贵阳城内兵力空虚,防守不严。而黔北兵变正乱,毛光翔慌了手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急忙派犹国材为代表,与王家烈谈判。随后毛通电辞职,推王代理省政府主席,旋即南京政府回电明令加委王家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王家烈入主贵阳后,将毛光翔的权力剥夺尽光,毛身边幕僚也驱逐已尽。毛遂于8月离开贵阳,出走息烽。后经王派员说和又将毛请回贵阳,委以虚衔,实为软禁起来。王家烈主政

后,由于权限分配不公,身边亲信多委以要职,而对黔北起兵反毛各部将领并未任用,对毛光翔的旧部也未做彻底改编。因此,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不久,驻防黔北各部又准备起兵反王,推毛重新主政。毛光翔接到这些情报后,一方面害怕消息走露王会加害于他,另一方面也急于出面策划倒王兵变,遂化装逃往乌江以北,与旧部第2师师长犹国材、第3师师长蒋在珍等人联系,纠集旧部在遵义通电讨王。王家烈闻讯后,派第2旅旅长简文波率部去遵义讨毛,在遵义城外与蒋在珍部交锋,由于简文波旅是王家烈的一支主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兵员素质较好,战斗力强。而蒋在珍部,因是败军杂勇纠合在一起的,战斗力很弱,战斗未及展开便急忙退入遵义城内固守。毛光翔在遵义城内见王家烈主力军外出,贵阳兵力空虚,便一面固守遵义,牵制王部主力,一面令犹国材率其主力从后侧进攻贵阳。同时,又派员到王部柏辉章部用重金进行收买。11月5日,犹国材师由安顺进逼贵阳。王家烈派柏辉章率5个营的兵力出城迫敌,不料柏辉章却趁机叛王投毛,与犹国材部合为一股,内外结应反攻贵阳。王家烈见势不妙,急令留守湘西的何知重师速返贵阳增援。同时,王率余部撤出贵阳,取道平越、八寨到榕江与率部来援的何师会合。

王家烈逃出贵阳后,毛光翔即返贵阳重任省主席,随即派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3个师,分路向榕江进攻,企图将王家烈一举歼灭。11月中旬,毛、王两军在榕江以北的八寨地区展开激烈战斗。王家烈、何知重指挥所部,采用伏击战法,首歼犹、蒋联军的先头部队吴剑平部。1933年1月初,王家烈率部在龙里与毛部主力部队相遇。这时,毛光翔部除犹、蒋、车3个

师的兵力外,又从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借来陈孔达旅助战,兵力较多。王家烈部此时只有1师2旅的兵力,在数量占劣势。但王部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较好,又因获得了何应钦处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补充,因而在龙里决战中,王部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各个破敌的作战方法,先破蒋在珍,后歼车鸣翼,再击犹国材师,经过几天激战,先后将毛部击溃,并于1月19日乘胜一鼓而下贵阳,王家烈又重新入省主政。

王家烈重返贵阳后,接受了上次入主贵阳的教训,即命主力西追犹国材、吴剑平部,以绝后患。犹、吴两人势穷兵竭,已无力再战,遂率残部退入云南投靠龙云。王又派1个师追击蒋在珍残部,蒋率部逃入四川綦江投靠了刘湘。

同年春节过后,犹、蒋两部残军经龙云、刘湘分别补充后,逐渐恢复元气,又在龙、刘的支持下,不断入犯黔境,均被王家烈派兵击退。由于贵州历史上长期遭受川、滇客军的侵犯,黔人饱受战争之苦,地方士绅认为毛、王之战已止戈,而犹国材、吴剑平、蒋在珍等人却寄身川、滇,将有重招客军入侵之虞,为此政系要人、社会名流均出面调停。在此情况下,王家烈做出让步,同意将黔西盘江八县让与犹、吴两部驻防;黔北绥阳、正安地区让与蒋在珍部驻防;毛光翔回原籍赤水养老,不得再重新入政,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1932年2月26日,毛光翔退去,王家烈率部进入贵阳,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至此,持续1年之久的王家烈、毛光翔争夺贵州统治权的战争宣告结束。

韩复榘与刘珍年山东之战

1929 年底,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被蒋委任为河南省主席。1930 年春,中原大战爆发时,蒋介石又任韩为山东省主席,并委任为第 1 军团总指挥,负责山东方面的作战指挥。但蒋也知韩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为了抑制韩的势力扩张,除将青岛交给张学良的海军驻防外,又将第 17 军刘珍年部驻在胶东,牵制韩复榘。

刘珍年原是鲁系军阀褚玉璞的旧部,第二次北伐时,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刘珍年率部投靠了蒋介石,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 17 军军长兼第 21 师师长。刘珍年凭借胶东这块富庶之地,以牵制韩复榘为名,向蒋介石要人要枪,不断扩充实力,很快就把一支 3000 多人的残余部队扩展为 1 个师 4 个旅共 3 万余人的部队,且武器精良,装备齐全。韩复榘虽为山东省主席,但所辖鲁南和鲁西北地区比较贫瘠,且又多匪患,农村经济很落后,社会治安不良,特别是缺海口,交通又不发达,无法将土产输出换取武器装备。韩看到南有刘峙指挥蒋军嫡系部队十几万人控制着徐州、开封,山东境内又有刘珍年装备精良的 3 万余人盘踞在胶东,北方又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韩复榘感到自己四面受到威胁,于是派代表刘熙众去北平向张学良表示愿意结盟。张因在“九·一八”事变中丢弃东北,使大片国土沦亡,正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感到非常孤立和不安,也正在寻找同盟者,便欣然表示同意。1932 年春,韩复榘到北平与张学良换谱结盟,成为异姓兄弟。张除以

一所豪华宅第赠与韩外,并表示如韩对刘珍年用兵,张决以全力支持。

韩复榘从北平回到山东后,便积极部署对刘珍年的作战。1932年9月中旬,韩以刘部越过防区为名,发动了对刘珍年部的进攻作战。当时,韩复榘和刘珍年两军隔潍河为界,韩部兵分两路:韩复榘亲自指挥了3个主力旅为左翼,沿烟(台)潍(坊)公路前进,直扑掖县;以曹福林为右翼总指挥,率其第29师3个旅渡莱河进攻平度,而后两路会师烟台,共同攻击刘珍年老巢。9月17日,韩、刘两部在昌邑潍河沿线接触,双方发生战斗。刘部稍事抗击后,很快退守掖县和平度,依据城防工事进行固守。韩部追至掖县城外前进受阻。23日,韩、刘两部主力在掖县外围展开激烈战斗。激战3天后,刘部于26日退入城内继续固守。韩部左路军在韩复榘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几次攻城受挫后,便在掖县外围构筑工事,破坏交通,伺机再行攻城。在此期间,曹福林指挥的右路军在平度外围与刘部守军发生激战后,刘军也缩短战线,退入莱阳城固守。

10月上旬起,韩、刘两军在掖县、平度一带不断发生激战。韩部急于破城,刘部据城死守。韩部先后集中了9个旅的兵力,又调动3个民团,轮番对两城进行攻击,终因缺乏重型武器,无法攻破刘部据守的坚城。至11月上旬韩部攻城月余,部队伤亡严重,张学良为了支援韩复榘,从驻防津浦线的王树常军派出一个重炮营化装成韩军前去助战。韩部在张学良炮兵协助之下,于11月中旬开始对固守掖县、平度两城的刘部发动总攻。两城被韩部困守月余,城内已弹尽粮绝,无力再战,此时又受到重炮的轰击,刘珍年在莱阳城内的指挥部也受到

重炮的猛轰,刘知己不能固守,遂请张学良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刘珍年部撤离胶东,韩复榘部停止进攻,余下事宜由国民党军委会另议处理。国民党军委会此时正忙于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无暇顾及韩、刘的山东之战,便将鲁事交于张学良处理。

11月8日,张学良委托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兼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率东北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5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调刘珍年率部离鲁开赴浙江。17日,刘率部退出莱阳,自烟台乘船向温州开拔,至12月10日,刘部抵达浙江温州港。此时,胶东各县政权均由张学良交由韩复榘接收。韩、刘山东之战到此结束。

齐鲁大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争,民国后也发生过多次军阀混战。1932年9月至11月发生韩复榘与刘珍年的战事,只是众多战争中的一场小混战。韩、刘山东之战结束后,使韩又占据了胶东半岛战略要地,为其进一步扩大军事力量,独霸山东奠定了基础。

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

1928年秋冬之季,四川同盟军联合发动反对刘湘之战结束后,刘湘的军事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而刘文辉趁机抢占了刘湘的一些地盘,军事实力也有了明显扩展,陈兵13万人,占有川康90余县,超过其余七部防地的总和,跨越川黔两省,纵横千里。刘湘见刘文辉势力不断扩张,不甘屈于之下,便联通邓锡侯、田颂尧,并与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重修旧好,商讨联合反对刘文辉之战。此时,杨森、刘存厚仅有防地各4

县;李家钰和罗泽州更是无容身之地;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则对刘文辉收买他们部属的行为感到气愤和不安,因此,上述七部一拍即合,大家以刘湘为中心,结成了共击刘文辉的联盟,先后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混战。

①李、罗发动“顺庆之战”

七部反刘(文辉)联盟组成后,新编第6师师长李家钰、新编第23师师长罗泽州因寄人篱下,急不可待,于1932年9月底,首先在南充地区发动了对刘文辉第24军的进攻。李部集中在蓬安周口,罗部集中在武胜,分南北两路同时向南充推进。10月1日拂晓前,罗部先头熊玉章旅进至距南充30多公里处,与驻守在嘉陵江西岸李渡镇的陈书农师发生战斗,刘文辉部陈鸣谦旅迅即增援陈师,夹攻罗部,迫使罗部退过嘉陵江东岸,双方隔江对峙。这时,李家钰约8个团的兵力,也向刘文辉驻守在距南充10公里左右的马屎铺的24军一部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由于24军顽强据守,李部毫无进展。10月3日清晨,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率兵4个团,林梅坡率兵3个团,同时向烈西溪、走马乡等地罗泽州残部进行全线反击。罗部被迫放弃阵地,退至熊家场、王家集一带固守。

李、罗发动攻击之后,21军军长刘湘也开始向大足、永川、江津一带增兵布防。刘文辉也向上述各县运送大量弹药军资,做好了应战准备。二刘双方部队相距不过数里,互相警戒对峙,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这时,20军军长杨森也站出来,公开支持李、罗。10月12日,第20军、第21军、第23军、第28军、第29军等七部共94位师长以上将领联名发表“治川纲要”通电,主张“打破防区,统一全川”,“另立统治制度”。

这是针对刘文辉担任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占有大量防地的情况而发的,并未经省府径直在报上发表,七部联军公开反对刘文辉的阵容就此亮相了。

刘文辉见七部联盟共同对己发起攻击,自感势孤力单,为了对付联军主力刘湘,决心先集中兵力将首先发难的李、罗击败,以减除侧翼威胁,稳固北道阵地,可在必要时,抽调北道的兵力,由潼南、武胜一带进击合川,从后翼威逼重庆。因此,刘文辉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下令第24军主力,加强对李、罗残部的全线攻击。10月15日,刘文辉部王元虎旅进攻金台场;黄锡王宣旅进攻斑竹林;王学姜旅进攻梵殿场。三路同时进攻,战斗尤为激烈。迫使李家钰部退至西充境内;罗泽州部退守武胜县,第24军直逼城下。罗见县城四面受困,连忙电求刘湘增援。刘湘也惧怕武胜失守,威胁重庆,乃急派孟浩然、许绍宗两旅,隐蔽前去增援;同时又电促杨森出兵援罗。这时,第23军军长刘存厚也派刘邦俊率兵2师经营山到达南充前线,与杨森的4旅援军一同援罗。17日,四部合力,分南北两路向刘文辉部发起攻击。双方激战正酣时,陈光藻等得知第29军军长田颂尧又出动2旅,由西充向南充开进,增援李家钰部;刘湘又派兵3旅进至铜梁,威胁潼南。陈见情况不利,未敢恋战,率部退集南充城中,急电刘文辉请示方略。刘也感到形势不利,遂决定放弃北道,撤出南充、遂宁地区,调集东道,以集中兵力迫战。刘、田、杨、李、罗等军于18日不占而下南充,并继续向蓬溪、遂宁前进。刘文辉于25日通电称:“本军自动放弃遂宁、潼南各县,力求和平,避免内战,请各友军派队接防,藉弭战祸。”实际上,这是刘文辉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以

对付刘湘的主力,并想以放弃北道各县来缓和刘(存厚)、杨、李、罗的攻势,以起到分化联军的作用。24日,田部的2个师会同杨、李、罗等部进占遂宁。至此,顺庆之战告一段落。但是,在李家钰、罗泽州的一再挑战之下,一场牵动全川各军的新的混战又开始了。

②刘湘抢夺“泸州之战”

顺庆之战告一段落,但七部联军攻势未减。刘文辉见结盟之势,恐难为敌,而刘湘则为盟主,便派其胞兄、刘氏族长刘升迁,面见刘湘,劝以私情,请求罢兵,刘湘置之不理。刘文辉又转向邓、田进行拉拢,希望共同维护“保定系”的友好团结,三军继续合作,但仍未见结果。刘文辉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准备分南、北、中三路与联军决一死战。以第1师师长张清平为南路总指挥;以川康边防第2师师长陈光藻为北路总指挥;以第3师师长夏首勋为中路总指挥。以张、夏二人率主力对付刘湘主力,陈率3师之众固守北道,既可对付李、罗的攻击,又可威胁刘湘的侧背。自18日起,战事又开始紧张起来。是日,刘湘派出唐式遵、王瓚绪、潘文华3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分由铜梁、莱昌、江津沿长江西进,并空军及兵舰配合步兵作战。正在双方都剑拔弩张、引满即发的关键时刻,田颂尧在侧后发动了成都之战,想借机夺占成都。对此,刘文辉误听人言,舍主从次,抽调大量部队开赴成都,与田颂尧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成都巷战”,激战月旬,虽然取得成都巷战的胜利,但却削弱了前线的有生力量,也被邓、田拖住了后腿,给刘湘可乘之机。结果,刘湘率部三路出击,水空并进,一举夺取了沱江下游刘文辉原属的富庶防区。10月23、24两日,刘湘连发两电,声讨刘

文辉“好乱成性”，决定“联合川中各军、民众，对刘文辉予以制裁”。同时，即以陆海空联合向刘文辉的潼南、大足、永川、江津等地全线进攻，战线长 200 多公里，双方兵力共 10 万余人，而使用空、海军参战，实开川省内战之先例。25 日，王瓚绪师进占潼南，潘文华师逼近江津。27 日，潘师郭勋祺旅占领永川；31 日又攻克莱昌等地。第 24 军南路张清平部不抵刘湘部的猛攻，节节败退。11 月 1 日，刘湘部又攻克隆昌。南路守军再退富顺，死保江津。江津一线，本是刘文辉的防守要地，因其孤悬在长江南岸，攻取不易，且又筑好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来敌。刘湘也做好了夺取江津的准备，以其川东边防第 2 路军穆瀛洲部沿长江南岸，以其嫡系何克修、廖泽 2 旅沿北岸，以海、空司令蒋逵率“巴渝”、“长江”2 舰，配飞机 2 架，溯长江西上，三路大军直抵江津城下。守军在刘湘陆、海、空三面轰击之下，顿时大乱，纷纷弃城往南山奔逃，直向合江退去。穆部迅即夺占江津，又克合江。张清平率残部只得退往泸州。

此时，北道方面的杨、田、李、罗等部，在杨森的统一指挥之下，11 月 2 日攻取安岳之后，各军从东、北两面齐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为缩短战线，保存实力，只好将主力移至威远、自贡、宜宾一线退守，而以另一部兵力屯驻仁寿，以防侧翼袭击。3 日，刘文辉发出通电，愿让出温江、崇庆、金堂、新都、南充、遂宁等 15 个县，期与邓、田、杨、李、罗等人换取和平，但未被接受。5 日，刘文辉与手下将领商讨战事，决定集中兵力，对付刘湘主力死守沱江，力图反攻。因此，二刘以争夺泸州为重心的大战又打响了。从 9 日至 11 日，这 3 天战斗尤为激烈，刘湘转由永川移驻泸州对岸，督师攻打泸州。刘文辉则坐阵泸

州,督师死守。刘湘水、陆、空三军猛攻。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之下,泸城内外,一片焦土,守军击沉兵舰1艘,击落飞机1架。穆瀛洲、廖泽两部屡次攻城不克死伤过半,尸体顺流漂至重庆码头,麇集成堆,伤亡惨重,由此可见。18日,龙透关被刘湘部攻克,刘文辉部遂退入城中固守。22日晚,刘湘部用夜袭办法,占领泸州城,守军小部冲出逃走,大部被缴械。23日,潘文华师进克荣县、宜宾等地。此时,杨、田、李3军又夺取了资中等地。刘文辉被迫将主力撤至东山,退保岷江流域各县。26日,刘湘进驻泸城,随后又令部占领犍为,进逼东山。至此,刘湘一举夺得川东南20余县。而刘文辉却丧失了沱江流域的千里沃土。为此,刘文辉并不甘心失败,决心以全力对刘湘,挽回败局,收复失地。于是又积极进行“荣威之战”的作战部署。

③刘湘、刘文辉“荣威之战”

刘文辉在“泸州之战”中虽然痛失沱江下游千里沃土,部队遭受一些损失,但主力尚在,还可以与刘湘决一雌雄。12月初,刘文辉与邓锡侯达成协议,将成都交与邓看守,集中兵力准备对刘湘进行“荣威之战”。决定由张清平、陈光藻、夏首勋、冷薰南分任第1、第2、第3、第4路总指挥,刘文辉在眉山设立作战总指挥部,统率共约7万兵力,集中主力于荣县、威远一带,而以荣威为主要目标发起攻击。刘湘方面则以唐式遵、王瓚绪、范绍增、潘文华分任第1、第2、第3、第4路总指挥,刘湘本人由泸州移驻自贡,设立作战行署,亲自指挥共约5万兵力,分头迎敌。12月10日起,二刘“荣威之战”爆发了。双方10多万大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激战5昼夜,互有胜负。15日起,夏首勋出一奇兵,从荣县以南向刘湘部侧背猛击,锐不

可挡,使侧翼阵地动摇,被迫向紫场等地退却,使第4路潘文华师孤军受敌。刘湘恐怕潘师遭歼,令其退守荣县白石沟一线,以图固守荣、威战略要地。但白石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潘师又折向老君台,准备在此建立防御阵地,可是此地已被刘文辉部夏首勋、冷薰南2师占领。夏、冷2师据老君台及两侧高地,摆兵布势,以逸待劳,给潘师以迎头痛击。在争夺这一要地的战斗中,双方共投入3万多人,反复争夺、冲杀血拼竟日。潘师战死者3000多人,仍未能夺下要地,只好又退回白石沟。为解潘师之危,刘湘派王瓚绪、范绍增2师前去增援,在行进途中,因遭陈光藻师等部的伏击和袭击,伤亡重大,被迫后退。陈师乘胜追击,直入威远境内。此时,唐式遵第1路军与刘文辉主力冷薰南师在东林场以北地区相遇,双方激战3日,唐师已精疲力尽,又见其他三路进攻,增援均受挫,便向松峰场撤退,途中又遭陈光藻堵击,激战两日,退入荣县双台坟固守。至此,刘湘四路大军均告失利,被迫退集荣、威,筑阵防守。12月29日,陈光藻师约5团之众,由仁寿松峰场绕道背后奇袭藻县,守军不备,一举攻入。此时,潘师指挥部驻在荣县城郊,突闻陈部破城,大为惊恐。后因无后续梯队接应,陈部自动撤回。此次奇袭,虽然在军事上收获不大,但对刘湘部的军心却给以很大打击。为怕断绝后路又开始压缩战线,集中兵力。

这时,刘文辉在军事上已占有明显优势,决定趁此机会,佯装从全面反攻,迷惑敌人,而另派精兵从小道抄至白石沟后,绕过刘湘部正面防线,实行前后夹击,乘虚直捣重庆。刘湘见战事危急,急令驻渝部队在浮图关等地赶筑防御工事,以备坚守。同时又急电促邓、田“湘智力俱竭,实难支持,请立进兵,

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请求早日出兵，向刘文辉后方进击。邓、田也怕刘湘如果真告失败，刘文辉回师进击自己。于是，邓、田又兵分三路南下，威胁刘文辉第24军侧背。此时，刘文辉所部的陈鸣谦因战功虽卓，但未受重用而心怀不满，在前线率旅倒戈，经球溪河到资中归附刘湘。陈旅是刘文辉的主力之一，陈旅的倒戈，对刘文辉打击也很大。由于以上两事出现，使战局又急转直下，为了避免再战下去，两败俱伤，刘文辉决定乘刘湘尚未喘息过来之机，谋求停战议和。12月26日，刘文辉托冷薰南致函刘湘以“两军久战，徒苦人民”为由，建议双方停战。刘湘此时正苦于官兵疲惫厌战，得信后喜出望外，立即派潘文华为全权代表与冷薰南在长山桥谈判。双方决定：第21军驻白石沟一线，第24军驻笋子山一线，各守阵地，不得射击，维持对峙局面。1933年1月10日，刘湘返回重庆；1月23日刘文辉返回成都。“荣威之战”至此遂告结束。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也由此终止。

刘文辉与邓锡侯毘河之战

1933年初，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结束后，刘文辉失去了遂宁、安岳、乐至、宜宾、泸州等县大片富庶之地，防地缩小，收入锐减。但是刘文辉仍然还保持着110个团，约12万人的庞大部队，军费开支极端困难。因此，刘文辉急于扩充防地，解决经济困难。此时，刘文辉和刘湘已经议和，无东顾之忧。而邓锡侯所属的温江、郫县、崇庆、新繁、灌县、崇宁、彭县、新都、广汉、金堂等县位于毘河两岸灌区尽是膏腴之地，但兵力只有4万余人，战斗力也弱。刘文辉便以防地缩小，饷糈奇

缺,非谋出路为名,准备凭借雄厚的势力对邓用兵,以夺取邓部所属防地。另外,在荣、威之战中,刘文辉处于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将刘湘击败,取得四川霸主地位,不意邓锡侯背信弃义,令其黄隐师伙同田颂尧部,突然袭击仁寿籍田铺,使其腹背受敌,不得不同意议和,以致失去胜利的机会。因此,刘文辉对邓锡侯切齿痛恨,旧怨未消,这也是刘文辉在荣威大战刚刚结束不久,不惜以久战疲惫之师与邓锡侯再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4月初起,刘开始调动部队,积极进行作战部署:在成都附近部署4师3旅;在重庆附近部署3个旅;在简阳、仁寿部署3师1旅;另在眉山、乐山、雅安附近地区部署了2师4旅部队。

邓锡侯见刘文辉将其主力部队调集成都附近,感到重兵压境,自己兵少力薄,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4月22日在成都华兴街黄华馆军部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诸将领一致决议,力争和平解决,避免打仗。因此,邓派员去谒见刘文辉,表明邓部第28军全体将领求和的心愿。刘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与邓适时宴聚一次,共议和平大计。但是,邓并不放心,因此,也积极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5月3日晚,邓得到密报:刘文辉有以设宴为名,乘机将其扣留,不战而屈第28军的阴谋,他于5月4日清晨,只带着几个随从,遁出北门,直奔新都陈离防地,当即决定陈离指挥所部,沿毘河北岸三合场一带设防,赶筑工事。5月6日,邓在宝光寺召开军事会议,取消了与刘议和的原案,迅速确定作战方案,调整部署作好应战准备。其兵力部署为:第2师黄隐部

担任灌县至崇宁县城沿毘河北岸一线防务；第7师马毓智部与第2师连接，担任崇宁至新繁县新郫桥、斑竹园一线防务；独立师陈离部与第7师连接，担任斑竹园至新都三合场一线防务；教导师杨秀春部与独立师相连接，担任三合场至金堂姚家渡一线防务；第3师陈书农部与教导师连接，担任赵家渡一带防务；第7师驻简阳、温江的第4、第3混成旅迅速向新繁转移。

5月8日下午4时，刘文辉部首先向毘河发动进攻。5月9日，占领温江、郫县。14日，刘文辉以30个团的兵力向毘河一线全面发动进攻。攻击的重点目标是崇宁县城、新郫桥、斑竹园、三合场。刘部以4个旅的兵力围攻崇宁县城。经过1天1夜的激烈战斗，邓部防守崇宁县城团长周子杰、县长唐炽煊阵亡，刘部占领崇宁县城。邓部残余退到北岸，将北桥烧毁，固守北岸桥头堡，双方隔河对峙。

刘部在占领崇宁的同时，向位于毘河对岸的青杠树斑竹园、新郫桥一带发起猛攻。毘河原为一条灌渠，河面既窄，水又不深。邓军为了防务，事前将都江堰内江的分水马杈砍掉，使外江水流入内江，于是毘河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成为邓军防守的天然屏障。刘部为渡河作战，征集了大量的拌桶、竹筏组织抢渡。邓部炮兵集中山炮、迫击炮猛烈轰击，竹筏、拌桶均被炮火和激流打翻，刘部伤亡极大，以后又多次组织抢渡，均未成功。23日，刘部又集中兵力向斑竹园、新郫桥、三合场等地发动进攻，并多次组织敢死队抢渡，均未得手。激战两天两夜，攻守双方伤亡俱极惨重。从下游赵家渡、淮口等处打捞上来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

自5月9日刘部向毘河邓部发动进攻以来,刘部在前线部队只有刘元塘、石肇武、余如海等几支部队积极战斗,猛烈进攻,而伤亡也大。其余部队迟迟不前,没有攻过毘河的决心,加以邓部顽强抵抗,因此战斗持续一段时间后,双方仍然隔河对峙。邓因兵少力薄,恐难以持久,便电请盟友刘湘出兵增援。刘湘借此机会于5月26日在阳华场召集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人开会,达成如下协议:

一、一致拥护刘湘统一四川;二、各军接受刘湘指挥;三、请刘湘拨发现款、弹药接济第28军作战;四、刘湘随即发兵援邓。

会后,刘湘拨款10万元、子弹10万发给邓部。

刘文辉得阳华场会议情况后,知刘湘出兵在即,七部联盟重又联手,感到形势严重,怕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在6月17日、25日致电刘湘,表示拥护刘湘统一四川,但刘湘急于利用这一机会,一举击溃刘文辉,达其独霸四川的目的,因此,对刘文辉的两次来电均未理睬。6月26日,刘湘同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6人联名发出通电,表示将以武力制止刘文辉、邓锡侯之间的战争。

正当刘湘准备出兵援邓攻刘之际,刘文辉内部分裂日趋严重。保定系师长张清平、林根云等一些高级将领约请第28军保定系的一些将领会商,一致主张刘、邓两部停战议和,并提出了具体议和条件。后因刘湘出兵援邓,战局急转直下,所议和约已无法实现。

7月2日,刘湘命令王瓚绪、范绍增两部向资中、内江集中;命令潘文华、唐式遵从荣、威方面向第24军进攻;李家钰、

罗泽州部向资阳攻击。刘文辉眼见联军再次组合从背后打来，腹背受敌，形势严峻，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毘河，退出成都，固守岷江。7月7日，刘文辉部宣布撤销成都卫戍司令部，第24军驻成都部队分批撤出。7月12日，邓部相继渡过毘河，对刘文辉部进行全面追击，收复失地。历时2个多月的毘河之战就此结束。

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新疆之战

马仲英出身于甘肃河州回系军阀世家，与青海军阀马步芳为叔伯兄弟，原名马步英，后因与马步芳决裂，改名仲英。1924年冬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省军务善后督办，派刘郁芬率军入甘。由于当时冯军气盛，盘踞在绥远、宁夏的马鸿宾等人投降了冯部。而控制凉州、青海的马仲英等人却坚决反对。1928年2月，马仲英率少数亲信回到河州西乡，利用乡土关系，在籍建立起一支2000多人的反冯武装。4月，马仲英率部包围了河州城。战败后，马仲英率部向洮岷突围，随后进入青海，又经陇中、河西进入宁夏民勤县。1929年2月22日，吉鸿昌率部进驻民勤城，马仲英等人又率部向河西走廊退去。5月5日，再度攻陷宁夏县城。6月初，吉鸿昌率部增援，经过剧烈战斗，收复银川。1931年2月，新疆发生民族纠纷，导致新疆东部地区少数民族暴动，马仲英应暴动首领的邀请于5月间率500余人入疆，被暴动的维民推为领袖。马仲英部入疆后屡败省军，至10月底率部从哈密直趋七角井，进占木垒河，直逼奇台。省主席金树仁见马仲英部剽悍善战，急电驻伊犁归化军张培元师来援，并委任张为东

路剿匪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张、盛二人指挥归化军与马仲英交战,马军不敌,退回肃州。金遂将张培元调回伊犁,另派黎海元为东路警备司令,盛世才、刘杰三人分任剿匪指挥,继续剿匪。

1932年冬,马仲英会同维军尧乐博斯部将刘杰三部5000余人诱入东疆山隘,全部予以歼灭,从此,马仲英部更加强大,并令其副师长马世明率30多名营连级军官到达维族部队任教官,进行正规军的训练,使其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1933年初,马仲英派马世明、马占仓等人率部到达鄯善,利用同族关系诱降了驻守吐鲁番的回族团长马福明,马福明又诱驻守该地的熊发友旅长率部入城,将熊生擒,部队被全部缴械。5000余人的武器,装备了麻木提的叛众。从此,在天山南麓又出现了一支反对金树仁的强大武装。

熊发友旅被诱歼后,金树仁命盛世才为东路剿匪总指挥,将所部由哈密西移。2月初,盛率部攻下吐鲁番。马世明、马占仓和麻木提等人将所部分为两股:马世明和麻木提率主力人马北上,马占仓率领一支人马南下阿克苏,乘机袭占焉耆,杀死行政长官牛时和驻军旅长詹世奎,将缴获的武器武装暴动的群众。与此同时,马世明率主力在除夕之夜,乘守军过节不防、聚众玩乐之际,袭击达坂城,夺取了这个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要隘。2月21日,马世明指挥维、哈、回部队进攻迪化城。激战一天,于当晚夺取了城外要塞红山嘴和无线电台,并从红山嘴制高点向迪化城内射击,掩护敢死队爬城作战。22日清晨,迪化城防司令白绶之和督署参谋处长陈中亲临城头作战,在城头设大炮轰击马部,夺回红山嘴和无线电台。23

日,又炸毁了西大桥外长达1里的回民街,使马世明失去攻城的依托,开始率部退至吉昌。接着,在马仲英的策动下,平康、乾德、绥来等地回民相继暴动。北疆、西疆烽火四起,金树仁政权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为最后挣扎,在3月初,金又将盛世才部由吐鲁番调到平康、乾德;将黎海元部从哈密调往奇台和木垒河;将陈品修部由达坂调回迪化城内。

3月下旬,马仲英率马虎山、马仲杰两个旅以神速的行动跨越辽阔的大戈壁,挺进到哈密城下。马部由于经过整训,纪律严明,受到维汉民众的欢迎。马仲英还采取与金树仁旧政权人员合作的方法,争取哈密行政长官韩履中起义,并由韩出面使沿途驻军放下武器,归顺马部。因此,马仲英率部一路无阻,顺利挺进到黎玉海防守的古城子(即奇台)。4月12日,马仲英率部攻城,其弟马仲杰被守军击毙,正当马仲英准备再次猛攻时,迪化城内发生反金政变。迪化县长陶明越、督署参谋处长陈中率驻城部队200余人发生叛乱,突然袭击省政府,金树仁之弟金树信被杀,金仓皇携眷属越墙而逃。但迪化城仍被陶、陈固守未破。4月14日,盛世才率部入城,就任新疆边防督办。事后,陶、陈等自恃逐金拥盛有功,对盛给的职位不满,便勾结南京国民党势力企图推倒盛世才。盛将计就计,在进行协商谈判时,将陶、陈等人处死。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从此,新疆开始了盛世才的统治时期。

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人,早年毕业于滇军韶关讲武堂,后回东北投入郭松龄部任参谋,为郭器重又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盛回国参战,失败后再次出逃日本。1926年国共合作举行北伐,盛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参谋处作战科长。1930年,金树仁来内地招聘军事人才,盛因北伐成功未受重用便应召入新。起初给金树仁任高级参谋,及至马仲英率部入新时,盛开始握有兵权,升任参谋长,后又任剿匪总指挥掌握兵权。当金树仁迪化被围,被迫出走时,盛却按兵不动,坐收渔人之利,乘机夺取了迪化政权。

盛世才入主迪化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即以左倾进步面目出现。经由中共平津党组织发动大批东北籍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入疆,协助盛制订了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随后,即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红军的援助下,盛世才与马仲英展开了争夺新疆控制权的战争。

盛世才因刚取得迪化政权,需要整顿内部,稳定局势,因此,派出吴霭宸等人为代表去古城子同马仲英谈判和平解决新疆争端问题。谈判的焦点是谁控制新疆首府迪化问题。盛世才表示他任边防督办,马仲英任省主席,马的军队不改编,仍由马为统帅。双方谈判延至6月1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总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到新疆宣抚,准备进行调停。马仲英认为黄来疆将于己不利,遂决定于6月12日突然向盛世才发动进攻。不料马的这一军事行动计划被电台台长秘密告知盛世才。盛遂埋伏重兵于马部所经要道。13日夜,两军遭遇于滋泥泉。此时适逢风雪冰雹大作,两军对垒,咫尺难辨敌我。盛部前敌指挥官李杜率部奋勇冲杀之后,迅将部队撤出,马部却在自相攻击践踏,死伤累累。14日天明,马部方知中计,马仲英率残部越过天山退往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进行休整。

马仲英在吐鲁番休整了4个多月,渐复元气,于10月初

又越过天山进扰北疆,寻机与盛部作战。10月11日,两军在达坂城相遇,盛军先锋步兵第4旅猝不及防,在马部的预先伏击下,旅长刘万魁阵亡,所部全军覆灭。17日,盛世才又倾其全军向马仲英部进攻。马仲英令其副师长马世明指挥全军及麻木提的维军采用前后夹击的战法,将盛部杀得大败。盛世才率残部逃离达坂,经数日收容始复成军,随后率部向迪化撤退。但马部紧追不舍,盛部边阻边撤,部队损失严重,于11月中旬撤至迪化。此时马仲英军连战告捷,军威复振,于11月底将迪化包围起来。

此时,新疆在军事上还存在三足鼎立的势力。一是盛世才盘踞着迪化及其附近几个县;二是马仲英控制着东疆和南疆;另外还有张培元的一个师在伊犁和北疆。张、马二人见盛部多系北方人,不愿参加新疆内战的心理,都在做策反工作,并提供交通工具争取北方籍士兵脱离盛部返回内地。盛世才获悉此情报后,以议事为名逮捕了第28旅旅长杨耀钧(原吉林自卫军参谋长)、第15旅旅长郑润成(原黑龙江救国军副官长)等与马仲英有秘密联系的高级将领多人,另提拔一批青年军官代替被逮捕高级军官的职务,牢牢地控制住了部队。马仲英获此情报后,立即约会张培元出兵迪化。年底,张培元首先发兵,并策反了盛进才部的东北义勇军旧部,扣留了盛世才由塔城运至迪化的一大批军火,接着派兵向迪化进发。

张培元攻击迪化的部署是:以主力突破绥来,进逼迪化;以驻迪化的东北义勇军为内应;另以部分东北义勇军从乌苏北上塔城,与驻塔城的义勇军会合,控制乌苏与塔城的交通。

盛世才为挽救危局,除派马占山部将拥盛的归化军布防

于呼图壁以西的乌兰乌苏阻击张培元部外,亲赴苏联领事馆求见领事格尔金·阿布列索夫请求苏联出兵援助。苏军阿尔泰军团随即开进伊宁,抄袭张培元的后路,接着又出动飞机对张部进行轰炸,并以摩托化部队直冲张部。在苏联军队的支援和强大火力的支持下,盛部开始全面反攻。张部倾刻瓦解,溃不成军。1934年1月16日,张培元兵败自杀,所部主力和东北义勇军王孝芝旅(即盛世才部第26旅)被缴械。残部由马仲英部新编中央陆军第36师副师长杨中正率领,越过天山逃往南疆与马仲英部会合。

1934年1月中旬,当张培元部向玛纳斯河前进时,马仲英乘盛军主力西调阻击张部时,也率部出达坂城,于1月12日直扑迪化,占领了无线电台和飞机场,又利用缴获的2架飞机向城内散发劝降传单。正在迪化岌岌可危之际,苏联军队从塔城南进,在头屯河与马部遭遇。马仲英部虽剽悍善战,但因陈旧劣制的武器无法抵挡机械化的苏联军队,交战初始便一败涂地,苏联军队顺利进占昌吉。2月11日,苏联军队又进攻围困迪化的马部,马仲英见苏联军队锐不可挡,便率部撤围而去。盛世才见苏联军队增援已至,便指挥守城部队乘势追赶马部,于3月6日攻克达坂城,8日进占吐鲁番。马仲英、麻木提率残部节节败退,一直退至喀什地区。为了挽回颓势,马仲英率部在巴楚与盛部进行最后一次决战,结果马部战将马世明在战斗中阵亡,马部失去指挥,部队陷入混乱,盛部乘胜攻击,马部彻底失败。最后,一部分投降了盛世才,另一部分在马仲英的率领下退往和田地区,以皮山为前线与盛部形成对峙。随后不久,马仲英偕其手下亲信280余人进入苏联寻求庇护。至

此,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新疆之战遂告结束。

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新疆之战,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在新疆境内最大的一场混战。在这场混战中,马仲英部虽然兵力较强,部队剽悍善战,但因指挥员在作战中缺少用兵谋略和正确作战方案,使这些优势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特别在初战得手的情况下,未能一鼓作气拿下迪化,为盛世才以后调整兵力进行反扑留下余地。在联合张培元,策反东北义勇军倒盛的谋划中,未能采取有效组织措施,集中兵力,形成合力,共同作战,丧失了战胜盛世才的机会,最后导致了全军失败。而盛世才在这次混战中则巧妙地利用交战双方的矛盾冲突,保存实力,扩充势力,寻机各个歼敌的战术。在作战中能够以静制动,采取坚决手段镇压和肃清内部反叛分子,保持了部队内部的统一。另外,盛世才在扩大军事、政治势力的同时,制定了亲苏共的政策,在危急之中及时得到苏联军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这也是他战胜马仲英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殿英与马鸿逵宁夏之战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人,原系豫西嵩山巨匪“仁义老张平”手下的一个小头目。民国后混入驻防河南的毅军当兵,后升任豫西镇守使丁香玲手下的连长。1924年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孙乘机拉出2个连叛变为匪,在豫西一带收编土匪和会徒,不久即扩充为2000多人,经镇嵩军憨玉琨收编为混成旅。1925年春,憨玉琨战败自杀,孙又改投国民军孙兵部任旅长。后又率部离豫到山东投靠张宗昌,获得大量的枪弹补充,成为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的师长、军长。1928年秋,

张、褚直鲁联军在蒋介石进行的第二次北伐战争中战败，孙又投靠国民党。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孙被阎锡山、冯玉祥委任为第5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孙率部挺进皖北，死守亳州百余天，牵制蒋军10余万人。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后，孙率部撤至晋南一带，被东北军张学良部收编为师长，后升任陆军第41军军长。

1932年冬，日军谋侵热河，孙殿英被张学良委任为华北第9军团总指挥，率部挺进热河，布防于赤峰、围场一线，与日伪军激战半个多月，孙军不仅实力未损，还收编了汤玉麟部3个多旅和其他一些义勇军武装2万多人。使孙部扩展到6万多人。热河抗战后，孙率部退入察东，后移沙城，控制了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咽喉，遂成为各派军阀竭力争取的对象。何应钦曾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令其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在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劝告之下拒绝接受，并保持中立，掩护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时，为帮助孙抗日，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革命青年300多人进入孙部帮助进行抗日宣传和改造工作。

孙殿英重兵在握，既不就察省主席，何应钦遂请孙改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为取得休养生息的地盘，遂在1933年7月中旬率部离开察哈尔，于7月底到达五原、临河一带，逼近宁夏。宁夏、青海本是马家军阀的世袭领地，多年来不许外人染指，见孙部大兵压境，甚感不安，马家军以第15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为首的诸多将领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对孙部移驻青海西区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为防止马家军起兵闹事，便循马家之请，电令孙部停止入青，暂驻五原、临河一带。

五原、临河位于内蒙古中河套地区,南临黄河,北是荒漠,地域狭小,进退维谷。为打破困境,摆脱不利局势,孙殿英特邀请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北方负责人南汉宸为高等顾问,经南与陕西杨虎城、陕北刘志丹、甘肃邓宝珊联络,策定了西北大联合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为:孙部借以去青海为名,攻取宁夏;杨虎城部进军陇东;刘志丹红军出击三边,并由孙部拨给刘志丹步枪 2000 支、机枪 100 挺;邓宝珊驻守甘肃以牵制马家军。待将马家军消灭后,即以杨虎城为盟主建立西北人民政权。阎锡山为了“送客出境”,允以粮食、弹药等物资随时接济。

孙殿英制定了“明攻平罗,暗袭银川”的作战方案,不料孙部的团长卫曰功(回民)暗通马鸿逵,将此作战计划密报于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商定共同出兵对敌。当时孙部号称 8 万人,而四马可投入的全部兵力只有 3 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四马决定采取将孙部放入宁夏,马家军逐步后撤,随机应变,与孙部持久作战,以逐步削弱孙部,最后伺机与之决战。其兵力部署为:平罗方面,由新编第 7 师第 2 旅旅长马宝琳率 1 个步兵旅坚守,以银川为犄角;其余宁夏军队编为 3 个支队,青海军和马鸿宾的第 35 师各为一个战斗单位。以上 5 支部队控制在银川周围,准备与孙部决战。为坐收渔人之利,蒋介石在景泰部署了胡宗南的第 1 师;阎锡山也派傅作义指挥王靖国、赵承绶师布防在包头以西,静观孙、马宁夏之战的局势变化。

1934 年 1 月 13 日,孙、马两军在磴口交战。孙部出动步、骑、炮兵混合部队向马家军展开猛烈进攻。在孙部的强大攻势下,马家军未作抵抗即撤退到石咀山,接着又稍作抵抗即退往

黄桥,与孙部保持一定距离,以引诱孙部深入。孙部第1师师长刘月亭、第2师师长丁纘宣亭不知是计,便以骑兵为先锋,率部向黄桥推进。马家军又以骑兵团引诱刘、丁两师人马孤军深入到贺兰山麓的红广营。在此期间,孙部主力包围了平罗县城,但由于马宝琳旅的顽强抵抗,孙部连攻几天未能破城,遂留一部分步兵监视平罗守军,其主力绕过平罗直接向宁夏省城银川进发。

时值隆冬季节,唐徕渠冬季水枯,孙部沿着干涸的河床行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1月30日抵达银川城下,与守军马鸿宾师及马英才旅展开激烈战斗。在马家军的顽强阻击下,孙部前进受阻,攻城不下,延至2月6日,马步芳、马步青等率援军赶到,双方主力在银川外围展开一场大决战。孙部在马家军城内城外两面夹击之下,伤亡惨重。这时,蒋介石又派飞机前来银川以助战为名,到处狂轰滥炸。由于孙、马两军战线混乱,飞机轰炸时也不分辨目标,致使孙、马两军都严重受损。孙殿英见战局发展与己不利,便率部退守李岗堡,并准备放弃攻银川、占宁夏的作战方案,率部渡过黄河,直趋固原,与陕西杨虎城部靠拢,并与进抵三边的刘志丹红军取得联系,但因部下意见不一致,未能及时行动,仍在银川、李岗堡、平罗等地与马家军继续拼消耗。2月24日,孙得知阎锡山已出兵至临河,正向三圣公、磴口逼近,恐怕阎趁机截孙部后路,便撤回部队向银川西北方向集结,以图后谋。由于孙部出师远征半年有余,又与马家军激战月余,部队减员很大,给养也很缺,便电请阎锡山要求退至沃野过冬。阎心中早有打算,既已“送客出境”,便不再想让孙部回来,因此,百般搪塞不允。在此进退无路、给养

奇缺的情况下,孙部军心开始混乱。3月15日,副军长于世铭投靠何应钦,并带走了骑兵军的部分人马,使孙部战斗力更为减弱。19日,马鸿逵乘孙部孤立无援、人心混乱的时机,指挥马家军进行总反攻,将孙部围困在银川西北地区。第2师师长丁维宣因孤军在前,四面受敌,只好投降马鸿逵;刘月亭师见丁师投降,自感无力对敌,不敢恋战,便率队北退,企图与孙部主力在银川西北地区会合,不料在半路途中被阎锡山部截击缴械。25日,孙殿英见主力部队已溃不成军,败局已定,便弃部出逃到阎部赵承绶师,并由赵承绶陪同去太原晋祠隐居起来。残余部队循编成刘月亭、卢丰年2个旅被阎锡山部收编后,开往江西修筑公路。至此,孙殿英与马家军的宁夏之战宣告结束。

五、南京国民政府 统治下的社会经济状态

民族工商业的 衰退和农村经济的凋敝

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一度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安插在这个政权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幻想依靠这个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展民族工商业。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不断扩张,对华商品输出的增长十分惊人;政府对民族资本课以重税,加之官僚资本的挤压,民族资本逐步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据实业部统计,如

以 1928 年注册厂数和资本额的指数分别为 100, 到 1932 年, 注册厂数降为 34.8, 资本额更降为 12.4。再以集中了当时中国工业 2/3 的上海为例, 1927 年底有民族资本企业 1295 家, 到 1931 年只乘下 795 家, 4 年间, 倒闭、改组的竟达 500 家, 占 38%。1934 年, 上海新设工厂 28 家, 由于市场萧条、企业亏损、蚀本或财政周转不灵等原因而改组的却有 291 家, 歇闭的 70 家。缫丝、纺织、卷烟业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三大支柱, 从表面看, 这一时期某些部门略有发展, 但实际上是每况愈下。据中国银行统计, 中国生丝产量, 1930 年比 1929 年减少 8.9 万担; 仅上海一地, 丝厂停业的达 70 家, 占全行业的 65%。政府从 1928 年起开征卷烟税, 三年间税率翻了一番, 卷烟厂纷纷倒闭, 由 1927 年的 182 家减少到 1931 年的 64 家。这样大批的工厂改组和倒闭, 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负担大大增加, 政府征收的营业税扶摇直上, 使他们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摧残。城市工人生活日益贫困。失业工人不断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 1929 年初全国至少有 50 万工人失业。在业工人工时延长, 劳动强度增大, 劳动条件恶化, 工资却大幅度下降。武汉工人 80% 降低了工资, 北方铁路当局拖欠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工人工资。

在农村, 南京政府取缔了国民革命时期实行的“二五减租”。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豪绅、官僚买办手中。地租剥削益加深重, 田赋附加税及其他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1930 年河南商城的田赋附加税超过正税的 600%, 四川奉节则超过 768%。1933 年江苏有的县附加税超过正税的 26 倍。有的地区苛捐杂税多达 140 种。地方政府还袭用北洋政府的预征制。

四川省的一些地区,1931年的田赋已预征到1961年,1933年则预征到1968年。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骤减,荒地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日益萎缩。据统计,1928—1931年间,全国灾民每年达四五千万,灾民死亡累计1370万人。亿万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地区出现了“处处门户封锁,村村井灶无烟”、饿殍遍野的凄惨现象。

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开始形成。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以反革命内战和买办活动起家,通过各种超经济手段,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官僚资本首先从反革命内战军费的筹集中攫取大量财富,从军火买卖中获得巨额利润。为了筹措军费,政府以关税、盐税、统税作担保,滥发公债。仅财政部在1927—1931年间发行的公债就达10亿以上,比北洋军阀15年发行的公债总数还要多4亿。这些公债主要向金融界推销,一般以5至7折押给银行,而偿还时却以票面十足支付;公债利息又高,一转手,金融资本家就可获四五分厚利。就这样,官僚资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通过其控制的银行垄断公债利息,从中攫取巨额利润。他们还垄断了同外国的军火贸易,从军火交易中获取高达40%的回扣。

官僚资本对全国经济的垄断是从建立垄断性金融机构开始的。1928年11月首先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号称国家银

行,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银行,享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钱币、经募内外公债等各种特权。接着,官僚资本以强制认加“官股”的办法控制了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两家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33年又设立了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扩大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设立了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成为官僚资本金融垄断的中心机构,在全国形成了金融垄断网。

国民党官僚资本还利用其经济、政治势力,逐步垄断全国的商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以至电影、广播、新闻、出版等文教事业,并独占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资本的全部工矿企业和大部分民族工商业,还拥有巨额的房地产,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并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便着手复苏经济,以巩固统治。1928年下半年,先后在上海、南京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决定对全国实行严格的财政控制,划分国家财政和省财政的收入,设立中央银行统一币制。会议还制定了整理税制,保护商人财产,保护国货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税制的改革,主要措施是提高关税税率,裁撤厘金,实行统税,盐税就场征收,自由买卖等等。经过税收整理,关、盐、统

各税成为国家政府财政来源的三大支柱。在财政收入比重中,1929年为71.4%,1931年为82.4%,1933年为91.4%。1936年三税总额为10.57亿元,比1927年增加15倍。

币制的改革,主要是1935年实施的法币政策。中国财政素以银本位硬币流通为主,3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白银国有”政策的冲击,造成中国白银严重外流,导致市面金融收缩,物价暴跌,工厂纷纷倒闭。为了克服旧币紊乱现象,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白银国有”政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危机,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实施法币政策和白银国有的法令。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集中货币发行权。规定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以后又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第二,实行白银国有,作法币的准备金。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额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凡银行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第三,确定对外汇率。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法币政策的实行,使中国货币进入现代行列,割断了货币同白银的直接联系,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货币的影响。货币的统一和稳定,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汇率的确定,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但因法币是以外汇为后盾的纸本位,就为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造成法币对英镑和美元的依赖性。

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重点,主要采取官办和

以学术团体名义举办乡村改革试点两条途径。官办的主要是举办农贷,设立农村服务区,进行新技术与良种试验,组织乡村互助社、合作社等。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1931年以后农业生产逐步复苏。主要农产品产量1936年和1931年相比,稻米增产5%,小麦增产1.7%,高粱增产2.5%,棉花增产39%,油菜籽增产6%。1936年农业产值为1989万元,比1935年增长5.9%。

工业生产能力和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1927年至1936年期间,电力年均增长9.4%,煤炭年均增长7%,水泥年均增长9.6%,棉布年均增长16.5%。1936年工业总产值为122.74亿元,比1927年增加83.2%。

交通运输业成就也比较显著。到抗战前夕,公路通车里程由1927年的2万多公里,增加到11万公里。铁路则由0.6万公里增加到1.3万公里。先后与美国、德国合作,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开辟了8条航线。设立了北方大港、东方大港筹备处,上海、汉口、天津设立了航运局,并修建了葫芦岛港和连云港。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南京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执政于国家政权机构之中;改订新约运动,使帝国主义做出一些让步;南京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8年至1931年间曾一度有所发展。以上海为例,1931年与1927年相比,棉纺织

业厂家由 23 家增至 27 家,纱锭由 67 万枚增至 103 万枚,棉纱年产量由 41 万多件上升到 55 万多件,棉布年产量由 220 万匹上升到 390 万匹。丝厂由 92 家增至 165 家,丝车由 2.2 万台增至 2.5 万台。面粉销售由 1950 万包上升到 3034 万包。随着棉纺工业的发展,机器工业也有所发展。

由于民族资本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无法与外资和官僚资本竞争,而且自身也存在着种类不齐全,比例不协调的严重问题。棉纺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而在采矿业、冶炼业等重工业部门,民族资本所占比重几乎是空白。1931 年至 1935 年,民族资本企业注册工厂数和资本额明显下降。据 1936 年《申报年鉴》统计,1930 年注册工厂数为 119 家,资本总额为 4494.7 万元,平均资本额为 37.8 万元;1932 年注册工厂数下降为 87 家,资本总额下跌到 1458.5 万元,平均资本额降为 16.8 万元。工厂改组、闭歇情况十分严重。1934 年仅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钱庄倒闭的就达 425 家,1935 年更增加到 895 家。这种大规模的倒闭、改组、停工减产、营业萧条的情况,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1934 年底,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摆脱了经济危机,走上恢复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客观影响。1935 年,国民政府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大规模内战基本停止,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在这些有利因素影响下,1936 年的工业品总产值为 122 亿元,比 1935 年增加 11%。民族资本在工业的资本额中占到 88%,达到旧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发展的颠峰。

第三节 工农武装革命的 深入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中华苏维埃 民主政权的成立和巩固

“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针

1930年7月和8月,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两次攻打长沙。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占长沙,11天后退出;8月,红军第1方面军第1、第3两军团围攻长沙,久攻不下,后主动撤围转兵江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曲折、不屈不挠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清剿”和“会剿”,到1930年夏,全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红军武装发展到3万人。同时,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边、赣东北、左右江等几块主要根据地。此外,还在广东、江苏、四川、陕西等省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但是,从当时全国总的形势讲,国民党在全国占据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地位,其军队的数量、武器装

备、战争潜力大大超过工农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仍然在战略上处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包围之中。可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对全国总的形势却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片面地夸大形势有利于革命的一面,进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最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红军“在8月以前扩大到50万”,“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目标;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全国主要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进攻歼灭国民党军较大部队。6月,又确定了举行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最终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总任务和总方针。为实现总任务和总方针,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并于6月24日批准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计划赋予各地红军的作战任务是:赣南、闽西红军第1军团,“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赣东北红军第10军,“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湘鄂赣红军第3军团,“一面切断武汉铁路”、“一面帮助鄂南、鄂东南地方暴动”,“进迫武汉”;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一面“帮助鄂西、鄂西南地方暴动”,一面“进迫武汉”;鄂豫皖红军第1军,“帮助鄂中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计划要求各路红军向武汉进攻,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分别赋予攻占当地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任务。

“左”倾冒险主义给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从以下三次军事行动中可见一斑。

红三军团打长沙

1930年6月上旬,中共红军第5军军委在鄂东南大冶县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以红5军为基础成立红军第3军团,同时组成中共红军第3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军团政治委员,邓萍任军团参谋长,袁国平任军团政治主任。军团下辖第5、第8两个军4个师,共1万余人。第5军,彭德怀兼军长、滕代远兼政治委员、邓萍兼参谋长、袁国平兼政治部主任,辖三个纵队。第1纵队,孔荷宠任纵队长、胡筠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李实行任纵队长、张启龙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吴溉之任纵队长、喻庚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郭炳生任纵队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第8军(由原红5军第5纵队扩编),李灿任军长(后何长工)、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卢匿才任参谋长、柯庆施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纵队。第1纵队李锷任纵队长、郭一清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谢振亚任纵队长、石恒中(即石衡中)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何时达任纵队长,徐策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区的部分地方部队组成第16军,由孔荷宠任军长、黄志敬任政治委员,隶属红3军团。

红3军团组成后,开始进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考虑到此时岳阳有钱大钧部两个师共十二个团约4万人及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的兵力驻防,红3军团首长决定以一部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进攻武昌,实行进击鄂南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歼灭当地地主武装,略取岳阳为后方。国

民党军果然上当,钱大钧部两个师星夜转运武汉、加强武昌防务。于是岳阳就只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了。6月底,红3军团先后占领铁山、金山、鄂城,通山、崇阳等地,并控制了咸宁。在通山,红军击溃国民党军第77师第3团,缴枪60余支。中共红3军团前委通山会议决定,乘岳阳守军势单力弱,夺取该城,切断武长铁路。旋即,红3军团一路攻击,进占蒲圻县的赵李桥、羊楼洞和湖南临湘县的羊楼司、城陵矶、云溪等城镇,进抵岳阳近郊。7月4日,红军与守城王东原部激战2小时,攻入岳阳城。是役,歼王旅2个营,缴步枪500余支、机枪18挺、野炮4门、山炮12门、子弹250余担及大批军用物资,王旅直属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乘船逃进洞庭湖区的君山。至此,红3军团完成了略占岳阳、切断武长铁路的任务。

打下岳阳后,红军集结平江地区整训。其间,部队补充新兵5000余人。此时,中共红3军团前委明悉长沙国民党军何键第4路军主力为追击张发奎、李宗仁联军,集中在湘桂边界地区,省城长沙防务空虚,决心率部沿平(江)长沙直下武昌。

长沙,是湖南军阀何键的老巢。何得知红军攻占岳阳并向长沙推进,为确保巢穴安全,急速从衡阳抽调其第19师第55旅会同长沙守军第15师第45旅共七个团的兵力,由第15师师长危宿钟统一指挥,于7月19日由长沙沿长平大道向平江进击,企图先机而动,消灭红军于平江地区,解除对长沙的威胁。22日,危宿钟指挥的两个旅七个团成3个梯队开进,其第1梯队进至瓮江镇,离平江约15公里;第2梯队进至金井;第3梯队进至春华山。各梯队之间间隔15至20公里,摆成一字

长蛇阵。红3军团首长抓住危宿钟进攻部署上的弱点,决心集中兵力,采取伏击、夹击的战法,首歼第1梯队,然后跟踪追击。23日拂晓,红3军团以一部兵力正面阻击,集中主力两翼夹击,猛攻危部第1梯队。经数小时激战,红军攻占金井,歼第15师第45旅大部;击溃危部第2梯队,歼其过半。危宿钟率残部向永安、梨梨市、长沙溃退。此战,红3军团缴长短枪数百支、轻重机枪6挺。战斗中,红8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郭一清和第3纵队纵队长何时达牺牲。何键唯恐省会长沙失落,即令邵阳的独立第9旅两个营、第19师第57旅2个营会同第45、第55两旅残部沿浏阳河构筑工事、分段固守。同时电令第19师主力驰援长沙。

金井战斗后,红3军团乘胜追击,猛扑长沙,攻占梨梨,突破浏阳防线,直抵长沙城下,并乘长沙守军惊慌失措之际,迅即发起攻城战斗。7月27日晚8时,红军突破守军约五个团的阵地,由小吴门、49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攻进市区,迅速占领国民党湖南党部、清乡督办署等国民党军政机关。何键只身逃往湘江西岸,“急图规复”长沙,速以第19师、第16师、第15师第45旅、独立第7旅等部,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别从株州、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疯狂反扑过来。红3军团在长沙郊区及城内进行顽强抗击,终因兵力悬殊,于8月6日放弃长沙,转移到平江地区进行休整。

在红军解放长沙的11天中,中共红3军团前委和湘鄂赣特委迅速着手城市政权建设,成立了省、市苏维埃政府,恢复了省市工人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武装,颁布了政纲和法令,成立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没收国民党反动官僚

地主财产分配给工农群众,控制物价,恢复商业经营等等。红军扩兵 7000 余人,筹措军费 40 余万银元。

自 7 月 23 日至 27 日,红 3 军团连打 4 仗,解放长沙,共俘国民党军何键部官兵 4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28 挺、手提机关枪 20 余支、迫击炮与山炮 20 余门、电台 9 部及大批作战物资。红 3 军团也付出相当代价,伤亡纵队以下官兵 1600 余人。撤退长沙时人员物资又遭受重大损失。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

7 月下旬,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 1 军团正在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军团首长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军阀何键部进攻红 3 军团的消息。于是,军团首长率领部队进击浏阳,并要求红 3 军团从平江方向配合,共歼追击红 3 军团的湘军戴斗垣部 4 个团。8 月 20 日,红 1 军团长途奔袭浏阳文家门,一举歼灭戴斗垣部 3 个团,俘 1000 余人,击毙纵队司令戴斗垣,缴枪 1500 余支。接着挥师北上,于 23 日在浏阳永和市同南下的红 3 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共红 1 军团前委和红 3 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辖第 1、第 3 两个军团;第 1 军团辖第 3、第 4、第 12、第 20、第 22 军;第 3 军团辖第 5、第 8、第 16 军,共 3 万余人。红军第 1、第 3 两军团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战略上进一步集中了兵力,使原来分别活动在湘、赣两省的两

支红军汇合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统一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这对于实现红军战争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的战局,打破国民党军大规模的“围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讨论,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任务,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5日,全军开始向长沙运动,29日进抵长沙郊区。此时,何键已集中兵力,收缩防线,构筑工事,设置电网,以阻止红军进攻长沙,其部署是:第19师防守猴子石、雨花亭、石马铺、两腿冲;第16师防守乌梅岭、杨家山、二学园;第15师防守湖绩渡、黑石头、捞刀河;新编第31师和独立第7旅分别集结在黄土岭和湘江西岸炭塘地区。另以第77师和新编第5师分别集结在捞刀河以南和韭菜园地区,朱兴曙大队集结在捞刀河附近,浏阳保安团位于湘江西岸长沙段担任湘江警戒。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鉴于长沙守军有6个师另1个旅约10万余人,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军一无攻坚器材、二无攻坚经验,决定采取诱歼守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势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

8月31日,方面军首长命令第3军团(欠第5军第1师)在杨家冲、龙山塘、西塘冲、黄虎冲一带歼灭从板石港渡河的湘军一部后,沿铁路、公路向长沙南关攻击前进;第5军第1师向猴子石佯攻,诱使第19师所部出击;第1军团主力位于天际岭、许家冲、洞井铺、燕子岭、东山地区待命,准备歼灭由猴子石出犯之第19师所部;第1军团第3军为总预备队。但守军各部只凭坚持顽抗,不脱阵出击,红军终未获得歼敌战

机。于是,方面军首长在9月1日下达向长沙发起总攻击的命令。2日,红军冒雨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反复冲击。为冲破电网,还采取了“火牛阵”,仍未突破电网,总攻终未奏效。3日,何键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被红军击退,何部被歼1个多团,其中被击毙900余人,被俘1000余人。鉴于诱歼何部的战法不能实现,方面军首长于10日9时第二次下达“强攻该敌,夺取城垣”的总攻命令。红军指战员向守军阵地连续多次地发起攻击,守军顽固坚守,战斗异常激烈严酷,还是未能突破守军阵地。此时,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得到情报,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何键一部已到株州。长沙守军凭坚固守,红军两次总攻未能得手,再战下去,红军势必更加被动。经毛泽东说服,方面军总前委于9月12日下达了“撤围长沙,进占株州、萍乡待机”的命令。13日,全军转移到湘赣边界的株州、醴陵、萍乡、攸县一带,就地转入休整、筹款和宣传群众。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历时20多天,共歼灭湘军二个多团,毙伤其1000余人;红军亦损失不小,红3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刘作述,原第3纵队纵队长谢振亚(红八军第3团团长)在战斗中牺牲。

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南征

1930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奉中共中央指令,以主力南渡长江,出兵湖南,以配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对长沙的进攻。在国民党军多方围攻下,部队受了重大损失,南征计划宣告失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中共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领导取得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为迅速实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各地红军分别向指定的中心城市进攻。赋予湘鄂西红军的任务是:“渡江与一三集团军配合行动”,进攻长沙。7月初,湘鄂西的红军第4军和第六军在公安会师后,按照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组成了中共红军第2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红2军团下辖两个军,红4军改称红2军,贺龙兼任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师和警卫团,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红六军由邝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师,王一鸣任第16师师长,王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兼任第17师师长,许光达任政治委员。全军团1万余人,5000余支枪。

红2军团组成后,中共鄂西特委和军团前委决定:首先集中红军主力以6个月为期,拔除洪湖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肃清“北极会”、“大刀会”等封建会道门武装及地主武装,以建立洪湖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尔后依托洪湖中心苏区,逐次向反动统治力量较弱的襄(河)北之京山、钟祥、潜江、天门地区和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打通襄枣宜、巴兴归、湘鄂边与洪湖中心苏区的联系。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经过努力才可以实现的战略计划。红2军团从7月下旬开始进行上述计划,转战于洪湖地区,先后攻克了潜江县城及龙湾、熊江、新沟咀、府场和杨林尾等地。集中打击了“北极会”与地主武装。9月23日,

红 2 军团在监利、华容农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攻克了阻塞洪湖苏区南北通道的最大白色据点监利县城,歼国民党军新 3 师教导团及监利保安团约 2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1000 余支、迫击炮 5 门。至此,洪湖苏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了一片。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也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扩充和提高。

就在红 2 军团胜利发展之际,中共中央派邓中夏到洪湖苏区接任红 2 军团政治委员和中共第 2 军团前委书记,同时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并致函贺龙、周逸群等:速将部队调回集中洪湖,准备执行中共中央路线。邓中夏到任伊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西特委和中共第 2 军团前委联席会议,紧接着召开了湘鄂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湘鄂西苏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些会议决定:成立以邓中夏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特委;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邓中夏随红 2 军团行动,由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汤慕禹任红 2 军团参谋长,孙德清任第 2 军军长,朱勉之任第 2 军政治委员。会议期间,已闻悉红一方面军已放弃进攻长沙,向江西转兵。由于邓中夏拥有最后决定权,依然决定红 2 军团渡长江南下,占领岳阳,以激起红军第一方面军再攻长沙。遂军团转入南征准备。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转来党中央指令:红 2 军团速渡江南下,在岳阳方向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红 2 军团前委觉得国民党军在岳阳方向兵力较大,进攻不易得手,决定进攻常德以牵制国民党军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于是,彻底否定了周逸群、贺龙等原定先巩固洪

湖中心苏区然后逐次向外发展的战略计划,改以军团主力渡长江南下进行南征作战。为充实战斗部队,根据地地方武装除留少许外,全部编入了军团部队,其中包括汉川中央红军独立师的 200 余人、100 余支枪。

10 月 15 日,红 2 军团各部队自峰口等地出发,红 2 军由石首横渡长江经鲇鱼须、梅田湖直取南县;红六军第 17 师由监利陶家埠渡长江,经长岗庙、松木桥向华容攻击前进,第 16 师由调弦口渡长江,首先歼灭了万庾守军,接着配合第 17 师会攻华容县城。10 月 22 日,红 2 军团先后攻占了南县、华容,歼灭川军新 11 师及南、华两县团防武装共 1000 余人。在红军部队进攻过程中,华容、石首的地方武装积极行动予以密切配合。夺占南、华两县,是红 2 军团南征初战的胜利,部队受到很大鼓舞。鉴于南县至常德之间地区湖泊河流纵横,大部队展开行动很受限制,中共红 2 军团前委乃决定以第 16 师经黄山头直逼津市,军团主力首先攻占公安,尔后经澧州攻击常德。30 日,红 2 军进占公安,第 17 师攻占藕池,并在闸口歼灭川军李宗鉴新编第 7 旅一部。11 月 1 日,红 2 军团主力由公安向澧州推进途中,在三汊河歼灭湘军陈运夔团 1 个营,4 日进逼澧州城下。同日,红六军第 16 师与红 2 军第 4 师第 10 团协同作战,于白洋堤歼灭湘军戴季韬团一部,乘胜进占津市。

红 2 军团突然渡长江南下,攻占津市,围攻澧州,令湖南国民党反动派大吃一惊,旋即调兵防堵。何键一面命令陈运夔死守澧州,一面急令退缩安乡的国民党新 11 师、驻临澧的独立第 1 旅李国钧部和驻慈利的湖南警备第 1 军陈渠珍部迅速增援澧州。11 月 9 日,湘军援军各路相继进抵新洲、东山铺一

带,前锋已达澧水南岸。红2军团以一部扼守澧水北岸顽强阻击,集中主力围攻澧州,陈运夔部凭城死守,战斗相持至11日。在湘军援军各路步步逼近、澧州数日久攻不下,再攻势必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红2军团放弃了对澧州的围攻,同时撤出津市,转兵石门。准备夺取石门,建立临时后方基地,继续向常德进攻,以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11月13日,红2军团一举攻下石门,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同时派出分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组织乡、村工农民主政府,还动员了一批农民青年参加红军。

11月下旬,各路湘军向红2军团发起反攻。邓中夏指挥红六军第17师坚守石门,贺龙指挥军团主力迎击湘军。22日,在夹山寺将湘军新11师击溃;23日,在余氏桥歼李国钧独立第1旅一部,并乘势进占临澧县城,进而打破了湘军的反攻。在临澧县城,从收缴的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蒋介石得胜后即刻将主力南调,准备“围剿”红军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没有向长沙再进,而是转向江西;国民党驻津市地区部队有进攻石门的企图。于是,中共红2军团前委接受贺龙的建议:将部队集中合口暂时休整,前委重新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在此之前,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曾几次致函邓中夏,提出红2军团应当返回洪湖,在巩固洪湖苏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发展。在合口举行的军团前委会上,贺龙、段德昌等人力主红2军团迅速返回洪湖,不宜继续孤军南征。邓中夏决意再打津市、澧州、夺占常德,切断武长铁路。于是,红2军于12月2日兵分两路,向津市、澧州发动攻击。红六军主力经激烈战斗,才攻进津市街口,旋即遭守城国

民党军新 11 师猛烈反击,幸亏红军增援部队 2 个团及时赶到,打退守军反扑,占领津市。红六军此次损失兵力达 1/4,军参谋长刘仁载和一名团长牺牲。红 2 军虽以迅猛动作将澧州包围,但守军陈运夔团凭城固守,红军一无攻城装备,二无攻城经验,终至未果。

在红 2 军团第 2 次进攻津、澧期间,国民党军第 19 师李觉部纠集湘西土著武装及陈渠珍部共两个多师的兵力向红 2 军团逼进。一路已陷石门,一路(主力)从临澧向澧州推进至澧水南岸的停弦渡、万河、宝塔湾一线,前锋已渡过澧水进占了合口。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 16 师彭位仁部由沅江向南县、华容推进;新 11 师残余自新洲配合第 19 师进行反扑;川军新编第 7 旅李宗鉴部已重占公安,严重威胁红 2 军团侧后。由于红 2 军久攻澧州不克,国民党军援兵各路相继逼近,中共红 2 军团前委迫于形势严峻,不得不自津、澧两地撤退。12 月 9 日,部队进至松滋县的杨林市、街河市地区稍事休整。12 日重占公安县城,即刻将伤病员及物资转移洪湖苏区。南征作战行动至此结束。红 2 军团南征,相继攻克了南县、华容、藕池、石首、公安、石门、津市和临澧等 8 座县城及附近乡村地区,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共计 6000 余人。红军亦付出了重大代价,全军团伤亡 2000 余人,仅红军 6 军战斗减员即达 1/4。为避免陷入更大的被动地位,不得不结束南征行动。

中央苏区第一至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全国红军和革

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扩大,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闽诸省的统治。于是,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运用正确的军事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经过英勇战斗,很快粉碎了敌人一至三次“围剿”。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冯、阎战争的形势,红军发展到约十万人,苏维埃红色区域也发展到赣、湘、闽、鄂、皖、豫、陕、甘、川等省。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成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10月,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11月后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兵力,以伪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术,分成八个纵队,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主持下,红军总前委召开了“罗坊会议”,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方针。随后,红军主力转移到群众基础好、地形条件亦好的根据地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集结,进行了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12月下旬,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趁敌军主力张辉瓒师分驻两地的有利战机,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中间突破”,在永丰县的龙冈全歼张辉瓒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并活捉敌人师长张辉瓒。这次战役从1930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1日,红军于五天内消灭敌主力一个半师,缴枪1.3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从吉安到建宁八百里一线,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余人,毛泽东、朱德等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采取“集中实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为了持重待机,打好反攻的首仗,红军在东固地区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诱使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之巩固阵地,向东固前进。然后,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由东向西横扫,在白沙歼敌郭华宗师一部,在中村歼敌高树勋一个旅,在广昌歼敌胡祖钰师一部,在建宁全歼敌刘和鼎师。从5月16——30日,红军连续行军作战,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打了三个大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又调集三十万兵力,分三路,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分成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压迫在赣江一带消灭。这时,距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只有一个多月,红军仍只有三万多人,主力远在福建建宁,且在苦战之后,尚未获得休整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充分依靠群众,在敌人的间隙中转来转去,机动作战。首先避开敌人的进攻,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革命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敌人发现后,忙调主力由东向西进攻,红军又避敌主力向兴国方面突进,分别在莲塘、中村、黄陂等地歼灭进攻之敌上官云相师一

个旅、郝梦麟师二个团、毛炳文师四个团。这时,敌人才发觉红军主力在黄陂,便又向东扑去。红军又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巧妙地甩掉敌人主力,转到兴国西部集中。敌人发现后再度西进,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军就是这样,被红军牵着鼻子跑,到处扑空挨打,精疲力尽,“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只好下令全线撤退。红军乘机乘胜追击,在老营盘歼敌蒋鼎文师一个旅,在方石岭歼敌韩德勤师全部和蒋鼎文师残部。这次反“围剿”,共七十五天,红军先后打溃敌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共歼敌七万余人,缴枪5万余支。至此,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初步形成,红军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21个县,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有所发展。全国红军又恢复发展到十万,赤卫队也发展到十万余人。

在此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也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的“围剿”。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阵地外,占领了广济、圻水、英山等县,击败并消灭了敌人进攻的部队。湘鄂西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还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

其他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双桥镇战斗

1931年3月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后转入进攻作战,在湖北省广水以东的双桥镇地区,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多团,俘获师长岳维峻的空前胜利。

1931年1月,鄂豫皖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后,将红1军和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为了扩大胜利,红四军根据临时特委的决定,主动转入进攻作战。1月下旬到2月上旬,进行了磨角楼、新集两次战斗。2月初,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进一步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各种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制定出新的斗争方针。红军经过短期休整,于2月下旬又向京汉路出击,准备调动国民党军,创造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军的战机。为此,红四军即以第11师向京汉路信阳至武胜关之间守备力量薄弱的车站、据点出击,主力则隐蔽在武胜关以东三里城地区待机。

3月1日至5日,红11师1个团先后袭占李家寨车站和柳林车站,歼国民党军一部,第12师第1旅旅长侯镇华被击毙,红军逼近信阳。国民党驻豫特派“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解除红军对京汉路的威胁,急令赵观涛第6师主力迅速集结信

阳,并以该师之第18旅、骑兵第1师、张印相第31师之第91旅、张钫第20路军之第63旅等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李定五新编第2旅固守广水,第31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34师由孝感经花园沿京汉路东侧向北推进,妄图南北夹击消灭红四军于京汉路及其东侧地区。

3月4日,南路国民党军第34师师长岳维峻率炮兵营和特务连由孝感出发,5日由小河溪督同旅长张万信、王俊杰率3个团溯潯水北进,沿途不断遭到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袭扰,到8日黄昏前始进抵双桥镇地区宿营。双桥镇东傍潯水,周围环山,岳维峻将其第100旅1个团置于潯水以西的瓦屋、刘家湾一线,第101旅2个团置于潯水以东的长岭岗、罗家楼和白马石岗、余家畈、小葵山一线,师部2个旅部及特务连均驻双桥镇,炮兵营配置在双桥镇西南。此时,北路国民党军尚徘徊于信阳与罗山之线,第31师仍滞留于广水附近,唯有南路岳维峻的第34师最为冒进、突出。

红四军鉴于国民党军第34师离开铁路线单独行动,比较孤立;而红军则以逸待劳,士气旺盛,且有当地广大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又可利用双桥镇四周皆山便于隐蔽和出击的有利条件,遂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该师。红四军的具体部署是:第10师1个团沿潯水西岸由北向南,第11师1个团在潯水以东由东向西,对刘家湾、瓦屋与长岭岗一线实施正面突击;第10师另1个团由界岭向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断其退路;第10、第11师各以1个团为预备队;第11师另1个团仍留三里城以北活动,对北路国民党军进行警戒,保障主力后侧安

全;罗山独立团位于二郎畈地区,对小河溪方向进行警戒。战斗计划规定全军于8日夜到达指定位置,9日拂晓发起攻击。

9日拂晓,在盪水东西两岸的红军突击部队分别向双桥镇西北和东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攻击。红军1个团于双桥镇北之刘家湾歼国民党军1个前哨连,然后乘势攻占刘家湾西侧高地。红军另1个团在双桥镇东北亦歼国民党军1个前哨连,然后攻占了长岭岗以北的两个前沿阵地。

国民党军第34师遭到突然攻击后,仓皇组织反击。岳维峻以第100旅1个团向刘家湾方向反扑,集中盪水以东的兵力,向长岭岗以北反扑。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党军的反扑很快被红军击退。

上午10时许,红军1个团主力已乘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在正面反击之机,迂回至双桥镇西南之罗家湾附近。国民党军发觉其侧后受到威胁,又慌忙抽兵回援。此时,红军在正面的2个团即乘势向前推进,一部逼近白马石岗;罗山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也占领了小葵山,截断双桥镇国民党军的退路,并加强了对小河溪方面的警戒,使在小河溪的国民党军第100旅1个团不敢妄动。至此,国民党军第34师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营、特务连完全陷入红军四面包围之中。周围数十里内的群众,拿着土枪、大刀、长矛也来参战,呐喊声响彻盪水两岸,使被围国民党军更加恐慌。

国民党军第34师被包围后,岳维峻亲自率领2个团兵力出镇反扑,他们仗着飞机、大炮的掩护与红军争夺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向南逃窜,战斗十分激烈、残酷。红四军一面命令3个团对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猛攻,增大压力;一面以预备队2

个团投入战斗,直插纵深,分割歼灭被围的国民党军。于是,红军以1个团从长岭岗与白马石岗之间、1个团沿澧水西岸,分别突破国民党军阵地,猛扑双桥镇。这一突然而果敢的行动,顿将澧水以东、以西之国民党军切成数块,打乱了第34师的防御体系,使其指挥系统陷于瘫痪,军心更加恐慌动摇。其外围松岭山、长岭岗、尖鸡岗和白马石岗等阵地的国民党军,完全陷于混乱,纷纷后撤。红军正面突击部队与包抄部队趁势夹击,在何家湾、刘家祠、余家畈等地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歼灭过半,残部向南逃跑,第34师师长岳维峻也率双桥镇内溃兵向南突围。在罗家湾、罗家城一线,溃退之国民党军遭到红军2个团的截击,逃回澧水西岸田子山和罗家湾等地,企图负隅顽抗。此时,正面进攻之红军部队也由北向南压来,将国民党军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猛攻;前来参战的地方武装和群众,也手执红旗刀枪,遍布各个山头,呐喊助威。战至13时左右,红军将国民党军全部歼灭,师长岳维峻在罗家城被红军俘获。

岳维峻是个老牌的陕军,早在1925年时已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徐向前曾是他的部下。被俘后提出只要留他一条命,可以答应红军的一切要求和条件。当时鄂豫皖军委和红四军领导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枪杀俘虏,破坏红军的传统,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双桥镇战斗,仅进行了约7个小时,红军即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步兵团和炮兵营、特务连,俘师长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山炮4门。这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在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后转入进攻

作战中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京汉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同时也标志着红四军战术素养的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黄安战役

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在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以后,估计到新的“围剿”必然到来,即抓紧时机进行反“围剿”的准备。首先整顿全区的地方武装,将所有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凡年满18岁至35岁以下的青壮年男子,除地主、富农以外,均动员参加赤卫军。17岁以下的少年,则组成少年先锋队。根据地的广大劳动妇女,也积极参加赤卫军的侦察队和救护队,至1931年10月,全区已组成赤卫军15个师。其次是进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决议,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根据地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军民新的“围剿”。在此基础上,根据地人民再次掀起了参军交粮的热潮,支援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欢乐声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第四军和第25军,第四军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总兵力近3万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使红军作战行动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为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虽然爆发了日军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仍然把主要矛头对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积极策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至11月上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已由10个师增至15个师: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地区7个师,皖西地区4个师。此外,还有3个师正向根据地边境调动。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激起的全国抗日反蒋怒潮难以平息,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又借机武力反蒋,使得国民党军原已计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迟迟难以发动。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态势,提出了外线出击、打破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计划的方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鉴于黄安县城是南线国民党军伸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是进攻根据地的桥头堡,且位置孤立突出,便于夺取,于是决心首战黄安,拔除这个据点。

黄安由国民党军赵冠英的第69师据守,师部及第206旅驻城内;第207旅驻城外,控制环城的王家畈、陈家畈、潘家湾、课子山、田铺湾等地作依托,并在下徐家和东王家建立了两个前出据点。彭振山的第30师配属1个团归赵冠英指挥,分驻于城西南高桥河和城南桃花店,以保障侧后安全,维护通向黄陂、宋埠的运输线。在赵冠英部的侧后及后方,有许多外围据点掩护,并可得到驻宋埠第30师、驻麻城第31师、驻岐亭第33师的策应。国民党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南部呈“山”字形部署。

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从“山”字头上开刀,兵围黄安,吸引援敌聚歼于野外,继而攻歼被围守

军,以粉碎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除以第10师2个团和第73师分别配置在豫东南和皖西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牵制其他国民党军外,集中2个多师共8个团的兵力进行黄安战役。战役开始时的部署是:第11师和黄安独立团为主力,麻城赤卫军相配合,进攻高桥河和桃花店据点,控制交通线,并打击宋埠、麻城、岐亭方向可能前来之援军;以第12师和第10师之第30团为主力,黄安赤卫军配合作战,进攻黄安外围下徐家、东王家等前出据点之守军,并在附近部署兵力,打击由黄安出城之援军。

1931年11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徐向前总指挥率领下,从七里坪出发,按预定目标包围了敌人,并展开攻击。红12师等部,在击退城区国民党军增援后,相继攻克东王家和下徐家据点,全歼守军2个营及反动地方武装一部共1200余人。红10师等部先后击退第33师和第30师1个旅以及城内国民党军的增援,并先后将高桥河、桃花店攻克,全歼守军1个团。经过10天激烈战斗,红军攻克黄安外围国民党守军的全部据点,完全切断了黄安守军与外地的联系,胜利完成了第一步战役计划。

第二步,红四方面军准备紧缩包围圈,歼灭援军。这是战役全过程的关键性阶段,为此,调整了部署,以黄安独立团配属红12师,紧缩对黄安守军的包围,以红11师与黄麻赤卫军配置在桃花店南北构筑数道防御阵地,全力担负打援任务,以红10师第30团为总预备队。

黄安守军为恢复与宋埠、岐亭的联系,改变有耗无补,被包围的不利处境,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向南反扑,均遭红军

迎头痛击,损失1000余人,狼狈败回。国民党军飞机往城里空投粮食,经常落到红军阵地上,饥饿的官兵出城抢粮,屡遭杀伤,一筹莫展。红军和赤卫军乘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守军,使城内军心动摇。赵冠英被搞得焦头烂额无计可施,只得频频告急求援。

12月7日,驻宋埠的国民党军第30师2个旅出援黄安,红11师以第33团在大小峰山迎击。国民党军步步推进,红33团边打边撤,将其诱至红军主阵地嶂山地区后,埋伏在两翼的红30、红31团发起猛烈反击,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余部逃回宋埠。

12月18日,国民党军第33师又从岐亭、宋埠出动,分两路向黄安增援,先后占领桃花山、五云山等地,并在优势火力掩护下进攻嶂山、寨山地区的红军第3道阵地,战斗极为激烈,一度突破前沿阵地,逼近红11师指挥所。红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当即组织手枪队、通信队与机关人员同敌人展开肉搏。红11师指挥所离方面军总部驻地仅几里地,如被国民党军得手,将直接威胁方面军总部的安全。总指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带上总部手枪营,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并令总预备队红30团投入战斗,调红12师第35团配合第33团从嶂山以东向国民党军右翼包抄,红32团协同红31团由嶂山实施正面反击,根据地群众和赤卫军、游击队也奋起参战。山上山下,拼死搏斗,杀声震天。在红军三面猛烈进攻下,国民党军第33师溃不成军,弃尸1000余具,狼狈回窜。红军俘虏800人,缴枪1000余支,并乘胜追击,进逼宋埠。国民党军的增援被彻底打垮。

在打援战斗的同时,担任围城的红 12 师及地方武装,结合军事打击和攻城准备,对国民党守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瓦解工作。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出了《为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政治工作,促进敌人瓦解,围下黄安县城》的紧急通告,印制大量传单,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罪行,解释红军的政治主张及俘虏政策,利用各种方法向城内散发。黄安守军经过红军 1 个月的围困,粮弹奇缺,外援无望,已成瓮中之鳖。在红军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声威之下,守军官兵纷纷投降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认为国民党守军已山穷水尽,士无斗志,夺取黄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实施第三步作战计划,总攻黄安,全歼守军。

12 月 22 日上午,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乘坐由宣化店缴获的命名为“列宁号”德式教练机飞临黄安上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给守军以极大的威胁和震动。原来他们还以为是为给空投物资的飞机,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劫,万万没有想到却是红军的飞机,弄得守军官兵更加惊恐不安。黄安独立团又趁机攻下钳制全城的制高点课子山,歼守军 1 个营。当晚,红军向黄安城发起总攻。徐向前指挥主力部队攻城,陈昌浩带一部兵力和赤卫军在郊外准备围歼逃跑的国民党军。红 35 团突击部队以偷袭手段迅速突入城内,后梯队跟进向北方进攻。赵冠英见城门已破急令部队从南门突围,自己化装由西门潜逃。红军乘势猛追,与城外红军、赤卫军一起将守军 5000 余人全歼于城郊。师长赵冠英化装后逃出西门,在通往河口的路上被赤卫军俘获。历时 43 天的黄安战役遂告结束。

宁都起义

第26路军原系冯玉祥国民军第2方面军(又称西北军)第5路军。1930年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冯的第2方面军第5路军3万余人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参谋长,下辖第25、第27师、骑兵第1师。孙连仲兼第25师师长、高树勋任第27师师长、关树人任骑1师师长。士兵大部分系陕西、甘肃籍,其余为山东、河南人。第26路军编成后,由河南、河北省边界地区东移到山东的济宁地区。是时,孙、冯之间还经常派代表来往,蒋介石既不放心,又因蒋对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便于1931年1月命令第26路军到江西“剿赤”,参加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孙连仲一怕到江西被红军打败,二怕到南方被蒋介石缴枪,借口1旅官兵哗变,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后在蒋介石重金收买和游说下,于1月28日从济宁陆续开动。士兵得知要南下与红军作战,都不愿意去,所以在出发时,就开了一大批小差。第26路军3月底全部到达江西的乐安、宜黄地区集结。官兵不适应南方气候,疫病流行,更不愿意与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围剿”中,第26路军第27师第81旅于5月22日在永丰县东南部的中村地区被红军歼灭大部。军心更加不稳,整班及零星开小差当红军的陆续发生。

蒋介石为分化和加强对第26军的控制,决定委任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为第17军军长,下辖第25、第27师。孙连仲本

来兼任第25师师长,但高树勋决定第25师师长空缺。孙连仲接到命令后十分恼怒,非但不成立军部,并将路军组成两个纵队,分别由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5旅旅长李松昆指挥,并将高树勋第27师(其中第81旅已在中村被红军基本歼灭)拨归两纵队指挥;委任高树勋前敌总指挥,有职无权,高便称病去南昌休息去了。在第三次“围剿”中,第26路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军团,归陈铭枢指挥。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26路军溃退到距广昌50华里的胡岭咀,又被蒋介石强令折回宁都。此时,第26路军军心沮丧,下层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甚至编了一个歌:“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交枪,快交枪,打毯(屙)押毯、打毯(屙)押毯(陕西土话)。”孙连仲经过两战失败,对进攻红军的胜利信心早已丧失,加上自己内部官兵不一心,感觉部队无法指挥,便请假去上海,将部队交由李松昆指挥。

大革命时期,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即派共产党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并在其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26年9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后,即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以后,中共又先后派陈延年、宣侠义、刘志丹(又名刘景桂)、邓希贤(即邓小平)、唐澍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的部队工作,对部队官兵产生了深刻的革命影响。蒋、冯合流后,少数共产党员仍在冯的部队中坚持秘密工作,开展兵运活动。第26路军南下江西时,第25师第73旅参谋、共产党刘振亚随部队到达江西。由于未能与红军接上关系,遂派在该部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袁汉澄(又名袁血卒)到河南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军委汇报工

作。省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开展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的指示,派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工作过的王超、李肃与袁汉澄同去第26路军开展兵运。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李富春、朱瑞等军委干部为袁、王、李3人举办了“兵运策略训练班”。1931年4月,袁汉澄等3人到达江西宜黄第26路军驻地,在该路军中积极开展兵运,先后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团结了一批同情革命的官兵,并初步掌握了第73旅学兵连。8月,在第26路军中建立了以刘振亚为书记,袁汉澄、王铭五为委员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同时,在学兵连和第26路军的军官中各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学兵连支部由连长李青云任书记。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各路军相继撤出中央苏区,唯独第26路军孤守宁都,引起官兵的强烈不满。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苏区的巩固、扩大及各项建设的成就,对第26路军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推进了第26路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热情,纷纷要求北返抗日。孙连仲、高树勋出走后,路军参谋长赵搏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等爱国将领也开始酝酿寻找新的出路。在此形势下,中共特别支部加紧兵运工作,积极发展组织,并于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吸收赵搏生参加了共产党。这就为中共在该路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发动路军起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31年11月底,第26路军的中共特别支部派王超赴上海途经南昌时,不知中共设在南昌的秘密机关已被国民党当局破获,王误将中共特支的文件交给了原秘密机关。12月5

日,蒋介石电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即刻拘捕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系中共地下党员,遂将蒋的来电交给刘振亚。中共特别支部和赵搏生研究决定乘总指挥孙连仲和军长高树勋不在宁都之际,组织部队举行起义。即以路军参谋长名义复电南昌“尊令即办”,以作应付;派袁汉澄等即刻动身去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报告起义计划,领取指示;以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为政治口号发动起义;由赵搏生以同乡同学关系首先争取旅长董振堂,再争取季振同支持起义。

董振堂系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富有军事学识,立志“救国救民”,大革命中深受中共的影响,痛恨蒋介石“反共”、“剿赤”,力主抗日救国。早在第26路军南下江西前,就与赵搏生在济宁东北郊外开过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参加红军”。季振同早已对蒋介石、孙连仲等军阀强烈不满。“九·一八”事变后,曾与赵搏生、董振堂等第26路军将领通电要求北返抗日,受到蒋、孙的责骂。孙、高借故离开前线,更加深了他的不满,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当赵搏生与董、季分别谈话时,两人欣然而赞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季振同还争取了本旅第222团团长黄中岳参加起义。这样,中共特别支部通过赵搏生与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基本上控制了第26路军的指挥权,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袁汉澄等人在瑞金,向中革军委详细报告了第26路军的情况和起义计划,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召开军委会议与袁汉澄等人共同研究确定了行动方针、各种情况下的处置措施、红军策应的部署和起义的日期等问题。

袁汉澄等返回第 26 路军后即向赵搏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和中共特别支部汇报中革军委关于起义的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获取由南昌运来的两万套冬服,赵搏生等和中共特支向中革军委建议,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并派袁汉澄、郭如岳(董振堂的代表)、卢寿椿(季振同的代表)3 人迅速前往苏区固村向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报告。中革军委批准了起义推迟一天的建议,决定于 12 月 14 日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新的指示,赵搏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与中共特别支部举行会议,对起义行动进行了研究和具体部署:由赵搏生、董振堂以私人关系争取第 27 师第 80 旅参谋长边章五参加起义,以掌握该旅;由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第 27 师参谋处长王鸿章,以掌握该师其它部队;季振同指挥第 74 旅解决第 25 师师部,负责警戒总指挥部(位于城内天主教堂);董振堂指挥旅手枪队扼守总指挥部与第 74 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赵搏生于 14 日晚 7 时,以路军参谋长身分请团以上军官吃饭(代理总指挥李松昆未出席),席上宣布起义,凡反对的军官予以就地解决,以控制全军。同时,还规定了行动时间和口令等事项。

1931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2 时,季振同在第 74 旅旅部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全旅将参加起义,投奔红军,与会军官表示服从旅长指挥。季振同遂命令第 223 团于下午 6 时前切断通往城外的全部电话,实行全城戒严;令第 222 团第 3 营于下午 4 时前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担任总指挥部的警戒,6 时前该团主力在县政府大院集合待命。当日下午,边章五、王鸿章决定参加起义,并为第 27 师的起义做了重要准备。下午

6 时,赵搏生按计划在总指挥部宴请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席间,向军官们讲明了当前的形势,分析了第 26 路军的处境,指明并强调第 26 路军的唯一正确出路是战场起义、参加红军,少数军官竭力反对起义,即被当场扣留起来。进而掌握了全路军的指挥权。在此期间,第 74 旅第 222 团主力解除了第 25 师直属分队的武装,李松昆潜逃到宁都城带走了这里的 1 个团向广昌逃窜。至深夜,第 26 路军起义顺利成功。15 日晨,赵搏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起义军 1.7 万余人携带 2 万余件武器开出宁都县城向苏区前进,红军第四军第 12 师旋即由宁都城东北的塘角村附近开进宁都县城。

15 日晚,宁都起义军进驻固厚地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代表中革军委热诚迎接。当晚,季振同、董振堂、赵搏生、黄中岳及全体官兵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 1931 年 12 月 14 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16 日,宁都起义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改编为红军第 5 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搏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 13 军、第 14 军、第 15 军。第 13 军

军长由董振堂兼任,政治委员何长工,下辖第 37、第 38 师;第 14 军军长由赵搏生兼任,政治委员黄火青,下辖第 40、第 41 师;第 15 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下辖第 43、第 44 师。此后,红 5 军团按照红军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建设自己的部队,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作为一支主力红军很快投入了反“围剿”的斗争。

陈家河、龙王集战斗

1932 年 1 月 20 日到 25 日,在贺龙、关向应等指挥下,湘鄂西红军第 3 军(由红 2 军团改编)第 9 师和汉川红军独立团,在湖北省应城县的陈家河、龙王集地区,与国民党军第 4 师第 12 旅、第 48 师特务团及陈、龙地区矿警、民团等部作战。红军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 3 个团、俘虏第 12 旅旅长张联华以下 40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20 余门、轻重机枪 60 余挺、长枪 3000 余支的重大胜利。

1931 年 12 月下旬,贺龙、万涛率领湘鄂西红军第 3 军主力部队自鄂西北返回洪湖苏区。此时,以夏曦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以杨光华为首的湘鄂西省委,正在积极推行王明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加紧“改造”中共湘鄂西党的各级组织和各地苏维埃政府,无端指责和处分贺龙、万涛、段德昌等红 3 军主要领导人。为了实现直接控制和改造红军的目的,夏曦擅自决定将红 3 军整编为 5 个团,撤销了各师师部,实际取消了军部,架空了军长贺龙。后迫于中共中央批评,恢复了红 3 军,将部队整编为第 7、第 9 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贺龙仍任军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夏曦

对红军的整编,尤其是无端地处分原政治委员万涛、红9师师长段德昌、红7师政治委员陈培荫,引起了贺龙在内的红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在红军中产生了严重消极的影响。

1931年12月末,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震动了武汉,蒋介石十分惊恐,便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起围攻,而对湘鄂西苏区暂取守势。是时,驻湘鄂西地区国民党军仅有第41师、第34师、独立第37旅和川军一部。据此,中共湘鄂西省委军委决定了“以九师过襄北行动,七师到襄南之汉川方面行动,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巩固苏区内部”的行动方针。于是,段德昌率红9师和汉川独立团再次出击襄北。在红军返回襄南时,国民党军第48师重占皂市,以其工兵营防守。同时,其特务团约2个营防守龙王集,1个营防守陈家河,负责掩护该师应城至皂市间的交通运输线。

1932年1月,红3军再度出击襄北,扩大苏区和红军力量。19日,红9师在段德昌指挥下,由潜江县周家矶出发,经泗港渡过襄河,向应城方向攻击前进。20日,红军冒雨进攻皂市。稍事战斗,守军第48师工兵营便弃阵逃向应城。拿下皂市据点后,红9师第25、第26两团,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包围了防守龙王集的第48师特务团的2个营及100余名矿警武装;第27团亦包围了防守陈家河的特务团另1个营;师侦察分队逼近应城。在红9师主力围歼龙王集守军时,第48师特务团团团长兼应城县县长蒋作均,速令工兵营增援龙王集。行进中被红9师骑兵连歼其大部。22日,红9师主力加紧攻击龙王集守军,红军一面利用有利地形逼近守军阵地;一面利用被俘的工兵营长写信劝降,并进行战场喊话,政治瓦解守军。

守军拒不投降,坚守三天三夜,因粮水断绝,拼力突围,大部被红军歼灭。在红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陈家河守军被迫与红军进行谈判,准备投降。24日,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得悉,国民党军第4师第12旅由孝感驰援应城,于是迅速调整部署:第27团以1个营继续围困陈家河,迫守军投降;第25、第26两团和第27团主力,分别进入应(城)皂(市)公路龙王集段两侧的汤庙、冷子岗、毛家畈、墙园湾地区的丘陵地设伏;汉川独立团位于桑树湾以南、中分湾以北地区,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设于柏树屋。令师骑兵连向应城方向前出,与进犯之第12旅保持接触,且战且退,将其诱入红军伏击圈,予以歼灭。25日晨,陈家河守军全营投降。红9师3个团(约9000人)于拂晓全部进入伏击地区。

国民党第4师第12旅旅长张联华,自恃所部系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有战斗力,视红军为“匪”,不放在眼里。驱兵沿应皂公路向陈家河疾进,一路毫无戒备。25日正午时分,张旅前卫已进至毛家畈,主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各团突然猛烈开火,伏兵由东南和西北2个方向向心攻击,张旅顿时大乱,被红军压制在公路上,连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都未来得及卸载,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到下午5时许,进入红军伏击圈内的张旅两个团及旅部全部就歼,另1个团经黄家滩窜逃,张旅才得以幸免全军覆没。

赣州战役

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随之多次提出中央红军“不要再重复胜利

后休息”，要不停顿地进攻，去夺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争取革命首先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胜利。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以坚决的进攻夺取赣州，尔后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首先在江西的胜利。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联结江西、广东两省的军事要地，城墙坚厚，三面临水，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是时，据守赣州的国民党军系国民党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第12师第34旅（辖2个团另1个独立连）共3000余人，另有赣南17县地主武装组成的民团指挥部的17个大队、5000余人枪。此外，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一带，有蒋介石的中央军陈诚第18军（辖第11师、第14师、第43师、第52师）和公秉藩第28师；在赣州以南的赣粤边境之大庾（今大余）、南雄、始兴、仁化地区，有粤省国民党军余汉谋第1军（辖第1师、第2师，独立第1、第2旅，军属第1、第2教导团）。红军一旦攻击赣州，陈（诚）、余（汉谋）两军势必随时驰援。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1月召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赣州是国民党军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又无攻坚经验，很可能久攻不克，于红军不利，反对打赣州。但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赣州。中革军委攻赣部署是：以第3军团和第4军为主作战军（中央红军当时进行作战任务时的编组，主作战军担负主要作战任务，支作战军担负次要的、支援性或补助性的任务），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主作战军的第3军团第7军和第2师担任主攻；第1师担任预备队配置在沙石埠，并组成坑

道队、爆破队和炮兵队配合攻城；第4师第10、第11、第12师及第3军团第3师分别配置在南康、新城、杨眉寺、王母渡等地区，准备打余汉谋部增援；第4军第13师配置在塘江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陈诚部增援，并截击由赣州溃退的守军；江西军区（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闽西军区（罗炳辉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共6个红军独立师，组成支作战军，由陈毅统一指挥，以广泛的游击战配合主作战军的攻城与打援行动。

2月4日，红军第3军团先头第7军进抵赣州东部的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并开始围城。6日，主作战军全部进抵城郊。与此同时，红4军主力进至南康附近，一部进至塘江。在开进途中，于新城附近消灭增援赣州的余汉谋部独立第1旅第3团大部，俘虏其300余名官兵。当红军逼近赣州时，赣州守备部队指挥马崑下令拆毁城外工事，缩短防御战线，依城固守待援。红军随之占领了白云山、天竺山等进攻出发阵地。支作战军各师分别进至指定作战地区加紧游击活动，以牵制国民党军。红3军主力于2月17日由雩都（今于都）、宁都地区前出至信丰一带，以加强对南雄方向余汉谋粤军的警戒，保障攻城部队的安全。是时，红军攻城部队曾两次组织攻城爆破，均未成功。2月23日，红军第3次组织攻城爆破，通过坑道炸开东门附近城墙一段，占领城楼。马崑组织猛烈反击，占领城楼的红军部队伤亡大部，攻城再度受挫。

蒋介石、朱绍良为解赣州之围，急令陈诚派兵驰援赣州。2月29日，第18军罗卓英第11师、周至柔第14师共4个旅12个团约2万人，由泰和地区进至赣州西北郊，并以一部进入城

内。3月1日,罗卓英第11师第31旅推进至黄金渡、欧潭、黎人坡一线;第32旅时至横石、神背、通天岩。周至柔第14师第41旅推进至南桥、杨梅渡一线;第40旅进至赤珠岭、火榜桥。中革军委对上述情况不明,仍于是日向红军主作战军下达了“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并增调在石城以南地区整训的红军第5军团参加战斗,并重新调整攻城部署:红3军团第1、第2师和第7军分别攻击西、南、东门,第3师为攻城预备队;红5军团第15军进至沙石埠一带,并在三江口至五里亭章水南岸担任狙击任务,第14军位于赣州以北赣江东岸储潭南北一线,控制赣江,并威胁和牵制罗卓英部,第13军为主作战军配备队配置在花子林一带待命;红4军控制南康、塘江一线,红3军控制信丰、南康一线,准备打余汉谋援军和蒋军的增援,配合攻城作战。

3月2日,罗卓英以第14师和第11师第62团置于双佛岭地区待命,以第11师第31旅(欠第62、第63团)控制在长塘下,亲自率领第11师第32旅和第31旅第63团渡浮桥进入赣州城内。为速解赣州之围,罗卓英决定主动出击,下令在西门南侧、南门西侧挖掘坑道三条,作为出击时的通道。正当守城国民党军加紧掘进坑道时,红军于3月4日再次以坑道爆破手段将东门附近城墙炸开50余米宽的缺口,但守军事先在东门城内抢修了一道拱墙,加强了火力,红军攻击又未奏效。7日凌晨2时,罗卓英指挥已进入城内的4个团和第34旅一分别由小南门和出击通道向红军发动突然袭击,第11师第62团亦从侧后配合城内出击部队向红军实施夹击。红军攻城部队注意力都集中在西、南、东门各处,又久屯城下,数攻

不克,十分疲劳,在罗卓英部前后夹击之下,措手不及,伤亡严重。正在危急关头,红15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率领全军及时赶到城下,全军官兵奋不顾身,用大刀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拼死掩护攻城部队撤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罗卓英已解赣州之围,便停止了进攻。随后,红军撤围赣州,赣州战役遂告结束。

文家墩战役

1932年1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领红3军出击襄北,在陈家河、龙王集地区,一举消灭国民党军3个团,俘虏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包括迫击炮、重机枪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红3军第7师前锋已逼近武汉。红军的攻势作战行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很大的震动,蒋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决心将鄂省全境划为五个“清剿”区,集中兵力,分区“清剿”,并命令国民党军第10军军长徐源泉负责“清剿”洪湖区,限其在3、4两个月内“肃清”洪湖红军。徐源泉受命后,确定:“首先恢复应城、岳口间交通,后就应城至岳口的大道划为两区,抽十团以上兵力,同时分剿。”

3月5日,国民党军第48师第144旅由皂市南下,企图打通皂市、天门间的交通,为泗港、张截港向渔薪河、灰埠头“清剿”的国民党部队准备补给线。贺龙等红3军首长得此情报后,判断国民党军第144旅南下是孤军行动,决定集中红3军主力,寻机在运动中将该旅全歼。第144旅由皂市出发后,因时逢大雨,部队行动不便,被迫暂停于皂市以南的文家墩、李家场地区。红3军首长得悉后,遂决定冒雨奔袭文家墩地

区,以突然动作包围歼灭第144旅。于是,令段德昌率领的红9师从渔薪河、汉川独立团从蒋家场等地出发,利用雨天和夜晚的掩护,急速向文家墩开进,于6日拂晓前将第144旅包围;令王一鸣率领的红7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以钳制国民党军援兵。6日中午,红9师和汉川独立团首先向李家场发起突然攻击,并很快突破国民党军阵地。文家墩守军闻讯前来支援,遭到红军阻击部队的猛烈反击,红军乘势占领了文家墩、杜家岭,第144旅旅长韩昌俊率领残部退至胡家岭、坡湾一线,抢修工事,组织顽抗,等待援军。

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8师第142旅由皂市出动,向文家墩方向增援,遭到红7师迎头阻击,将其一举击溃。第144旅终不敌红军连续猛烈的攻击,在飞机掩护下,于当日下午组织突围。溃退中被红军全歼在方家咀、坡湖一带,其旅长韩昌俊亦被红军生俘。文家墩战斗,红3军全歼国民党军第48师第144旅,击溃第142旅,俘虏韩昌俊以下官兵2000余人。战后,泗港、张截港地区之“清剿”军部队,畏惧红军围歼,相继撤退,进而挫败了徐源泉的一次“清剿”行动。

苏家埠战役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弃“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驻皖西地区的国民党军,乘红四方面军在豫东南地区活动之际,积极向外扩张,相继进占苏家埠、青山店等地,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这样,皖西地区的国民党军增至12个团,北起六安、南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

其部署是：岳盛瑄第46师师部率1个旅另2个团驻六安，第137旅旅部率1个团驻马家庵，警备第2旅1个团驻韩摆渡，第138旅和第136旅旅部率1个团驻苏家埠，第136旅的另1个团驻青山店，警备第1旅驻霍山。此外，尚有第55师另2个旅、第57师、第7师等部，分布于合肥、潜山、蚌埠，但距六安、霍山较远，淠河一线后方有很大空隙。

商潢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令红25军第73师回皖西活动，率红4军北上进围固始县城，打击国民党军第45师。固始城坚难下，引诱又坚守不出，红军在城北三河尖歼其1个营后，获悉皖西国民党军的活动及部署，决定东进皖西，寻歼国民党军，扩大根据地。除留红12师在潢川、商城地区活动，开辟新区工作外，红四方面军总率第10、第11师于3月18日东进，在独山镇与红25军第73师会合。

根据国民党军在皖西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苏家埠战役，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分别包围六安与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几个据点，伺机消灭六安、霍山援兵。

3月21日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红10、红11、红73师，由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架设浮桥，秘密渡过淠河，以红73师、霍山独立团包围青山店。22日上午，红10师在北进中，与苏家埠出援青山店的2个团遭遇，经反复冲杀，将其击溃，歼其一个营，乘胜进围苏家埠。红11师继续北进，韩摆渡、马家庵守军仓皇逃进六安县城。23日，驻六安国民党军岳盛瑄部以2个团的兵力增援苏家埠，进至韩摆渡附近，遭红军夹击，1个团被围于韩摆渡，另1个团窜入苏家埠。红军渡河仅3

天,即实现了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歼国民党军一部的计划。

红四方面军鉴于苏家埠、青山店等据点寨高壕深,红军火力不强,硬攻难于奏效,于是决定采用围困据点的办法,吸引六安、霍山守军出援,予以歼灭。红军部署是:以红10师2个团围困苏家埠,以红73师和霍山独立团围困青山店和打击霍山援兵,以红11师1个团和六安独立团包围韩摆渡,将红11师主力配置在六安西南,占领有利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打击六安援兵,红10师第29团为总预备队。同时令六安、霍山两地县赤卫军、游击队进行广泛游击,侦察情况,制造假象,迷惑国民党军。

3月底,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岳盛瑄,鉴于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守军处境危殆,立即组织六安、霍山两驻军同时出援,企图南北夹击,解救被围守军。岳盛瑄以4个团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由六安倾剿出犯,岳亲自到十里桥督战。国民党军先后突破红军马家庵、平头岗阵地,其先头部队进至苏家埠北面凉水井、桂家老坟一带。红四方面军总部判断苏家埠守军有乘机突围可能,当即命令红10师对苏家埠严加封锁,并速令总预备队红29团迅速投入战斗,与担任阻援任务的2个团由东西两面钳击进入凉水井、桂家老坟之国民党军,经激烈战斗,歼其1个营,生俘团长陈培根,警备第2旅1个团溃不成军,窜入韩摆渡,与原被围之第274团会合。岳盛瑄见先头失利,仓皇率第163旅逃回六安。由南面霍山城出援的警备第1旅,进至霍山以北十里铺,被红军第73师阻援部队击溃,逃回霍山。战斗中,苏家埠守军突围未逞;青山店守军冒死突围,被

歼过半，一部逃至霍山东北舒家庙，被赤卫军游击队歼灭，一部逃向淠河西岸，一部窜入苏家埠。青山店被红军占领。

六安、霍山两地国民党军遭此打击，已无力再援。红四方面军总部以一部兵力围困苏家埠和韩摆渡，集结主力休整待机，以地方武装监视六、霍两地守军。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的国民党军，被红军长期围困，弹缺粮尽，虽有飞机不时来空投接济，但多落入红军的阵地，使守军更加恐慌。红军乘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日夜向守军喊话，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和国民党军内部的黑暗统治，宣传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和红军官兵平等，号召国民党军官兵拖枪投降红军，并向饥饿不堪的国民党士兵送去信息，欢迎他们出来讨取食物。凡来者均予热情招待。愿回者发给宣传品让其返回。为了照顾点内的居民免于饿死，红军还写信给守军旅长，令他将据点内挨饿的群众全部放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他们负全部责任。不久，即同守军达成协议，将万余群众接出据点，进行了妥善安置。红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守军更加动摇，携枪投诚者有增无减，连最可靠的旅部警卫部队手提式冲锋枪排，也携械向红军投诚。第46师师长岳盛璋眼看苏、韩两地守军难以维持而一筹莫展，连连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而陈调元也无能为力，只得向蒋介石频频告急求援。

4月下旬，蒋介石委任第7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该师5个团、第12师2个团、第57师2个团、第55师4个团及警备第1旅2个团，共15个团约2万人，自合肥等地大举增援。红四方面军总部得悉这一情报后分析判断：援

军数量虽多,但道远师疲;有许多部队曾遭过红军的打击,其中不少士兵是红军释放的俘虏,他们不愿与红军作战,士气低落。红军以逸待劳,士气旺盛;战场设在丘陵地带,便于发挥红军野战近战的长处。于是总部决定集中主力,在六安以西丘陵起伏、林木茂密的樊通桥、戚家桥一线布阵待敌,并组织打援部队进行现地勘察,拟定作战方案,进行战场准备。以红 73 师在樊通桥地区构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红 10、红 11 师主力分布于红 73 师阵地两翼,伺机迂回包抄;以红 73 师 1 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以地方武装秘密接替一部主力红军继续围困苏家埠和韩摆渡。红军在苏、韩两地周围挖有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堑壕、盖沟,守军要想突围比登天还难。

5 月 1 日,由合肥出援的国民党军第 7 师第 19 旅与红军诱援部队在陡拔河以东接战,红军边打边撤。第 19 旅即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 73 师阵地猛攻。红军利用工事,给予重大杀伤。此时适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第 19 旅遭红军沉重打击后仓皇后撤,不明情况的后续部队继续前涌,你挤我推,混乱异常。红 73 师乘势冲杀,援军落水溺死者无数,第 19 旅即大部被歼。尚在陡拔河西岸的国民党援军,见先头旅失利,慌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企图稳住阵脚。此时,红 11 师主力已由六安城南向国民党军右侧后包抄,红 10 师主力也由戚家桥、庙岗头向国民党军左侧右包抄。红四方面军总部见国民党军已被完全包围,立即发出总攻击令。红 73 师从正面一举突入纵深,摧毁了国民党军皖西“剿共”指挥机关,活捉“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红 10、红 11 师主力也攻

下老牛口、婆山岭高地,将国民党援军退路截断。国民党援军全部被包围于陡拔河两岸,又失去指挥,人马自相践踏,更加混乱不堪。红军及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和参战群众,从四面八方发起多路突击,进行猛烈穿插、分割包围。激战至下午5时,2万余援兵除少数逃散外,悉数被歼。在红军与国民党援军战斗过程中,苏家埠、韩摆渡守军曾数次冒死突围,并一度冲入红军第一线战壕,但在围的红军、地方武装坚强堵击下,均未得逞。

苏家埠、韩摆渡两地守军,外无援兵,内无粮弹,突围无望,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红军乘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并向其发出最后通牒,促其迅速投降。5月8日,苏家埠守军第136旅旅长王藩庆率军官数人至红10师师部请求投降。红军当即宣布:一、不准破坏一切武器弹药;二、枪支要捆好,按部队序列挨次交出;三、军官全部集合,交枪事宜由特务长办理;四、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不得乱动。旅长表示完全接受,并派出一名团长回去传达命令。韩摆渡守军也同意向红11师投降。至此,苏、韩两地守军同时放下武器,向红军投降。苏家埠守军缴枪时还举行了投降仪式,在广场上把枪放得整整齐齐,官兵列队迎接红军。战役至此全部胜利结束。

漳州战役

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中央红军和江西、闽西军区红军独立师按照王明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方针,强攻赣州33天而不克,反遭重大损失,被迫撤回赣州,转移到赣州东南地区整补待命。是役后,蒋介石增强了赣江流域的兵力;粤军余

汉谋第1军第1、第2、第4师和独立第2旅进入赣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第54、第59两师亦进入赣南。这样，加上已在赣江沿岸的中央军第11、第14、第28、第43、第52师，蒋军在袁水以南的赣江两岸即部署了10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由于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新的“围剿”尚在策划之中，上述各师继续采取守势。与赣江流域相比，其它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就比较薄弱：赣东北地区共有5个师，闽北地区2个师，闽粤边地区3个师，而闽南地区只有张贞第49师和少量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队。皖南、苏南及浙江省的国民党军兵力也很薄弱。

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尔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依据他对国民党军形势的分析，力主红军主力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求得在上述广大农村建立苏维埃，开展红军战争。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坚持红军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拒绝采纳毛泽东的主张。3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训令，规定中央红军以攻势行动“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决定：以红军第1、第5两军团组成中路军，由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赣江以东地区行动；以红军第3军团与湘赣、湘鄂赣两苏区地方红军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赣江以西地区行动。尔后中、西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

城市,达成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在中央红军已经东西路分兵行动的形势下,毛泽东根据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伸足闽南沿海的新情况和闽南、闽西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形势,以及济漳州地区群众基础与地形特点,于3月30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中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宗,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同时建议红5军团迅速由赣入闽,与红1军团会合行动,以集中兵力。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1931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正式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为委员,统一领导与指挥全国红军。红一方面军番号取消,各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实际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领导职务),率领东路军(3月26日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周恩来随中革军委进驻长汀,统筹红军后方工作,全力支持东征作战。

4月2日,红军第1军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转进长汀,准备向龙岩、漳州开进。出发前,毛泽东向红军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他在分析赣江流域和闽南、闽西的形势和发展前途后指出:当前日本侵略势力已到达厦门,红军进军闽南,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共的抗日主张,上举在国内外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指出:蒋介石的“剿匪”大本营就设在南昌,红军主力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向南势必与粤军主力顶牛;向西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

利。一来有闽西苏区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和发展余地。3日,红军第1、第5两军团分由长汀及信丰的新田出发,向龙岩、漳州方向前进。10日拂晓,红1军团先头第15军乘敌不备,一举歼灭龙岩以西小池之张贞第49师第2补充营一部,继续攻击前进。进至考塘地区时,第49师第291团和第1补充营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抗击。红15军第45师攻击受阻。红4军投入战斗。红军以一部正面攻击,一部从右翼迂回,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将考塘守军大部歼灭,顺势由西、北两个方向向龙岩守军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占了龙岩,歼灭守军第49师独立团。考塘、龙岩战斗,红军消灭张贞第49师约2个团,俘虏685人,缴枪925支,子弹7万余发,炮2门。

漳州地处九龙江下游,濒临海口,水陆交通便利,既是闽南政治中心,又是贸易商埠。漳州地势平坦,无城墙,易攻难守。据守漳州的国民党军是张贞第49师第145、第146旅,及师属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辎重营、独立营,还有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靖卫团,共约1万人。张贞为守住漳州,作了如下部署:以第145旅(辖第289、第290团和第291团残部)配置在榕子岭、笔架山及南靖(今靖城)地域;第146旅(辖第292、第293、第294团)配置在风霜岭、十二岭及天宝地域;师直属队和保安队等配置在市区。毛泽东与东路军首长研究决定,首先扫清外围,尔后攻占市区,全歼张贞第49师。其攻城部署是:红1军团第4军在左主攻,第15军在右助攻;第5军团第3军为预备队位于南坪附近;红5军团军团部率领第13军留守龙岩,维护后方交通;闽西军区(总指挥罗炳辉兼第12军军

长,政治委员谭震林兼第12军政治委员)红军第12军前出武平、上杭、永定地区,监视粤军的行动,以保障东路军右翼后方的安全。

4月19日晨,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阵地发起总攻。上午9时,红4军首先突破了守军第146旅的主阵地十二岭、风霜岭,主力向天宝纵深扩张,一部由左向右横扫,协同红15军作战;红15军在红4军配合下,迅速攻占了第145旅主阵地榕子岭、笔架山,并向南靖纵深发展。红军各部协同动作,一鼓作气,占领了天宝、南靖外围纵深阵地,乘胜向市区推进。下午,在天宝东南的荣铺地区击溃了由漳州出援的师部直属队,又乘势向市区追歼溃退之兵。张贞见大势已去,遂炸毁城内弹药库,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乘夜暗率残部弃漳州向漳浦、诏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随后相继占领了长泰、海澄、漳浦、平和、山城(今南靖)等城镇及其附近农村,开始了分兵发动群众,征集粮款。在东路军入闽作战的同时,西路军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于4月初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5月上旬进入湘南地区并攻占了桂东、汝城,后在国民党军重兵“会剿”下,被迫折回赣南地区休整补充。

新沟嘴战斗

1932年5月下旬,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夏曦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不顾湘鄂西红军连续作战造成的疲劳和减员,强令红3军“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决议》),1932年5月16日),进攻云梦、孝感、应山、

安陆为中心的京汉路,扩大革命战争,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造成长江以北整片苏区,再与长江南岸的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包围武汉。是时,鄂省国民党军正集中 20 个团的兵力,“清剿”汉川县刁汊湖地区。对于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确定的方针是“全力消灭进攻之敌”。据此,红 3 军以一部协同游击队阻击国民党军“清剿”部队,主力于 5 月 23 日向进至刁汊湖的国民党军第 44 师发起主动进攻。在皂市附近的张家场、文家墩等地,先后与国民党军第 44 师、第 41 师、第 48 师、独立第 37 旅等部作战,持续达 8 昼夜,毙伤国民党军 800 余人,自损 1300 余人。是继 4 月初瓦庙集战斗后,红 3 军打的又一个消耗战。加上湘鄂西根据地的第一次错误肃反,万涛、周小康、孙德清、柳克明、段玉林等大批红军干部先后被杀害,大大损伤了红三军的元气,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驻鄂川军在襄北国民党军迭次要求下,乘红 3 军全力争夺襄北的机会,集中 10 个团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大举进犯。川军兵分 3 路:第 1 路,第 21 军教导师第 3 旅、第 2 师第 9 旅共 5 个团,由江陵地区东进,先后占领了下蚌湖、浩子口、周家矶、潜江一线;第 2 路,第 21 军第 4 师 3 个团,由沙市地区东进,先后占领了张金河、龙湾、老新口一线;第 3 路,第 21 军 2 个团由监利地区北上,进攻陈沱子口,威逼新沟嘴。徐源泉部 6 个团在襄北渔新河、皂市一带牵制红 3 军主力,配合川军行动。企图南北合击,占领洪湖苏区,摧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军首脑机关。

6 月初,川军各路迅速向预定地区推进。由于红 3 军主力

远在襄河以北,襄南地区仅有的红军省军委警卫团及地方武装和军校学员队迅速发动和组织群众,奋起抗击,战局十分严峻。贺龙、关向应等红3军首长决心率主力速返襄南,保卫苏区,粉碎国民党军进犯。6月9日前后,红3军第7师从荆南方向出击川军侧背,红9师(欠第25团)经黑流渡渡过襄河,隐蔽地进到新沟嘴地区,在当地赤卫队和群众的鼎力帮助下,连夜抢修工事,设置障碍物。在红9师未到之前,军委警卫团已从张金河、老新口一线退至新沟嘴,并在当地准备防御作战。于是,红3军首长作出如下部署:红9师第26团和警卫团主力配置在新沟嘴西北,为第一梯队,担负主要防御方向防御;警卫团一部配置在东荆河对岸的渔阳镇附近,负责侧翼掩护;红9师第27团和师直属骑兵连为第2梯队。由于红3军连续打了几次消耗战,部队弹药很缺,此时不得不向赤卫队和群众借来大批长矛、大刀,准备必要时与国民党军进行肉搏战。6月10日,正当红军一面继续加强防御工事,一面恢复体力以利再战时,夏曦赶到新沟嘴,要红军主动进攻老新口。经段德昌力陈利弊,夏曦才放弃要红9师主动进攻老新口的计划。过了两天,川军仍按兵不动。红9师从襄北返回时,只带了5天的给养,苏区此时又严重缺粮,再等下去就要发生粮荒。为了诱川军来攻,段德昌师长命令警戒分队出击老新口,将川军引出后,继续保持接触,且战且退,纵其深入。果然,川军范绍曾第4师3个团于13日发起进攻,其先头部队拼命追赶红军警戒分队,其主力成多路纵沿东荆河南岸河堤猛烈冲击红军阵地,企图扫除障碍一拥而入新沟嘴。这时,严阵以待的红军集中火力猛烈地射击,并适时发起反冲击,将进犯川军

赶回其冲击出发地区,并给予川军大量杀伤。是时,川军左面的东荆河堤东侧渔阳镇已被红军警卫团一部的火力所控制;右面是水稻田和池塘,川军大部队难以展开,虽经多次冲击,均被红军第1梯队击退。在红军第1梯队正面抗击川军连续冲击时,第2梯队则利用河堤为遮蔽,迅速迂回川军侧后,发起突然攻击,第1梯队又乘机全线反击。川军范绍曾部遭到红军前后夹击,顿时一片混乱,失去统一指挥,各路纵队竞相溃退。红军跟踪穷追不舍,一直追击到老新口以西的熊口一带,毙伤俘师长范绍曾以下川军官兵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在此期间,红3军第7师在浩子口、下蚌湖地区截击溃退川军,歼灭了第3师第9旅一部。

南雄、水口战役

1932年5月,蒋介石不顾全国民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继续并加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准备对红军和苏区组织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采取的战略步骤是: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苏区红军,尔后转兵南下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红军。蒋介石在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时,撤销了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委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副总司令,统筹辖区内的“清剿”与尔后的大举“围剿”。何应钦乘是时中央红军东西路分兵之机,调集粤军余汉谋第1军、陈诚第18军、湘军第38军第15师共6个多师的兵力,集中“会剿”进入湘南地区的中央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同时,粤军19个团乘机进入

赣南,对赣南苏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部署是:李振球第1师(辖4个团)、叶肇第2师(辖4个团)和军属第2教导团集结在赣州城及其西面的塘江等地,准备“围剿”横石井、社溪地区;独立第1旅(辖3个团)进驻仁化;独立第2旅的两个团进驻南雄;军属第1教导团进驻大庾(今大余)。

1932年4月下旬漳州战役后,中央红军东路军(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统率路军)在龙岩、漳州地区活动,6月初由龙岩集中班师回赣南。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下达军事训令,规定东路军的红1、红5两军团主力与西路军的红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尔后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6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临时中央训令,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朱德仍任方面军总司令,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王稼祥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方面军在前方“主持大计”。下旬,红一方面军第1、第3、第5军团相继回师安远、南康、信丰地区。回师途中,红4军军长王良在福建武平县西北的大禾侦察地形时遭国民党兵冷枪射击中弹牺牲。

6月2日,为执行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首先“解决入赣粤敌”的作战意图,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以红1、红5两军团和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独立第3师由信丰南部出击南雄,调动信丰、南康、大庾(今大余)、南雄等地之粤军至南雄、信丰边界的坪田至乌迳一带给予有力打击;尔后集中红1、红3、红5军团和闽西军区(总指挥罗炳辉、政

委委员谭震林)第12军(罗、谭分兼军长、政治委员)、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准备在南雄境内同粤军决战,给予余汉谋第1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消除粤军对赣南苏区的威胁,保障方面军转兵北进,依次夺取赣州、吉安、樟树,直逼南昌。

红军第一方面军各军团回师赣南地区后,陈济棠、余汉谋遂于6月29日决定:“乘各股赤匪尚未完全会合以前,先行剿灭其一部后,集结兵力歼匪全部于(南)康(大)余(南)雄信(丰)地区。”于是陈、余作如下部署:第1师全部、第2师第5团、军属教导第2团急趋南康兜击;第2师(欠第5团)防守赣州并“相机出击”;第2独立旅扼守南雄,并“相机抄击”。同时,请求何应钦令陈诚部分兵出上犹赣州“协击”。6月30日,粤军第1师师长李振球指挥6个团推进至南康地区。7月1日下午在南(康)大(余)间的池江附近与红军第3军团前锋遭遇,红军稍经接触即撤出战斗。2日拂晓,红3军团主力向池江地区李振球师发起攻击,战至下午4时,将李师的4个多团击溃。池江战斗,红军一无所获,红7军第19师师长李显在战斗中牺牲。李振球率部退守大余。

余汉谋的第1师退守大余后,红军方面军首长判断:大余粤军可能迅速向南雄靠拢,遂决心抢占大余、南雄之间有利地形,断绝并歼灭大余粤军。7月3日下午2时,红1军团以2个多团的兵力向驻守梅岭关的粤军叶肇第2师第5团发起攻击,经2小时战斗,将该团击溃,控制了梅岭关要隘。此时,红1军团主力、红5军团和红12军已进至大余、南雄之间的中站、灵潭、槐花、白石桥地区待机;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和第6师已分别在信丰、南雄两地佯动、牵制。

余汉谋丢去梅岭关要隘后,即率军直属队和李振球第1师固守大余待援。其防御布署如下:第1师(欠第3团)配置在大余老城;第1师第3团和军属教导第2团配置在东山,第1教导团配置在珠山;军属特务营、工兵营配置在大余新城;叶肇第2师第5团配置在大余新城为预备队;炮兵营在东山及大余老城之间地段占领发射阵地。7月4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下令红3军团开始转攻大余。5日,方面军首长得围攻大余的部队报告:“大余之敌已经退却。”于是于当日下午4时命令红5军团直插南雄以南,截击南雄粤军,防止逃窜。6日,红5军团逼近南雄郊区时,方面军首长才知大余粤军根本未动,而粤军张枚新第4师已放弃信丰正向南雄靠拢。于是,方面军首长遂改变命令,让红5军团北返罗田、赤石、州头一线集结待命。4日至7日,红3军团多次攻击大余,均未得手,与守城粤军形成对峙。

在此期间,陈诚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4、第52师正由上犹地区向大余疾进,余汉谋的独立第3师和第5师已由韶关兼程急进南雄,第4师亦由信丰进至乌迳。何应钦、陈济棠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分进合击,消灭红一方面军于南雄地区。7月8日,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红1、红3、红5军团和闽西军区第12军等部,同时攻歼由南雄出动的粤军第5师和独立第3师与进抵乌迳的粤军第4师,并作了如下作战部署:红1军团和红12军分别位于中站、中坑附近,担任攻歼由南雄出动的粤军第5师和独立第3师;红5军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继续执行歼灭由乌迳出动的粤军第4师;红3军团以一部兵力牵制大余粤军第1、第2师,主力位于中站东北

高地担任方面军预备队。7月8日上午,红5军团首长得悉粤军第4师已于是日凌晨离开乌迳向水口方向逃跑,遂即命令改变方向,向水口截击。下午1时半,军团先头红13军进至水口附近同粤军第4次接触,红3军及时从红13军左翼投入战斗,与粤军激战2小时,将第4师的2个团击溃。9日拂晓,红5军团再次对水口之粤军展开攻击,战至12时,南雄出动的粤军6个团赶到水口,旋即向红5军团展开全线反击。由于红5军团首长对粤军援兵的到来未及时察觉,误把10个团当成4个团来打,处境十分危急。正在危险关头,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两师在陈毅率领下及时赶到。红军参战部队同粤军展开了英勇的肉搏战,连续打退粤军10个团的多次冲击。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激战期间,红一方面军首长本拟以主力增援水口,会歼粤军,由于红军攻击部队误报“水口之敌已退去”,致使方面军首长中途改变了增援水口的决心。

当红一方面军首长得知水口粤军并未撤退而且得到更大增援时,遂于9日下午2时急令红1、红3两军团和红12军迅速转向水口,会同红5军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合力围歼粤军于水口地区。10日晨,红12军、红1军团先到达战场,即与红5军团首长共同商定了攻击部署:由红5军团(欠红3军)和独立第3师担任正面进攻;红1军团和红3、红12军、独立第6师由左翼向粤军右翼进攻。是日11时,红军发起总攻,经1小时战斗,将粤军全部打垮。当红3军团先头第7军赶到水口战场时,粤军10个团已全线溃逃,退入南雄城内。此时,大余的

粤军第1、第2两师未敢出动,陈诚的第52师和第14师分别停止在大余东北的青龙和杨眉寺地区。红军返回水口休整补充,南雄、水口战役遂告结束。

乐安、宜黄战役

1932年8月16日至23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红军部队的直接配合下,于江西省的乐安县、宜黄县境内,同国民党军陈诚、朱绍良、孙连仲等部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是役,红军攻克了乐安、宜黄两城,占领了南丰、宁化两县,消灭国民党军约3个旅,生俘其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迫击炮20多门,无线电台3部,米面千袋,汽油500多桶。

1932年7月10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及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红军部队,结束了南雄水口战役后,部队转至南(雄)信(丰)边界的坪田圩、界址圩、铁石圩和固陂等地补充休整,待机而动。7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的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的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规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以调动国民党军,主力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江,沿赣江西岸北进,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动进攻。7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赶到前方(周到前方后,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信丰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方面军首长会商。共同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于是,周、毛、朱、王根据战场实际

情况出发,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先取万安,以求得渡河点再西渡赣江,然后寻机同蒋系主力决战。7月27日,红军由南雄、信丰地区北移,于8月上旬进至兴国、雩都(今于都)地区待机。

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副总司令陈济棠)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即判断“匪军有北犯南丰、南城或东窜闽北之可能”,遂下令在红军南雄水口战役时援粤的陈诚第2路之第14、第52两师,速从大余东北的青龙、杨眉寺地区回防吉安、秦和,以堵截红军西渡赣江北进。同时令王懋德第28师集结万安。在此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局于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周、毛、朱、王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蒋军主力摆在赣江以西,红军主力若按原计划西渡赣江寻战,势必陷于不利态势;赣江以东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仅仅有国民党军1个师,比较容易就歼。于是决定:先打乐安、宜黄之国民党军,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国民党军,进而牵动湘鄂赣、赣东北两地区的国民党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江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若抚州(今临川)空虚亦可先占抚州。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举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以红军第1、第3、第5三个军团组成主作战军,首先攻歼乐安、宜黄国民党军,进而夺取与威胁赣江、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以闽西军区第12军、江西军区第21军、第22军及两军区独立师(团)组成支作战军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同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组成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处理行动方针和作战

计划,由周恩来任会议主席。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下达了进攻乐安的作战命令。驻防乐安的国民党军,系孙连仲第9路第27师(师长高树勋)第79旅(2个团)和第80旅第1团第1营。其主力凭城固守,一部防守城外近郊高地。根据守军布防形势,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心:以红1军团、红31师、红22军第65师及方面军特务营为攻城部队,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红3军进至宜黄以南的牌路港地区,准备打宜黄、崇仁来援之国民党军;红5军团为总预备队,配置在乐安以南的望仙、南村附近,随时准备参加攻城或打国民党援军。16日15时,红1军团第3军袭取乐安,国民党军守城部队据坚顽抗,袭占未能奏效。16时,红1军团调整兵力,实施强攻。17日凌晨3时,红3军以主力袭击东门外守军以吸引守军主力;以第7师进攻西门以牵制守军一部,掩护红4军主攻南门。拂晓,红4军在红3军和炮火掩护下,向南门外的守军发起攻击,战至上午9时,将南门及江门外守军全部击溃。是时,红军攻城部队乘势向各城门扑去。至11时,红4军由东、南两门,红3军团由西、北两门,红22军第65师由北门全部突进乐安城内。12时,战斗结束,红军歼灭高树勋第27师防守乐安的一旅两团并一营全部,缴枪近2000,机枪、迫击炮各10余支(门),无线电1架,俘虏3000多,旅团长至伙夫无一逃脱。

攻克乐安后,红一方面军首长遂决心直取宜黄,继续攻歼孙连仲部。驻防宜黄的国民党军为高树勋第27师第80旅(欠1个营)、第81旅(4个团),主力防守县城,一部于城外防御。孙连仲部骑兵第4师驻防崇仁;朱绍良第6路第8、第23、第

24 师驻防南城、南丰地区。红军进攻宜黄、崇仁、南城、南丰等地国民党军随时可能来援。为保证攻城和打援成功,红一方面军首长在 8 月 19 日下达的攻击命令中作了如下部署:红 3 军团担任主攻,由城南方向攻击;红 1 军团担任助攻,在城北方向攻击并向崇仁方向警戒,同时以一部兵力向龙骨渡方向游击;红 5 军团前出至炉藻、龙源、麻坑一带担任总预备队。进攻作战,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8 月 20 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红 3 军团第 3 师顺利占领了肖家排以北高地,第 1 师和第 2 师进攻北华山、峨嵋山分别受挫,第一次总攻未能奏效。当天晚上 9 时,红军发起第二次总攻。战至 11 时,红 1 军团第 31 师首先由北门攻入城内,接着,第 3 军一部从西门攻入城内。在此期间,红 3 军团亦从东、南两门突入城内。红军各师(团)协同作战,与守城国民党军激战一夜,击溃守城之高树勋第 27 师两旅共 3 团,缴获俘虏近千,得无线电 2 架,机关枪 20 多挺,军用品、辎重甚多。红军在尾追溃逃之守军时,又俘虏 1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由于红军一星期之内连克乐安、宜黄两城,歼灭高树勋第 27 师约 3 个旅,陈诚、朱绍良部惧怕分散就歼,纷纷收缩兵力。闽西军区红军于 8 月 19 日占领了宁化,红 12 军于 23 日占领了南丰。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此期间,各地区相继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这一切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

条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苏区、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还有上海、武汉等地秘密工会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共600多人。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以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它以国家政权的姿态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1933年3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扩大到湘鄂赣粤4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人口发展到300万,正规军发展到10万人,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全国的工农革命力量到1934年初发展到14省15个地区,人口1000万,正规红军发展到30万人。

苏区各项建设的展开

在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广泛开展。

政权建设方面,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逐步健全了自上而下的中央、省、县、区、乡五级政权机构。根据宪法大纲规定,各级政权均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1932年和1933年,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选举,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使民主权力,许多地方参选的选民达80%以上。

随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不断深化,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具体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和经济建设等重要问题。大会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和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推举了主席团为执委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经济建设方面,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普遍组织起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种粮合作社及合作程度更高的合作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实行这些新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33年,中央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收获量比上年增加了15%,闽浙赣根据地增加了20%。其次是发展工商业。根据地的工商业主要由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和私人企业组成,为适应战争和生活的双重需求,根据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据1934年3月不完全统计,

仅中央根据地就有较大的军需工厂 30 多家,民用企业则有制糖、制盐、纺织、煤炭、造船、农具、造纸、烟草、医药、肥料等工业。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军民的生活需要,根据地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对外贸易机关,经营粮食、食盐、布匹的贸易。第三是财政金融事业的建设。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贪污的财政支出方针。1931 年 11 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不仅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作储备,还有大量的物资后盾,保证了币值的稳定性。

文化教育方面,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学龄儿童普遍进入列宁小学学习。1934 年 1 月中央苏区有 3000 余所列宁小学,学生近 9 万名。1933 年中央苏区有夜校 6400 余所,学生 74500 多人。还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红军大学、女子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文化、出版工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34 年,中央苏区已有各种报刊 34 种。

根据地政权、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不仅使根据地得到壮大和巩固,而且为中共独立管理国家政权,领导经济建设做出了可贵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川陕和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

川陕根据地红军反“三路围攻”

反三路围攻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于 1933 年 2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在川陕边区所进行的反对国民

党川军围攻的第一次作战。这次作战,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总计毙伤川军田颂尧部1.4万余人,俘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部损失近半,退守嘉陵江沿岸。红军打破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扩大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和前堵后追,于12月中旬到达陕南的城固地区。当时得知国民党四川军阀正在川西混战,川北防务空虚;同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集团又有矛盾,蒋系部队难以入川。红四方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2月中旬向南越过巴山进入川北。不到1个月,接连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共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余人。

蒋介石对红军入川大为震惊,连电四川各派军阀,要他们立即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1933年1月下旬,四川军阀暂时停止了在川西的混战,蒋介石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共”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令其乘红军立足未稳组织进攻。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随即将其在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并命其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于阆中设总指挥部,积极作进攻红军的准备。

田颂尧部共有5个师、3个旅、2个警卫旅、1个军属独立旅共50个团。他以39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编组为左、中、右3个纵队进行三路围攻,妄图消灭红军,恢复其对通、南、巴地区的统治。具体部署是:左纵队以第1、第4、第5师主力及第

2、第3路和独立旅等25个团组成,由第4师师长王铭章指挥,集结于旺苍坝地区,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中央纵队以第2师和第5师和1个旅共4个团组成,由第2师师长曾南夫指挥,集结于恩阳河以西地区,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尔后会同右纵队占领通江;右纵队以第3师和第1路共10个团组成,由第3师师长罗乃琼指挥,集结于仪陇及其以北地区,企图经曾口场、得胜山,攻取通江城。3个纵队中,以左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为助攻。此外,盘据于营口、渠县之川军杨森第20军和在达县、宣汉、万源地区的刘存厚川陕边防军,也准备相机配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当时川军情况和在鄂豫皖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及川北地形山高林密、谷深路险的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在收紧阵地过程中,要求各部队利用险要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节节抗击,给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消耗,然后逐步收缩,达成兵力的集中;待反攻时机成熟时,则集中力量实施反攻,打破川军的围攻。兵力部署是:红73师主力位于南江及其以西三江坝地区,红11师主力位于南江西南之木门、长池地区,共同对付田颂尧之左纵队;第12师位于巴中及其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对付中央纵队和右纵队;第10师位于通江东北之洪口场,第11师1个团位于通江西南之得胜山,除警戒刘存厚、杨森两部保障红军侧后安全外,并为机动力量;红73师1个团位于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陕南方向警戒。

2月12日,川军开始以小部队在川陕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袭扰和侦察活动,并掩护其主力展开。左纵队首先向三江坝、木门两地猛攻。红73、红11师分别在分水岭、侯家梁等地依托险要阵地进行顽强抗击,予川军以重大打击。仅红11师第32团在侯家梁3天的防御战中,便全部击溃了第二路的进攻,俘500余人,缴枪700余支。田颂尧见其主攻方向受挫,当即集中左纵队向长池猛扑。红军凭险防守,先在高壁寨击退第5师和第三路4个团的进攻,继在中魁山地区击溃第4、第5师及第三路共6个团的进攻,杀伤川军约2000人。以后又在青杠梁击溃第1师2个团的进攻。从18日至28日,田颂尧担任主攻的左纵队已损失近5000人。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已达到大量消耗川军的目的,乃令红军向后收缩,主动放弃长池,主力转到八庙垭地区。川军占领长池后继续进犯。3月8日,红四方面军集中第73、第11师各一部,乘川军进至八庙垭之足未稳之际实施反击,激战半日,歼第1师第1旅一部和独立团大部,然后撤出八庙垭。18日,为继续收紧阵地,红军主动放弃南江城。红73师一部又在甑子垭、梁炮台等地给了川军以大量杀伤。此后,红73师和红11师主力即相继转移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在巴中方向,田颂尧中央纵队经恩阳河向巴中进攻。红12师一部于恩阳河附近稍事阻击后,于2月底退守巴中城西南山地。川军第2师第5旅占据恩阳河后,在右纵队第3师一部配合下继续前进。当进至南坎坡时,红12师突然向川军两翼反击,毙伤1000余人,迫其退回三江口一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见巴中方向已完成消耗川军的任务,乃令红12师于3

月8日撤出巴中城,转至清江渡附近。

通江方向,田颂尧右纵队占领曾口场后,又继续向得胜山进攻,被驻守在该地的红军击退。与此同时,杨森第20军3个团配合左纵队向兰草渡进犯,遭到红12师一部的坚强阻击,逡巡不前;刘存厚部1个旅及第三路2个团分别向得胜山以南之元山场和洪口场以南之余家坪进犯,也先后被红军击退。

从2月18日到3月18日1个月的作战中,川军虽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但先后占领了巴中、南江两城。他们兴高采烈,陶醉在一片“胜利”声中。国民党的电台,天天给田颂尧的胜利打气。红军主力则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到得胜山,又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竹峪关一线占领了新阵地,继续阻击围攻红军的川军。

从3月下旬以后,川军暂时停止了全线进攻,田颂尧一面整顿补充部队,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一鼓作气,消灭红军于大巴山下,以完成其第二步战役企图;一面在其后方大肆搜刮民财和粮食,以充其“剿共”之需。红军则积极构筑工事、加强阵地、开展冷枪杀敌运动,加强瓦解川军的工作,并经常派遣小部队和游击队乘夜摸到后方袭扰打击川军。同时,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开展战场练兵,深入政治动员,稳定人心,并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筹集粮秣,为迎击川军新的进攻和举行反攻作准备。

4月26日,川军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准备,又在全线发动了对红军的猛烈进攻。其部署是:由中央纵队、右纵队和左纵队的一部,分别经清江渡、得胜山、大明垭等地,直扑通江;

左纵队主力向贵民关、观光山一线猛攻,压迫红军到通江以北地区,再包围歼灭。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充分运用前一段的作战经验,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继续以少数兵力依托险要地形与工事,以短促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顽强地阻击田颂尧部的进攻,消耗其有生力量。全线再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26日到28日,红军共毙伤川军3000余人,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

4月29日,红四方面军为集中主力,引诱川军再进,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红四方面军总部撤至战略后方最北端的空山坝地区。川北的地势,南低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红军坚守。红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收紧阵地,示弱于敌,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发起致川军于死地的反攻。田颂尧非常愚蠢,不懂这个道理,以为红军退出通江城后已“溃不成军”,将“兵退汉中”。狂妄地宣称胜利“不过指顾间事”,令部队再次展开全线进攻,以“竟其全功”。其担任主攻的左纵队司令王铭章令第2路司令刘汉雄指挥4个旅和1个团的兵力,继续向东猛扑,于5月中旬进至空山坝以南地区。刘汉雄以2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骡马山,1个旅的兵力进攻小骡马山及柳林坝,置1个旅于右楼子为第2梯队,1个团置于高集为预备队。左纵队其他部队也向柳林坝以西地区前进,准备配合中、右两纵队前后夹击。东面的刘存厚部也认为有机可乘,急于5月14日以8个团抢占竹峪关,威胁红军左侧。

此时,左纵队刘汉雄指挥的9个团虽来势汹汹,但孤军深入,急于求成,补给困难,人员疲惫,士气沮丧;又处于崇山峻

岭、狭谷深壑之间,不但步步涉险,而且没有回旋余地。刘存厚部抢占竹峪关的目的在于趁火打劫,没有后续力量,战斗力不强,立足未稳,经不起打击。红军虽退守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狭小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已全部集中,士气旺盛,战斗情绪极高。红四方面军总部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反攻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决定拣弱的先打,首先歼灭进占竹峪关之刘存厚部,解除翼侧威胁,尔后迅速回师消灭空山坝地区之刘汉雄部。具体部署是:红 73 师主力于大、小骡马及小坎子地区抗击左纵队主力,阻止其继续前进;红 12 师一部和红 10 师 1 个团结合部分地方武装坚守小通江河以东及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正面阵地,钳制中、右两纵队;红 12 师主力及红 11 师 1 个团分别集中于长坪及其以北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并作好反攻准备,红 10、红 11 师主力担任反击竹峪关刘存厚部之任务。部署确定之后,红军各部队即按各自的任务行动。红 10、红 11 师主力兼程奔向竹峪关。5 月 15 日深夜,红军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占领竹峪关西北之包台山及东北之亭子庙和东南之佛爷山等外围险要阵地,刘部被全部击溃,死伤 800 余人,迅速后撤。红军乘胜追击 60 余里,解除了侧翼的威胁。

5 月 17 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集中主力歼灭冒进至空山坝以南田颂尧左纵队之 9 个团。部署是:以红 11 师由空山坝以北向田军左侧迂回,断其通路;红 10、红 12 师主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其右翼;红 73 师仍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正面进攻。反攻部署确定后,红 73 师同正面川军多次展开肉搏,抗住了强大、猛烈的进攻,为反攻部队的集结运动赢得了时间。担

任进攻的红军在进行了积极准备之后,以红 11 师一部为先头部队,冒雨从空山坝以北的深山老林中开辟了一条通路,秘密插入田部左侧。21 日拂晓,田部左侧遭到红 11 师的突然攻击,顿时惊慌失措。接着红 73 师从正面,红 10 师及红 12 师从右翼发起猛攻,将田颂尧部 9 个团大部分割包围于空山坟以南之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基本将其歼灭,共毙、伤、俘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 5000 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迫击炮 50 余门。接着又在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等地击溃左纵队 4 个团。

左纵队主力遭到惨败,溃不成军,孙震率残部夺路而逃。中、右纵队也慌忙四窜。川军素有“川老鼠”之称,溃败时不仅逃得快,而且耍花招,官兵在沿途丢弃枪支弹药和银元物资引诱对方去拣,以便自己逃命。这次红军已有经验,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红军不许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穷追。川军此计未成,更加溃不成军,四散逃命。红 73 师直取南江城,在守军弃城逃跑后于 26 日收复。红 11 师经平溪坝、官路口抵长池附近。红 12 师于 29 日收复通江城后,分两路追击。一路经清江渡于 6 月 5 日收复巴中城,接着又克恩阳河;另一路沿通江河以西经得胜山收复江口。田颂尧部在后撤中,慌乱不堪,一片狼藉,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红军尾随穷追,沿途又俘获川军官兵 6000 余人。

田颂尧在其左、中、右三路全线崩溃后,又急忙抽调后方留守部队 5 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为乘胜扩张战果,向该部发起猛攻。6 月 10 日夜,红 73 师 2 个连袭占险要阵地华盖山,仅以 2 名轻伤的代价,歼其

500 余人。12 日,三江坝守军 1 个旅闻风溃逃,红 73 师乘势西追,15 日占领旺苍坝,将该旅大部歼灭,直逼广元城下。与此同时,红 11 师攻击长池,守军向后逃窜,红军当即收复长池、木门,并追至苍溪县以南之龙山场,逼近苍溪。红 12 师自恩阳河向西挺进,占领尹家铺,威逼仪陇。红 10 师一部也乘胜向前推进,迫使刘存厚部继续后撤。

至此,红军历时 4 个月的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川军田颂尧部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田颂尧川陕“剿共”督办的头衔,也被蒋介石罢免。

宣达战役

宣(汉)达(县)战役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于 1933 年秋季举行的三次进攻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红四方面军在中央梁(山)达(县)中心县委的支援和川东游击军配合下,从 10 月 17 日起至 27 日结束,重创川军刘存厚的第 23 军,连克宣汉、达县、万源 3 城,歼灭和击溃 15 个团,毙俘 5000 余人,缴获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工厂和大量军用物资,使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乘川军新的围攻尚未来临之际,于 8 月开始,先后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两次进攻战役。至 10 月初,已解放了仪陇、营山两城与嘉陵江以东、渠江以西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在两次战役胜利的基础上,为扩大根据地,决定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向刘存厚第 23 军进攻。

刘存厚是个贪婪昏庸、顽固腐朽的老牌军阀,在接受国民

党政府委任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23军军长以前,已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高级将领,曾授予“崇威上将军”的荣衔。他升官有术,治军无能,在军阀混战中屡屡败北,最后不得不退处川东北一带,苟延残喘。在红军反三路围攻最困难的时刻,他趁火打劫,派兵抢占竹峪关,配合田颂尧的围攻。宣达战役发起前,刘存厚的第23军盘据在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区,辖2个师、1个路和1个独立旅共15个团的兵力。为防御红军的进攻,以13个团布置在东北起万源,西南至巴水长达300余里的防线上。具体部署是:廖雨辰第3路位于万源及其附近地区,魏邦文第2师位于草坝场、余家坪地区,刘邦俊第1师位于土地堡、丘家堡地区;另有少数兵力防守老鹰寨。其总部率独立旅位于达县县城。

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在木门进行了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部队由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每军辖3个师。以红10师为基础扩编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以红12师为基础扩编为红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以红11师为基础扩编为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以红73师为基础扩编为红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

红四方面军根据刘存厚兵力部署前重后轻、纵深薄弱、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刘存厚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具体部署是:以红30军之第88师及第89师一部为第1梯队,红9军之第25师为第2梯队,组成中路,由通江城以南地区经刘坪向以土地堡为中

心的第1师阵地实施突破,得手后向宣汉、达县发展。以红4军之第10师及第12师一部为左路,由洪口场、龙凤场地区向以草坝场为中心的第2师阵地进攻,得手后向罗文坝、毛坝场发展,并相机占领万源城。以红4军之第11师为右路,由江口附近东渡巴水向江林溪和达县城方向进攻,并协助中路兜抄可能南逃之川军。上述各路限10月15日前完成进攻准备。在准备期间,以红31军全部及红9军和红30军各一部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积极佯动,以迷惑川军,达成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按照红四方面军统一部署,中路军向预定目标开进。17日拂晓,红30军一部向土地堡西北的土门场发起突然攻击。红军1个营以夜摸手段突破川军防线,占领了土地堡的屏障烟灯寨,歼川军1个营。红军主力继续前进,一举攻占了土地堡、麻石口和凤凰观等阵地,歼守军1个团,俘虏400余人,在刘存厚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7日下午,乘胜占领了丘家堡、马渡关,将守军1个团击溃。残部向宣汉、达县方向逃窜。红军按预定计划实施追击。18日,红25师一部占领了通往宣汉路上的隘口场、双河场;红30军占领了达县以北的双庙场。19日,红25师继续向宣汉城追击,相继占领了宣汉城北的板凳垭、尖山子。宣汉守军弃城东逃,该城遂告解放。这时,红30军先后占领了达县城东北的蒲家场和罗江口,控制了达县通往宣汉的大道。通过侦察及地方党供给的情报,获悉达县城北靠凤凰山,山上地形险峻,并有坚固工事作为该城北面的屏障。川军以1个团防守凤凰山,1个团防守城垣;城东10里之吴家桥有1个连控制宣达大道。根据上述情况,红四方面军总

部遂决定避开城北难攻的凤凰山,突袭达县城。20日黄昏,红军突然向凤凰山之敌开火。袭击达县城红军进至吴家桥,迅速将守军击溃,然后尾追溃兵,突入达县城的东门,控制了城内数处制高点,接着,红军主力也迅速赶至城内投入战斗。刘存厚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宣达战役以前,以为红军主力仍在嘉陵江沿岸地区。当土地堡、麻石口等地防线被突破后,仍认为是红军小部队和川东游击军进攻,不放在心上,尚在府中饮酒扶乩。以后虽发现是红军主力,但仍妄想依靠凤凰山之坚险固守达县待援。这时,这位刘老将军求援的电报像雪片似的飞出达县,一面向刘湘告急求救,一面又表示要“誓死坚守”达县。及惊闻红军入城,才如梦初醒,仓皇带上家眷卫兵,出城渡河南逃,其城内守军1个团则大部被红军歼灭。凤凰山守军发现城已失守,极其动摇。红军及时由佯攻转为猛攻,在城内红军一部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凤凰山,歼守军大部,俘团长温少康以下500余人。余部在夜暗中向西逃窜。20日晨,红军完全解放达县城。

红军左路军于10月16日与中路军同时开进。红4军第10、第12师分别向草坝场、镇龙关守军发起进攻。红10师主力经过半日激战占领镇龙关,歼川军1个营;随后向东迂回石窝场。红10、红12师各以1个团向余家坪、草坝场守军发起攻击后,遭到顽强抵抗,战斗相持1日,红军一面以主力从正面进行仰攻,一面以一部兵力向草坝场以南迂回,进占苦寨坪。此时,守军发觉红军已深入其左后方,十分恐慌。18日拂晓,草坝场等地守军1个旅另1个团仓皇向南突围,行至五龙台,被红军四面包围,在混乱中为红军全部歼灭,石窝场之反

动民团 300 余人也被一网打尽。此时,万源守军廖雨辰等部 5 个团见红军攻势锐不可挡,惧怕被歼,乃于 18 日上午弃城经黄金口、峰尘场南逃,红军衔尾追击,于 19 日进抵宣汉以东之下八庙。红军另一部占领万源城后,继续向东发展,进抵城口近郊。

红军右路军于 18 日拂晓从江口渡过巴水,攻占老鹰寨,沿江口至达县的大道向达县攻击前进。途中在白衣庵、江林溪两地与溃兵接触,俘获 400 余人。21 日,在达县城西配合中路军红 30 军部队前后夹击,将凤凰山溃逃守军全部歼灭。

红四方面军发起宣达战役后,活动于宣汉、达县地区由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即积极活动,进行配合。红军突破刘存厚的土地堡防线向宣汉、达县前进时,与川东游击军一部胜利会师。游击军与中央梁(山)达(县)中心县委当即为主力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并动员群众积极支援作战。当宣汉守军逃至州河南岸时,川东游击军另一部及当地群众追歼溃兵 2 个连,俘获近百人。宣汉解放后,王维舟派人到红四方面军联络,报告川军廖雨辰等部和其他漏网溃军逃至宣汉以东的南坝场、圣灯寺一带,川东游击军和当地群众武装已对其展开袭击、困扰,要求主力协助游击军围歼该部。27 日,红四方面军派出 2 个团与川东游击军协同作战,将川军 8 个团击溃,俘获 500 余人。川东游击军乘胜追击,直抵开县近郊之高桥。

宣达战役结束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3 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归入红四方面军建制。

郭家河战斗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于1932年10月将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过平汉铁路西进川陕边地区。为继续坚持根据地革命武装斗争,红四方面军留置鄂豫皖的5个主力团,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会合后,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4师(徐海东任师长,戴秀英任政治委员);第75师(姚家芳任师长,高敬亭任政治委员),全军约7000人,并于11月30日,在檀树岗村召开成立大会。

同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清剿”,并将根据地划分为东、西两个“清剿”区。西区为经(扶)黄(安)“清剿”区,由国民党第14军军长卫立煌任指挥,“清剿”军为7个师。东区为商(城)罗(田)“清剿”区,由第1军军长陈继承为指挥,“清剿”军为6个师。1933年3月4日,“清剿”军第35师第103旅第205团、第104旅第207团先后投入“清剿”作战,并进占郭家河地区,准备长期驻守,以控制根据地中心。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首长认为,郭家河是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国民党军占领该地后,对根据地和红军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认为占领郭家河的国民党军第35师2个旅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郭家河东北面新集一带有第35师一部,东南面檀树岗、西张店一带有第30师1个旅,南面黄安七里坪有第13师,西面宣化店、黄陂站有第58师,大多距郭家河有1天以上的路程。战斗打响后,上述国民党军各部都

不易迅速增援。红 25 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高涨;郭家河一带地形和群众条件均有利于红军作战。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 25 军首长决心集中红 25 军主力歼灭进占郭家河之国民党军。其具体部署是:以第 74 师和军部特务营攻歼郭家河地区之敌;以第 75 师 1 个团占领郭家河东北摸云山,打击溃敌并堵截援敌;以 1 个团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在郭家河地区加入战斗,以扩大战果,或向摸云山方向机动,协同师主力打敌援兵。

3 月 5 日夜,红 25 军集中于野鸡笼地区。6 日拂晓前,第 74 师抵达郭家河东向戴家岗一带,即令第 220 团及军特务营从郭家河东北方向实施主攻;第 222 团从郭家河南及西南方向实施攻击。拂晓后,第 222 团进至羊人岩(又称羊儿岩)以东地区,发现羊人岩高地一带国民党军警戒部队约 1 个营正在集结。第 222 团遂乘其不备,以迅猛的动作实施全面攻击。将该敌大部歼灭,少部向郭家河逃窜。第 222 团乘胜追击,直抵郭家河南面,以 1 个营从南面佯攻,主力则从西南攻击。郭家河国民党守军遭突然打击后,仓皇由东北方向撤退,企图逃往新集。此时,第 220 团及红 25 军军部特务营已从尼姑台迂回到郭家河东北国民党守军侧后,当即予以痛击。在红军的两面夹击下,国民党军第 103 旅第 205 团及第 104 旅第 207 团被团团包围,经 1 个多小时的激战,该敌全数被歼。在战斗过程中,成千群众上阵助战,一些零散漏网的国民党军残兵,多为群众所捕获缴械。

郭家河战斗,红 25 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以极少的代价,将敌第 103 旅第 205 团以及第 104 旅第 207 团

全部歼灭,毙敌第 207 团团长以下 100 余人,俘敌第 205 团团长以下 2000 余人,缴获山炮 1 门、迫击炮 8 门、机枪 12 挺、长短枪 2000 余支、子弹 10 万余发,战马 100 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红 25 军仅伤亡 30 余人。

潘家河战斗

潘家河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在 1933 年反击国民党军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作战的一次重要战斗。此次战斗于 4 月 15 日拂晓发起,当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第 13 师 1 个团,使该师其余各路“围剿”军畏缩不前,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光山南区的进攻。

1933 年 3 月 6 日郭家河战斗结束后,红 25 军迅速转移并本着避实击虚的原则在转移中歼灭国民党军第 13、第 30、第 31 师各一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红 25 军计划与红 28 军会合以集中兵力进行反“清剿”作战。但这一计划由于受到国民党军第 89 师的阻隔,结果未能实现。为此,红 25 军递进至光山南部地区活动;红 28 军即进入皖西地区活动。

4 月上旬,红 25 军与红 28 军在湖北麻城大畈地区会合。8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为集中兵力打破“清剿”,将红 28 军并入红 25 军序列,编成第 73 师。廖荣坤任师长,王少卿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217、第 218、第 219 团。将罗山独立第 6 师第 16 团并入第 75 师,编为第 225 团。将部分地方武装并入第 74 师,编为第 221 团和师特务营。吴焕先任军长,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廖荣坤任副军长,全军共 1.2 万余人。整编后的红 25 军兵员充实,士气高涨,并相机西进郭家河地区,准备寻机歼灭分散孤立之敌。

国民党军“经(扶)黄(安)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在2~3月连续“清剿”而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解除了第89师的“围剿”任务,改由第13师担任全区的“追剿队”,向老君山、黎子沟北犯。

红25军主力进至郭家河地区后,准备歼灭位于罗山、卡房国民党军。13日,军首长悉国民党军企图后,果断放弃了进攻卡房国民党军的计划,决心乘国民党军第58师和第13师左纵队只行进至天台山以西地区,距右纵队尚远、而其第30、第35师尚未出动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打击突出、冒进的第13师右纵队,同时以根据地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作战,袭扰和牵制其它各路之敌。

14日,国民党军第13师右纵队沿倒水河西岸进至上潘家河附近,其第75团进至鸡公寨;第78团第3营占领黄石岩高地,第1、第2营在白果树店露营;师部及第76团在上潘家河露营。

对此,各部队传达了吴焕先军长和戴季英政治委员作战决心,区分了任务:罗山独立第6师在鸡公寨附近积极活动,牵制与迷惑进攻之敌,保障军主力右翼安全;第73师从正面向黄石岩国民党军进攻,歼灭当面之敌后以部分兵力控制已占地区,其余兵力协同军主力歼灭来犯之敌后续部队;第75师迂回于黄石岩右侧,切断该地区国民党军退路,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清剿”军后援;第71师为预备队。

14日夜,红25军隐蔽西进至黄石岩附近地区,罗山独立第6师迫近鸡公寨。15日拂晓,“清剿”军第78团出动,渡过倒水河向黄石岩方向推进,并与已位于黄石岩地区的第3营会合。罗山独立第6师遂向鸡公寨“清剿”军发起佯攻,牵制该

敌。第 73 师以突然勇猛动作首先攻占黄石岩制高点,歼其一部,尔后协同第 75 师将“清剿”军右纵队压迫至倒水河边狭小范围内,即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在歼其大部后,“清剿”军第 13 师师长万耀煌令纵队驰援,同时令第 76 团 2 个营渡过倒水河,支援其第 78 团战斗。红 25 军首长为防止万耀煌部第 76、第 78 团会合,遂命第 75 师以少数兵力继续攻歼其第 78 团残部;令各部主力转兵攻击万耀煌所部第 76 团渡河部队。当万部第 76 团遭到猛烈攻击后,仓皇回窜,其时突降暴雨,河水陡涨。在渡河逃窜中万耀煌部被洪水淹亡甚多,此时,在河西佯动的红军独立第 6 师再度向鸡公寨“清剿”军一部发起攻击,此举被万耀煌误认为是红军主力由上游渡河,便率领残部向七里坪方向溃退。在战斗中,万耀煌第 13 师左纵队借口天下大雨、山路难行以及电台失灵,迟迟未向右纵队增援;而国民党军第 37、第 35 师又害怕遭到歼灭,出发当日就迅速退回原地,结果使“清剿”遭到惨败。

这次战斗,红 25 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 13 师 1 个多团,打破了其对光山南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二、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王明路线及红军长征

1931 年 1 月,由于共产国际的不适当干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

任何积极作用,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组织上实现了王明等人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目的。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21岁时在武汉加入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他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不注重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只知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革命的某些经验,因而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国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二)在革命形势和共产党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鼓吹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企图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取得全国胜利。(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无视中国革命的平衡性和长期性,无视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服从和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为了推行“左”倾纲领和政策,王明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生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局面。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11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临时中央继续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政策。

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首先刚刚恢复的白区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继续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使共产党丧失了“九·一八”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白区党组织保存无几。

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积极贯彻“左”倾政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终未能打破“围剿”。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中旬到达川陕地区坚持斗争。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也被迫撤出洪湖,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在中央根据地,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于1932年10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1933年2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在运动中围歼敌军,取得了胜利。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正在这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1933年2月,“左”倾领导者错误进行了反对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所谓“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指责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打击。“左”倾领导者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提出“经济上消灭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口号;对民族工商业者课以重税,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等,给根据地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在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战争开始,他们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命令红军“全线出击”。红军屡战不胜,陷入被动挨打局面。这时,福建事变爆发,这是红军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但李德、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提出的将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的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继而重新部署兵力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合围之势,4月,集中进攻根据地北大门广昌,李德、博古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调集9个师的兵力进行广昌保卫战,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红军损失惨重,广昌失守。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求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在这之前,已有三支红军部队先行突围远征。第一支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10军团。粟裕、刘英率余部坚持斗

争,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第二支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1934年8月从湘赣和湘鄂赣区突围,10月到达黔东,与先期到达的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第三支是坚持鄂豫皖游击战争的红25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于9月突围,翌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26军会合,组成红15军团。这三支红军的远征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陈毅、邓子恢等组成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共3万余人坚持游击斗争,掩护主力突围,保卫土地革命成果。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向湘西突围,开始长征。

还在反“围剿”战争中,1934年9月,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矛盾,指派何长工、潘汉年为红军代表前往陈济棠辖区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以及可以借道等五项协议。红军进入广东后,陈济棠履行协议,命令军队撤离让道,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11月中旬,红军冲出第四道封锁线后,兵力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纠集40万兵力,拦截中央红军与湘鄂川黔的红2、6军团的会合。李德、博古无视战争形势的变化,继续主张死拼硬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央红军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若照他们的意见办,红军将与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决战,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央红军一支主力军团组成的先遣部队,奉命北上抗日,途经福建(闽)、浙江(浙)、江西(赣)、安徽(皖)等省区时的作战行动。

1934年,日本侵略军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继续觊觎华北、华东地区,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用重兵加紧进行对江西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央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处境危殆。

在上述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决定,抽调红军第7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沿途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和发展皖南地区人民群众正在举行的暴动,企图以此举迫使国民党军改变“围剿”中央苏区的战略和作战部署。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北上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红7军团时期;第二阶段为红10军团时期。

1934年7月6日,红7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全军团编有3个师:第19师、第20师、第21师,共计6000多

人,其中战斗人员 4000 多人。部队经闽西的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然后攻克樟湖坂,东渡闽江。按照计划本拟从古田直接北上浙西,再去皖南。但中革军委却电令红 7 军团东进,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突然在闽中出现感到震惊和疑惑,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地区的第 87 师向福州集中,同时又急调正在湖北的第 49 师星夜驰援福建。福州是福建省会,城墙高大,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郊有飞机场,城内驻守着国民党军第 87 师的 1 个团和 1 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部队。8 月 7 日,红 7 军团抵进福州并发起进攻,激战一昼夜,不克,遂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福州一战暴露了抗日先遣队是红军的一支实力不大的“偏师”,自此,便不断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9 日,7 军团在福州东北桃源同尾追国民党军第 87 师的 1 个团激战竟日,因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赶至,再次被迫撤出战斗。桃源战斗后,7 军团进入中共领导的闽东游击区,与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8 月 14 日,7 军团奇袭罗源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 1000 余人。罗源战斗的胜利,大大兴奋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在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部队的伤病员得到了安置,并补充了一批新兵员。8 月 16 日,7 军团离开闽东继续北上,尔后在闽浙边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堵截,于 9 月初顺利进入闽北苏区。7 军团自出征以来,一路马不停蹄,日夜转战,此时已人困马乏,本想利用闽北苏区良好的根据地条件,休整部队,并寻机给尾追之国民党军第 49 师以有力打击,借以摆脱被动局面。但中革军委却指示 7 军团不要在闽北停留,而应去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十军及闽北苏区

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9月9日，7军团离开闽北，北上浙西，不久进入江山、常山、衢县之间地区，一面对付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一面沿途炸桥断路。9月17日、18日，中革军委连续来电，指示红7军团停止继续北上，要求以遂安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遂安地处新安江上游，交通便利，地瘠民贫，又是赣东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无论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均不适宜建立根据地。此时，国民党军第49师、浙江保安第1、第2纵队和补充第1旅也从几个方向围拢过来，企图合击红7军团。在遂安建立根据地计划不可能实现，红7军团遂转向皖赣边行动。9月底，7军团抵达江西婺源县以北地区，才获知皖南地区的暴动已经失败。鉴于皖赣和皖南地区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军团领导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以主力在这一地区积极活动，争取群众，消灭和打击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仍未获同意。10月下旬，7军团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

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7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红10军团，下编3个师：7军团编为第19师；红10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军团领导也作了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寻淮洲任第19师师长，刘英任

第19师政治部主任,粟裕调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此时已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中央指示红10军团今后的行动归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指挥。整编以后红10军团的任务是:第19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的国民党军,发展新苏区;第20、第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的国民党军,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第19师在师长寻淮洲率领下,以突然动作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国民党军之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尔后打垮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2个团的尾追,渡过新安江,逼近临安,震动了杭州。接着转向皖南,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间北上,威胁芜湖。就在第19师在浙皖赣边机动作战,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根据国民党军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中央军区电令红10军团军团部率第20、第21师立即转至外线与第19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运动歼敌,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中央军区还决定,成立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10军团和创建新苏区的活动,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10军团行动,调回粟裕和刘英,粟、刘分别任10军团参谋长和军团政治部主任。11月下旬,方志敏、刘畴西率红10军团部和第20、第21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12月10日与第19师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会合,再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北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此时获悉,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10军团围追堵截,各路追兵现距尚远,惟补充第1旅追击积极,已抵达汤口。该旅系蒋介石之嫡

系部队,有3个团,装备较强,但孤立冒进,又不占地利先机。红10军团首长当即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灭补充第1旅大部,粉碎国民党军合围的企图,争取战场主动权。其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第19、第20、第21师的顺序设伏;第19师除以1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主要兵力应部署在乌泥关以北;第21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追兵进入设伏地域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其退路,阻敌增援;第20、第21师会同第19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争取将补充第1旅大部歼灭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12月14日上午战斗打响,补充第1旅遭红10军团突然打击,队形呈混乱形势,但由于第19师未能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在以南,南面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补充第1旅随即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向第20、第21师阵地进攻。第20、第21师不擅长正规作战,第19师又来不及增援,阵地遂被突破,乌泥关制高点也被占领。在此关头,第19师师长寻淮洲亲自率队向乌泥关制高点猛攻,虽夺回了该点,但寻淮洲身负重伤,转移下来后牺牲。此时战场形势逆转,红10军团被迫撤出战斗。谭家桥之战是红10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使红10军团的处境愈加困难。

谭家桥战斗后,国民党军调集第49师、补充第1旅、补充第21旅及一些地方部队,约计20个团的兵力,加紧追堵红10军团。从1934年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红10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泾县、太平、青阳、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10余县地区往返转移,其间进行

了10余次战斗,给国民党军以相当的杀伤,但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于是,军团领导决定全军经开化、婺源、德兴地区返回闽浙赣苏区。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加之军团领导在作战指挥上的迟疑失误,1月16日,红10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优势兵力重围之中,经过英勇卓绝的战斗,大部牺牲,小部突围至闽浙赣苏区和皖南山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同年8月,方志敏等在南昌被国民党杀害)。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归于失败。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怀玉山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开入浙江南部地区,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

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工农红军第2、第6两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和恢复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向湖南西部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发动的一次攻势作战。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湘鄂西红军第3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第6军团,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分隔阻拦与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会师于贵州东部印江县的木黄地区。这时,红3军有4300人、红6军团有3300人。会师后,两军首长共同决定并报中共中央批准,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仍任军团长、任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

治部(由红6军团政治部转派)主任,辖第4、第6两个师共4个团。红6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主任甘泗琪,军团暂编3个团。红2、红6两个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组成的红军第2、第6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作战行动(以下简称总指挥部)。

在红3军与红6军团黔东会师前后,中革军委先后数电要求红3军在黔东根据地积极活动;红6军团向凤凰、乾城前进(并打通与红3军的联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以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于湘西地区,策应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在任弼时领导下,两军团首长对中革军委的数电指示和当前形势及红军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地分析研究后,向中革军委建议:红2、红6两军团在目前形势下,应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集中行动,一方面加强对黔东根据地的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黔东根据地,另一方面集中两军团主力在湘鄂川3省边界的酉(阳)、龙(山)、保(靖)、永(顺)、永(绥)之间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然后再向湘西凤凰、乾城地区发展。中革军委对于红2、红6军团现状和湘西的实情不了解,不同意红2、红6两军团首长的建议,于10月26日再电指示:批评两军团集中行动是“绝对错误”;重申两军团必须按中革军委规定的行动方针,各自独立地去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两军团首长接到这个指示电后,又于27日和28日两次联名向中革军委陈述两军团分合行动的利害关系,并且再次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然后分兵去凤凰、乾城地区。在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的支持下,两军团首

长开会决定：不去乾城、凤凰地区，集中红2、红6两军团进军湘西，展开攻势作战，创建湘西北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为了迅速执行集中力量进军湘西的作战方针，两军团只用了两天的准备，便于1934年10月28日从南腰界出发，开始了湘西攻势作战的行动。

10月29日，红2、红6两军团进抵川东的酉阳县，守城川军旅长田冠五慑于红军声威，率部弃城逃跑，红军顺利通过了酉阳。这个时候湘西国民党军新编第34师师长陈渠珍惟恐红军返回湘西攻占其老窝、动摇其统治，急令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3个旅共1万余人，由永绥、保靖急速北上，阻止红军进入湘西。红军为避开陈渠珍师锋芒，避免过早与其决战，决定绕道鄂西咸丰经百户司渡过酉水向湘省龙山县的招头寨前进，牵动陈渠珍部向北运动。陈部果然北进招头寨，红军突然折转东进，于11月7日攻占了湘西北要地永顺县城。红2、红6两军团在永顺进行7天的休整。休整期间，红军领导层着手清理和解决了夏曦领导湘鄂西苏区和红军时期的错误；部队深入进行了战斗动员和作战物资的准备。还根据中共中央11月16日复电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湘川黔边省委，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为委员，以“集中与加强对湘川黔苏区的领导”；组织了湘川黔边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以“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两军团主要领导人不变，“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

在红2、红6两军团进占永顺并就地休整时，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部队正集中湘南地区堵截中央红军；湘鄂川边“剿

匪”总司令徐源泉所部正分散在湘鄂西的施恩、南县、津市、澧州地区；当面只有陈渠珍新编第34师3个旅共10个团的兵力。贺龙、任弼时等总指挥部首长经过充分研究后决定：集中两军团主力，采取运动战方针，首先歼灭陈渠珍部3个旅，在湘西打开局面，立稳脚根，然后发展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龙家寨战斗

根据总指挥部确定的作战方针，红2、红6军团结束休整后便集结在永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引诱陈渠珍师进攻。11月13日，陈师逼近了永顺，红军示人以弱，主动撤出县城，向北机动。陈师视红军畏惧就歼弃城北逃，立即挥师追击。总指挥部一面以一部红军与陈师保持不间断的接触，且战且退诱其尾追，一面沿途勘察地形，选择战场。其间，曾两次试图设伏，均因战机不成熟，没有实施。总指挥部首长决心打好进入湘西的第一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由于红军一退再退，陈渠珍部越发骄怠，咬住红军部队不放，一直追到永顺城以北90余华里的龙家寨。是时，贺龙、任弼时等红军首长发现龙家寨以北的十万坪谷地，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战场：十万坪谷地南北约15华里、东西最宽处约4华里，川地平坦，多村庄，但房屋多系木质结构，易燃易爆，不利于固守防御；谷川两侧的山势虽不险峻，但森林茂密，灌木丛生，既便于红军伏兵又便于部队多路突击。于是决定在十万坪地区痛歼陈渠珍新编第43师。11月16日凌晨3时，红2、红6军团伪装继续北退，退至十万坪谷川东北隘口时，红6军团迅速秘密地折转到谷川东

侧山上展开;红2军团则迅速埋伏在谷川北端的密林中。8时,陈师先头旅龚仁杰部侦察分队进入龙家寨,由于当地群众拥护红军保守秘密,到下午2时仍未发现红军伏兵。龚仁杰旅继续前进,周燮卿旅梯次跟进。担任后卫的杨其昌旅和皮德培团已在龙家寨、把总河等地宿营。当龚、周两旅完全进入十万坪谷川红军伏击地域时,红6军团首先从周燮卿旅翼侧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红2军团亦从正面猛烈攻击龚仁杰旅。红军出现得突然,打得猛烈,锐不可挡。周、龚两旅的不少士兵还未来得及拉开枪机,就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红军歼灭了周、龚两个旅的大部。战斗打响后,杨其昌旅和皮德培团虽然在把总河一线仓促展开,却不积极前往增援。后在红军两军团协同攻击下,也迅速溃散。红军主力乘势星夜追击,于17日重占永顺。是役,红2、红6两军团共歼陈渠珍新编第34师2个旅的大部,击溃1个旅另1个团,俘获其旅参谋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得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红军第2、第6军团进军湘西,首战告捷,不仅在湘西打开了局面,也为尔后发展攻势造成了有利条件。

十万坪战斗后,总指挥部为执行中革军委10月26日指示,遂留下红6军团第49团3个连在永顺、保绥一带活动,两军团主力准备南下渡过酉水,继续打击陈渠珍部,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凤凰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上述行动计划未能遂行,原因是陈渠珍部遭打后已加强防范,红军未能渡过酉水。更主要的是当时中革军委又电示贺龙与任弼时,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要红2、红6两军团坚决地深入到湘中

及湘西地区,首先要出击沅水流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并向常德、桃源方向积极活动”。指示规定:“应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巩固新苏区的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敌人)正规部队”;两军团仍归“贺、任统一指挥”。总指挥部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当面的具体情况,旋即回师,于11月24日占领了大庸和桑植。嗣后,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率领红6军团第49、第53团和红2军团第16团等部,留在新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率领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继续进行湘西攻势作战。

沅溪河战斗

1934年12月初,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由大庸南下,准备攻占沅陵后进入湘中,直接威胁湘南国民党军侧背,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由于防守沅陵的黔军廖怀忠第8师已有准备,红军攻占沅陵未果,于是变更计划、顺沅江东下,直进常德、桃源地区。此时,国民党军罗启疆独立第34旅已由黄陂船运常德。企图凭借该旅“官兵都是家乡子弟,极为可靠,弹药充足,装备占优势”,采取了“决战防御”的方针,誓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一死战。其作战部署是:该旅第701团配置在桃源北面的沅溪河;第702团配置在桃源与常德之间的陬市河汊地区;第700团配置在桃源担任机动;旅部直属队协同当地保安团防守常德县城。罗启疆妄称:如此布兵设阵,可以“消耗和疲劳红军的进攻,保持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得威胁和

进攻长沙。”

12月15日夜,红军以大雨和夜暗为掩护,向浯溪河急进。16日晨,其先头第12团在行进间发起攻击并一举突入了浯溪河西山的守军阵地。罗启疆旅第701团发现红军后续梯队拉得较远,一时还不能投入战斗,便集中兵力进行反击,企图击退红军第12团,恢复防御态势。红12团为赢得时间,保障主力顺利投入战斗,顽强地控制突破口。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红12团官兵发扬红军近战拼搏的战斗作风,连续击退第701团的反扑,守住了突破口,保障了主力顺利地投入了战斗。在红军的勇猛攻击下,第701团很快溃败下去,官兵竞相逃命,相互践踏。由桃源赶来增援的第700团的2个营,又畏惧就歼,与第701团溃兵一道,漫山遍野地向南逃窜。红军以一部分兵力追歼逃兵,捕捉俘虏,以主力直取河湫,进攻罗旅第702团。经2小时的激烈战斗,又将第702团击溃。防守桃源的700团1个营,被红军造成的声威所震撼,迅速弃城撤退常德。浯溪河战斗和河湫战斗,红军英勇顽强战斗,连续攻击,共歼罗启疆独立第34旅1个整团又两个营,击溃1个团。12月17日,占领了桃源,并包围了常德县城。

常德为湘西水陆交通的枢纽和政治、经济中心。此时,城内守军仅有罗启疆旅部直属队和1个保安团及部分溃退回城的残部。湘省军阀何键惊悉常德被红军包围,十分恐慌,急令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的李觉第19师、陶广第62师和章亮基第16师等部,星夜兼程北返,以防红军攻占常德后,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和安化,进而威胁长沙。蒋介石接何键求援电报

后,也命令在赣省“清剿”苏区的郭汝栋第26师搭乘火车与汽车驰援常德。徐源泉接何键求援电后,害怕红2、红6军团主力向鄂省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自行改变蒋介石令他率部入川与红军作战的决定,将他指挥的第48师、第34师、第58师、新编第3旅和暂编第4旅,集结于湘鄂边和湘西。国民党军李云杰和李韞珩2个纵队共4个师也转到了湘黔边界,防堵红2、红6两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由于红2、红6军团的积极行动,使国民党军10数个师(旅)受到牵动,这就在事实上达成了中革军委指定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即中央红军)之目的。”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了贵州省的东南部,并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确定的中央红军与红2、红6两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新苏区的计划,拟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建立新的苏区。20日,红军总司令电告贺、任、关、肖、王等红2、红6军团首长,通报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湘、鄂、黔3省国民党军行动情况,命令红2、红6军团主力在湘省国民党军已逼近常德、桃源时,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东行动。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1团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吸收了几千工人农民加入红军,筹措了一大批物资和钱款,于12月26日进占了慈利县城。27日又接朱德总司令电令:“我二、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留”,主力应“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域寻求翼侧机动”作战。于是,贺龙、关向应、肖克便于1935年1月初率领红军第2军团主力和第6军团第51团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

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一次最大战役。是役自1934年11月25日起至12月1日结束,红军人人奋起作战,不顾一切牺牲,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进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企图。

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已经无力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形势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0月21日到11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组成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地区。

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是转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重开局面。遂于11月12日任命湖南国民党新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辖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中薛岳指挥的第2路、北路军中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粤军陈济棠、余汉谋部4个师北上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前出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全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5路:第1路司令刘建绪,指挥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2路司令薛岳,指挥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

第3路司令周浑元,指挥4个师由资兴、郴州向道县方向追击;第4路司令李云杰指挥2个师,经嘉禾向宁远方向尾追;第5路司令李韞珩指挥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向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何键的5路“追剿”军和粤、桂“防堵”军有25个正规师兵力,实力确实不小。但是,湘、粤、桂系国民党新军阀貌合神离,各有打算,口齐心不齐。红军西进湖南,对何键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何键行动积极;粤军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时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的5项协议;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素与蒋氏不和,只求边境防堵自保;薛岳、周浑元系国民党中央军,从来不服地方军官长的指挥。湘南地区,原为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在这里有较大的影响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地国民党军力量不强,又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据此向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建议,乘何键各路军调动之际,组织红军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歼“追剿”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或以红3军团进击湘(潭)、宁(乡)、益(阳)地区,以威逼长沙,并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歼敌一部以调动何键各部,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毛、彭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使红军丧失了湘南机动作战的良机,而一味消极避战,继续向西退却,处境日趋严峻。

11月18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继续西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3、红8两军团为右纵队,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推进;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红9两军团为左纵队,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蓝

山方向推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16日,左纵队占领临武城。这时,桂阳守军2团已进嘉禾。右纵队主动以红6师从嘉禾南面阻击该敌南进,以保障左纵队,18日占领了蓝山城。接着,左纵队以日行100多华里的速度奔袭,于22日进占了道县县城;右纵队于24日占领了江华城(今水口)。随后,全军在道县与江华之间渡过沱水河。

中央红军渡过沱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虎落平川,不难就擒。于是下令何键的“追剿”军与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防堵”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实施四面围追堵截,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其部署是:刘建绪第1路日夜兼程,进至全州沿湘江布防,与桂军切取联系,共同堵截;薛岳第2路沿湘桂公路对红军进行侧击,防止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周浑元第3路经道县继续尾追红军,李云杰第4路与第3路协同追击;李韞珩第5路协同粤、桂两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李、白的5个师继续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堵截红军西进。在此形势下,中央红军即以一部进攻永明,以调动桂军,寻机渡江。此举果然奏效,李、白误认为红军要西进广西进占桂林,急忙将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调至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防堵红军入桂,同时又防止蒋系军队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兴安、全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便空虚了。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至全州之间地域,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

此时,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地抓住桂系主力南下,兴安到全州地域兵力较空虚的时机,突破湘江防线,冲出战略重围,才

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可能危险。“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能否西渡湘江,胜负关系全局。为此,中共临时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11月25日),要求红军“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中革军委于同日下午下达了《关于我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将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组成进攻部队;红1军团第1师和红5、红9军团组成掩护部队。具体的战役战略是:以红1军团主力为第1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前进;第1军团1个师、军委第1纵队和第5军团(欠1个师)为第2纵队,经雷口关或水安关及文市向南前进,尔后则依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第3军团、军委第2纵队及第5军团1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城,尔后向兴安前进;第8、第9两军团为第4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行)、三峰山向灌阳、兴安、道县前进。此间,何键已令刘建绪第1路的2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薛岳第2路的一部进至零陵、黄沙一线;周浑元第3路由宁远尾追;李云杰第4路和李韞珩第5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第2师、红3军团第4师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并架设了湘江浮桥。红5军团于28日控制了蒋家岭、水安关、雷口关地域,正在阻击“追剿”部队。这时,军委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渡江点只有160多华里,由于搬家式的行军,

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缓慢,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9日,“追剿”军刘建绪第1路追至脚山铺并向红1军团第2师发起进攻;其他各路也分别在道县、文市等地向红军后卫部队开展攻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各路国民党军在飞机火力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江点,并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于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是日,红军第1军团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绍水,第2师推进到朱塘铺,一部向全州逼近;红3军团第4师过江后,首先进占了光华铺,主力向界首前进;红5军团继续在蒋家岭一带扼阻追兵;红8、红9两军团到达水车;红军总司令部、军委第2纵队一部均进至宫山。30日,为掩护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抢渡湘江,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的脚山铺与刘建绪第1路“追剿”军激战终日;红3军团第4师在光华铺及其以西顽强抗击由兴安北上的桂军,主力渡过了湘江。红5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至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第2纵队渡过湘江进至界首附近的王家。红军总司令部渡过湘江进至界首西北的大田。担任后卫的红军一部被隔滞 in 湘江以东,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鏖战。

12月1日,中央红军的处境更是险恶。湘江两岸的红军各部同截击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被隔滞 in 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与“追剿”军顽强拼搏,而且越来越困难。为争取扭转险恶的局势,中革军委决定以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方向堵截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追周浑元第3路的部队,以保障隔滞湘

江东岸的红军后续部队抢渡湘江并前出到西延山区。遂命令红 1 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由全州方向来攻之敌,控制住红军西进的通道;红 3 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红 6 师暂留河东岸,占领石玉村,掩护红 5、红 8 军团等部抢渡湘江。在万不得已时,红 3 军团必须死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 5 军团主力向麻子渡前进,抗击桂军及周浑元第 3 路“追剿”军;被切断的红军部队应向麻子渡方向自动突围。是日 3 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致电红 1、红 3 军团首长,强调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面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12 月 1 日之战,“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中央红军的广大官兵,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指挥员沉着指挥,身先士卒,战斗员不怕牺牲,拼命战斗,经过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地浴血鏖战,终于阻住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掩护了中共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 12 月 1 日 17 时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山地区。红 5 军团第 34 师、红 3 军团第 18 团,为掩护主力被隔阻于湘江东岸,虽经殊死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遵义会议及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

的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过湘江后的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了。中央红军艰难转战,1935年1月,进占贵州省的遵义地区。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各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分析了“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朱德、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刘伯承、彭德怀等都在发言中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批评,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着重分析了“左”倾错误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明确指出这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

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指挥小组(以中革军委名义)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会议期间,红军第1军团集结于桐梓、松坎地区,第3、第5、第9军团等部分别集结于滥板凳、猪场、湄潭地区。各军团以一部兵力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部队休整。部队边整顿边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吸收新战士4000余人)。部队甩掉从苏区带出的笨重物品,实行轻装和精简机关,进而恢复了体力,增强了机动力和战斗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除以湘鄂两省军队一部围攻红2、红6军团,以川陕两省军队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了薛岳兵团和贵州国民党军全部,四川、湖南、云南国民党军主力和广西国民党军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8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以后,前锋已进抵乌江南岸;黔军王家烈以2个师向刀肥水、滥板凳,以1个师向湄潭发动进攻;川军刘湘调集了10多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组成“四川南岸剿共军”,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抵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川湘黔边界的

酉阳、秀山、松桃、铜山一线筑碉设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滇军 4 个旅 12 个团进抵贵州毕节地区;桂军 3 个师已抵贵州独山、都匀一线。此外,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正由河南向四川万县、重庆开进。

根据以上军事形势,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目前基本作战方针为:“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中央红军第一步任务是,“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和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中革军委要求红 2、红 6 军团向秀山、黔江、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来凤、咸丰、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活动;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向营山,主力从苍溪、阆中之线向嘉陵江以西发动进攻。

1935 年 1 月 19 日,中央红军兵分 3 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当晚,黔军第 1 师、第 2 师进占遵义,另一部进占湄潭。川军以模范师第 1 旅、边防第 4 路(2 个团)分别防守宜宾、泸州,其主力 8 个旅分别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等地推进。24 日,中央红军右纵队红 1 军团一举击溃黔军侯汉佑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至 26 日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纵队红 9 军团攻占习水,红 5 军团进抵三元场;左纵队红 3 军团进抵土城东南的回龙场地区。是

时,川军教导师第1旅和第5师第13旅先进赤水城并对红1军团发起猛烈反扑;教导师第3旅和独立第4旅由东胜场进至温水,先头进至土城以东的木栏坝,尾击红军,另有4个旅作为第2梯队跟进;第1师第3旅主力正向叙永推进,并重占习水。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中央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决定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军被击溃的有利时机,以红1、红9两军团各一部运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下之川军,集中红军主力求歼川军教导师先头4个团于土城东北之风材坝、万羔咀、表岗坡地区,以保障红军顺利北渡长江入川。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干部团,于拂晓向表岗坡地区川军教导师发起突然猛攻,激战1天,重创川军,但未能全歼。此时,川军第2梯队2个旅迅速增援并从红军背后发起攻击。中央红军腹背受敌,再战更为不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运动至古蔺、兴文、长宁西南地区集结,尔后视情况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当晚,红军以少数兵力阻击川军,主力撤出战斗。

1月29日,中央红军在预先架好浮桥情况下,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这时,川军以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并沿长江西岸布防;薛岳兵团所部和黔军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疾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2日,红军右纵队红1军团先头第2师猛攻叙永而未克,后卫第1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红1军团又先后在永宁、毛坝、大坝等地遭截击。红军左纵队第3军团在天堂坝与追击之川军1个旅展开激战。

在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分路围追堵截,并加强了长江西岸沿线防御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入川的原定计划已无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2月7日决定,暂缓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边境地区机动作战,争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为此,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进入川滇边地区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追剿”,将第1兵团编为第1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刘建绪为前线总指挥,除以一部在湘西“围剿”红2、红6两军团外,以一部策应第2路军作战;以薛岳兵团和滇黔西省军队为“追剿军”第2路,龙云为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即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4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专司“围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阀矛盾重重,何键见红军主力远离湘境,不愿再让湘军西进“跟踪穷追”;王家烈急于恢复其对贵州的统治,对“追剿”红军的兴趣不浓;桂军滞留在独山、都匀地区,徐图自保。只有川军刘湘和滇军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他们的领土而对防堵红军颇为卖力。2月7日,龙云下令孙渡第3纵队由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吴奇伟、周浑元的第1、第2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王家烈第4纵队防守赤水河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潘文华(指挥约15个旅)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蔺、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上,其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

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妄图合力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此时,蒋介石调集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多达 150 多个团,约 40 余万人。

2 月 9 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各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进行了休整与缩编。全军加上干部团共编为 17 个团,共 3.6 万人左右。红 1 军团为 2 个师 6 个团,红 3 军团为 4 个团,红 5、红 9 两军团各为 3 个团。11 日,孙渡纵队和潘文华所部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吴奇伟纵队一部已进至黔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东南方向扑向扎西。为避强击弱,脱离川军与滇军的合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即迅速东渡赤水河,向黔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展战局,寻歼王家烈部主力。按上述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于 2 月 11 日由扎西地区突然掉头东进,分 3 个纵队,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锅厂坝,于 18 日至 21 日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以红 5 团一部向温水佯动吸引追兵,主力向桐梓地区疾进。

中央红军突然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使蒋介石的“追剿军”措手不及。于是川军 3 个旅急忙由扎西附近地域向东尾追,却已落在红军后面三到四天的路程,红军则赢得了东出桐梓、娄山关的宝贵时间。黔军王家烈慌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地区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第 59 师、第 93 师由黔西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红军并与王家烈部合击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 月 24 日,中央红军左纵队第 1 军团先敌进占桐梓,援桐之黔军 1 个团退守娄

山关。翌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为达成上述目的,以红 5、红 9 两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运动防御,阻击川军;以红 1 军团主力和红 3 军团一部从娄山关东西两翼向守关黔军侧后迂回,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 26 日攻占了娄山关,并乘胜追击,击溃黔军 3 个团的阻击,于 28 日晨重占遵义城。天亮后,吴奇伟纵队第 59 师主力和第 93 师一部即向遵义猛扑过来。第 59 师主力向红 1 军团阵地红花岗连续发起冲击,当即遭到红军英勇反击,将其 1 个团击溃。于是该师又转向红 3 军团阵地老鸦山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离老鸦山阵地。协同吴奇伟部进攻的王家烈部,因屡遭红军重创,此时则观望不前。红 1 军团主力乘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突破第 93 师和王家烈部的抵抗,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仓皇率领第 93 师残部约 1 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穷追狠打,配合红 3 军团夺回老鸦山阵地,歼灭第 59 师大部。王家烈亦率残部逃向打鼓新场。

遵义之战,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正确指挥下,在 3 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 2 个师又 8 个团,俘虏约 3000 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仗,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使得其“追剿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奇耻大辱”。同时,中央红军获得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短期休整的机会。

中央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万分焦虑,于 3 月 2 日飞往重

庆,再度策划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妄图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北夹击的战法,夺回遵义并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他下令川军郭勋祺部2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相部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克复遵义;周浑元纵队4个师进抵仁怀、鲁班扬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孙渡纵队4个旅进抵大定、黔西北地区防堵;王家烈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吴奇伟纵队4个师(其中第59、第93两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各路作战。同时,命令李韫珩第53师由镇远向石碑推进,何键部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碉防堵红军东进。3月5日至10日近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准备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郭勋祺部向东运动,集中主力由遵义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地区,寻歼周浑元纵队。周纵队各部始终惧歼不前,只守不攻,红军多次寻战,终未得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在遵义西南机动作战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此举是“徘徊于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可能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因此命令各路“追剿军”按原定部署加快推进。至11日,川军郭勋祺部进占遵义,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后向鸭溪、遵义方向推进。

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两军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歼其一部”。依据这个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于15日集中主力对鲁班场之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周4个师猥集一团,不便于分割各个击破,

且吴奇伟部增援部队已进抵枫香坝,为避免前后夹击,陷入被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放弃进攻鲁班场,迅速撤出战斗,转兵西进,再创战机。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途中击溃川军1个团的阻截,于19日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旋即调整军事部署,令其所有“追剿军”各部以川南为目标全力追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具体布置是:周浑元纵队主力经鄯家渡向古蔺方向追截;吴奇伟纵队2个师归周浑元指挥,尾红军追击;孙渡纵队主力进抵毕节附近堵击;王家烈纵队以一部兵力运动于新场以北地区,寻找红军截击;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向仁怀、古蔺追击,第一师第3旅赶赴土城防堵;李韞珩第53师由石碑向遵义推进。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依据敌情变化,于3月20日决定中央红军“以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蒋介石,加深其错觉,红军以1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途中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随即从“追剿军”右翼分路向南疾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尾追之敌一部。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直飞贵阳,亲自督军,妄图寻中央红军主力决战。鉴于“追剿军”重兵猬集,不易分割歼灭。27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以吸引“追剿军”

向北,主力则乘敌还没有搞清红军意图之际,继续分路向南急进。翌日,中央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狗场地区,并于31日南渡乌江,从而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合击圈,把国民党军几十万“追剿”部队甩在了乌江以北。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动息烽,主力进占狗场、扎佐,前锋逼近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这是因为,此时贵阳及其周围只有黔军第99师4个团,如此单薄的兵力,何以挡住红军中央主力的进攻?蒋介石慌忙下令“追剿军”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保驾”。同时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跑。于是“追剿军”各路又纷纷转向贵阳急进。4月3日,中央红军在息烽至扎佐之间东进,5日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即以少量兵力东渡清水河,向平越方向积极动作,并在清水河上架设浮桥,作出全军东渡的姿态。此举果然使蒋介石又一次发生错觉,认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是又急令湘军何键部3个师向余庆、石碑推进堵截;令桂军白崇禧部1个师进至清水河以东的平越、中场一线防堵;急令已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孙渡、吴奇伟两纵队和李韞珩第53师,分3路掉头向东追击;令周浑元纵队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碉设防,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乌江。

滇军孙渡纵队由滇黔边开往黔东后,云南境内兵力空虚,这就为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就讲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中央红军乘“追剿军”各路驰援贵阳“保驾”之际,于4月8日在运动

中急转南下,以每天 60 公里的强行军,突破“追剿军”贵阳至龙黑之间的防线,经青岩、惠水、广顺、鸡场、老凹圪等地,向云南疾进。蒋介石又一次失措,气急败坏,急忙又命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李韞珩第 53 师在东进中调头向西,在中央红军右侧沿滇黔公路向云南追击;令孙渡纵队尾随中央红军追击。“追剿军”各路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士气更加低落,内部矛盾加重。4 月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先后进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地。原暂留乌江以北马鬃岭地区牵制敌军的红 9 军团,完成掩护主力南进任务后,也转战到达黔西的水城地区。此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进会合红 9 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入川。于是决定集中龙云、薛岳指挥的第 2 路“追剿军”主力向宣威、威宁地区逼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该地区。据此,吴奇伟、周浑元、王家烈三个纵队和李韞珩第 53 师分路向宣(威)、威(宁)地区转进,孙渡尾追红军不舍,川军郭勋祺集结毕节。

为了进一步调动“追剿军”各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命令红 9 军团继续单独进行,以吸引敌军,掩护主力行动。红 9 军团迅速由水城向滇东北前进,主力则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相继攻占马龙、寻甸、嵩明,于 4 月 27 日进抵杨林,前锋已逼近昆明市。这时的昆明,守军力薄势小;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尚在几百里以外的曲靖以东地区;另一个旅虽正向昆明进发,因遭红军打击,伤亡惨重,战斗力甚小;其它“追剿军”距昆明都有 3 天以上里程。龙云为保老巢安全,一面电催孙渡纵队取捷径回援昆明,一面调集各县团防武装防守城垣。这样,就进一步

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堵力量,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4月29日决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实现原定的“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并号召全军将士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果敢地去实现这一艰苦任务。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滇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珩、海龙塘、石板河进攻至皎平渡。5月3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边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又以一部分兵力北上,途中击溃增援敌人,至会理城下。在此期间,红1军团抢占了龙街渡,洪门渡等渡口的水流太急或江面太宽,一时无法架桥,且渡船又小,大部队难以过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3军团第13团由洪门渡过江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主力全都改由皎平渡过江。中央红军渡江过程中,“追剿军”先头已进到团街,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乘敌立足未稳,先机攻击,掩护主力顺利渡江。9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在滇东北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的红9军团,于5月2日攻占了东川(今会泽)并顺利渡过金沙江。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追剿军”各路人马,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则只有川康边防军1个旅。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守军;以红9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扼阻东岸追兵,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短期休整。四渡赤水作战胜利结束。仅就其

中大小近 40 次战斗的统计,中央红军歼灭国民党“追剿军”1.8 万人左右,击落敌机 1 架,缴枪数千支。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于 1935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 7 个多团,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 4 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 200 公里的地区,打破了川军依靠嘉陵江设防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的计划。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

1934 年 9 月,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失败后,蒋介石即开始布置“川陕会剿”,除组织参谋团入川、准备监督川军“剿共”外,并调其嫡系部队向四川开进。1935 年 1 月,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红四方面军在打破川军六路围攻后,即确定向川甘边发展,以扩大根据地。1935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中旬,先是乘国民党军“川陕会剿”尚未部署就绪,进行了广昭战役。1 月下旬接中共中央电示,要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从泸州以西的渡江行动。为调动嘉陵江西岸防守之陕军,又进行了陕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 7 个团,占领了宁羌(今宁强)、沔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防守广元、昭化之胡宗南部仓皇北上增援。

当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时,其他各线川军即乘隙向根据地进攻。东线第 21 军于 2 月 3 日占领万源,8 日占巴中,9 日

占通江。西线罗泽洲部2月5日占仪陇,田颂尧部占苍溪。为制止川军进攻,扫清渡江作战的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侵占仪陇、苍溪之川军。2月中旬,红军主力回师川北,于3月初向仪陇、苍溪地区的川军发起进攻,歼田颂尧、罗泽洲部4个多团,俘官兵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嘉陵江东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一段,除阆中外,悉数被红军控制。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转到川黔边地区,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计划,和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决定在苍溪、阆中地区强渡嘉陵江,发起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川军沿江筑有坚固工事,由田颂尧和邓锡侯两部防守,邓锡侯统一指挥,妄图凭此天险堵截红军向西发展。川军的布防情况是:

邓锡侯第28军17个团防守广元以北陈家坝、朝天驿至江口沿江地段。其中10个团守备江防,第3师第7旅和宪兵第2团防守江口至广元地区,第4师第12旅和第2师2个团防守广元县城及乌龙堡地区,第5师第14旅和第15旅1个团防守上西坝至朝天驿地区。警卫第3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第3师第8旅配置于三磊坝,宪兵第3团配置于下西坝,第1师第3旅主力第2旅一个团、特科第4团作预备队。

田颂尧第29军35个团防守昭化以南江口至新政坝一线。其中以23个团守备江防:第1师第1、第2旅和第5师第13旅共6个团防守江口至青牛庙,独立师防守青牛庙至小站河,第3路防守小站河至百里坝,第3师、第5路、第2师第5旅共10个团防守百里坝至河溪关,第4师第12旅和独立旅、警卫第3旅、第1路共10个团防守河溪关至新政坝地段。以

1 个旅作预备队。

这样,川军在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 300 公里的嘉陵江以西地区,共配置了 52 个团。但其防线绵长,有不少薄弱环节。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 50 公里的江岸,只有 3 个团防守,其前沿又只有 4 个营。同时,田颂尧、邓锡侯两部都遭受过红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低落,不少部队建制残缺,兵员不足。

红四方面军根据川军宽大正面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部署,决定集中主力,选择川军防御薄弱部分实施重点突破,同时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多路强渡。渡江成功后,首先歼灭沿江设防守军,夺取要点,并向两翼扩展,然后向纵深发展,以占领嘉陵江、涪江间的广大地区,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红军渡江作战部署如下:红 30 军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消灭江防守军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 31 军消灭剑门关守军。红 31 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军,并迅速向昭化、广元发展进攻,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位于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侧安全。红 9 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 30 军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川军,以保障左翼侧安全。红 4 军为方面军第 2 梯队,于第 1 梯队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红 9 军消灭南部守军,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团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 30 军强渡。红军大学在苍溪西关佯动,配合主力渡江。总指挥徐向前亲率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收集水文资料,为红军顺利强渡作了准备。

红四方面军利用各种机会,号召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部

队,都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完成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一、政治动员。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各种顾虑,增强胜利信心,树立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的决心。二、渡江侦察。各部队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内,以化装侦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查明守军兵力和火力配备情况。同时,嘉陵江西岸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给渡江部队提供了守军内部的一些资料及江防部署情况。三、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红军,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对于一般人员进行江河水性知识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四、物资器材的准备。要强渡江河,中心问题是造船。群众闻讯后运来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筹集了大量的废铁;很多老船工由各地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赶赴苍溪。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时间内造出了大批木船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这样,保证了红军的第1梯队与后续部队均能迅速投入战斗。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在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中,做到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等,使川军始终未能识破红军的作战意图。

3月下旬,红军渡江准备工作完成。28日,指挥部发出渡江命令。当夜,各部队开始强渡嘉陵江作战。红30军2个营和方面军直属教导营为突击队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动作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才被川军发觉。但川军火力尚未展开,塔子山的红军炮兵即向其前沿猛烈轰击,压制川军火力,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队登岸后,全歼守军1个营,

控制要点,击退了南北两翼川军的反击,巩固了登陆场。29日拂晓,红88师第2梯队2个团陆续渡江扩大战果。川军仓猝反击,妄图消灭红军于滩头阵地;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先以密集火力予以杀伤,然后集中主力实施突击,川军狼狈回窜。红军乘胜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从阆中后撤的川军第2师第5旅。

红31军第9师于29日拂晓前在苍溪以北之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克守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退刘汉雄师1个旅,巩固了登陆场。与此同时,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江成功。

第1梯队强渡成功后,迅即向纵深和两翼扩展。红4军也于苍溪加设的浮桥上过江,投入战斗。

3月31日,红30军及红9军一部经福兴场攻占剑阁,守军向江油方向逃窜。接着,红30军以红88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剑门山上的隘口,扼川陕孔道,地势险要。两旁均为数丈高的峭壁,山间仅有一条小路相通,用火力封锁即难通过。经川军长期驻守设防,地堡、堑壕密布,是江防纵深的重要支撑点。邓锡侯调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到该地防守。4月2日拂晓,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3师和第91师1个团,先后到达剑门关附近,对川军形成三面包围。但守军凭险顽抗,力图固守,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乃决定集中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掩护突击队对守军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红31军向隘口东侧守军阵地进攻;红30军向隘口西侧守军阵地进攻。川军在红军的猛攻下据险死守并拼命反扑,红军同守军展开多次肉搏,经半日激战,将东西两侧高

地全部占领,并乘胜夺取了隘口的北山主峰,切断了守军向北逃跑的道路。不久,剑门关守军被全部歼灭。

红军占领了“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川军沿江防线即土崩瓦解,溃兵纷纷向西逃窜。红30军和红31军各一部星夜直奔昭化,3日占领昭化城,歼守军1个团。红31军主力继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南下,并以一部包围广元城。

在红30军与红31军北向剑阁、昭化方向发展的同时,红四军主力即西向梓潼方向发展,一部配合红9军主力,南向阆中、南部城方向发展。阆中守军仓皇弃城向盐亭逃窜,红9军即于3月31日占领阆中。4月2日,又攻克南部城,全歼守军李炜如部3个团。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至此胜利结束。被击溃的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田颂尧被蒋介石撤职;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一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第2师第4团在西康省(今四川省)泸定县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击国民党川军的进攻作战。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

的高山,易守难攻。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在这里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击,并以第3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两岸布防,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以川军第24军主力由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训令强调指出:“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军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军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红军在北进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守军2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防守北岸之川军第5旅第7团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从而在守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1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抢渡成功,但这里水深流急,不

能架桥,红军只有4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河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尾追之薛岳部已过德昌,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击而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这时,川军以2个旅在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红军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第4团,于27日由安顺场出发后,为了抢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前夺取泸定桥,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的口号下,沿着崎岖山路,边打边走,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攀西面)等地击破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的阻击,于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军为国民党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守军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红军第4团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起开火,由第2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对岸冲去,在穿过守军于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城内,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歼灭守军一部,攻占泸定城。红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1师和干部团,也日夜兼程赶进,在击破川军1个团的拦阻后,胜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

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这样,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成泡影。

红军长征的胜利

6月中旬,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先期到达的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3月开始长征的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进军方向,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8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越川西大草地。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分别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这时,率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率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红军自俄界北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随后,红军又连续突破敌人在会宁、固原设置的两道封锁线,击溃尾追的敌人骑兵部队,越过六盘山,于10

月19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率领下,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经艰苦转战,1936年6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甘孜会师后,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积极力争下,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的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种和民族精华。红军转移到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人民参加抗日战争提供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长征还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诚意,驳斥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捣乱后方”、“牵制抗日”的诬蔑之词。

长征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 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相继退出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并进行长征后,留下了 1.6 万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在 8 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含今海南省),15 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海南岛琼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并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开展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扰乱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实施反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长驱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进攻,11 月下旬,占领了根据地的全部县城、交通要道和大部乡村。然后,采取分区“绥靖”、限期“清剿”的方针,企图一举全歼红军。在此期间,红 24 师等部队,实施了阵地防御作战,不断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在防御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5 年 2 月,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所作的新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红 24 师和地方武装分散开展游击战

争。在分散转移途中,红军的领导机关和部队大部损失,部分辗转到达赣粤边和闽西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中央分局的电台在突围时失去了与中共中央和各地区的联系,从此,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中,各地的中共党组织独立地领导了游击战争,在南方 8 省内逐步形成了 15 块游击区。

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秋冬反“讨伐”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族人民群众,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旨意,自发地组成抗日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名义的武装进行抗日。这些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其全盛时约 30 万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但由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派系不一,无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加之其领导人有的缺乏全局观念,纪律松弛,故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威逼利诱下,或被消灭,或遭惨重损失,或瓦解降敌,到 1936 年初已所剩不多了。

此时,由中共满洲省委组建的几支弱小游击队,在其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英勇奋战,迅速发展为 4 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两支反日联合军。他们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关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精神,递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第 1 至第 6 军。(第 7 军由第 4 军第 2 师在 1936 年冬扩建组成)同年秋,谢文东、汪雅臣、李华堂、祁明山(又名祁致

中)等部,分编为抗联第8、第9、第10军及独立师。抗联各部,在日伪军从1936年3月至9月进行的第1期“治安肃正”中,其第2军军部率主力由安图地区西进南满,留下第2师在宁安、东宁地区与第5军协同作战。5月,第2军第3师于抚松县境与第1军第2师会合。7月,中共东满特委、南满特委,抗联第1、第2军党委领导人在金川县河里地区的密营举行了联席会。会议决定两军合编为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统辖6个师。第2军3个师,改称第1路第4、第5、第6师。东、南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2人为委员。会议研究确定第1路军的作战方针为:冲破东边道山林地区,扩大游击区域。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西征辽西、热河、内蒙古,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第2军军部率第2、第4、第6师在原地坚持战斗,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行动;第5师仍在宁安等地配合第5军行动。

在吉东地区之抗联第5军,早在1936年春,即按为打破敌人“讨伐”,扩大游击活动范围的军事行动方针,和以宁安为中心,分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必要时向北挺进的行动计划,其第1、第2师主力,于同年夏,进至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与活动在该区的第3、第4、第6军的部队会合。9月,周保中率军部、军属直队向中东铁路东段转移,留下该军第3、第6团等部和第2军第5师组成道南留守处,继续坚持绥宁游击区斗争。

北满珠河游击区的第3军主力,在赵尚志军长率领下于

1936年1月进至汤原县境,下旬,同汤原游击总队领导人夏云杰、第4军军长李延禄及其他抗日友军的领导人谢文东、李华堂、冯志刚会合并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华堂任副总司令,张寿篈任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第3、第6军(由汤原游击总队组成)决定各留部分兵力组成以张寿篈为主任的留守处,建立在汤旺河一带的后方根据地,以第3军大部组织西征,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海伦游击区。3月,赵尚志率第3军之第5、第6团等部开始西征,先后进行了舒乐河镇、八浪河等多次作战,威震松花江两岸。至夏初,到达木兰县境,尔后又在巴彦、木兰、通河一带活动,开辟了巴木通新游击区。半年时间,第3军由6个团发展成6个师,活跃在北满的20多个县,打破了敌人的多次“讨伐”,使松花江南北两岸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1936年9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实施第2期“治安肃正计划”,将东、南、北满及吉东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以日军4个师5个独立守备队及各特种兵部队和伪军担任“讨伐”任务,9月日伪军正式开始向上述各区实施“讨伐”。

1936年7月,抗联第1路军根据“金川县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其第1师由本溪县境出发,西征辽西、热河,当进至辽阳地区时,遇强敌追堵,西进不能,遂行东返,途中在摩天岭与尾追之日军激战竟日,毙日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但自身亦伤亡很大,只得返回宽甸地区之密营

休整。为配合第1师西征和反对日伪军的秋季“讨伐”，杨靖宇、王德泰分别率部在南满各地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相继进行了通化县四道江、大拐弯子伏击战，袭击抚松县城，化装袭击了鸭绿江畔之大荒沟，以及错草沟伏击战，大、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等多次战斗，给进行“讨伐”之日伪军以重创。

10月，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以伪满第1军区之伪军为主力，调集第2、第3、第5军管区部分兵力和伪靖安军及警宪计1.5万余人，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满洲国军部大臣于芷江任司令，对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辉南、金川、柳河九县地区，进行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抗联第1路军根据上述敌情，决定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进行反“讨伐”作战。同时还决定以第3师再次西征。第1路军总部组织部队在深山密林修造密营，储备物资，以供部队反“讨伐”作战之需和休整之用。11月，在杨靖宇主持下，第3师组成了400余人的骑兵西征部队，下旬，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治委员周建华率领下，由兴京县出发，过清原，翻铁岭，越南满铁路，一路冲杀，于12月下旬进抵辽河东岸。然而始料未及，当年冬季气温偏高，辽河此时并未封冻，又因难觅渡船，部队无法渡河，再因行进急速、频繁战斗，人员骤减至100余人，且过度疲劳，日伪军大量逼来，在此紧急之际，西征部队只得放弃西征，绕道返回兴京密营进行休整。

在第3师西征期间，第1路军之第2、第4、第6师，在长白、安图、临江、蒙江等县境内广泛展开游击战。10月，在长白县境内毙日守备队80余名，在安图县东青沟毙日军石川上校、河村中校及伪混成第7旅官兵数十人，使敌人之“东边道

独立大讨伐”一开始即遭重创。11月,抗联第1路军部队,拔除了临江县大阳沟据点,伪军2个连被迫投降,接着又在长白县八道沟毙伤伪军40人。同月下旬,王德泰率第4及第6师一部于蒙江县小汤河活动,是时,遭伪骑兵第7团和教导队的突然夜袭。王德泰临危不乱,镇定从容,指挥部队夹击进攻之敌,毙伤伪军团长以下官兵40余人,迫敌仓皇南逃。王德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战后,魏拯民继续率部战斗在长白、临江等县境。12月,在十三道沟重创伪军“讨伐”队,在五道沟毙伤伪军50余名。留守长白县黑瞎子沟密营的第6师20余人,利用有利地势,巧设疑阵,伏击了前去“讨伐”的500余人的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近100名。日伪军在长白、临江境内连遭打击后,遂调集重兵,以图围歼活动于该区的抗联部队。魏拯民得悉敌方企图后,随即率第2、第4、第6师主力向抚松转移,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留下的部分部队在内线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1月间,第1路军第4师在蒙江县小夹皮沟伏击战中毙俘伪靖安军30名,在抚松县漫江沟歼伪军100名,接着袭占了南岗木场,随又与第6师在鲤明水沟设伏,歼伪军2个连大部。此外,第6师还先后进行了抚松县城南战斗、红山头 and 桃泉里等战斗。至此,抗联第1路军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之进行的秋冬季大“讨伐”。为此,伪满洲国军政部日本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哀鸣抗联第1路军是“满洲治安之癌”。

1936年秋,抗联除第1路军外,已大部云集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广泛展开游击战,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队伍获得迅猛发展,使日伪当局十分惊恐,把他们称之为伪满洲国的“北部国防上的心腹之患”。于是在1936年10月决定,以日军

第9师团师团长为司令官,调集了大批日伪军开始对以汤原、宾县、木兰、通河、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欲聚歼该地区之抗日武装。

为打破日伪军“讨伐”,贯彻同年9月18日召开的中共珠河、汤原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确定的“向新区发展,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中突击”的精神,和避免部队为敌聚歼,分散就食以减轻民众负担,抗联遂以第3军大部及第4、第5军部分部队组成远征队向小兴安远征,其余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配合远征队行动。第3军之第2、第3、第5、第6、第9等师为远征先遣队,分由方正、延寿、五常、宾县、庆城、东兴地区出发,11月先后会合于铁力县境,随即展开游击活动,在孙灵阁山附近与装备精良的500余日军激战一昼夜,毙日军80余人。同月,赵尚志军长率500余名骑兵队由汤原老钱柜出发,12月到达铁力县境,他向先遣队部署工作,随即又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北进。不久进至海伦、通北地区。此时,日军侦悉到抗联之远征意图,即在北黑线及黑龙江流域部署重兵,对远征队进行堵击、尾追和进攻。当赵尚志率队到达通北县冰锥子第5师之密营时,得群众密报,有日伪军800人进山“讨伐”。赵尚志根据当时虽敌我兵力悬殊,但所处之地谷深林密,时值隆冬,谷底已形成冰川,是难得的伏击战场。于是当即将主要部队分布在深谷两侧矮树丛中,形成袋形阵势待敌,以1个班兵力前出诱敌。是日午后,日伪军“讨伐”队被诱入伏击阵地内即遭密集炽热火力射击,被压伏在无处藏身的冰川上,死伤狼藉,然仍作困兽犹斗,连续组织了10次进攻,但均未得逞。当晚,日伪军被困于零下40℃的奇寒中,伏击部队却利用密营

木屋交替取暖,轮番出击敌人。次日,“讨伐”队方在援军的接应下仓皇撤退。此次战役,共毙伤日伪 300 余人。同日,第 3 军第 9 师与第 4 军第 2 团歼灭了海伦县六井子伪警察署全部伪警。冰锥子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向龙门一带挺进,途中击破了日伪军的堵击,克服了茫茫林海雪原和粮断水绝的困难。当其到达龙门附近之炭窑时,获悉日军乘坐 30 多张爬犁前来“讨伐”。于是赵尚志将部队设伏在日军来路两侧。是日 13 时许,日军进入伏击阵地,突遭伏击部队猛烈射击,丘井大尉以下官兵被歼。战后,赵尚志率队前进。连续的作战和艰苦行军,部队大量减员。待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已十分疲劳的部队突遭日军偷袭,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战骑全部丧失。余部 70 余人在赵尚志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对敌的仇恨与必胜的信念,克服了重重险阻,于 1937 年春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留在中东铁路南北、松花江下游活动的抗联第 3 至第 11 军各部,为配合远征队行动,他们有时独立活动,有时联合作战,或袭击、或攻城、或略寨,积极展开游击战,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他们先后进行了袭击林口城、小道沟附近的延寿伪警察大队,攻占军事重镇佛山(今嘉阴)城,刁翎大盘道伏击战,夜袭刁翎和攻打依兰县城等大小战斗上千次,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该区的大“讨伐”计划,保存了老的游击区,同时与远征队一起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兴等新的游击区,建造了后方基地和密营,并以此开办学校、医院、军需工厂,部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壮大和重大发展。

东北抗联在 1936 年中与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近 3000 次,歼日军上千名,伪军数千名,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欲于

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取得了反“讨伐”作战的重大胜利,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鼓舞了东北人民和其他抗日友军的抗战热忱,部队由不到万人发展到2.2万余人的10个军另1个独立师,组建了汤原、刁翎、长白山游击基地,建造了很多密营,保持了老的游击区,开辟了铁力、庆城、海伦、富锦、宝清等新的游击区,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四节 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华北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1933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不承认国际联盟讨论通过的《李顿调查报告书》,宣告退出国联。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狂妄表示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日本对“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有单独责任,无须他国干涉;试图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目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媚日外交,希望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演说,提出“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表示赞许。5月,中日公使同时升级为大

使。南京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在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集结重兵，准备随时入侵华北。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下野、省政府移至保定，更换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等要求。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完全接受日方要求，并在几天内即一一照办。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向何应钦提交“觉书”及附带事项，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出在河北的一切党政机关和所有中央军、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在此前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借口察哈尔张北地方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派土肥原贤二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要挟。6月29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等。“何梅”、“秦土”两协定，使中国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

接着，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防共自治运动”。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

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实现“华北经济圈独立”以及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提出了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狂妄要求。10月,土肥原到华北加紧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唆使汉奸、流氓在冀东香河县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宣称“脱离中央”,“独立”“自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个县实际上沦于日本之手。南京政府却适应日本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明令裁撤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指派宋哲元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

在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日中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在华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垄断华北的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关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据美国太平洋联合会最保守的估计,1935年中国走私进口的货物总值达2.5亿美元(产包括各种毒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通过华北各口走私运进的。

日本对中国的加紧侵略,直接威胁着英、美在华的利益。英、美的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英、美报刊指责日本是“黠武的国家”、“国际的强盗”,揭露

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以与日本的扩张相抗衡。1935年4月,美国派遣“经济考察团”来华。9月,英国派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实行币制改革,中国宣布加入英镑集团。12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华北“正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表示“中国任何部分的非常发展”“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次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国以白银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用以维持法币的汇价。南京政府进一步依赖英、美。币制改革和白银协定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使整个华北面临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的危险;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经济上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开始向亲日派发起攻击。宋子文、孔祥熙等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和颁发“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1935年8月,国民政府监察院提出不信任外交部长案(时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汪精卫只得请辞本兼各职。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举行,汪精卫被击伤。会议通过了冯玉祥等二十人联名提出的《救亡大计案》。随即,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蒋介石在19日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

后之决心”。大会通过的宣言也宣称“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12月，蒋介石亲自接替汪精卫行政院长职务，并一度主持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态度。行政院各部部长亦代之以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以国民党五大为契机，国民党内亲日派和英美派的力量出现明显消长，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亲日投降的外交路线受挫。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提出了“绝对不能容许”破坏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等条件。诚然，国民党的这种变化是初步的，不彻底的。华北在名义上没有分裂出去，实际上却已在日本控制之下。华北危机空前严重。

二、“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几千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爱国学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当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北平学生和市

民3万多人先后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收复失地。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游行群众再次遭到镇压。

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同情。宋庆龄和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杨秀峰、张申府等以及外国友人斯诺夫妇等各方面人士都对学生的斗争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从12月11日起,南京、上海、天津、武汉、杭州、济南、广州、西安、太原、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为青年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与领导下,近500名大中学生组成四个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活动,使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学生开始找到自己扎根的土壤,正确认识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后来,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总部设在北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先

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实际取代了共青团,成为共产党在宣传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方面可靠、得力的助手。到七七抗战前夕,民先队员发展到2万多人,甚至在巴黎和南洋的华侨青年中也有民先队员。民先队团结了广大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从而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它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其次,“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三、中共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八一宣言》的 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高涨。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口号,高举民族抗日的光辉旗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并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和“八一宣

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几个月间,中共连续发表三个抗日宣言,反映了形势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早在“八一宣言”发表的当天,蒋介石就从电台获悉。对于中共政策变化的新动向,极为关切。“八一宣言”是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发表伊始,便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制定了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状况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估计,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左”倾

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他也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提醒全党要注意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

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与西征

红一方面军东征

1936年2月中旬至5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东渡黄河,出师山西的东征战役。此役,历时75天,红军转战晋中、晋西南、晋西北广大地区,歼晋绥军约7个团,俘其4000余人,粉碎了晋绥军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堡垒线,予山西军阀阎锡山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同蒲路沿线20余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平津、太原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为后来红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

1935年冬季,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是中共和红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兵力仅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比较困难,扩军不容易。苏区

周围的形势比较严重;在南面、西南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 10 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 84、第 86 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 5 个旅。他们正加紧对苏区和红军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妄图将红一方面军困死、饿死,最终“剿灭”陕甘边地区。

参加对陕甘苏区围困并准备发动进攻的国民党军,主要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据守宣川、韩城、白水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据守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县城和附近一些乡镇,阻止红军向西南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井岳第 86 师从榆林、靖边、安边、定边向南袭扰,企图夺占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高桂滋第 84 师据守绥德、米脂和清涧地区;阎锡山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率领晋绥军 4 个步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和镇及其南北地区,并指挥晋绥军骑兵第 4 旅及井、高部队各一部“清剿”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以 3 个旅另 1 个团的兵力,沿黑峪口至禹门口 300 多公里的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中第 71 师第 216 旅 2 个团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 207 旅 2 个团担任包括沟口、河口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 72 师第 209 旅 1 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 69 师第 203 旅担任包括禹门口等渡口在内的大宁、吉县河防;另有第 101 师第 3 旅两个团在柳林机动。此外,以 6 个旅另 1 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

阳、临汾等地区防守,另有 14 个旅驻守在长治、应县、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黄河东征的方针,中央军委于 1935 年 12 月 24 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随后,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主要有: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晋绥军,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扩大红军,充实部队实力;调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工作;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了造船民工,并组建了工兵连,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各部队指挥员現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还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

1936 年 2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第 1 军团以第 2 师第 5 团为先头,第 2 师主力,第 4 师、第 1 师、第 15 军团第 81 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花坪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 15 军团打通联系。第 15 军团(欠第 81 师)以第 75 师第 223 团为先头,第 75 师主力、第 78 师随后,从河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

20日20时,渡河战斗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在预定的渡河点突破晋绥军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地区。之后,红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开始转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此间,山西游击队500余人从河口渡河,进至义牒镇为中心的地区,担任维护交通、巩固占领区的任务。

为了阻止红军的进攻,进而驱逐红军至黄河以西,阎锡山急调入陕之晋绥军4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1师等部,阻止红军北进,牵制红军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66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72师主力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2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69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另1个旅分路北上,均向隰县前进,阻止红军南进,牵制红军东进。另调驻浑源、大同之第68师2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2个旅到崞县至忻县间,随时增援太原;调驻应县的独立第3旅至文水、交城地区,以防卫太原的西南方。

为打破晋绥军的封锁,建立临时根据地,红一方面军首长彭德怀、毛泽东于24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绥军一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

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依据上述决心,红1、红15军团分别开始了行动。红15军团于2月25日1时先在石楼南端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晋绥军约1个营;继以3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预期的遭遇战中,歼晋绥军第69师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1个营。随后,军团主力转向东进,于27日占领水头镇。红1军团于26日下午从南北两面进攻关上村,歼晋绥军独立第2旅第4团。该旅旅部率第3团由石板上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将该敌歼灭。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凌厉的攻势,阎锡山以救援石楼为目的,一面电告蒋介石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编为4个纵队,于3月4日开始,分路向红军实施反击:第69师3个旅为第1纵队,由隰县向北反击;第66师3个旅为第2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第72师1个旅另1个团和第68师1个旅为第3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第101师和第71、第72师各1个旅共5个旅为第4纵队,由中阳向南反击。

鉴于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迅速定下粉碎阎锡山反击的决心:第1军团第2师一部在关上村钳制阎部第4纵队,第15军团1个营在石口镇钳制阎部第1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的主力,歼击兑九峪附近阎部第2、第3纵队。10日7时,红1、红15军团主力向兑九峪守军发起攻击,击溃阎部第一线部队。接着,阎部第3纵队在第2纵队的配合下,向红1军团攻击,红军两军团主力奋起还击,将其2个纵队击溃。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即被粉碎。

第一次反击被粉碎后,晋绥军第2、第3纵队退至孝义、

汾阳及其附近地区整顿;第1纵队一部退隰县,一部调回临汾;第4纵队主力仍在柳林、离石、中阳和关上村附近。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从3月上旬起陆续入晋,其第25师已进至灵石,第32军第141、第142师已经从正太路向平遥、介休间开进,第13军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分路向侯马开进。这些部队初到山西,开始行动比较谨慎。

为打乱阎蒋两军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力量,彭德怀、毛泽东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作战,扩大和发展战役胜利,其决心和部署是:以第1军团指挥第81师(欠1个营)组成东征先锋军(后称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首先向霍县出击,尔后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第15军团第78、第75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进至灵石以西地区,掩护第1军团南下;以第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第81师1个营和新组建的第30军等部为一路(后称中路军),由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继续包围石楼和在石口镇、关上村附近地区牵制晋绥军第1、第4两纵队,并保障黄河渡口及后方联络线畅通。

3月16日,红军右路军从大麦郊及其以北地区出发,于17日突破晋绥军汾河防线,包围了霍县县城,并占领了城北的道美、南关西村;左路军于16日由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于17日进抵灵石以西,并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这时,阎锡山为解救石楼并夺回被红军所占地区,又集中了4个纵队,于3月17日开始向石楼方向组织第二次反击。这样,太原、晋南、晋西北地区的防守力量便减弱了。彭德怀、毛泽东决心分兵南北作战:以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继续南下,相机进占赵城、

洪洞,并向曲沃、闻喜、运城攻击;以左路军乘虚北上,首先占领文水、交城,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县,创建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力争与陕北的神府苏区打通联系;叶剑英参谋长指挥的中路军,继续包围石楼,反击晋绥军的反扑,控制黄河渡口。这样,红军便形成了左、右两路南下北上发展进攻,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的有利态势。

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于3月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左路军于3月18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进到岔口镇作短暂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广大地区钳制了晋绥军4个纵队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的作战。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并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建立了地方党和政权机构,为下一步的作战准备了战场。红28军在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晋绥军,有力地策应了红15军团主力的行动。

3月下旬,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直接指挥由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编成的第5、第6、第7三个纵队,企图封锁黄河,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强令在山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进击,以造成红军后顾之忧。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首长于4月初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准备集中歼敌。为此,右路红1军团和第81师,即由古城、汾城(今襄汾)等地北上,攻占吉县,进至大宁、蒲

县、隰县地区,并逐一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的晋军黄河沿岸堡垒;左路红15军团,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于4月12日在师庄地区歼晋军第66师1个团另1个炮营,击溃其3个团,俘团长以下600余人,尔后转至大麦郊镇休整。红28军经金罗镇攻占三交镇后,经石楼到达康城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时,山西境内各路晋军纷纷向红军围拢,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陕甘宁各省国民党军队,向红军陕甘根据地进攻。为避免与优势晋军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4月下旬,方面军首长决定回师河西,遂于5月2日下达了渡河命令。自5月2日晚开始到5日,各参战部队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全部返回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同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至此,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西征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时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继东征战役胜利后进行了西征战役,给宁夏国民党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建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的倡议。但是,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的倡议,继续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并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等部共16个师另3个旅,对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围剿”。其部署是:蒋系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辖第4师、第89师)和晋绥军李生达第72师和1个炮兵团,渡黄河入陕,协同原在陕的高桂滋第84师、高双成第86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李仙洲第21师、关麟征第25师和晋绥军的2个旅为预备队,集结在山西境内待命机动作战。另以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辖3个师)、刘多荃第105师主力(2个旅)和西北军冯钦哉第7军第42师、孙蔚如第38军第17师,由延安、甘泉、鹿_鹿县、洛川、韩城、宜川向北,进攻陕甘苏区南部;以东北军董英斌第57军的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进攻陕甘苏区中部;宁夏马鸿逵第15路军(1个师5个旅)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胜(今下马关)等地;马鸿宾第35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还以晋绥军4个多师,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防备红军再次东进。

是时,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其广大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倾向抗日救亡,不愿同红军打仗。蒋介石、阎锡山素有矛盾、貌合神离,阎只求自保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剿共”。所以,蒋

介石进攻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只有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所部。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然反共坚决、积极,但防区广大,兵力有限,第15路军总指挥兼所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仅有步〈骑〉兵12个团,马鸿宾仅有第35师共步〈骑〉兵8个团。这是一个较薄弱的战略方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红军力量,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面敌人决战。据此,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陕甘苏区党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北上;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坚持东面的游击战争。确定上述三项战略任务之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空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进而发动全国抗战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军委依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战区形势,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进攻,开创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策应红四方面军与红2、红6军团北上。同时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陕北地方红军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蒋系中央军和晋绥军,保卫陕甘苏区;以红28军准备出击陕南,协同陕南红74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并吸引蒋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

况变化参加西征作战)。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西方野战军的第一阶段任务是:夺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20日前后,参战各部由现地出发,分2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经蟠龙、安塞进抵吴起镇(今吴旗);右路军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经永坪、蟠龙之间进抵新城堡;红81师、骑兵团及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是时,彭德怀的决心是:以红15军团兵分两路首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尔后向定边、盐池攻击,再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佯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一带的马鸿宾第35师回援宁夏;红1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机歼灭第35师,并迅速夺占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月28日,红15军团右翼队第73师袭占了宁条梁,左翼队第75师强攻安边未果。随后,红15军团以第78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并派一部兵力(骑兵团)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侦察。红1军团则由吴起镇向元城镇、曲子镇方向攻击前进。宁夏系“两马”的老巢,红军进攻宁夏,顿使“两马”惊慌。马鸿宾第35师一部急速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遗防由东北军接替。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领导人,请其“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不要阻碍红军的进攻;一面电示彭德怀,要红1军团立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上,相机攻占曲子及其南北一线,并指出,执行上述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6月1日,红1军团第1师进至曲子以北,向木钵方向警戒,第2师向进抵曲子的马鸿宾第35师第105旅旅长所率的特务连发动攻击,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下,该旅长冶成章率150余人投降;第4师于马岭附近击溃第35师1个营,进占阜城。2日,马鸿宾集中8个步(骑)兵营,向阜城反扑。3日拂晓,红1军团主力突然向马部发起猛攻,战斗3小时,马部8个步(骑)兵营大部就歼,1100余名官兵被俘虏。阜城战斗后,红1军团第4师控制曲子、阜城,并派1个团进占曲子西南的三岔;第1、第2两师继续北上,于4日攻占环县,5日攻占洪德城。红15军团第73、第75师,于4日攻占定边西南的洪柳沟,并准备打击马鸿逵的出援部队。为协调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东北军部队按中共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一线,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6月5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心继续兵分两路向西攻击,“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以第4师控制阜城至洪德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并准备在红29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以南发展进攻,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继续西征,攻占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继续向西推进,攻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78师准备撤回安边,西进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第81师和骑兵团暂留宁条梁、安边地区游击和做群众工作。西方野战军司令部率直

属队进至洪德城附近。6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之间地区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与苏联联系的战略枢纽,也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据此,彭德怀于10日下令由红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又称中路军),由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由陕南转兵北上,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要点,在东与老根据地连接,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的广大地区进行赤化工作,并准备以有力一部,消灭马部出援部队。

6月7日,西方野战军各路开始行动。至11日,右路军红15军团先头部队第73师第219团进占了同心城,其主力进抵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于13日进抵七营、上新堡地区,第4师继续控制三岔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终于切断了马鸿宾第35师余部经七营、同心城大路撤退中宁、石空堡的退路,打破了“两马”收缩兵力加强宁夏腹地防守力量的企图。在此期间,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北路军已进抵宁条梁、安边附近地区;红29军一部亦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活动,以配合红1军团的行动。这样,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广大地区,并开展了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6月14日,彭德怀确定西征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控制七营、上

新堡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第4师控制曲子、阜城、三岔等要地。右路军红15军团主力攻占豫旺县城,尔后攻占韦州城,以一部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一线,并向海原、中宁方向游击侦察;第78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方向游击侦察,打击马鸿逵的出扰部队,以掩护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北路军主力夺占安边,以一部兵力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方向游击;另以1个小团在宁条梁、横山之间地区开展赤化工作。各路军根据上述部署,旋即开始行动。

6月16日,北路军第28军、第81师和骑兵团完成了对安边的包围。是日2时许,暂归宋时轮、宋任穷指挥的第15军团第78师乘定边守军不备,一举袭占了定边城,全歼城内守军。17日,北路军首长留第28军一部与第81师继续围攻安边,率主力西进定边,准备进占盐池。21日3时,第78师和骑兵团攻占盐池,歼灭马鸿逵骑兵2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此后,北路军以定边城为中心,展开工作,一边肃清残匪,一边扩大红军和征集资材;第78师和第81师夺占安边并准备打击马鸿逵部出扰部队。左路军红1军团第2师于20日进占七营,主力位于七宫、八百户之间地区,防堵马鸿宾部北窜;同时在防区两侧地区展开群众工作。此后,马鸿宾部向西转移到海原、黑城一带,东北军一部接替七营以南的阵地防务。21日黄昏,右路军红15军团第73师一部攻占同心城以南的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枪数十支,战马100余匹;27日2时,军团直属手枪团夜袭豫旺县城成功,歼灭守军2个连,俘守军营长以下280余人,缴长短枪180余支、战马150匹。尔后,红15军团主力向韦州城攻击前

进。韦州城是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的战略重镇，马鸿逵接韦州告急讯后，立刻派兵 3 个团（其中骑兵 2 个团）前往增援。7 月 5 日，马鸿逵部第 20 旅旅长马全良率 3 个步（骑）兵团另 2 个营的兵力由韦州城进犯豫旺县城，企图夺回该地。当马全良部进至红城水一带时，遭到红 15 军第 75 师有计划的抗击，马部死伤 300 余人，狼狈退回韦州城。战斗后，右路军主力即在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红城水、大水坑、甜水堡、豫旺县城这一大片地区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北线，防守横山的国民党军高双成第 86 师，以 1 个团（骑兵 1 个营、步兵 3 个连）的兵力，于 6 月 24 日向安边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红军北路军首长当即决定：留一部兵力防守定边、盐池，主力回安边，准备打击高双成第 86 师援兵。7 月 13 日晨，由横山西援的第 86 师所部进至安边附近，被围城红军击溃，退回堆子梁。在此前后，北路军曾再次攻击安边，均未奏效。根据彭德怀的决定，红 28 军停止围攻安边，撤至安边以南休整，并准备打击出扰之马、高部队；第 78 师集中于盐池，担任赤化工作；第 81 师集中于定边，担任赤化工作。至 7 月下旬，第 78 师调至豫旺县城，归属红 15 军团建制；第 81 师调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池、定边西北防务由第 28 军接替。

在南线，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骑兵第 3、第 6、第 7、第 10 师），在张学良赴南京期间，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第 106、第 108、第 120 师与骑兵第 3、第 6、第 7、第 10 师及马鸿宾第 35 师余部，自固原至安庆一线北犯。6 月中旬至 7 月初，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并继续向曲子推进。随后，何柱国直接指挥步（骑）兵 4 个师和第 35 师余

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兵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本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已同中共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红军西征以来,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一直采取忍让和避免与其决战的姿态,但何柱国却认为红军的克制态度是软弱,继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彭德怀,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以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于是,彭德怀决心集中红1、红15两军团主力,给予何柱国以有力打击。部署是:以红1军团第4师及第1师第13团于曲子地区,阻击东北军第106、第108师北进;第1师主力和第2师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并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东北军的接触;红15军团集结于豫旺县城附近,待机出击。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6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攻击,被红2师一举击溃。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的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东北军遂暂时停止了进攻。

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行动。7月底,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行动胜利结束。

四、南京国民 政府内外政策的初步调整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华北扩大侵略和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经两度延期,于1935年11月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在会上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他在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蒋介石的讲演,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也反映了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大会闭幕不久,12月2日至7日,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1936年5月5日颁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将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推举张人杰等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席汪精卫,副主席

蒋介石。会议又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向会议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的决议。改组后的行政院各部门的主要官员中,亲英、美派势力占了上风。

对日外交日趋强硬和抗战准备

从1935年11月开始,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外交部长张群接任谈判后,在与日驻华大使有田的首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国民政府不赞成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外交的基础”,“不能抛开东北、华北问题,孤立地空谈中日关系调整”。张群的强硬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后,张群在与日新任驻华大使川越的谈判中,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关于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停止不法飞行,消灭察绥伪军等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毫无进展。12月中旬,因西安事变爆发,谈判终止。

南京当局一面以强硬态度和拖延办法应付对日谈判,一面进行抗战的准备。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决策:“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

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此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战略路线的主体,有关具体部署是:以四川为中心建立大西南总根据地;以华中重镇武汉为“国防作战中心”;以国民党统治心脏宁、沪地区为国防战略重点,修筑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无锡至澄江三道国防线,同时将全国划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大区域。除上述内容外,国民政府还就重要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内迁等提出了积极的设想,对于保护国家经济、教育、科研命脉,坚持抗战及维持大后方物质的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增强了国防实力,在日后的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方面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又因中国工业生产落后,尤其在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方面更为薄弱,没有独立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未能形成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

沟通国共对话以图政治解决

与转变对日政策相同步,国民党当局从1935年11月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共取得联系,谋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中日矛盾的激化,华北事变刺激了蒋介石,使他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其次,红军已被消灭大半,对国民党的统治构不成大的威胁。第三,在国际上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的支持。而同苏联改善关系,而首先必须同中共改善关系。第四,中共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下业已做出了反响,“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第五,在中共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国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对中共、红军的策略,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同时,主动寻求政治解决,以收编、招抚红军,如果谈判不成,再行围剿。

1935 年底,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宋氏姐弟委托董健吾去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1936 年 2 月,董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经西安到达陕北瓦窑堡,转达了国民党当局的意图。3 月 4 日,正在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及时提出了两党谈判的 5 项条件。董健吾回上海复命,至此,中断 10 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中枢之间的联系得到恢复。

蒋介石还指派陈立夫从其他途径打通国共关系,陈立夫委派 CC 重要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具体负责。1935 年 11 月底,曾委托部属谌小岑联络此事。谌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随后,吕振羽受命以北平左派教授的身分到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会晤,担任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方面之间的联系人。1936 年 6 月,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中共代表的身分到南京与曾养甫会谈,此为 1927 年国共分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与此同时,谌小岑还通过左恭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5 年 12 月,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1936 年 2 月,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到达陕北根据地,先后单独向博古、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了谈判情况。此后,张子华多次往返于陕北、西安、南京之间,为两党谈判做联络工作。1936 年 1 月,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

仪奉蒋介石之命,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表达了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意向,王明建议这项谈判在国内进行,并指派潘汉年为联系人。1936年7月潘汉年回国,11月,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上海会晤,潘向陈递交了中共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协定草案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党现状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联合抗日的具体建议。国民党方面在开始接触时,态度是积极的,但后来,陈立夫禀承蒋介石的“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旨意,提出以取消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作为两党联合的先决条件,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国共双方的初步接触,增强了彼此了解,减少了对立情绪,为两党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的公布和国民大会的筹备

国民党当局在有条件地谋求对中共政治解决的同时,准备实施宪政,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着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应于最近期间积极遵行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积极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拟于民国24年3月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立法院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之研讨”。1933年1月,立法院成立了孙科为首的40人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制宪”工作正式开始。6月,完成宪法草案初稿。1934年3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公布,由立

法院进行审查。10月16日,立法院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三读通过,送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审核。国民党中央的审查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初,经过四届五中全会、四届六中全会、五大、五届一中全会共4次会议。1936年5月1日,宪法草案通过,5月5日正式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宪草分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教育、宪法之实施及修正8章,共148条。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立法、监察院正副院长和立法、监察委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等政权。宪草规定总统副总统任期6年,总统对国民大会负责,有统率全国海陆空军,依法对外行使宣战、媾和、缔约,对内宣布戒严解严、大赦、特赦、发布紧急命令,任免行政、司法、考试院长及其他文武官员之治权。宪草规定了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依法律请愿、诉愿、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应试之权利,有纳税、服兵役、工役及公务的义务。但同时又规定: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律,以保障国家安全、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需者为限。宪草规定中华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公用事业及独占性企业以国家公营为原则,但必要时允许国民私营,“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以法律取得所有权者,其所有权受法律之保障及限制”。

《五五宪草》是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一部力图粉饰民主的宪法草案,规定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本质

则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个人独裁。《五五宪草》是国民党法统的基础,为1947年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之蓝本。

《五五宪草》公布后,召开国民大会的其他准备工作主要是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实施选举。

193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7月1日,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依照上述法规,国民大会代表分为两种,一为当选代表,即依选举法规定所选出的代表;二为当然代表,依《国民大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为当然代表。此外,规定以下五种人得列席国民大会:(1)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候补监察委员;(2)国民政府主席;(3)国民政府委员;(4)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之长官;(5)国民大会主席团特许之人员。

《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几经修改,于1937年5月2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修改后的代表名额为1440名,分配方法为:依区域选举方法选出者665名;依职业选举方法选出者380名;依特种选举法选出者155名。除调整了代表名额外,还对两法的其他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国民大会的职权缩小,限制在“制宪”范围;取消国民政府对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初选当选者的圈定权。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虽有初步成果,并原定1936年11月12日召开,但因故拖延长达10年之久。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素有矛盾。1936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常会主席胡汉民病故,使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决意利用此机会解决两广问题,派居正、孙科等人赴粤以祭胡为名,要求西南与中央精诚团结,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于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进行反蒋。6月1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2日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接着出兵湖南,南京政府也调集部队进入防御状态,内战一触即发。

两广事变的发生,引起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接受西南当局的抗日要求,同时要求西南当局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抗日诚意,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则对事变采取打拉并用的两手策略,一面派出大军准备进袭两广,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下,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这次反蒋行动。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西南问题的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被迫通电下野,旋即赴港。蒋介石认为分化桂粤目的已达

到,便电令白崇禧、李宗仁离桂任职。遭拒绝后,蒋又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方面也严阵以待。对此,全国人民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冯玉祥居中调停,双方举行和谈,蒋介石被迫收回成命,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因为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并起作用的结果。

南方两广事件刚刚平息,北方绥远再燃抗战烽火。1936年10月,在日军直接配合下,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攻绥远。对此国民政府严正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亲赴平地泉指挥,蒋介石也飞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战事,并令汤恩伯十三军驰绥增援。

保卫红格尔图的战斗是绥远抗战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战役,11月中旬,双方激战数日,终将伪蒙军彻底击溃。此后,日伪军以百灵庙为依托进犯绥北。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300余里,为西通河套,南达归绥、包头之交通要道。为确保绥远,红格尔图胜利后,傅作义即针对日伪军之行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收复百灵庙。11月23日伪蒙军数千人在日本指挥官率领下,由百灵庙向武川、固阳方面出动。绥军奋起应战,迅速将敌击退,并乘胜追击至百灵庙附近。双方在百灵庙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24日拂晓,敌势衰不支,全线溃退。为挽回败局,日军又指挥大量伪蒙军集结于百灵庙东北160余里的大庙地区,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向百灵庙反扑。10月2日,伪蒙军由大庙出发,向百灵庙发起攻击。严阵以待的绥军,当即予以迎头痛击。9日夜,傅作义下达总攻大庙令,10日上午,绥军收复

大庙。

绥远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声援,上海各界派出以黄炎培为首的慰问团携款 10 万赴绥慰问抗敌将士,北平学生成立了救护队、慰劳队、义勇队等组织,亲赴绥远抗日前线。绥远抗日获胜,举国为之振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西安事变和及其和平解决

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都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放在陕西,作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张、杨所部在“剿共”战争中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但不给予支援,反而趁机削弱张、杨的力量。张、杨十分不满,又感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现实逼着他们寻求新的出路。东北军、西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开展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在瓦窑堡会议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就分别给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和陕西地方实力派写信,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争取张、杨两部合作抗日的工作。

1936 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希望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兼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释放了在“围剿”战争中被俘的东北

军军官,并派李克农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 67 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本人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当时东北军驻防的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重要协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遣不少共产党员,如刘澜涛、刘鼎、宋黎等到东北军做中、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虎城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人有过合作关系,以后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35 年 11 月,共产党员南汉宸派人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当即表示赞同。12 月,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并派汪峰携信件到西安与杨会见。杨虎城联共抗日决心日坚。1936 年 2 月,共产党又派王世英与杨虎城继续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双方同时着手抗日准备等协议。不久,国民革命时期就在杨虎城部担任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奉命到杨虎城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还联合张、杨内部的进步人士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帮助张、杨消除某些隔阂,使两军关系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1936 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派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1936 年 8 月,日本卵翼下的内蒙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向绥远发起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 35 军军长傅作义率部抵抗。11 月,傅作义部在红格尔图痛歼日伪军,乘胜收复了百灵

庙、大庙等失地，取得了局部抗战的胜利。全国人民展开了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傅作义。但他仍然顽固坚持“剿共”方针。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集结重兵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云集西安，紧张部署“剿共”军事。10月31日，蒋介石颁布对红军的总攻击令。红军多次退让后被迫应战，11月21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78师2个团，这是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最后一仗。12月1日，毛泽东、朱德致函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增援绥远抗战；并给红军以抗日出路，开赴晋绥前线。蒋介石不但拒绝共产党的正义要求，而且在河南洛阳再次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调集30个师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图谋一举消灭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杨决心既不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慷慨陈词，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蒋介石毫无悔悟之意，表示誓不改变“剿共”计划。9日，西安地区1万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特务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为学生激情所感动，10、11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部队控制了西

安全城,扣押了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即通电全国,陈述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张、杨还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后事宜。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日本企图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公开威胁南京政府,暗中支持“讨伐”张、杨。英、美为遏制日本的扩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能维持统治,就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共同对付日本。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投机”,是“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另一方面主张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国内,国民党内出现了所谓“讨伐派”与“主和派”的对立,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何应钦被推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派”一度占了上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张、杨。国民党内冯玉祥等抗日民主势力也积极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内战再起。地方实力派中多数呼吁“政治解决”,少数主张付诸武力。东北军、西北军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中的多数也主张严惩蒋介石,但又忧虑内战再起。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及其前途,指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

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前途:或是由此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欢迎的;或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更迅速建立起来,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这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爱国分子所希望的。

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一)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道路;(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政治上、军事上的积极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共同抗日主张,并切实做好防御准备,随时迎击亲日派和日军的武装进攻。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将领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救国的一贯主张,力主和平解决事变。19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各界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立场。(二)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随时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亲日派的进攻。(三)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和平谈判。

12月16日,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向张、杨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就可释放他回南京,这将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张、杨对中共的抗日救国诚意十分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行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定,即:(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尖锐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业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迫使蒋介石下令撤离了包围陕甘宁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实际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基本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